

傳播研究與實踐

科技部TSSCI期刊

第11卷 第1期 2021 年1月

專題論壇：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

專題導言

國際本土結合、創新改革並行／蘇鑰機、羅文輝

特邀論文

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蘇鑰機

專題研究論文

新加坡的傳播教育：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個案／郝曉鳴

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林宇玲

傳播科系學程制度規劃與反思：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為例／施伯燁

研究論文

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以《電業法》修法為例／徐美苓

中共建政70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顏瑞宏

研究紀要

社群公關倫理的理論與實踐／鄭怡卉

典籍再現

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張惠嵐

主 編

夏春祥／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副 主 編

黃順星／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副研究員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林照真／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林鴻亦／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胡元輝／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胡幼偉／文化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施琮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編輯顧問

李金銓／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玉山學者

周成蔭／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館長兼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客座副教授

邱皓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系教授

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侯 傑／中國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胡智鋒／中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倪炎元／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高 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夏曉鵬／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郭良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陳憶寧／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張惠晶／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榮譽學院教授

張錦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張讚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黃清龍／旺旺中時集團副總經理、社長兼總編輯（退休）

黃鈴媚／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教授

黃懿慧／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講座教授

程曼麗／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鍾振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簡妙如／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英文編輯

蕭宏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執行編輯

劉玉哲／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羅尹悅／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ditor

Hsia, Chun-Hsiang /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ddress: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70
Fax: +886-2-22360278
Email: chhsia@mail.shu.edu.tw

Associate Editor

Huang, Shun-Shing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ditorial Board

Chen, Ping-Hu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Lin, Chao-Che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Lin, Fu-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Lin, Hong-Yi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Hu, Yu-Wei /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Hu, Yuan-Huei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Shih, Tsung-J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Wang, Hsiao-Yung /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Advisory Board

Chang, Chin-Hw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ang Hui-Ching /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Chang, Tsan-Kuo /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Chen, Guo-Ming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Chen, Yi-Ning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eng, Man-Li /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Chiou, Haw-Je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how, Cheng-Yi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Duke University, USA
Chung, Jensen /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Gao, Ga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Hou, Jie / Nankai Univesity, China
Hsia, Hsiao-Chua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Hu, Zhi-Feng / Beijing Film Academy, China
Huang, Ching-Lung / *Want Daily News*, Taiwan
Huang, Christine Yi-Hui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uang, Lin-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Jian, Miao-Ju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Kuo, Chen-Yu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Kuo, Liang-Wen /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Lee, Chin-Chua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Lin, Jing-Ling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Ni, Yen-Yuan /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English Editor

Shiau, Hong-Ch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xecutive Editor

Liu, Yu-Hs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Lo, Yin-Yueh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 11 卷 第 1 期 2021 年 1 月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紀念館**
Cheng Shue Wen-shing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編者的話

在未來的記憶中，新冠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勢必是我們對 2020 年的關鍵印象，變種病毒的全球肆虐更是現在生活中無法忽略的強烈衝擊。而疾病之外，我們生存的世界也面臨重大轉折；2020 年 11 月，民主黨的喬·拜登（Joe Biden）贏得美國總統大選，9、10 月在亞歐交界的亞美尼亞，因戰爭未勝讓出大片土地給亞塞拜然，8 月黎巴嫩港口倉庫大爆炸、6 月香港國安法通過、5 月美國非洲裔青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以及開春以來的澳洲森林大火造成數億動物死亡，在在地例證了今日生活世界的動盪生態。面對此種變局，學術該如何回應，現實又會如何變遷呢？身處傳播社群的我們，歡迎各種跨越學科界線的關注與討論。

本期專題論文關注知識生產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即一個產生學科共識與規範學門行動的互動過程如何形成，具體案例包括了如何成立科系建制、如何招聘教師人才生產專業知識、如何撰寫教材以培養新進人員等。當然，如何滿足生活需要、如何回應社會變遷，也都是知識的重要內涵。

在國際上，傳播學門的建制化源自於美國 19 世紀大量公立學校的出現，並在 20 世紀逐步落實，成為年輕學子們積極參與的新興範疇。在這背景下，華人的新聞科系誕生於中國動盪變革之際，並在上個世紀末 20 年迎來學術建制的蓬勃發展。21 世紀初，由於生活科技的大幅改變，資訊社會帶來的數位匯流改變了這些校系的過往安排，「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的主題關注過往，也著眼未來。很高興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系教授羅文輝擔任客座主編，負責本期專題論文的邀約、組織等；蘇鑰機更以熟悉的香港社會及中文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主題撰寫論文，作為此專題的特邀稿件。此外，本刊也依雙匿名審查程序選出三篇專題論文，合計四篇文章，共同討論華人傳播社群的建制化過程，有過往也有新近，時間跨度有長有短，內容分別討論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臺灣世新大學與南華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前兩篇論文記錄科系建立過程中的各個面向，及其與社會互動的關係，後兩者則討論在數位匯流衝擊下，臺灣社會中學程制度的變革反思與作法內容。兩岸四地的傳播教育蓬勃發展，本刊計畫以學術研究的方式介紹不同地區新聞傳播系所的各項發展，以讓讀者在新世紀對於這些知名院校有最新的理解與掌握。

本期收錄的研究論文，包含兩篇文章。首篇是由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徐美苓撰寫的〈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以《電業法》修法為例〉，另

一篇作者則是國防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顏瑞宏，探討中國大陸共產黨的閱兵儀式與習近平演說的相關影響。在科技政策的文章中，作者指出《電業法》修法乃攸關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與公眾息息相關，但作為傳遞資訊及維護公共利益重要管道的傳播媒體，並未善盡增進公眾參與議題的角色，且相關報導極少透過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框架加以論述，反倒是多引述經濟相關消息來源；研究結果同時指出若將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做出比較，主流媒體的觀點反較多元，且有更多公民參與元素。〈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關注的是近來世界變遷的隱藏臺詞，即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表現，以及相對應的政黨政策與國家治理是何種實際面貌；研究發現，公開演說中論述形構的期待為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與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鬥爭可以重建新世紀的秩序等；作者指出習近平言說主要訴求以政黨認同為召喚對象，中國人民及臺灣社會均在論述裡「被消失」，最強烈的他者則是美國。

而 2020 年 1 月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結果由民進黨的蔡英文與賴清德獲得勝利，但在選舉過程中，公共輿論與數位網路上的民眾意見呈現何種樣貌，一直是各方關注的重點；而在社群媒體的公關實務上，「網路口碑行銷」、「業配文」、「論壇寫手」以及「網軍」等概念，更揭示了臺灣社會對於這些與之相關的工作如何界定與面對有著極高關注。本期「研究紀要」刊出政治大學廣告系副教授鄭怡卉撰寫的〈社群公關倫理的理論與實踐〉，該文探討在公共關係實踐的過程裡，學術社群對於社群媒體扮演的角色，以及目前產生的各種影響；結論指出早期公關人員多在企業內，以業務導向的限定性角色為主，而在今日環境中，對於新媒體多元運用的企劃角色則益形重要，倫理議題因而值得深思。閱讀本文能激發想像，希冀能促成反思的開展，2018 年間日本關西機場事件與「卡神」楊蕙如網軍之間、2019 年間行政院農委會編列預算雇用的網路小編，以及選舉過程中的「1450」等都是不斷浮現、提供參照的具體案例。

最後一篇收錄在「典籍再現」的〈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是由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張惠嵐撰寫，評論文本是由來自於芬蘭的 Erkki Huhtamo 與 Jussi Parikka 合編的《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英文版 2011 / 中文版 2019），中譯者則是華中科技大學唐海江教授。媒介考古學是一個看似新興，但其實醞釀自長期以來不同學科的理論觀點，相關論點主要源自於德國與法國的知識傳統，主張傳播形式的物質基礎，絕非聊備一格，而是對訊息內容產生了制約性的規範影響，因此主張在內容上與人類中心主義的詮釋保持距離、認真凝視，並以具多重空間維度的技術結構來拓展媒介的深層時間與空間維度。這可說是對於歷史偏倚化的反撲，也是對於傳播偏倚（bias in

communication) 的一種認真思索。作者從思潮的醞釀脈絡說起，經由觀點主張與文集介紹的闡述，到最後對於譯本內容做出評估，邏輯完整清晰。

2021 年，本刊即將迎來刊物創立以來的第 11 年；發展過程中感謝各位讀者的鼓勵與支持，刊物的封面顏色與設計也略作調整，以迎接下一個十年。本刊近 3 年的退稿率分別是 2018 年的 79%、2019 年的 75%，以及今年度（2020）的 74%。我們期待在嚴謹審查之餘，也能替社群的知識想像與實踐範疇做出更具視野與寬容的拓展；而在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為因應教育部推動多元升等的「建制化」作法，本刊將原本存在於研究論文審查過程中的雙匿名審查制，推廣至「研究紀要」與「典籍再現」等專欄，以使社群同仁們可以獲得升等過程中的有力奧援。另外，期刊也接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委託，承擔專書稿件審查的學術機制。這些都是編輯顧問對期刊發展的語重心長，希冀期刊能肩負起推動觀念革新的社會責任，讓每位學者專家，每份系統探索的用心都可以被平等看見。只是，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難以一步到位，也希望各位繼續斧正，讓我們持續調校。

本刊編輯團隊也在本期出版後進行改組，感謝兩位來自於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的羅尹悅與劉玉哲老師這兩年在編務上的諸多貢獻；未來，將由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教師徐暄洵，以及數位多媒體學系的鄭元榕老師等新血接手繼續。而在英文編譯方面，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的蕭宏祺老師過去五年來付出實多，日後我們將交由專業編譯公司負責英文稿件的修改。未來，本刊將陸續推出運動傳播、傳播與遊戲，以及政治傳播等專題，歡迎各位學者惠賜稿件，共同就傳播社群內的更多面向進行考察與挖掘。

夏春祥

2020 年 12 月 22 日

目次

專題論壇：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

- 導言：國際本土結合、創新改革並行／蘇鑰機、羅文輝 1

特邀論文

- 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蘇鑰機 5

專題研究論文

- 新加坡的傳播教育：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個案／郝曉鳴 33
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林宇玲 53
傳播科系學程制度規劃與反思：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為例／施伯燁 83

研究論文

- 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以《電業法》修法為例／徐美苓 105
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顏瑞宏 141

研究紀要

- 社群公關倫理的理論與實踐／鄭怡卉 177

典籍再現

- 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張惠嵐 207

Contents

FORUM OF SPECIAL TOPIC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Introduction: Merging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Parallel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 So, Clement York-Kee & Lo, Ven-Hwei 1

INVITED PAPER

- Organizational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o, Clement York-Kee 5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of the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 Hao, Xiaoming 33
- Digital Challen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 Lin, Yu-Ling 53
- Plann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urse Module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of Nan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 Shih, Poyeh 83

RESEARCH ARTICLES

- Media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The Case of Revising the Electricity Act in Taiwan / Hsu, Mei-Ling 105
- The Offic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Regime Toward the Parade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s Founding / Yen, Jui-Hung 141

RESEARCH NOTE

-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on Social Media / Cheng, I-Huei 177

REVIEW AND REFLECTION

-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Illuminating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the Media Through
Media-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 Chang, Hui-Lan 207

導言：國際本土結合、創新改革並行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羅文輝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訪問教授

「華人傳播教育建制化」專題主要探索三個華人社會幾所新聞傳播院校的歷史發展，並分析各校發展過程的特色和經驗。另一個關注點是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問題，尤其是近年面對新科技的挑戰，院校如何重新規劃課程、培訓人才。專題共有四篇文章，其中兩篇考察兩所知名院校的發展，另外兩篇則具體分析學系如何重整課程。

蘇鑰機教授的論文以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簡稱為中大新傳學院）作為個案，探討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文章將學院歷史分為六個階段，並和香港社會發展作排比，以找出兩者的關聯。它使用結構與個人能動的框架，試圖結合宏觀社會情況、組織內部及個人因素。微觀上分析個別人物的學術背景、地緣關係、工作成果和師生傳承。

文章指出，中大新傳學院的課程強調「學與術並重」，研究取向以新聞、政治傳播、媒體文化為焦點。正如該院 C 研中心是以中華、比較、傳播為核心，學院的定位是比較中西方及大中華兩岸三地。學院強調社會參與，對時事進行研究評述。學院的特色是本地化和「系友化」，並探討其背後的條件因素。文章最後分析學院未來的挑戰，包括課程如何應對新科技環境，人員傳承的優良傳統，及面對環境變化帶來的人才流失與學術自主問題。

郝曉鳴教授的論文分析新加坡的傳播教育，以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作為個案。新加坡的媒體在 1990 年代迅速發展，因此新聞傳播教育要配合媒體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的發展進行轉型。新加坡缺乏新聞教育傳統，但得到政府支持，資源充足和硬體建設上都能夠打好基礎。新加坡規模不大，很難靠本地人作為師資骨幹，於是轉向國際招聘。學院提供良好教研條件，著力培養年輕學者，使他們成為科研的重要力量。

學院的特色是高度國際化，使學院的排名在國際及亞洲名列前茅。教師來自歐美和亞洲等地，海外經驗結合了本土情況。師生在國際刊物發表很多論文，學院實行嚴格考核制度，以保證教學與研究的質量。教師在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下，可以選擇自己的研究課題，錄取的學生質素很高，這些都有利於吸引國際師資。學院的課程目標是加強通識和跨學科教育，增加課程的多樣化和彈性。

林宇玲教授探討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並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分析改革經過和面臨的困難。新聞系經歷兩波改革，第一波是廢紙媒並建立網路媒體。實習報紙改變路線，將內容全部上網。第二波改革是數位優先，讓學生有能力在數位傳播的不同領域發揮所長。課程設計由「序列」改為「數位多工」，不再強調單一媒體或技能的培訓，重點放在跨／多平臺的應用。

系所採用「創新者模式」，老師帶領學生生產新聞，以「教學醫院模式」訓練學生各種新技能。新聞生產過程變得更開放，內容可以不斷更新增減，也讓民眾在網站平臺上對新聞議題發表意見。新聞生產過程還要包括平臺管理、社群互動及民主參與。這篇論文也探討數位衝擊對新聞教育帶來危機和轉機，當中涉及在新環境下訂立倫理標準，數位時代新聞學理論內涵，資深新聞教師如何應付數位環境等。

施伯燁教授透過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探討學程制度規劃。他指出該校在 2013 年開始推動課程革新，從「T 型教育」轉化為「 π 型教育」，後者加入了跨領域就業學程。學系要推動課程學程化，強調彈性和市場動態結合，設計專門課程組成「模組」，結合不同模組形成學程，目的在改善學習情況，增加就業能力與多元專長。

透過學生意見調查和專家座談，作者觀察到四個問題：如何規劃必修課程、如何建立與分類學程模組、如何銜接「總整課程」、如何面對實務課程與媒體產業。文章提出三個調整方向。第一是重新整合與分類課程模組，令它們彼此銜接，增加自主學習空間。第二是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讓學生有更多選擇。第三是加強學術與實務連結，以匯流代替課程的分流。學程制度可建立系所定位與特色；要發展問題意識與深層自主學習，以提升學生興趣並結合就業目標；師生要共同面對與適應媒體變遷。

中大和南洋理工大學的文章，主要分析學院發展與在地社會的關係。中大因應香港的位置，希望成為溝通中西、聯繫兩岸三地的交流橋樑。中大的特色在於教師本地化和「系友化」，前提是能夠建立師生傳承系統，但需要在本土與國際之間取得平衡。南洋理工大學後來居上，發展方向清晰。它著力國際化，不僅提供良好教研環境，更強調研究產出和實施嚴格的考核制度。其挑戰是要管理好本土與國際之間的結合，保持教員的穩定性。兩所院校有不同定位、不同發展策略，也面對不同挑戰。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面對數位挑戰和轉型，大膽採用「創新者模式」，關鍵的理念包括實踐、開放、彈性、互動、融合。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在改革課程規劃時，加入了跨領域就業的考慮。學程化過程中強調自主、選擇、彈性、銜接、匯流、適應、市場。它以學生為本，考慮他們的興趣、能力和就業前景。值得注意的是兩所院校的改革方向相同，但各自有其定位、都在努力更新嘗試中。這些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希望這個專題只是一個開始，日後有更多文章介紹華人傳播教育的發展經驗。

專題主編 蘇鑰機、羅文輝

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

蘇鑰機^{*}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摘要

一個機構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本身內部的規劃和運作，同時也和他身處的社會環境有關。在發展歷程中，機構內一些人物的能動性或可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可以作為個案，來展現機構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首先回顧該學院歷史的六個階段，並勾劃不同時期香港發生的一些重要大事，看學院歷程與社會背景之間有何聯繫。文章又研究學院早年師資的背景，以瞭解創系時的路向，特別是個別教師的工作和貢獻。學院的教育理念、課程特色、學術取向、研究重點也是本文的審視範圍。之後總結學院的一些發展經驗，尤其是教學人員的本地化和「系友化」兩個因素。最後將探討學院在新科技環境下課程要走的路向，及處於香港新政治氣候中如何面向未來的挑戰。

關鍵詞：機構歷程、社會變遷、個人能動、本地化、系友化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壹、前言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事物，要考慮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甚至不同時間，而且要明白向量兩端之間的互相關聯。這種取向可用於觀察不同事物，分析一個學術機構也如是。本文著眼的個案，是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簡稱新傳學院）。我們希望察看它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發展，省思其歷程與經驗。

具體而言，本文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審視中大新傳學院的歷史，及它和身處社會環境的關係。我們希望瞭解在社會、大學、學系、個人等層面的一些重要歷史時刻及其影響意義。第二個目的是勾劃學院的特色，及總結一些有用的經驗。中大新傳學院在華人傳播學界中是個鮮活的例子，究竟它的一些經驗是獨特的還是可以轉移的呢？

本研究的框架是希望兼顧宏觀與微觀的視角，瞭解大環境與機構之間的關係。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2015，頁 21）在所編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中曾這樣寫：

如果「新傳」是一個小火車卡，它走過的路軌有 50 年這麼長。1965–2015 年也是「香港號」這列火車的重要歲月，火車卡和整列火車唇齒相依，互為影響。學院經歷不同時期的變遷和發展，在不同年代發生的事件，某程度反映了香港的大環境。」

朱立認為，我們要向社會學取經，新聞傳播教育「總是和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與傳媒業同步，兩者彼此依賴、互動」（王彥，2017，頁 89）。

用社會學中的結構（structure）與能動（agency）關係來說，一個機構的運作和當中個人的作用是互動的，影響到機構的表現 (Dutta, 2011; Sztompka, 1994)。結構是指不斷出現的組織安排，足以影響個人的機會和選擇。能動是指個人能否作出自由的選擇。結構和科層組織是社會必要的組成元素，令社會可以有序地運作。個人可以在結構中扮演積極角色，而非完全受環境所制約，他有時甚至改變身處中的社會結構。在分析中大新傳學院時，這一對概念能夠提供一個有用視角。

本文有不同的資料來源，首先是中大在 1960 年代創立時，十多年間出版了三本《校長報告書》（香港中文大學，1969，1975，1979）。新亞書院的歷史也有專門刊物詳細記載，當中包括新聞系初創時的資料。第二個資料來源是學院在

40 週年和 50 週年時分別出版的兩本特刊（李玉蓮、姚霞主編，2005；蘇鑰機等人，2015），內有很多老師的回憶文章和各種珍貴資料。第三個來源是其他相關的書籍和文獻。本文作者在學院讀書和工作前後有 40 年，當中自然有一些經歷和觀察。

貳、早期的中大新聞教育

根據李家園（1989，頁 182-195）的考證，香港最早的新聞教育機構於 1927 年由香港新聞學社舉辦，聘得一些資深報人任教，於 1931 年便結束了。1936 年有新聞業者創辦了生活新聞學院，設有夜間課程，也只維持了很短時間。1939 年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立了中國新聞學院，於 1949 年結束。到了 1951 年，香港教育司開辦高級漢文夜學院，設有新聞科目，但只辦到 1956 年。同年聯合書院正式成立，位於港島堅道的分部設有新聞學系，由廣東一些資深報人擔任老師。不過聯合書院在 1963 年加入新開辦的中大時，原有的新聞學系被取消。

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的人口不到 200 萬，因有大量內地移民湧入，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統計，1961 年人口已達 310 萬。香港專上教育的步伐跟不上人口的增長。當時只有一所香港大學，在 1961 年學生總人數約 2,000 人。當時香港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口比例只有約 2%。同年有 4,600 人參加英文中學會考，另有 2,300 人參加中文中學會考，大學教育的需求很大（香港中文大學，1969，頁 5）。香港政府於 1959 年開始考慮，要成立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新大學，並於 1963 年正式成立中大。它由三所已在運作的書院組成，分別是有基督教思想的崇基學院、儒學背景的新亞書院，及服務本地社會的聯合書院。

中大創立時，除了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它同時加入了英聯邦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與英國大學設立學術交換計畫，法國、西德、日本、意大利政府又協助開設各科外文課程，並且得到英國及美國的一些基金會支持，發展研究中心和各項計畫（香港中文大學，1975）。此時新亞書院也獲得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財政上的支援，並在教育方面有長期交流。

新聞學系在 1965 年成立時，已確立 4 項教學目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頁 96-97；魏大公，1967）：一、以各種理論與實際課程，訓練學生在香港及東南亞地區從事記者、編輯及新聞事業管理之工作；二、使學生瞭解自由社會之真義，新聞自由之可貴及新聞從業人員對社會之責任；三、藉各種理論之訓

練，使學生畢業之後，能在國外或中大大眾傳播中心繼續深造；四、與香港新聞界密切合作，共同提高香港新聞事業之水準。新聞系創立之初，只設三、四年級，招收由其他學系完成首兩年課程的學生。課程內容兼顧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新聞專門課程。

中大剛成立時，於 1964 年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院的喻德基教授，來港協助設立新聞學系。他建議新聞系不設一、二年級，學系不應偏重新聞技巧訓練，新聞系應適當輔助大眾傳播事業提高其水準，並推動研究工作。換言之，應要達成教學、研究和為社會及新聞界服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9）。

學系的成立，有賴香港中文報業的大力支持，從學系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可見。主席是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 N. J. V. Watt，委員包括《虎報》社長胡督東、《工商日報》經理何鴻毅、星系報業公司總經理胡仙、《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還有亞洲協會代表袁倫仁、香港廣播電臺臺長 Donald Brooks 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港專員 Charles Mohn。當年由星系報業、《華僑日報》、《南華早報》共捐贈 12 個獎學金給新聞系學生。新聞界也協助代印學生的《實習新聞》刊物，並提供暑期實習機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9，頁 81-83；蘇鑰機，2015）。在 1965 年，《華僑日報》的岑維休出任新亞校董；星系報業的胡仙也於 1967 年出任新亞校董，並在 1975 年獲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

中大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學，與三年制具英國殖民地色彩的香港大學不同。由中大設立新聞系，一方面能配合香港中文新聞業的人才需求，也移植了美國新聞教育的傳統。因為英國的大學很少開辦新聞系，所以不宜將香港的新聞系設於以英文授課的香港大學。創立新聞系時，找了一些美國的教授前來設計課程和講學，並由亞洲協會資助建立群眾播導中心。

參、學院發展的六個時期

中大新傳學院至今 55 年的歷史，大概分為六個階段（蘇鑰機，2015 年 10 月 31 日），詳情可見表 1。首先是 1960 年代的始創期，由喻德基於 1964 年開始構思學系起計，年分由 1964–1973 年。由於新聞系是香港在正規大學首創，沒有很多前人經驗可參考，主要依靠留美學者喻德基提供意見。實行時由新亞書院的張丕介暫時充當系主任，加上聘請從美國畢業不久的魏大公，當時新亞同事戲稱「一個老爺一個兵」（黃建業，2015）。魏大公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1. 始創期（1964–1973）		
1964	美國亞洲協會資助下，新亞書院籌設新聞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喻德基來港協助	
1965	創辦中大新聞學系；成立群眾播導中心	
1966	出版《實習新聞》和《雜誌世界》	
1967		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
1969		推行 10 年建屋計畫
1971		推行 9 年免費教育
1972		紅磡海底隧道通車
1973	遷入沙田新亞書院現址	開展新市鎮建設工程
2. 定期期（1974–1982）		
1974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設廣播專業；成立傳播研究中心	廉政公署成立
1975	兩年制改為四年制；出版《傳播季刊》（ <i>Asian Messenger</i> ）	
1976	發生「沙田新聞事件」	
1977	宣偉伯來港擔任胡文虎講座教授，創辦傳播哲學碩士課程	
1978		實施 9 年免費教育
1979		地下鐵路通車；首批「居者有其屋」落成
1981	增設廣告及公關專業範疇	
1982		舉行首屆區議會選舉
3. 波動期（1983–1993）		
1983		港元波動，實施與美元聯繫匯率
1984	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新傳系系主任；1982–1986 年間先後有 5 位系主任	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第一波移民潮出現
1985	重申本科課程學術和專業並重	
1989		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第二波移民潮出現
1990		頒布《香港基本法》（簡稱《基本法》）
1991	聘請多位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大學改為三年制；新生人數由每年三十多人增至六十多人	立法局首次直接選舉
1992	本科課程專修範圍增加至 4 個：廣告、廣播、印刷新聞、傳播研究	
1993	開辦傳播哲學博士課程；英文實習刊物 <i>Varsity</i> 創刊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4. 穩定期（1994–1998）		
1994	計畫引進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大亞灣核電站落成及向香港輸電
1995	《大學線月刊》取代《新沙田》	
1996	開辦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董建華當選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臨時立法會成立
1997	成立數碼攝影工作室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1998		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股匯，政府入市干預
5. 發展期（1999–2011）		
1999	改名為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辦新聞學碩士課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居港權問題首次釋法
2000	開辦新媒體碩士課程；與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簽訂學生交換計畫	
2001	原有的傳播碩士課程，改為企業傳播碩士課程	
2003	設立中大新聞獎	沙士疫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爆發；50 萬港人遊行，反對《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
2004	開辦廣告碩士課程；成立傳播研究中心	
2005	開辦全球傳播碩士課程；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簽訂學生交換計畫	董建華辭職，曾蔭權接任特首
2006	《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成立新聞教育基金祕書處	
2007	與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簽訂學生交換計畫；擔任新聞教育基金祕書處	
2008	<i>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創刊	中國舉辦北京奧運，香港協辦馬術項目
2010	與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增設「點子創作」作為校內實習小組	泛民主派發起 5 區總辭，引發「5 區公投」
2011	<i>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 被納入 SSCI 數據庫	
6. 成熟期（2012–2020）		
2012	和商學院合辦五年制的雙學位課程；本科生恢復四年制課程；成立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C 研中心）	梁振英出任特首；反國民教育科爭議
2013	《傳播與社會學刊》成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收錄的期刊；與南韓翰林大學（Hallym University）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增設新聞與傳播學及社會學雙主修課程；推出新院徽	

表 1：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及香港大事記（續）

年分	新聞與傳播學系／院事件	香港重要事件
2014	增設創意媒體實驗室作為第四個校內實習課程	全國人大對普選定下 8.31 框架，引致占領中環及雨傘運動
2015	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簽訂學生交換計畫；《傳播與社會學刊》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的第一本外文附屬學刊；學院慶祝成立 50 週年	特首選舉方案被立法會否決
2016		農曆新年旺角騷亂；立法會宣誓風波
2017	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合作，成立全球傳播四年制本科課程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西九龍站內設內地口岸區
2018	《傳播與社會學刊》被評為 TSSCI 一級核心期刊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通車；港珠澳大橋通車
2019		反逃犯修例草案運動，過百萬人上街示威
2020	成立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實驗室	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引發第三波移民潮；全球爆發新冠肺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of Missouri) 新聞系，來港前曾短期於臺灣的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當時還有一位美國來的訪問教授 Charles C. Clayton，他又是剛成立的群眾播導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學，1969）。Clayton 在密蘇里大學畢業，有數十年的新聞實務經驗。喻德基在 1968 年留下來做了一年訪問教授，系務於 1967 年轉交魏大公接手，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院都享有盛名，決定了中大新聞系的發展方向。那時新亞書院要到 1973 年才遷入沙田的校園，新聞系師生之前曾在界限街孟氏圖書館等地上課（朱雯、黃郁文、李玉蓮，2015）。

第二階段是 1970 年代起，可稱為定型期，時間為 1974–1982 年。學系的規模稍增，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增加了廣播課程，並由兩年制轉為四年制。當時的辦公地方分設在新亞書院及大學中部的碧秋樓，後來才集中搬到山頂的新亞書院。1976 年，學系發生《沙田新聞》事件，學系的實習刊物報導了一些中大畢業生未能考獲政府的政務官，大學高層對報道要問責，令系內一些教師受到譴責及後來不獲續約（馮德雄，2015a）。余也魯出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陸續增聘了朱立、皇甫河旺、李金銓等源於臺灣的生力軍。余也魯又邀得傳播學大師宣偉伯（Wilbur Schramm，又譯作施拉姆）來港，在 1977 年創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積極為日後儲備本土的教研人才（余也魯，2015a，2015b）。在這階段，學系和美國及臺灣的學術界有一定聯繫，當年曾到訪或短期任教的學者有 Ithiel de Sola

Pool、Alex Edelstein、Robert Bishop、Bradley Greenberg、Ken Starck、William Hatchen、汪淇等。

1980年代的第三階段是波動期，由1983–1993年。此時香港前途未卜，中英談判剛剛開始，人心不穩，港元大跌，中大新傳學系的人事反覆。1982–1986年間，余也魯退休後，朱謙從夏威夷來了一個學期就提早離開了，系主任一職先後由鄭惠和與關信基暫代，到了朱立領導系務才穩定下來。此時有李少南、陳韜文、蘇鑰機三名校友先後從美國學成回歸，教師本地化悄然開始。學系在1980年代初增加了廣告和公關課程，但仍側重文字新聞訓練，新設立的《新沙田》替代了原來的《沙田新聞》。朱立推行課程改革，令學生選科更有彈性，又邀請外地教授來港短期任教，包括Erwin Atwood、Thomas Baldwin、羅文輝、王嵩音等（朱立，2015）。在此期間，由於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每年招生人數倍增，同時聘用了更多新聞傳播業界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六四事件嚴重影響了1990年代香港的發展，有一些老師移民離港，美國著名教授George A. Comstock被邀來當系主任，他先後聘請了幾位美國老師，包括James Kenny、Robert Stone、Bryce McIntyre、Lars Willnat、Karen Wilkins（黎淑怡，2015）。Comstock創辦了傳播哲學博士課程，但他逗留了兩年便返美國。

第四階段是由1994–1998年的穩定期，系主任一職開始由香港新生代接手。Comstock之後暫由梁偉賢接任，繼由陳韜文出掌系政。陳韜文從美國引入一些年輕剛畢業的留美大陸學者，如潘忠黨、魏然、陳懷林等，一些本地教師如李少南、蘇鑰機、馬傑偉、梁永熾、姚霞陸續回歸，又邀得李金銓再度來中大當講座教授。李金銓作為第二代主要的華人傳播學者，帶領著歸聚的第三代本地及大陸學者，努力探究各項學術議題。新傳學系此時士氣上升，開始凝聚力量。區報《新沙田》在1995年蛻變為《大學線月刊》（陳韜文、蘇鑰機，1996），加上在1993年創辦了英文的*Varsity*雜誌。1996年率先開辦了修課式的傳播碩士課程。

第五階段是發展期，由1999–2011年。新傳學系改名為新傳學院，預示了學院接下來的許多發展。唯一不變的是學系同仁繼續支持「學與術並重」的課程方針，它一方面強調理論和思考訓練，另一方面著重專業技術培訓，並且保持課程的彈性，以配合時代發展和業界需求。院長李少南銳意設立多個修課式碩士課程，在扎根香港之餘，並開始招收大陸學生，令學生和教師人數均增。同時大量聘請業界資深人士擔任兼職講師，加強和傳播行業的聯繫。此時學院又啟用電話調查民意中心，積極發展教研的廣度和深度。在大學對學院的常設撥款未有增加的情況下，仍能透過修課式碩士課程開拓新資源，擴充學院的規模與能量。

千禧年的後半段由蘇鑰機接力當院長，加強學生對外交換計畫，進一步發展與新聞界的關係，並設立了兩本學術期刊《傳播與社會學刊》和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教師隊伍以本地人為主，不少還是系友（例如馮應謙、邱林川、梁麗娟、朱順慈、李立峯），配合來自臺灣（例如羅文輝和黃懿慧）及海外的學者，形成一個既本土又多元化的團隊。

自 2012–2020 年是第六階段的成熟期，前一段由馮應謙出任院長，2017 年起由李立峯繼任，可說是由第四代華人傳播學者接棒。這段期間學院規模人手更上一層樓，獲大學增撥地方作教研及辦公用途。有很多本地的老師加入教研團隊（包括一些系友如譚蕙芸、潘達培、陳志敏、區家麟），同時也聘用不少大陸和外國學者，人數眾多及組成多元。課程方面新設「點子創作」（Pinpoint）和「創意媒體實驗室」（Creative Media Laboratory）兩個校內實習課程，成立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C 研中心），努力走向國際化，推出更多海外交換計畫和學習之旅，令學院在國際聲譽、收生質素及師生研究成果諸方面均名列前茅，兩本中英文學術期刊分別被收錄於 TSSCI 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學術數據庫中。在 2017 年學院和英國的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合作，成立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

肆、學院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表 1 列出香港自 1960 年代至今的一些重大社會事件，並且和新傳學院的大事並列，以作參照。香港在 1960 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調整治港方針，大力發展房屋、交通、教育、城市等建設，和不久前創辦中大是在一個共同社會脈絡。1950 及 1960 年代的香港仍然很落後，需要人力資金以作發展。中大的成立得到美國學術和文化界支持，首任校長李卓敏原任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系，初時借調 3 年到中大出任校長，後來一直留了 15 年（香港中文大學，1979）。另一例子是在 1966 年，中大仍在籌建校園，邀得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從美國來香港，對校舍設計提供意見（香港中文大學，1969）。

中大以新亞書院創建新聞系，而非由原有新聞課程的聯合書院統籌，這是個小小的謎團。歷史文獻對此並無明確紀錄，可能和當時新亞書院的意願和它掌握不同界別的人脈有關（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中大的目標是為香港培養不同行業的人才，例如首創新聞、藝術、音樂等學位課程。新聞學系得到報界大力支持，因為行業需要高質素人才，中大的課程將新聞訓練正規化，請來美國

著名新聞院校的教授幫忙。1965 年中大率先在香港創立新聞系，之後浸會書院和珠海書院均於 1968 年建立新聞科系，樹仁書院於 1971 年也推出相同課程。

到了 1970–1980 年代初學系的定型期，此時香港社會經濟起飛，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改善，大型基建包括地下鐵路、居者有其屋、9 年免費教育、廉政公署成立等，都標誌著香港的高速發展，這和新傳學系以及中大的發展同步。學系此時提供更多類型的課程，本科生人數倍增，並創立全港首個傳播哲學碩士課程。中大有頒授大學學位的優勢，在香港新聞教育中處於較佳位置。此時系內仍是臺灣教師作為主力，極少本地的全職教員。

1980 年代初，香港政治前景開始不明朗，出現信心危機。中英談判並不順利，港元兌美元匯率一度暴跌，雖然後來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仍出現第一波移民潮。此時新聞系的人事不穩，1982–1986 年間先後出現 5 位系主任，足見情況嚴重。幸得幾個年輕本地畢業生在外地學成後回校服務，局面得以維持。在此時期的後半段，發生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出現第二波移民潮，學系 8 名全職教師中有 3 人移民他去。後來 Comstock 當系主任時，僱請了數名外國學者以填補人員空缺。但外籍教師融入需時，加上有語言和文化差異，系內的能量和對外的聯繫未如理想。

在九七回歸前後，中英政府在政制和交接安排上仍有爭拗，於是有臨時立法會的設立，大亞灣核電廠此時啟用，回歸後出現短暫的亞洲金融風暴。政治主權易手，香港有人離開也有人從外地回流，整體政治局勢較為明朗。學系因有一些本地學人回歸，加上聘請了幾位源自大陸的年輕學者，人事上得以補充。系主任開始本地化，李金鈺由美國回來停留數年，研究氣氛活潑，環球媒體如何報道香港回歸都成為研究題目。

千禧年後香港經濟仍有發展，政治上偶然爆發大型示威，整體政經環境有起有跌，但大家一般覺得香港政治情況比回歸前預期的為佳。高等教育的質與量都有提升，浸會學院於 1994 年升格為大學，千禧年前後香港大學和城市大學先後設立新聞傳播科系，之後恒生管理學院升格為恒生大學，也成立了傳播學院，這些努力加強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廣度和深度。中大新傳學院在這段時期起飛，增加了人手，院內團結穩定，團隊以本地人為主，也有來自大陸、臺灣和外國的教師。學院得到大學支持，順利推出新課程和計畫。特別是陸續推出的五個修課式碩士課程和全球傳播學士課程，它們不單加闊了傳播學科的範圍，增加了學院的財政收入，又回應了近年傳播業界對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等領域的人才培訓需求。它能夠在教研方面發揮香港的中介角色，成為中西溝通的匯聚點，在

亞洲區內發揮顯著作用。

最近十年，香港發生數次重大爭議事件，政治環境逐漸下滑，令人擔憂社會穩定。同時大陸和香港迅速融合，文化上出現身分認同等爭拗，內地對香港的影響愈見明顯。此時中大新傳學院進一步擴充，推出新計畫又獲得一些學術榮譽。它一方面努力對外聯繫，同時也和中國內地有互動交流，招收頗多內地學生。學院在 1990 年代初已開始和海峽兩岸的學者交流，較有規模的是傳播學訪問學者計畫，自 2008 年起舉辦，每年邀請幾位大陸學者到學院作短期訪問（陳韜文、程曉萱，2017）。此外，學院 C 研中心的工作小組每年擬定主題，提前公開徵稿，邀請大約十位大陸、臺灣和海外的學者參加每年一度的工作坊，大家提交論文和作深度研討。部分論文經匿名評審後，發表於《傳播與社會學刊》，並曾出版專書。

曾參加過工作坊深圳大學的周裕瓊表示：「香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好比一個海納百川的學術海港，而一年一度的工作坊則引來千帆競秀」（陳韜文、程曉萱，2017，頁 71）。武漢大學的尚珺說：「工作坊非常好地以研究問題為導向，聚合兩岸三地和國際學者，讓大家充分地、自由地進行討論，這種思想風暴所帶來的衝擊勢必對研究者產生重要的引領作用」（同上引，頁 91）。臺灣中正大學的管中祥說：「來自各地的華人傳播學者在此分享研究與實踐，溝通、批判、論辯，不但能走出研究的同溫層、舒適圈，更重要的是，彼此砥礪、擴大視野，反思自我的局限，為華人傳播研究留下重要的累積」（同上引，頁 92）。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大背景下，學院作為東西方橋樑及扮演兩岸學術交流的中介角色頗為重要。除了接待大陸和臺灣的學者到訪，一些中大的教師前往兩地講學交流。例如陳韜文是首位傳播學的長江學者，經常在復旦大學與師生互動，馮應謙也曾獲選擔任珠江學者。近十多年來，中大和清華大學及政治大學都有簽訂短期學者互訪協議。

新傳學院有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的傳統。早於 1980 及 1990 年代，學院的老師在《信報》開闢「傳媒筆剖」專欄，每週輪流撰文。由 2014 年至今，又在《明報》觀點版設立「媒體解碼」欄目，由同事每週撰寫媒體評論。學院在 2003 年設立中大新聞獎，每兩年一次評選優秀的香港新聞報道作品。自 2006 年起，學院和新聞教育基金合作，舉辦活動一起努力促進業界的水平。學院不時發放媒體調查結果，例如在 2014–2020 年間，進行連串有關「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的調查。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之後，學院接受監警會委託，進行了大型的民意調查研究，並提交和公開了詳細報告。

伍、師資背景和系主任情況

要深入瞭解一個學術機構的特點，就要觀察它的師資和學生，尤其是主要負責人的背景、學術訓練和工作成果，因為這些都會影響該機構的發展路向。在中大新傳學院逾半世紀的歷程，有眾多學者和老師，其中曾任系主任、院長等人物，都值得分析（蘇鑰機，2020）。

首任系主任張丕介屬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是經濟學者，他在新聞系創立的頭兩年兼任系主任。之後接棒的魏大公在新聞系服務了 22 年，其中 6 年擔任系主任（馮德雄，2015b）。喻德基和 Clayton 也是重要人物，雖然他們留在系內只有 1-2 年。在這十多年間，有 14 位訪問學者，他們來自外地，多停留 1-2 年，接力在中大作短暫教學。詳情可參看表 2。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德國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博士	中國中央政治大學	1965-1967 年兼系主任
魏大公	1965-1987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	1967-1970 年、1971-1974 年兼系主任
Charles C. Clayton	1965-1967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ason Rossiter Smith	1967-1968	美國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學士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喻德基	1968-1969	美國埃奧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博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harles L. Allen	1969-1970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	
陳閏	1970-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1970-1971 年兼系主任
John Hohenberg	1970-1971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		
沈承怡	1971-1972	美國密蘇里大學博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	
Slo W. Sanders	1972-1973	美國密蘇里大學學士		
李宜培	1973-1976	美國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學士		
馬鴻昌	1973-1974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埃奧華大學	

表 2：1960 及 1970 年代入職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專任教師名單及背景（續）

姓名	任教年分	最高學歷	教學經歷	其他
Mark A. Reese	1973–1974	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余也魯	1974–1982	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碩士	香港浸會書院	1974–1975 年、1977–1982 年兼系主任
陳黃義敏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博士		
John L. Mitchell	1974–1976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碩士		1975–1976 年兼系主任
黃維忠	1976–198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		1976–1977 年兼代系主任
張全聲	1977–1980	美國密蘇里大學碩士		
皇甫河旺	1977–1987	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碩士		
Wilbur Schramm	1977–1978	美國埃奧華大學博士	美國史丹福大學	創辦碩士課程
朱立	1978–1991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博士		1987–1991 年兼系主任
李金銓	1978–1982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		1994–1998 年任訪問教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余也魯曾於 1966–1968 年中大新聞系擔任兼職，其後在浸會書院開創傳理系並當上系主任。到了 1974 年，中大聘請他回到新聞系出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至 1982 年退休。在他任內，新聞學系易名為新聞與傳播學系，由兩年制變成四年制，加添了一些課程。當時黃維忠是唯一的香港人，在學系畢業後到美國學成回來，於 1976 年起任教了十多年。傳播學大師宣偉伯應其學生余也魯的邀請，於 1977 年到中大出任胡文虎傳播講座教授。他原本打算來 3 年，可惜只逗留了 1 年便返美（李少南，2015）。後來他和余也魯在 1982 年到大陸幾個城市作旋風式訪問，為傳播學日後在中國的發展埋下種子（蘇鑰機，2012）。

皇甫河旺、朱立、李金銓 3 位來自臺灣，在美國留學後到中大新聞學系任教。他們停留了頗長時間。皇甫河旺（2015）對領導中文編採課程很有貢獻，後來回去臺灣學界任職，多年後再到香港珠海學院出任新聞與傳播系系主任。朱立在 1970 年代末加盟，服務了十多年後移居澳洲，他在中大後期當系主任，穩定了系內的局面。後來朱立接受浸會大學邀請，擔任傳理學院院長直至光榮退休（簡

稱榮休）。李金銓在 1970 年代末在中大只逗留了 4 年，後來在 1990 年代中期再次來中大，他雖然沒有擔任主要行政職務，但在培訓學生和帶領研究團隊方面，影響甚大。李金銓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榮休後，回港加入城市大學傳播與媒體學系，後期當系主任直至再榮休。他們幾位都和香港兩度結緣，而且貢獻良多。

這些老師的學歷，反映了一些外國大學對中大新聞系的影響。其實早年中大和其他香港學校的新聞系，都有很多外地學者，可說是「依賴式的發展」（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從表 2 可見，中大早期有 6 位畢業於密蘇里大學的教師，來自埃奧華大學有 3 位，密西根大學有 2 位。他們都來自美國有新聞傳播學系的著名大學。這 22 位老師當中，有 11 位具博士學位。具碩士學位的有 6 位，只有學士學歷的 5 位，他們以教授新聞實務課程為主。兩類教師各有所長，負責不同範疇。早年的校外考試委員 3 年一任，由 1966 年開始，依次有國立政治大學的曾虛白、哥倫比亞大學的喻德基、南洋大學的陳光澤、波士頓大學的沈承怡、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朱謙、國立政治大學的徐佳士。他們都是著名的華人傳播學者，來自不同地方的學校，願意為中大提供意見，協助塑造新聞系的課程。

由 1990 年代至今，本地研究型教師大多於美國著名新聞傳播院校獲得博士學位，往英國或歐洲攻讀的人很少，馬傑偉（2015）是一個異例。歐洲的學術訓練以文化研究和質性取向為主，是對美國主流量化研究的甚佳補充。此時也有少數在本地院校取得博士學位者加入教師行列，顯示香港的研究生教育日趨成熟。

表 3 列出歷任學系主任／院長的背景資料。在名單中，從任期先後和長短來看，較為關鍵的人物依次序是魏大公、余也魯、朱立、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馮應謙、李立峯。在過去五十多年中，有三個短暫時期曾出現問題。第一個時期是由 1974–1977 年，主要是在 1976 年發生《沙田新聞》事件，令系內人事不穩。第二個是 1982–1986 年，當時香港政局不明朗，系主任變更頻繁。第三個是 1991–1994 年，六四事件後遺症令不少教職人員紛紛移民，要到數年後有人回歸和新血加入，才扭轉局面。

前期系主任的任期不長，多是約 1–3 年，後期較為規範，任期由 4–7 年不等。早期的系主任較多有海外背景，至 1990 年代中至今則明顯本地化，由香港人擔任院長。早期的系主任多畢業於密蘇里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後期則有幾位明尼蘇達大學的畢業生。由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二十多年，5 任院長均為系友。陳韜文、李少南和蘇鑰機是早年哲學碩士班畢業，他們本科時分別讀農藝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如宣偉伯所言，有些學人在學術旅程中遇上傳播這個綠洲，稍息後便離開（Schramm, 1989）。三人卻繼續留下來，而且都在院內服務了超過 30 年，對學

表 3：歷任中大新聞與傳播系主任／院長名單及背景資料

姓名	任期（年）	地區背景	博（碩）士就讀學校	其他
張丕介	1965–1967	大陸	德國弗萊堡大學	經濟系系主任兼任
魏大公	1967–1970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陳閏	1970–1971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魏大公	1971–1974	臺灣	美國密蘇里大學	
余也魯	1974–1975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John L. Mitchell	1975–1976	美國	美國密西根大學	
黃維忠	1976–197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余也魯	1977–1982	大陸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朱謙	1982–1983	臺灣	美國史丹福大學	
鄭惠和	1983–1984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關信基	1984–1986	香港	德國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unich）	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兼任
朱立	1986–1991	臺灣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	
George A. Comstock	1991–1993	美國	美國史丹福大學	
梁偉賢	1993–1994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陳韜文	1994–1998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碩士系友
李少南	1998–2005	香港	美國密西根大學	碩士系友
蘇鑰機	2005–2011	香港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碩士系友
馮應謙	2011–2017	香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本科系友
李立峯	2017–	香港	美國史丹福大學	本科、碩士系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院的穩定發展甚有幫助。馮應謙和李立峯是新傳學院本科的系友，博士畢業後短暫在外校任教，接著回母校工作至今。

陸、教師和學生人數變化

學系的學生人數及其他教師資料，可參看表 4。過去五十多年，新傳學院的全職教師人數一直增加，學院不停擴展，不同傳播專業種類和學生人數都在上升。由 1965 年只有兩位全職教師開始，到了 1980 年代每年教師數目不夠十人，1990 年代人數開始上升，近十多年至今人數倍增。兼職教師自 1960 年代已有，但前二十多年每年不到十人。由 1990 年代開始，因大學的政策放寬，也由於新傳學院教學的需要，所以兼職教師人數大幅增加，到了 2000 年後因為修課碩士

表 4：不同年分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院師生人數及教師背景

項目	1969	1979	1989	1999	2009	2019
全職教師人數	2	7	8	13	22	31
兼職教師人數	5	6	9	22	78	60
教師類別						
研究	2	6	7	12	17	20
純教學	0	1	1	1	5	11
教師背景						
香港	0	1	6	7	16	19
臺灣	1	5	2	0	2	3
大陸	0	1	0	3	1	5
外國	1	0	0	3	3	4
全職教師中系友人數及比例	0 (0.0%)	1 (14.3%)	3 (37.5%)	5 (38.5%)	10 (45.5%)	15 (48.4%)
男／女教師比例	2:0	7:0	6:2	12:1	13:9	15:16
行政及支援人員	1	4	7	14	24	37
本科生人數	38	95	164	236	254	474
修課碩士生人數	0	0	0	58	385	311
研究碩士生人數	0	6	17	27	13	12
博士生人數	0	0	0	4	26	3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課程的增加，令兼職教師人數達至高峰，近十年則有鞏固之勢，人數略為減少，但仍相當可觀。

學院一直以研究類型教師為主，新聞系創立時已表明是學與術並重。教授專業技能如編輯採訪等科目，則要依賴教學型的老師。這個趨勢在 2000 年代更為清楚，至今研究型 and 教學型老師的比例約為 2:1，反映了專業傳播教育課程的發展。

教師的背景反映了不同地區對學院師資的影響。早期的老師多來自臺灣，到了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本地化，1990 年代則引進了一些美國學者和有大陸背景的教師，臺灣和大陸教員此消彼長，教學團隊的成分變得較為多樣化。2000 年代後本地化的趨勢更明顯，主要是因為新增了一些本科和修課碩士課程。現時本地和外地教師的比例約是 6:4，這大概是個合適的比例。現時來自外國教師的國籍包括德國、荷蘭、韓國。教師的性別也值得注意。創系之後，多年來直到 1990 年代，女性教師人數極少，到了千禧年後才有明顯增加，至今男女比例差不多各半，這個變化符合時代的發展。

全職教師中的系友人數值得注意。中大新傳系友的人數比例一直都顯著，在

1980 年代開始到 1990 年代，差不多近四成，到了千禧年後更超過四成，這個高比例和學院的發展有頗大關係，之後會再探討這個現象。

學院的行政支援人員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由早年的不到 10 人，到了 1990 年代有十數人，至今更高達三十多人。這是因為學院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和活動，需要行政及技術方面的配合。行政同事人數反映學院課程性質及高活動能量，與其他學系比較更為明顯。現時學院有 7 位行政主任，其中 5 位是新傳學院的系友，另外兩位不是系友但也是中大畢業生。這個情況並非刻意安排，只是系友較願意回校服務，他們熟悉學院情況及工作投入，這和教師的高系友比例情況相似。

學生人數方面，1965 年開始時只錄取了 6 名學生，他們在其他學系已修讀了兩年，到 3 年級才轉入新聞系。在 1969 年收了 10 人，1979 年收生人數增至 24 人，1989 年 39 人，1999 年 84 人，2009 年 76 人，2019 年 112 人，此外還有少量修讀雙學位和雙主修的學生。以上只是本科生的人數，還未計碩士生和博士生，現時每年收取近三百名研究生。這五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 1970 年代新聞系的學制由兩年轉為四年，所以學生倍增。1980 年代中大規模擴展，所以學生自然增加。到了 1990 年代，中大整體由四年制變為三年制，收生人數每年大增。到了 2010 年代，透過社會科學院「大類收生」途徑，轉入新傳學院第二年的學生人數眾多，所以令每年收生人數總和增至近一百二十人。新傳學院受到學生歡迎，收生成績要求高，是中大大社會科學院各課程中收生成績最高的，在香港眾多新聞傳播院系中，公開試取錄成績也是名列前茅。

修課碩士課程始於 1990 年代，到了千禧年後課程數目和學生人數劇增，整體修課碩士學生人數和本科生相差不遠。後來大學調整政策，新的指標是研究生人數不應超過本科生人數的一半，於是新傳學院減收修課碩士學生。本科生的數目由大學規定，每年變化不大。修課碩士收生人數由學院自行決定，這個修課碩士與本科生的比例，令學院要縮減收生規模。研究型碩士課程收生人數一直不多，在 1990 年代末和千禧年初達至高峰，後來大學將研究生學額多撥給博士生，於是研究碩士生人數下降。

柒、教育理念 and 課程

中大新傳的學科發展在不同年代各有重點，創辦之初在 1960 年代以印刷新聞為主，1970 年代加入廣播課程，1980 年代加入廣告和公關科目，到了 2010 年代有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及加入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全球傳播強調國際化和海

外經驗，加強了新傳課程的立體感和多樣化。這種與時並進、由小到大、由窄到闊的走向，順應了時代的需求。中大一直強調通識教育，在大學層面和書院層面均有相關課程，強調要打好中、英文雙語基礎。

學系創立時已訂明學科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中大開始就被設定為研究型大學，所以新聞系課程除了教授傳播技能，更要訓練學生的思考視野。學系初始的課程設計，受到密蘇里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注重新聞實務訓練的影響。密蘇里大學對臺灣的新聞教育和事業，均有很大影響，它甚至對民國時期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和燕京大學的新聞系，都有相當貢獻（羅文輝，1989）。

比較香港幾所新聞傳播院校的課程，早年浸會學院的傳理系以專業技能訓練為主，後來加強社會科學基本訓練（杜耀明、丁偉，1992）。浸會大學近年銳意發展財經新聞，開展數據新聞作為新方向。它的電影學院一向提供獨特完備的影視課程。樹仁大學致力培養傳播行業人才，注重應用技術，有不同的實習平臺供學生參與（俞旭等人，1999）。珠海學院的新方向是重視跨媒體訓練，看重流動媒體。香港大學的新聞與傳媒中心成立以來一直發展國際新聞，以英文採訪寫作為重點。城市大學較為偏重廣播訓練，近年強調數碼科技及跨科際發展。恒生大學因其創辦機構的財經背景，其新聞系大力發展財經新聞報道（蘇鑰機，2017）。

中大的課程路向一貫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它的學術傾向比其他院校明顯。其理論科目在比例上較其他院校的為高（梁偉賢，1992），但與歐美主要院校相比大致相若。它一直以大學的要求來設計課程，以前收生人數不多，著眼培養中、高層的新聞管理人才。後來因社會和行業需要，才大力拓展學院規模和課程種類。中大的課程要兼顧專才和通才訓練，希望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讓學生在文字、影音、網上等不同平臺，都能掌握傳播工具，靈活運用表達技巧，讓畢業生在不同傳播行業發揮所長。學生要熟悉團隊合作，培養思辨能力，解決實際工作問題。畢業後可實踐社會關懷，秉持專業道德操守。這些能力和特質，除了應用在新聞傳播領域外，也可轉移到其他行業，不會浪費之前所學，要適應新時代環境的需求。

捌、學術取向和研究重點

瞭解一個學術研究單位的表現，可以用一些國際學術排名作為參考準則。夸夸雷利·西蒙茲（Quacquarelli Symonds, QS）在 2011 年推出全球大學學科的排

名，在傳播與媒體學方面，最早找到數據的年份是 2013 年。該年中大新傳學院在全球排名 29，到了 2017 及 2018 年，排名升至 20。2019 及 2020 年的排名均為 15，走勢持續上升。在 2020 年，中大新傳學院在亞洲排名第 3，僅次於新加坡的兩間大學。同年香港其他三間公立大學傳播院系的世界排名，分別是 25、38、51–100，均處於頗前位置。學術排名受很多因素影響，大家的看法和側重點未必相同，作為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或許對機構的表現有些參考作用。

中大新傳學院的研究路向，因應傳播職業分類，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創意媒體等。在理論領域方面，包括政治傳播、健康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國際傳播、文化傳播等，近年又開始發展網絡媒體、計算社會科學等。學院的教師按照各自的興趣，在不同範疇自選研究題目。陳韜文（1992，頁 424）以前指出，早年香港傳播研究可分為四個主題：一、傳媒的使用及評價；二、政治傳播；三、傳播與社會變遷；四、資訊科技及其他。

近年比較清晰和有關香港的研究焦點有三個。第一個焦點和新聞有關，相關的研究包括香港記者調查、新聞機構公信力調查、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使用調查、路透社國際新聞比較調查、新聞記者角色表現國際調查等。一些出版的書籍有《變動中的香港記者》、《全球媒介奇觀：香港的新聞戰》、《獨家新聞解碼 1/2》等。另一個焦點是政治傳播，曾進行的研究包括媒體在政治過渡期的角色、回歸採訪研究等。出版的書籍有《香港的報業和政治》、《七一解讀》、《數碼年代的媒體和抗議邏輯》等。第三個焦點是傳媒文化研究，曾出版的書籍包括《香港的創新和創意工業》、《全球遊戲工業和文化政策》、《香港的文化、政治和電視》等。

學院老師有若干著作和比較研究有關，除了之前提及的書籍，其他的例子包括《全球資本與本土文化》、《渴望香港、消費南中國：跨境文化》、《新電視、全球化與東亞文化想像》等。在 2015 年學院舉行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之後出版了專書《促進比較媒體與傳播研究》。

玖、學院的特色和傳承

中大新傳學院有一些明顯特色，首先是其東西學術匯聚的自我定位。C 研中心在 2012 年成立，全名是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它強調三個 C：中華（Chinese）、比較（comparative）、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關鍵詞概括了中心的特點，尤其是將比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取向。它的目標是致力傳播學

科發展，提倡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研究。它希望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促進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對話。其活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和講座、追蹤性研究、出版等。學院於 2004 年設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學術界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跨學科的社會及傳媒研究。近年曾進行的大型研究包括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傳媒體公信力調查、公眾對媒體和民意的意見、香港民意和政治發展等。學院每隔數年便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聯繫東西學術界，探討一些重要傳播議題。近年曾舉辦的題目包括比較傳播研究、中國傳播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數碼方法和社會發展研究高峰會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聯繫社會方面發揮一定作用，它除了協助進行學術研究外，也對社會重要傳播議題發聲，讓市民大眾對事情有更多瞭解。

第二是課程設計注重彈性。課程設計提供一個框架，學生可以有足夠科目選擇。在不同年代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專業範疇，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比例的理論課程或實務科目。在修課碩士課程當中，也有五個不同範疇的設置，另有研究型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它們有不同行業焦點，理論和實踐的配搭比例不同。近年設立的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拓展了課程的多樣性，配合了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例如數碼化和科技化是當今主流，於是在課程上增加相應科目，包括「社交媒體分析技術」、「社交媒體與危機溝通」、「新媒體廣告」、「新媒體工業」、「數碼新聞學」等。

第三是教研人員以本地化為主。學院課程要面向社會，照顧不同傳播行業需要，所以要相當程度的本地化，關鍵在哪個程度才算合適。教師以本地人為主體，同時有外籍學者配搭，還有全職教師和兼任老師互相配合，希望達到較理想的平衡。中大早在 1990 年代聘請不少資深傳播界專才兼職任教。在研究方面也有若干程度的本地化，大家撰寫中英文學術文章和書籍，也有在報刊發表時事評論。研究者運用西方理論，結合本土事例、又參與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術連線，例如在 2004 年時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是最早的三地記者調查研究。

第四是員工的系友比例高，可稱之為「系友化」或「院友化」現象。中大新傳學院歷史悠久，能吸引優秀學生和人才，畢業生到外地深造再回到母校服務，正如一窩蜜蜂各自出外採百花蜜，回來後共同貢獻所得。這不同於在同一機構畢業後，隨即留校任教，未曾經歷往外走的洗禮，出現學術「近親繁殖」（王彥，2017，頁 103）。中大一方面本地化，但某程度也要國際化，並且吸納大陸和臺灣的人才。本地化是要「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

吸引他們回流」（陳韜文，1992，頁 435）。這些系友有相同的中大背景，也有外地不同院校學習經歷，可說是有同有異。回校服務後，大家熟悉環境，對學院有向心力和認同感，辦事更加投入，同事之間有師生或同學關係，有利於團隊工作，正如李金銓（2015，頁 87）所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

教員本地化和系友化是可取的做法，但實行起來不容易，要有很多因素配合。本地化首先涉及學校的類型，私立大學以教學為主，研究要求較次，找資深業界人士當老師不難，所以私立大學的教師容易做到本地化。公立大學重視研究產出，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因此更需要聘請研究型教師，他們要有足夠學術資歷訓練，在本地較難找到合適人才。本地老師中有博士資歷的不多，有海外著名大學學位和經歷的更少。外籍老師一般來自海外著名大學，研究能力較強，聘請他們可令教師團隊多元化，但他們大多只能教授理論科目，行政和社會服務的貢獻較少。因此公立大學教師的本地化不容易做到。中大新傳學院是個例外，在 2019 年它的 31 名全職教師中，20 位是本地人，比例占 65%。全職教師有 20 位屬研究類的，當中有 10 個是本地人，剛占了一半。其他香港公營大學的本地化程度更低，研究類老師中本地比例甚至不到一成。為何中大較能做到本地化，這涉及系友化的因素。

要做到系友化，前提是學系的學生素質要好，有畢業生選擇繼續進修，他們到海外讀博士，志願是教學和做研究，之後自然想回母校服務，促成了學院的系友化。一般新傳院系的學生多打算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工作，深造的意欲很低，以培養傳播專業人才為主的院校更是如此，這不利於出現系友化現象。近年不少內地生到香港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他們較願意走學術之路，畢業後可能回到香港的母校服務，可說是實現了「半本地化」，但非純正的本地化。所以說本地化和系友化只能是個目標，不是所有院校都有條件做到。中大新傳學院因為一向重視研究培養，師生傳承有頗多例子，有畢業生願意出外深造並回校服務，於是某程度上成就了系友化和本地化。再以中大新傳學院作統計，2019 年在所有教師中，系友的比例是 48%，在研究類教師中的系友比例是 45%，相對其他院校的情況也是偏高的。往後如果學系的發展要朝這個方向走，可做的是多鼓勵本地學生選擇學術之路。本地化和系友化可能是一個學系發展的罕有模式，有院校引入大量學術外援，以「非本地化」作為藍本，也有系所採用混合模式，以配合自己的實際情況。

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有五種風格，最差的是「漠不關心」風格，令員工不開

心而且工作沒有成效。只關心員工心情的「鄉村俱樂部」風格，和只看工作成果的「獨裁」風格均不理想。還有「中庸之道」風格以兼顧員工及工作，盡量取得平衡。最佳的是「團隊」風格，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又達成生產效能（Blake & Mouton, 1985）。如果一間機構的領導能夠多為集體設想，員工之間有相近背景和共識，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氣氛和高效的工作環境，達致團隊模式。系友比例高，容易在工作上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合作順利，促進良性競爭，學院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達到多贏結果。

中大新傳學院見證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整個歷程，包括了不同輩分的學者，他們之間有老師和學生的傳承關係，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可以說，第一代的傳播學者是喻德基、朱謙、余也魯、魏大公，第二代以朱立和李金銓為代表，第三代包括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第四代是馮應謙、李立峯等。他們曾在不同時間服務於中大新傳學院、特別是第二至四代人員之間的關係密切，第二代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老師，第三代又是第四代的老師。這種自然而有序的傳承過程，對促進學院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學院正期待本地第五代更年輕一輩的出現和茁壯成長，將來可接班傳承下去。

拾、總結和前瞻

學院和社會之間有一定關係，但關係未必直接，視乎不同時期和情況而定。回顧一個機構的發展，還要考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從宏觀角度，中大新傳學院不單和香港社會的發展有聯繫，它和大陸及臺灣的傳播學界的互動也值得探討。結構和個人能動的關係是辯證的，結構因素很多時占了主導，但個體也可在某時刻發揮關鍵作用，足以扭轉歷史進程，或者和結構有頗多互動（Archer, 2003）。之前提及早年的魏大公和余也魯前來中大，負責開創學系，發揮很大作用。後來朱立和李金銓受聘來到香港，對學系的發展有重要貢獻。1980年代本地的陳韜文、李少南和蘇鑰機從別的學術領域轉投新聞與傳播學，後來多年負責院務，對學院的進程有深遠影響。近年接力的馮應謙和李立峯，都在不同時期發光發熱。他們在某個關鍵時刻來到中大新傳學院，可說是歷史的偶然，卻見證了個人能動對機構的影響。

文首曾經提問，中大新傳學院的一些做法和經驗，是否可複製到其他機構，作為參考之用。對社會的關懷和參與積極參與，是學院的一項傳統特色。如何認清自己的定位並善用優勢，也是另一種經驗。在本地化和多元化之間如何取得適

當的平衡，怎樣進行傳承工程以作長遠規劃，也是重要議題。中大的本地化和高系友比例，需要有一些配合的因素才能達成，其他學系可能不一定能夠做到。其他學術機構同樣面對以上的考量，或許某程度上可借鑒分析中大新傳學院走過的路。

展望未來，大家都很關心傳媒行業面臨的困境，如何應付新傳播科技帶來的挑戰，業界和院校要如何轉型。在回應新科技環境帶來的機遇和要求，中大在課程上已經有一些新做法（蘇鑰機，2017）。第一是多著眼數碼多媒體訓練，提供更多相關科目，加強學生的能力，以追上時代和媒體工作的要求。第二是整合一些課程的板塊。例如將實習刊物的內容在網上發布，除了文字圖片外，又增加了錄影拍攝，放在 YouTube 供人觀看。這幾年也發展社交媒體，在 Facebook 發放消息，又在網站上做即時新聞報道。不同的實習課程之間在技術或研究對象可能有重疊，透過課程結構重整，學生可一起修讀相同科目，共同探討不同行業的傳播議題。

第三是發展微型課程，以補充傳統科目的不足。這些微型課程有很大彈性，時間可長可短，形式如短期的工作坊，只占一個學分，有不同組合，以適應不同學生的需要，內容涉及各種電腦軟件和工作技巧等。第四是引進新的合作夥伴。在校內透過和其他院系推出雙學位、雙主修課程，讓同學修讀相關學科如工商管理 and 電腦資訊工程等。在校外可和海外大學有學生交換計畫、老師短期互訪甚至課程合作。第五是和傳播業界加強合作，多聘資深從業員作兼職老師，將業界的最新經驗和知識帶給學生。學生又可利用暑假實習機會及短期的參觀訓練課程，或參加大專界及公開的比賽。

過去五十多年，中大新傳學院整體發展尚算順利，除了在 1970 年代有內部的偶發事件，和在 1980 及 1990 年代受到社會情況影響，曾出現短暫的不穩定時期。踏入下一個十年，因應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要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教研人員的流失，例如在 2020 年有一位教授和一位助理教授選擇離開，分別到新加坡和美國任教，這種情況以前較為少現。未來是否繼續有人員流失，如何留住人才，保存團隊精神和協作文化，是個迫切問題。其次是在新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下，教學和研究的自主空間能否保持。這不單涉及現時的教研人員，也可能影響未來的教師和學生加入的意願。第三是學術人員接班問題，系友會否願意回歸母校，能夠接棒延續院務發展。

當然有危也可能有機，中大新傳學院畢竟有深厚傳統，崇尚優質教研和社會參與，以往的經歷是個良好範例。它在國際學術界排名頗高，在華人傳播學界和

香港業界享有聲譽，特別在比較研究、學術交流、本地化和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特色。學院如何回應教育、學術和社會的需求，如何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成熟期之後是新機遇還是走下坡，這些都是要面對和解決的議題。

參考書目

- 王彥（2017）。〈香港新聞傳播學界的成名與想像（1927–2006）——專訪臺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朱立〉，《國際新聞界》，5：85-108。
- 朱立（2015）。〈吐露傳情十六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78-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朱雯、黃郁文、李玉蓮（2015）。〈校友茶聚話當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61-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余也魯（2015a）。〈發展中大新聞系〉，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72-7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2015b）。《萬水千山都是詩：余也魯回憶錄》。香港：海天書樓。
- 李少南（2015）。〈課堂二三事〉，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9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玉蓮、姚霞主編（2005）。《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四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金銓（2015）。〈兩段中大的香港因緣〉，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85-8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李家園（1989）。《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
- 杜耀明、丁偉（1992）。〈新聞教育與社會政治發展：浸會學院傳理系新聞專業課程個案分析〉，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5-48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俞旭、朱立、朵志群（1999）。〈香港四所院校新聞教育之比較研究〉，俞旭、

- 郭忠實、黃煜（編），《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頁 319-347。香港：中華書局。
- 皇甫河旺（2015）。〈懷念中大那八年〉，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82-8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1969）。《開辦的六年：1963-1969：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_____（1975）。《漸具規模的中文大學：1970-1974：大學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_____（1979）。《新紀元的開始：1975-1978：大學校長報告書》。香港：作者。
-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65）。《新亞書院概況》。香港：作者。
- _____（1969）。《新亞書院二十週年校慶特刊》。香港：作者。
- 馬傑偉（2015）。〈寫下新傳名句〉，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9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梁偉賢（1992）。〈香港大專院校新聞與傳播教育之比較研究〉，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頁 481-49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陳韜文（1992）。〈香港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7-44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 陳韜文、程曉萱（2017）。《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訪問學者計畫十週年特刊 2008-201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陳韜文、蘇鑰機（1996）。〈以範例問題帶動的新聞實務教育——從《大學線》月刊說起〉。《臺大新聞論壇》，4：224-250。
- 黃建業（2015）。〈回憶六十、七十年代的新聞系和新亞書院〉，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22-2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馮德雄（2015a）。〈沙田新聞事件〉，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26-2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_____（2015b）。〈悼魏大公博士〉，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70-7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黎淑怡（2015）。〈八十年代的新傳系〉，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28-3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魏大公（1967）。〈中文新聞從業員的培養〉，《新亞生活雙周刊》，9（13）：1-3。
- 羅文輝（1989）。〈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41：201-210。
- 蘇鑰機（2012）。〈傳播學的中國播種人——余也魯（1920-2012）〉，《財新新世紀周刊》，39：114。
- _____（2015）。〈資深校友率先為學院慶祝生日〉，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頁 66-6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_____（2015 年 10 月 31 日）。〈細說中大新傳 50 年〉。《明報》，第 D4 版。
- _____（2017 年 12 月）。〈新科技環境下新聞教育的新路向〉，論文發表於「第十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研討會」，中國，澳門。
- _____（2020 年 3 月）。〈中大新聞系早年教師點將錄〉，《校友通訊》，3。
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alumni.com.cuhk.edu.hk/e-news/2020v1clementso/>
- 蘇鑰機、黃碧瑤、翁愛明（編）（2015）。《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五十週年特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 Archer, M. S. (2003).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ke, R. R., & Mouton, J. S. (1985). *The managerial grid III: The key to leadership excellence*. Houston, TX: Gulf.
- Dutta, M. J. (2011). *Communicating social change: Structure, culture, and agenc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ramm, W. (1989).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behavioral science: Jack Hilgard and his committee. In S. S. King (Ed.),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Selected contemporary views* (pp. 13-26).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Sztompka, P. (Ed.). (1994). *Agency and structure: Reorienting social theory*. Yverdon, Switzerland: Gordon and Breach.

Organizational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Clement York-Ke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bstract

An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depends primarily on its internal planning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partly on its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some individuals as agency can exert vital influences.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a case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change.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six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School in tandem with the major social events in these stages in order to ascertain linkages between the School's history and the larger social context. We shall also explore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ideals,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foci. Some experiences will be summarized from the School'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especially about teaching staff loc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alumnization." There is also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School's curriculum responds to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new political climate of Hong Kong.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history, social change, individual agency, localization, alumnization

* Email: clementso@cuhk.edu.hk

新加坡的傳播教育：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個案^{*}

郝曉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退休教授

摘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發展成為一所國際知名的傳播學院，其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學院借鑒。與兩岸三地的傳播院系相比，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由於新加坡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影響和對國外師資的依賴，在教學和科學研究方面更加國際化，這使得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益。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嚴格的考核制度和銳意改革的進取精神也是保證學院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傳播教育、國際化、學術自由、考核制度

* 本文作者從 1993 年起至 2018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任教，先後擔任系主任、副院長和大學學術委員會參議院主席及指導委員會成員等職務。文中的大量資料來源於作者在學院和大學的管理經驗。

** Email: txmhao@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遠離兩岸三地的大中華圈，但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仍會被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 (Harding, 1993, p. 660; Wang, 1993)。由於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的 76.1%，新加坡也自然繼承了相當程度的華族文化傳統，其華文教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當地華社在 1829 年開設的方言學校。在上世紀 50 年代華文教育的全盛期，新加坡共有 349 所華校，擁有 6 萬 7 千多名學生，占當時全國學生總數的 57.9%（張汐瑩，2016 年 7 月 11 日）。在中小學華文教育高度發展的同時，由東南亞華僑共同創辦的南洋大學 1955 年在新加坡成立，成為歷史上兩岸三地之外唯一一所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大學。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強調英語為全民共同語，把英語作為政府用語和商業用語，使英語最終取代各族群的母語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語言。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成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文獻館，2018）。中小學教育的最後一所華校也在 1985 年停辦（張汐瑩，2016 年 7 月 11 日）。新加坡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其高等教育不單在教學語言上，而且在教學理念和方式上與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有著很大區別，在傳播教育方面亦是如此。本文介紹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發展歷程。資料來源除了文獻分析，主要依靠個人參與觀察和與建院工作同事們的訪談。

壹、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建立的背景

新加坡的教育，特別是其高等教育，早期是以英國的教育體系為主導，更強調專業性的培訓，而不是北美教育體系所提倡的通識教育。學校的任務不單是要保證學生在校獲得就業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也要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分流學生，達到因材施教和選拔人才的目的。小學生六年級畢業要參加全國統一考試，根據會考成績選擇上不同的中學或工藝學校。中學生四年畢業時要參加新加坡教育部和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聯合主辦的劍橋 O 水準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選擇上兩年制的初級學院或三年制的理工學院。初級學院類似於中國的高中，課程分文理兩科，畢業生參加劍橋 A 水準考試作為大學入學標準 (Kuo & Lee, 2006)。理工學院學制三年，類似中國的大專，負責培養就業市場所需的專業人才，前百分之十的優秀畢業生也可進入本地大學完成專轉本的課程。這種層層考試的制度確保最終進入本地大學的學生是同輩中學業方面的佼佼者。

新加坡的大學教育可以追溯到 1905 年建立的一所醫學院。但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新加坡大學教育並沒有得到很大發展。在英國統治者看來，對殖民地居民

過多的教育會威脅其統治，高等教育只應有極少數人享受 (Goh & Tan, 2008)。所以直到上個世紀中葉，新加坡才先後出現了在 1949 年通過兩所高等教育學院合併成立的馬來亞大學（1962 年更名為新加坡大學）和在 1955 年成立的南洋大學。在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 1980 年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後，新加坡政府 1981 年在原南洋大學校園內設立了南洋理工學院，並在 1991 年將這所大專學府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 (HistorySG, 2015)。除了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這兩所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外，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又先後開辦了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新加坡理工大學和新躍社科大學等專科性大學。

在上世紀 90 年代之前，新加坡在大學層次與傳播學相關的課程寥寥無幾。在 70 年代初，新加坡大學的社會學系和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曾開設過幾門大眾傳播課程。南洋大學的政治與公共管理系在 1975 年還開辦了大眾傳播專業，但當南洋大學 1980 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這個先後培養了大約百名畢業生的專業也就關閉了 (Kuo & Lee, 2006)。直到 1989 年，義安理工學院才又開設了頒發大專文憑的大眾傳播專業以滿足公眾和傳媒業界的需求 (Hukill, 1994)。

新加坡的媒體業從獨立後到上世紀 90 年代初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報業方面，新加坡既有 170 多年歷史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也有針對不同族群以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發行的報章。1984 年成立的報業控股是亞洲最大的媒體集團之一，擁有在新加坡發行的所有主要報章。在 80 年代末，新加坡報紙的發行量達到總人口的 29.4%。與此同時，從 1936 年開始的電臺廣播和從 1963 年開始的電視廣播也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達到發展的高峰，居民擁有收音機和電視機執照的比例分別達到 23.8% 和 19.8% (Kuo, 1991)。從上世紀 90 年代到本世紀初，新加坡媒體的年增長率達到 6–7% (APAC Outlook, n.d.)。在本地媒體蓬勃發展的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努力吸引外國媒體到新加坡建立區域性總部，力圖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媒中心（〈楊榮文：鼓勵國內外傳媒公司投資，我國希望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播中心〉，1994 年 5 月 11 日）。自上世紀 90 年代起，新加坡已經吸引了亞太探索網路（Discovery Networks Asia Pacifi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亞太頻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Asia Pacific）和 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ESPN）Star Sports 等眾多全球性廣播公司入駐（新加坡經濟發展局，2018）。在媒體業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政府教育規劃的日程。在義安理工學院開設大眾傳播課程不久，新加坡國立大學也在其人文社會科學院建立大眾傳播

系，從 1991 年開始招生，但這個系不久就被南洋理工大學新開辦的傳播學院所取代 (Kuo & Lee, 2006)。

新加坡政府 1991 年在原南洋大學校址建立南洋理工大學以滿足日益蓬勃發展的新加坡經濟對高等人才的需要。南洋理工大學在創建初期是一所只有工程、應用科學和財會三個學科，以工科為主的學校，但工科出身的校長詹道存博士卻希望引進一些與工科完全不同的學科來擴大學校的多樣化，向綜合性大學發展。最終，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南洋理工大學 1992 年設立傳播學院，原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系系主任郭振羽教授被任命為傳播學院的首任院長 (Cham, 2014, pp. 96-97)。

在新加坡的高等學府創辦一個培養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科目曾受到多方質疑。新加坡新聞媒體時任領導層中鮮有畢業於新聞傳播科系的，新聞從業員中眾多佼佼者也不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因此業界並不看好新聞傳播教育。除了內部質疑外，國際上的質疑更為強烈（楊倩蓉，2010）。新加坡一向被認為是缺少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新加坡設立的傳播學院在教學上是否會受限於本國的新聞體制？學生能否培養成為求真求實，忠於新聞操守的新聞工作者？其教職員能否自由地傳授知識和研究相關新聞傳播課題？這些問題都為學院在教師招聘和建立學生海外交流專案方面帶來一定困難。

由於新加坡在大學層次除了南洋大學和國立大學設立過短暫課程並沒有建立起傳播教育的傳統，學院在課程設置上參考了世界各地大學，特別是北美新聞傳播院系的課程。學院之初設立了新聞、廣播電視、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本科生課程採取在通識教育基礎上進行專業化培訓的模式。學生在四年學制的前兩年修讀統一課程，幫助學生在進入專業學習之前全面瞭解新聞、廣播電視、影像、廣告、公關、傳播研究以及多媒體技術所涉及的社會背景、理論與實踐。與此同時，學生還要修讀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東南亞政治、當代世界和新加坡社會等通識課程。學生在第三年進入不同的科系修讀專業課程；專業教學力求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尋求平衡，除了課堂教學，學生還參與校園報紙、有線廣播和電視的採編和節目製作。在進入專業課程的後兩年中，學生要到媒體全職實習六個月，並在最後一年學習期間完成系列新聞報導、廣播電視專題節目、電影、宣傳策劃和研究報告等題材的畢業專案 (Kuo & Lee, 2006)。

在本科生 1993 年入學的同時，學院開始招收以研究為主的碩士生，兩年後開始招收博士生。從 1996 年起，學院為業界人士開辦了以授課為主的大眾傳播碩士課程。在 2001 年，原屬電腦學院的資訊學系併入學院，成為學院的

第五個系，學院也從傳播學院更名為傳播與資訊學院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KWSCI], 2020a)。資訊學系以培養研究生為主，開辦資訊學、資訊系統和知識管理等碩士課程，近年來也為傳播學的本科生開設資訊處理方面的課程。

雖然新加坡政府和南洋理工大學並沒有給學院的發展規定明確目標，但學院的領導層從首任院長郭振羽教授開始就努力以國際視野發展這所全新的學院。建院初期，學院領導層通過和教師協商，確立了把學院辦成一所「亞洲一流，國際知名」的傳播學院的目標 (WKWSCI, 2020b)。在強調教書育人的同時，學院把通過學術研究提升知識和服務社會作為學院的重要任務。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學院不但培養了一批批受到新加坡乃至國際傳媒業界歡迎的畢業生，也在科學研究（簡稱科研）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績，眾多科研成果發表在一流的國際學術刊物上，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度。在 2019 年，學院在 QS 世界大學專科排名榜傳播媒體類學科中名列全球第八，亞洲第一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在上海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榜上名列新聞傳播學類全球第二十、亞洲第一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9)。

過去的二、三十年是亞洲傳媒業大發展的時期，同時也見證了新聞傳播教育在亞洲的蓬勃發展，一些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系擴大規模升格為學院或大學，愈來愈多的大學開設獨立的新聞傳播院系。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有多所歷史悠久的新聞傳播院系，無論是在辦學經驗和國際知名度方面都優於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這樣一所新成立的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在不到 30 年的時間內從無到有，在強調國際聲望的 QS 排名和強調學術研究成果的上海軟科排名中名列亞洲前茅可謂是個奇跡。雖然這些學科排名不能全面反映一所院校的教學與研究成果，但好的排名不單是對大學或學科建設的一種肯定，也為學校帶來更多資源，是辦學者不可忽視的一項指標。本文將在下面具體討論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學科排名方面取得斐然成績的一些重要因素。

貳、辦學基本條件的建設

辦好高等教育離不開三項重要條件，即大樓、大師和優秀的學生來源。大樓不單單是指教學樓舍的建設，也泛指教學所需的其他資源，包括足夠的財力用於支付教師優厚的薪金和開展國際交流項目等。雖然「大學者，非大樓也，大師之謂也」，但原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講這番話時恰恰是在清華園的教學基礎設施已

基本完成之時（陳先哲，2017 年 5 月 2 日）。高等教育的成敗雖然最終取決於教師和學生的優劣，但充足的辦學資源是築巢引鳳的必要條件。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開始就得到政府和校方的有力支持，學院成為南洋理工大學眾學院中第一個擁有獨立教學辦公大樓的學院，配有一整套在當時可以與世界頂尖傳播學院媲美的教學設施。學院也先後開辦了即有印刷版也有網路版的報紙、有線電視和電臺作為學生實踐課堂知識的平臺。除了政府投資外，學院也受到業界的大力支持，先後通過業界的捐助加政府的補貼建立了黃金輝和邵氏基金講座教授的職位。在新聞工作者出身的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博士 2005 年過世後，學院在 2006 年通過用他的名字為學院冠名的方式向社會募捐，為學院籌得 2 千 7 百萬新幣的發展基金 (WKWSCl, 2020a)。學院目前可以享用的基金共有 31 項，其中 10 個基金由學院自行管理 (WKWSCl, 2019a)。

傳播學大師對於一所位處亞洲的新學院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雖然學院可以利用已有的講座教授職位聘請美國的 Everett Rogers 和臺灣的汪琪等知名教授到學院短期任教，但學院教師隊伍的核心骨幹主要靠自己培養。由於新加坡沒有傳播教育的傳統，在海外攻讀傳播學博士學位的新加坡人寥寥無幾。雖然學院在建院初期也成功招募到個別從海外學成歸來的新加坡同事，但新加坡籍的教師在學院中屬於少數。學院的教師隊伍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國際化的團隊，在學院先後任教過的教師來自全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度、中國、臺灣、香港、斯里蘭卡、韓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法國、塞爾維亞和新加坡的學者。雖然近年來學院也聘請了一些資深教授加入學院的教師團隊，但更多還是依靠新畢業的年輕教師作為教學和科研的骨幹力量。在聘請教師方面，學院要求被聘用者具有相關的博士學位，優先考慮有亞洲背景或經驗的應聘者（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隨著學院知名度的提高，應聘者從最初一個職位只有幾個人報名發展到今天幾十個人報名，使學院在聘任教師上有了更多選擇。

受聘教師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相當一部分人最終會由於種種原因選擇離開，但學院努力為他們提供條件，讓他們在學院任教期間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為了提升大學的教學和科研的發展，新加坡政府 2005 年開始對本地大學進行了結構性和企業化改革 (Lee & Gopinathan, 2008)。南洋理工大學從新加坡教育部管轄的學校改為自主大學，並在 2007 年開始對大學的管理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改革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對教師的任聘和升等制度進行全面更新，以合同制為主的教師聘用體系被終身教職體系所取代。所有在職教師都受到嚴格的評

審，一些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達不到學校要求的教師不被續約，騰出更多職位聘請新的教師 (Andersson & Mayer, 2014)。新聘任的教師面臨的是同美國大學一樣的終身教職制度，一名助理教授在終身教職的預備期（開始是九年後改為七年）內要發表一定數量和品質的研究成果才能被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職，否則將在預備期結束後離開崗位。由於新加坡僅有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大學開設傳播專業而雙方又不接受對方不被續約的教師，這無疑為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帶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學院為年輕教師提供更多有利於他們集中精力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助理教授在學院工作的前三年一般不參與學院的行政管理工作，在教學量上也獲得減免。從這些年的經驗看，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已經成為學院科研的重要力量，每年發表的論文在整個學院發表的論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對於這些年輕教師來說，終身教職的預備期可能是他們教學生涯中最辛苦的階段，但也是在科研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時期。最終能夠在完成預備期後獲得升等和終身教職的教師同時也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奠定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為長期學術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一些出色的年輕教師在預備期間就被其他大學用終身教職和升等挖走，而那些沒能留下的教師一般也能在預備期發表相當數量的科研成果，比較容易地在其他國家找到新的職位。

作為辦學的必要條件，良好的生源同樣是學院成功的保障。在新加坡公立大學就讀的學生絕大部分來源於本地的初級學院，根據劍橋 A 水準考試成績進入大學，部分頂尖的理工學院畢業生也可根據理工學院的畢業成績被大學錄取 (Kuo & Lee, 2006)。公立大學的外籍學生占本科生的比例在 2010 年以前曾達到 20%，但隨著招生數量的擴大，這個比例已逐步下降到 10% (gov.sg, 2018)，多數修讀本科的外籍學生是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和印度的新加坡政府獎學金獲得者。但在傳播學院，修讀本科的外籍學生少之又少，一方面是因為傳播學對學生英文讀寫能力要求高，報考的外籍學生數量少；另一方面是因為學院對外籍考生在錄取分數上有更高要求。

在高等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過多的大學畢業生不利於合理的社會分工，有意控制大學畢業生占人口的比例 (Hugo, 2017, May 11)。在 1990–2000 年間，同齡學生中只有 15–21% 的人能夠進入本地大學學習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6, p. 62)。雖然這個比例在逐年增加，但政府明確表示會將同齡學生的大學入學比率控制在 30–40% 之間 (Cheong, 2017, May 4)。這一政策也保證了在新加坡大學就讀的學生在學業方面是同輩中的佼佼者。

學院在招生方面採取開放的政策，既招收初級學院畢業的文科生，也招收理科生。建院幾年後，學院也開始招收部分理工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作為一所新的文科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大批報名者。在第一屆錄取的 96 名學生中，很多學生的劍橋 A 水準考試成績可以讓他們報考更加熱門的法學院和商學院，甚至個別可以報考醫學院的學生也選擇了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以錄取成績的截點來看，學院初期錄取的學生屬於同屆劍橋 A 水準前 15–20% 的考生。近年來，新加坡新添了四所大學和更多的科系，學生在報考大學和專業上有了更多選擇，但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仍能吸引眾多優秀學生入學，本科生錄取的分數線在文科院系中始終名列前茅。

黃金輝傳播學院有別於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重要一點是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雖然新加坡的中小學實行雙語教育，但因為主要教學語言是英文，所以本地學生的英文水準一般高於母語的水準。除個別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學生外，學院招收的本地學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熟練地用中文寫作並在畢業後加入本地的華文媒體。作為一所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的傳播學院，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與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的學生相比在學習和研究方面有一些優勢，他們更容易接觸傳播學的新內容，閱讀更多的教科書和參考資料，也更容易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發表。從多年學生海外交流情況來看，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可以和海外頂尖傳播學院的學生媲美（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良好的生源是學院辦學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許多教師願意在學院長期任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學院第一批學生在 1997 年畢業後的短短幾年時間內，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就通過他們的實習和就業改變了業界對專科傳播教育的疑問，本地的新聞傳播機構大量雇用學院的畢業生，愈來愈多的校友成為本地新聞傳播業界的中高層管理者。

參、教學和科研的國際化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能夠在不同的國際學科排名中處於亞洲領先的地位與其教學和研究的高度國際化分不開。如前所述，在學院創辦之前新加坡沒有系統的傳播教育，自然也無新聞傳播教育傳統可言。所以，學院在學院架構和課程設置上無規可循，一切從頭開始。學院初建時期，新加坡大學的教育體系以英式為主，但傳播學院的設計並沒有以英國傳播教育體系為模式，而是參考了國際上不

同傳播院系的架構和課程設置（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由於當時的南洋理工大學還是一所以工科為主，輔以商科和財會的大學，大學無法提供更多適合傳播專業的通識課程。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學院創建初期在院內開設了相當數量的社會科學類和綜合性傳播學課程作為通識課程供學生在一、二年級修讀（郭振羽，2019）。隨著更多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院系在南洋理工大學的開辦，傳播學院學生所修讀的課程更加向通識方面發展。專科教育的課程安排與國際通行的傳播學課程安排相似，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生既要掌握傳播的基本技能，也要懂得傳播的社會效應，以理論指導實踐。

在課程設置以外，教學的國際化更多是通過教學實踐來體現的。如前所說，學院的絕大部分教師都來自海外，既有來自歐美的教師，也有在歐美獲得學位但出身於亞洲的教師。在教學上，學院對教學模式和方法沒有統一規定也不對新入職教師進行統一培訓，而是完全放手讓教師根據課程大綱按照他們對傳播學的理解和經驗授課。這樣做的結果有助於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僅能以新加坡的視野看待傳播中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同時也能跳出新加坡制度的局限從不同角度學習和思考問題。來自海外的教師在與學生的互動中也使自己的知識更好地和本地經驗相結合，豐富了教學內容與觀點。

教學的國際化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學院的海外交流計畫。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社會，也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大都市，但在新加坡這樣一個島國長大的孩子對海外的瞭解是有限的。在全球化高速發展的當今世界，缺少大的國際視野對傳播專業人士來說是致命的缺陷。建院伊始，學院領導就努力發展學生交流項目，從第一屆學生開始就有超過 10% 的學生到美國的一些大學交流學習，這類交流項目逐步擴大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洲和歐洲等地。海外交流項目不但幫助學生擴展了視野，也通過學生在海外學習的優異表現提高了學院的國際聲譽和知名度。近年來，學院自行開展的交流項目已被納入大學的整體交流計畫，整個南洋理工大學在全球共有三百多個合作夥伴，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海外交流機會。除了到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媒體學習和實習外，學院也開辦多種海外短期教學和實踐課程。目前已有 70% 的本科生能夠在校學習期間通過各種方式獲得海外學習和實踐的經驗 (WKWSCl, 2019b)。教學的國際化和海外交流經驗為學生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國際視野，畢業生不僅很容易地融入新加坡的媒體環境，也能勝任在海外的新聞傳播工作。不少畢業生成為駐外記者或加入海外的媒體和傳播機構。

學院從建院開始就努力與海外的教育機構和學術團體建立關係，通過交流合作擴大大學的知名度和與海外機構合作發展的機會。例如，學院與中國新聞史

學會和華中科技大學從 1995 年聯合舉辦的「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在中國內地、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先後舉辦十一屆，成為一個學術交流的品牌。學院也分別在 2000 年和 2010 年承辦了國際傳媒與傳播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年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播學者有機會認識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 (WKWSCI, 2020a)。

學院的國際化也體現在科研成果的發表途徑上。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雖然有高品質的教育和科研機構，但其科研人員和可發表科研成果的數量並不足以支撐以發表本國科研成果為主的學術刊物，傳播學作為一個小學科更是如此。因此，新加坡的傳播學者不能像中國大陸、臺灣、韓國、日本的傳播學者那樣有眾多的本土學術刊物作為發表科研成果的途徑，他們只能把論文投向國際性學術期刊，這當然給學院師生發表論文增加難度，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學院的國際知名度。學院師生平均每年在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多達一、二百篇，其中相當數量的論文發表在不同研究領域的核心期刊上。多年以來，學院也積極鼓勵和資助教師和學生參加大型國際會議。例如，學院師生每年都在論文接受率較低的國際傳播協會的年會上發表數十篇論文，是參會人員最多的傳播學院之一，學院在國際傳播協會年會上舉辦的「南洋招待會」已成為學院師生與國際傳播學者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

學院成立後，郭振羽教授把他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在 1990 年創辦的《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引入學院，成為學院和亞洲傳媒資訊與傳播中心合辦的刊物。學院的多名教師長期參與學報的編輯工作，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亞洲傳播學報》已被社會科學檢索（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等眾多資料庫收藏，成為展示亞洲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平臺，擴大了學院在本區域和國際傳播學界的影響力（郝曉鳴、池見星，2012 年 11 月 28 日）。

肆、學術自由與嚴格的考核制度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成立之初受到外界質疑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學院在教學與科研上能否做到學術自由。在外界看來，新加坡有著高度管控的媒體環境，媒體自我審查非常普遍，就連網上的內容也受到限制 (Singapore profile—Media, 2017, September 5)。雖然新加坡在眾多國際排名處於領先的地位，但在無邊界記

者組織編輯的新聞自由度排名中長期落後，在最新的 2019 年排名中，新加坡在 180 個國家中名列第 151 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傳播學院的課程中占有著重要地位的新聞、廣播和電視課程能否不受限於新加坡自身的媒體環境，讓學生在瞭解新加坡媒體生態環境的同時，也瞭解世界上其他新聞體制的生存哲理和實踐方式對學院無疑是個挑戰。

建院初期，學院在教學上首先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讓一個深受英國教學傳統影響，有著極其嚴格的教學管理方式的工科大學接受一個強調獨創性，反對循規蹈矩的異類學科。例如，作為工科大學，南洋理工大學對考試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每一科考試不但要有考題，而且要有面面俱到的標準答案，分數精確到每一個要點的分值。更為甚者，所有考題、答案和評分標準要由同系教師一起討論通過。這樣的考試方法顯然不適用於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時任院長郭振羽教授成功說服校領導，不在傳播學院推行這樣的考試方法。傳播學院的各科考題雖然也要按大學規定經系主任和主管教學的院領導過目，但審查的重點放在考試題的出題方式和文字表述上，而不是試題內容和答案（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作為傳播學院，出版校園報紙和開辦廣播電視節目作為學生實踐的平臺必不可少。根據新加坡的法規，學院順利開辦了中英文雙語的校園報紙《南洋紀事報》(Nanyang Chronicle)，但廣播電視節目只能以有線的方式在校園內播放。校園報紙和廣播電視節目以報導校內事物為主，自然包括對學校主管部門乃至學生會的監督和批評性報導，因而也會引起主管部門和學生會個別領導的不滿，時常有人力圖通過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向學生記者和編輯施壓，禁止或改變對某些事情的報導。面對這種情況，學院領導和指導教師總是耐心地向對方解釋校園媒體的責任以及學生記者和編輯的報導自由和權利，同時邀請對方接受學生記者的採訪讓他們在報導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大學領導對學生主辦的報紙和廣播電視節目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當有個別部門領導對學生記者的報導不滿狀告大學領導時，校長詹道存博士就曾出面做協調工作（擷取自郭振羽，2019 年 4 月 11 日個人訪談）。

在新加坡校園辦報和廣播如同本地媒體一樣會受到外來的壓力。《南洋紀事報》從 1994 年創辦至今真正受到外來新聞審查的威脅只有一次。2008 年，新加坡反對黨民主黨的領導人不請自來到訪新加坡的大學，向學生宣講該黨綱領和發放傳單。校方第一次直接插手《南洋紀事報》的新聞報導，下令撤掉有關反對黨領導人到校訪問和接受採訪的文章，並同時停播已經在校內有線電視播放的相

關報導。校方對學生新聞媒體的直接干預在學院內引起極大反彈。學院內發現非法張貼的反對新聞封鎖的黑色條幅，雖然條幅很快被學校保安摘除，但條幅的照片被上載到網上，廣為流傳。與此同時，學生利用新媒體號召學生參加在新加坡被稱之為「演說者角落」的芳林公園集會，抗議校方對學生媒體的新聞封鎖。出席這個集會的除了學生也有媒體工作者，集會的消息不但被路透社等海外媒體報導，也被眾多本地媒體報導，並在互聯網廣泛轉載 (Staff, 2008, October 5)。有關反對黨到訪，校園媒體被封殺和學生集會抗議的消息最終還是出現在《南洋紀事報》的版面，不但原本的新聞沒有封鎖住，對反對新聞封鎖活動的報導更加放大了上層本意封鎖的小新聞 (Hor, 2009)。

學院教師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文化，所受教育也不盡相同，難免對新加坡現行的新聞體制和媒體運作方式有不同看法，對在新加坡教授新聞傳播學有顧慮。學院在教學上採取充分信任教師的做法，課程設置上只對每門課教授的內容有基本要求；對具體使用何種教材，授課內容的細節和教學方法沒有任何規定，完全由授課教師自行決定。多數教師在開始教學時對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並不瞭解，自然也無法把新加坡的新聞傳播模式作為教學的重點，往往是以他們在海外所學的知識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只有當他們通過與學生課上交流和對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有了較深入的瞭解之後才得以在教學中融入更多比較新加坡和其他國家新聞傳播環境的內容。雖然學院希望教師能在教學中更多融入與本地新聞傳播環境相關的內容，但並沒有強行要求每一個教師在教授每一課程都這樣做¹，對教師如何介紹和評論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和體系沒有具體要求。在教學評估上，學院沒有專門的系統評估每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只是使用大學通用的教學評估體系，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

在科研方面，學院只在論文發表數量和在何類期刊上發表有基本要求，而對於研究的領域、問題、方法和觀點沒有任何要求。受聘教師在入職後可以在自己專長的領域進行研究，也可以轉向研究不同的領域或參與跨學科研究。由於新加坡的新聞傳播環境頗受爭議，以新加坡為樣本的研究難免會得出與現行體制相左的發現和結論，因此對新加坡現行體制的反思和批評時常出現在學院師生發表的論文中。在極個別情況下，學院教師和學生發表的論文也會受到外界的質疑，但

1 由於學院沒有對教學內容有具體的要求和監督，所以教學中也會出現一些漏洞。例如，學院有關傳播法規的一門課長期以來是由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美國教師教授的，但筆者從與在新加坡媒體管理局實習的學生訪談中發現，學生雖然通過課程懂得了很多法規產生的哲理，但對本地各類法規的知識仍非常有限。

在學院內領導從未對教師和學生所發表的論文就其觀點進行指責。當學院的一名優秀教師在 2013 年因為非學術原因被大學拒絕授予終身教職和續簽合同時，學院的教師和學生也分別以內部通信和公開信的方式對大學領導層的決定提出質疑 (Soh, 2013, April 30)。雖然大學的這一決定沒能最終改變，但學院師生對這一事件的反應受到主流媒體和網路媒體的關注，對公眾輿論造成一定影響。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南洋理工大學是相對較小的學院，但學院師生在大學事物中所發出的聲音遠超其所占大學師生的比例，這不單單是學院主辦校園報紙和有線廣播電視節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於學院特有的文化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一個重點是培養學生對公眾事務的關注和興趣，讓他們從公眾利益出發尋找事實真相並提出自己的觀點，因此學院的師生在校內活動中也體現出傳播業者特有的文化傳統。在學院內，師生交流比較暢所欲言，領導對不同意見也比較寬容。在大學事物中，傳播學院的師生有較強的參與感並敢於發聲。

與寬鬆的學術環境相對應的是嚴格的考核制度。新加坡大學傳承了英國的考核制度，學生不但入學要通過統一的劍橋考試擇選，入學後仍然要面臨遠比西方和中國內地大學嚴格許多的考試制度。在學院成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院開設的每門課都要有期末考試，所有考試都是採取閉卷和匿名的方式在大學專設的考場舉行。隨著教學改革，一些實踐課程已經取消考試，更多的考試採取開卷的方式進行，但學生每學期仍然要在嚴密監考下的統一考場進行多門考試。沒有通過考試的學生在本學期不能補考，要等到下學期或下學年複讀同樣的課程再次參加考試。學生的各科成績是按等級比例分配的，只有少數學生能獲得 A 或 A- 的成績，所以學院平均 B 的學生在海外留學期間通常會取得 A 的成績。這樣的考試制度雖然會迫使學生學習期間過於專注書本知識，但對鞭策學生努力學習還是行之有效的。

教師考核在南洋理工大學 2007–2008 年進行改革之前是相對寬鬆的。南洋理工大學初建時是一所專注教學的大學，雖然對科研有一定要求，但沒有明確的指標。教師中除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任教六年後可以獲得到 55 歲結束的終身教職外，其他國籍的教師都是採用合同制，每三年一簽。一般情況下，只有少數在教學上學生反映很差或無研究成果的教師得不到續聘。薪金的增長基本上隨時間積累，年終獎金差別很小。在 2007 年，大學對教師的聘用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所有教師包括已有終身教職的教師都受到重新審核，評估標準涉及教學、科研和服務三方面。符合大學標準的具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獲得到 65 歲為止的終身教職，符合條件的助理教授要等到第二、三個三年合同完成後進行評估，決定

可否升等並獲終身教職 (Andersson & Mayer, 2014)。在這一輪的審核過程中，學院有 30% 以上的教師沒能在合同結束後續聘。

在新的教師任聘制度下，教師招聘有了更加嚴格的評審制度，學院在招聘教師方面只有推薦權，最終任聘與否由大學教務長和一級學院院長組成的委員會決定。新任聘的助理教授要在三個三年合同（後改為三年加四年的兩個合同）內升等並獲終身教職，否則將面臨淘汰。這樣的任聘體系與北美大學的任聘制度相似，但由於新加坡大學數量有限，在一所大學拿不到終身教職也基本上失去在本地其他大學任教的機會，因此年輕的助理教授們倍感壓力。從這些年的經驗看，學院新升等的教師在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品質上通常高於北美研究型大學的同輩，即便如此仍然有半數左右的助理教授無法升等或選擇在評審前離開。提升為副教授並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在六年後有機會被學院推薦參加晉升教授的評審。鑒於目前全大學只有 15% 左右的教師獲得正教授職稱，而且這個比例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提升，正教授的評審更具競爭性。

除了嚴格的升等評審制度外，所有教師每年都要接受年終評估。每名教師要填寫統一的表格並提交個人簡歷，由學院五名正教授組成的委員會對被評審人的教學、科研和服務進行評估，評估結果再由學院領導組成的委員會審核評定。所有教師會按大學人事部門設定的比率劃分為 A-D 四等，由人事部門根據評估等級決定每名教師的薪資增長和獎金數額（一般為 0-4 個月的工資額度）。年終評審與嚴格的任聘和升等審查相結合使得教師任教期間長期感受到壓力和挑戰，成為提升教學品質和科研成果的有效手段。

伍、與時俱進，銳意改革

過去的三十年見證了全球化和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這些變化自然影響到新聞傳播的發展。面對傳播業界的變化，新聞傳播教育必須不斷調整教學內容和方式。作為傳播教育的後來者，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通過不斷招聘新畢業的年輕教師在更新教學內容和方式上具有一定優勢，但除此之外學院也對課程設置和內容有意識地進行改革。

學院成立之初在參考了國際不同傳播教育模式後設立了新聞、廣電、公關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每個系都有明確目標為特定的專業領域培養人才。學生從入學第三年開始進入專業學習，由於各科系課程相對獨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系為單位的學生群體，學生鮮有機會修讀非本專業的高年級課程。隨著網

路和多媒體的發展，特別是當新加坡政府為了提高本地媒體的競爭力而允許本地報業集團辦電視和廣播電臺並允許廣電集團辦報紙之後（袁舟，2004 年 9 月 13 日）²，這種傳統的以系為單位的教學方式顯然不利於培養能夠適應網路和多媒體時代的傳播專才。

為了使教學適應現代傳播發展的需要，學院在 2005 年對本科生課程進行了重大改革。原有以系為基礎的課程設置被不同專業的核心課程取代，本科生在結束前兩年的通識課程之後不再劃分為新聞、廣電、公共與促銷傳播和傳播研究四個系的學生，學生可以從為新聞、廣播電視、電影、公關、廣告、傳播研究等領域設立的系列課程中選讀推薦的核心課程和輔助課程。學生可以專門修讀一兩個領域的課程，也可從不同領域的課程中挑選自己想要的課程。換言之，高年級的課程設置從「套餐」轉為「自助餐」模式，學生可以自由選讀有利於畢業後個人發展的課程。

學院的課程設置隨著大學整體課程設置的調整近年來一直在變化，總的目標是讓整個教學體系更加強調通識和跨學科教育，其結果是必修科目的減少和選修課程多樣化的加強。受大學推進跨學科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影響，學院內部也取消了原有的科系建制，各類課程由學院統一安排，根據媒體行業的發展趨勢不斷增加新的教學內容。例如，學院近年來利用本學院資訊科學的師資力量為傳播學本科生開設了資料採擷、分類、分析和視覺化方面的課程以適應大資料時代對傳播專業人士的要求。同時，學院也通過招聘新的師資力量開設和擴展了健康傳播和社交媒體方面的課程和研究。

陸、結語

在過去的 20 多年中，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和兩岸三地的新聞傳播學院共同經歷了傳播教育在亞洲大發展的時期。由於新加坡的社會體制以及傳播與教育環境與兩岸三地有很大區別，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教學科研體系與兩岸三地傳播學院，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傳播院校，有很大不同。新加坡雖然在文化上可被看作是大中華文化圈的一分子，但它在社會制度和教育文化體系中融入了更多西方文化傳統，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建院和發展上體現了這一社會背景。

2 報業集團和廣電集團相互涉入對方領域的競爭雖然最終因為虧損而終止，但隨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兩家集團都先後利用網路開辦了多媒體新聞平臺。與此同時，公關、廣告等領域也逐步向多種媒體融合發展。這些變化迫使學院將教學重點從單一的文字或視聽訓練轉向培養多技能的新聞傳播業者。

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在國際學科排名榜上的優異表現得益於其國際化程度，學院在教師隊伍建設和科研成果發表方面的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結果。新加坡歷來重視自己在各方面的國際排名，其大學教育近年改革的焦點也放在各項可以在國際間進行比較的指標上，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作為南洋理工大學的一部分，也自然隨著整個大學教育的改革而更多地運用國際性指標衡量自身的教學與研究。這樣做的正面效果是擴大了學院的知名度和提升了學院的國際排名，其負面影響是學院相對愈來愈忽視學院對亞洲傳播教育與研究發展的專注和貢獻，有違學院創辦者的初衷。另一方面，學院自由的學術氛圍加上嚴格但相對公平的考核制度，也是學院得以培養一支可延續的國際化教師隊伍和保持良好生源的重要因素。

教育機構說到底是為本國服務的，因此一所學院的成功與否最終是看其能否完成對本國所需人才培養的任務，其發展無疑也受限於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從這個意義出發，不同國家教育機構的優劣是無法用同樣的標準衡量的。國際排名所依據的只是教育機構共有的部分特徵，這樣的評比方式使得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這樣國際化程度高的學院在國際排名中受惠。作為亞洲傳播教育的一分子，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辦學模式不會輕易地照搬到亞洲其他地方，但它通過國際化程度提升學院國際知名度的經驗值得其他亞洲傳播教育機構借鑒。

參考書目

- 〈楊榮文：鼓勵國內外傳媒公司投資，我國希望發展成為區域性大眾傳播中心〉（1994年5月11日）。《聯合早報》，第1版。
- 袁舟（2004年9月13日）。〈新加坡報業控股的多媒體整合〉，《人民網》。
上網日期：2019年7月23日，取自 <http://dengxiaopingnet.com/GB/14677/22100/37595/37596/2781049.html>
- 郝曉鳴、池見星（2012年11月28日）。〈用亞洲的經驗擴大看世界的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第B05版。
- 陳先哲（2017年5月2日）。〈重識大樓之謂與大師之謂〉，《光明日報》，第13版。
- 張汐瑩（2016年7月11日）。〈華校60年 飲水思情義〉，《聯合晚報》。
上網日期：2019年7月21日，取自 <https://www.wanbao.com.sg/taxonomy/term/46/all/feed/page/6/0?page=487>

郭振羽 (2019)。〈新加坡的傳播教育：從播種到成蔭（中）〉，《怡和世紀》，41：66-71。

新加坡文獻館 (2018 年 9 月 15 日)。〈李光耀關閉南洋大學歷史紀實〉。上網日期：2020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2090>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2018)。〈傳媒與娛樂產業〉。上網日期：2019 年 10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edb.gov.sg/content/edb/zh/industries/industries/media-and-entertainment.html>

楊倩蓉 (2010)。〈郭振羽老師——新加坡傳播教育領航者〉，《提燈照路的人：政大新聞系 75 周年典範人物》。上網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取自 https://comm.nccu.edu.tw/zh_tw/link18/people9/%E9%83%AD%E6%8C%AF%E7%BE%BD%E3%80%80%E6%96%B0%E5%8A%A0%E5%9D%A1%E5%82%B3%E6%92%AD%E6%95%99%E8%82%B2%E9%A0%98%E8%88%AA%E8%80%85-24605912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9). Shanghai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2019—Communication. Retrieved April 17, 2020, from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Shanghairanking-Subject-Rankings-2019/communication.html>

Andersson, B., & Mayer, T. (2014).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ory: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Lion City. In J. K. Hudzik (Ed.),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isation: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o success* (pp. 175-182). London, UK: Routledge.

APAC Outlook. (n.d.). Recording the growth of the media industry in Singapore. Retrieved April 1, 2020, from <https://www.asiaoutlookmag.com/news/recording-the-growth-of-the-media-industry-in-singapore>

Cham, T. S. (2014). *The making of NTU: My stor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Cheong, D. (2017, May 4).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be aligned with needs of the economy: Ong Ye Kung.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9, fro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ducation-system-should-be-aligned-with-needs-of-the-economy-ong-ye-kung>

Goh, C. B., & Tan, L. W. H.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n S. K. Lee, C. B. Goh, B. Fredricksen, & J. P. Tan (Eds.), *Toward a better fu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 since 1965 (pp. 149-16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gov.sg. (2018). Is it true our public universities reserve 20% of their places for foreign students? Retrieved July 3, 2020, from <https://www.gov.sg/article/is-it-true-our-public-universities-reserve-20-of-their-places-for-foreign-students>
- Harding, H. (1993).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660-686.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3229X>
- HistorySG. (2015).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Retrieved July 4, 2020, from <https://eresources.nlb.gov.sg/history/events/5b196e5e-3204-4dd5-91d2-103474eaf0fb>
- Hor, J. (2009). Soft words over spiked story. *The Nanyang Chronicle*, 15(4), 6.
- Hugo, J. (2017, May 11). School’s out: How Singapore keeps university reserved for the elites. *The NewsLens*. Retrieved August 23, 2019, from <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68084>
- Hukill, M. A. (1994).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Responding to media needs. *Media Asia*, 51, 199-205. <https://doi.org/10.1080/01296612.1994.11726454>
- Kuo, E. C. Y. (1991).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Singapore: Themes, gaps and priorities—With a select bibliography.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 109-128.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9109359543>
- Kuo, E. C. Y., & Lee C. W. (2006).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ingapo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K. W. Y. Leung, J. Kenny, & P. S. N.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p. 211-234).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Lee, M. H., & Gopinathan, S. (2008).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in Singapore: Amazing or a maze?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6, 569-588. <https://doi.org/10.2304/pfie.2008.6.5.569>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 Communication & media studies.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19, from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19/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
-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9). 2019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Retrieved August 2, 2019, from <https://rsf.org/en/ranking/2019>

-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6). *Singapore 2006 statistical highlight*.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Singapore profile—Media. (2017, September 5). *BBC News*. Retrieved March 3, 2020,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15966553>
- Soh, E. (2013, April 30). Students, faculty protest against rejection of Dr. Cherian George’s appeal. *Yahoo News*. Retrieved July 12, 2020, from <https://sg.news.yahoo.com/ntu-rejects-outspoken-professor-s-tenure-appeal-115504121.html>
- Staff, R. (2008, October 5). Singapore students protest university censorship. *Reuters*. Retrieved July 3, 2020, from <https://in.reuters.com/article/idINIndia-35804320081005>
- Wang, G. (1993).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26-948. <https://doi.org/10.1017/S0305741000032392>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19a). Endowment fund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9,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Endowment/Pages/Home.aspx>
- (2019b). Overseas opportunit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9,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programmes/Prospective Students/Prospective%20Masters%20and%20PhD%20students/Student%20Life%20and%20Development/Pages/Overseas-Opportunities.aspx](http://www.wkwsci.ntu.edu.sg/programmes/Prospective%20Students/Prospective%20Masters%20and%20PhD%20students/Student%20Life%20and%20Development/Pages/Overseas-Opportunities.aspx)
-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20a). Our history.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July 2, 2020,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Pages/Our-History.aspx>
- (2020b). About WKWSC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Retrieved July 5, 2020, from <http://www.wkwsci.ntu.edu.sg/aboutus/Pages/About-WKWSCI.aspx>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of the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Hao, Xiaoming*

Retired Professor,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WKWSCI) of Singapor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as grown into a world-renowned communication school in less than 30 years, setting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Asian schools. Compared with communication schools in China's mainland,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WKWSCI performs better in international rankings based on its more internationally orien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ich in turn are based on Singapore's unique cultural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school's 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faculty. Other factors that ensure the schoo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e its free academic environment, strict assessment systems, and constant drive for chang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academic freedom, assessment systems

* Email: txmhao@gmail.com

Received: 2020.4.3

Accepted: 2020.9.16

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 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

林宇玲^{*}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摘要

數位科技改變了新聞生產環境，對新聞業和新聞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儘管是危機，卻也是轉機，在混亂、顛覆的新聞環境中，開闢新的可能性。本文試圖從新聞教育者的反身性角度，檢視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所面對的挑戰與改革，並藉由探討新聞學的改變、西方新聞教育的應對，延伸至國內的轉型案例——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作為個案，說明新聞教育為何要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型的遭遇與困難。最後，本文提出三項建議，分別是建立 Journalism 2.0 倫理規範、重新檢視理論課程的內涵，以及調整教師心態。

關鍵詞：新聞學 2.0、新聞教育、新聞教學醫院模式、創業新聞學、數位轉型

^{*} Email: ylin@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9 月 5 日

壹、前言

數位科技改變了新聞媒體生態，原是主心骨的印刷媒體也陷入困境 (Williams, 2017, p. 4731)。隨著閱讀率下降、廣告收益銳減，以及紙張成本上揚，不少國內外的報刊雜誌紛紛面臨裁員、縮編、停刊，或被迫轉型為網路媒體的命運。報業的榮景不在，各家媒體無不引以為鑒，戰戰兢兢，「如何因應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已成為新聞業的首要之務 (Casero-Ripollés & Izquierdo-Castillo, 2013; Downie & Schudson, 2009)。

除了新聞業外，大學新聞相關科系所面對的數位衝擊，也不容小覷。一直以來，新聞教育都是採用自由報業的思維，不僅新聞哲學以報業的四大理論為主，強調新聞的「客觀性」、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及記者的「守門人」角色；在新聞實務上，也要求學生練習純淨新聞寫作、平面排版編輯，以及出版發行校園刊物 (Vine, 2016)。但，在「報紙將死」或廢紙的聲浪下，傳統以報業為內涵的新聞學系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尤其在「人人都是記者」的今日，不用接受新聞教育就能生產新聞，那新聞學系的價值何在？又是否應配合時下的數位傳播而更名，還是沿用「新聞學」之名，但因應數位變遷，進行科系的重新定位和課程的修訂？

目前國內外各大新聞相關科系的作法不一：有的學校選擇另增新科系，如摩根州立大學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的「多媒體新聞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Journalism)；有的選擇更名，如南佛羅里達聖彼得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St. Petersburg) 的「新聞學與數位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也有新增專業，如丹佛大都會州立大學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of Denver) 在新聞學系底下增設「匯流新聞學」組 (Convergent Journalism Major)，或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增加「數位新聞學」 (Digital Journalism) 碩士學位；也有提供雙學位，如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新聞學院提供新聞學和電腦科學的碩士雙學位 (Dual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Computer Science)。當然，更有不少學校仍在觀望，但大多數的新聞學系已增開數位相關課程 (Huang, Davison, Shreve, Davis, & Bettendorf, 2006)。

各別學校系所因為社文脈絡、政經背景、教育政策或數位資源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改革策略，但面對數位挑戰，增設數位技術課程，教導學生學習數位、多媒體技巧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然而，新聞學系學生獲得數位技巧，是否就能成為

未來的記者，趕上業界需求？當新聞教育以數位技術來進行改革，是否又會重蹈覆轍——重技術而輕理論、重實作而輕思考、重業界而輕學術？這些問題已引發國外學界的熱議，但國內相關的論述尚未多見，因此本文試圖從新聞教育者的反身性角度，檢視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的改革，並從以下三部分進行探討：

一、新聞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能否應付時下的媒體環境？

二、因應對策的反思：現有西方學界提出的解套方式能否讓新聞教育擺脫過去的批判，並跳脫數位困境？

三、個案的反思：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革作為個案，進一步檢視改革所面臨的問題與限制。

貳、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產品 VS. 新聞過程

新聞教育的目標與任務，涉及「何謂新聞學？」、「誰是記者？」及「實務內容為何？」(Deuze & Witschge, 2018)。最早的新聞教育是採用學徒制 (apprenticeship)——待新人進入報社後，再進行在職培訓 (on-the-job training)，但美國學界主張新聞學是一種專業，報社記者必須接受更好的教育，才能改善新聞品質，裨益民主發展，因而在二十世紀初推動以大學為主 (university-based) 的新聞教育 (Folkerts, 2014)。

隨著傳播科技的推陳出新，繼報紙之後，廣播、電視、衛星、電子報 (Web 1.0)，新聞組織一直都是採用報業以新聞室為中心 (newsroom-centricity) 的守門模式，強調常規化和受控的新聞形式 (routinized and controlled forms)，大學新聞教育也沿用此模式，傳授「單一媒介」、「分開平臺」的守門知識與專業技巧 (Deuze & Witschge, 2018)。

然而，Web 2.0 科技（如：YouTube、Blog 或 Facebook）改變了一切，不但開創多種新聞形式（如：協作新聞、臉書新聞）和跨平臺的新聞作業，也允許業餘者（即一般公民）參與新聞行列。以往的守門模式在匯流的環境中，顯得有些扞格不入 (Newton, 2012a)。這可以從下面四點看出端倪。

一、傳播管道

過去由於傳播管道有限，所能承載的內容相對受限，以致新聞組織必須採用專業守門，才能產出有品質且「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 的新聞 (Sambrook, 2012, p. 39)。但在匯流時代，傳播管道的數量和容量激增，新聞媒體／記者已喪

失產製新聞的獨占權（monopoly）。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高速、多媒體、超連結、互動性及跨媒體／平臺功能，也讓線上新聞不再局限於單一媒體／平臺的呈現，而且產製的時間縮短、訊息增多，幾乎每分鐘都是截止時間，因此很難再用「先篩選，後出版」（filter, then publish）的守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先出版，再篩選」（publish, then filter）的參與模式——藉由不斷更新訊息，同時鼓勵民眾參與新聞生產或討論，試圖以「合作看門」（collaborative gatewatching）和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來提高新聞的可信度（Bruns, 2003; Karlsson, 2010, 2011; Robinson, 2007）。

二、傳播方式

新聞學一向採用「線性傳遞」——由新聞組織將「完成」的新聞，單向傳送給所有民眾，也就是「由我們寫，你來讀」（we write and you read）。然而，在 Web 2.0 的今日，很多人並非從新聞媒體取得新聞，而是經由社群分享，甚或由朋友圈來決定關注的議題，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如前（Cochrane, Sissons, & Mulrennan, 2012; Ekström & Westlund, 2019）。加上網路科技標榜非線性、去中心化、去階層化的傳播方式，不僅有助於打破新聞生產／消費、後臺／前臺、專業／業餘的界線，也能讓民眾和新聞、記者，甚或其他公眾進行互動，創造更廣的參與對話（engaged dialog）（Mihailidis & Shumow, 2011）。

三、記者和閱聽人身分

記者原指服務於新聞組織且受過新聞訓練的專業人員，但在數位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出版者，雖然他們只是業餘／公民記者，缺乏專業和資源，多只做偶發或隨機的新聞（accidental or random acts of journalism），但他們的人數眾多且遍及各地，可能隨時就在新聞現場，只要一支手機，便能即時傳送「第一手消息」，迫使新聞組織也不得不和他們合作。除了做新聞外，民眾也不再是被動的新聞接收者，而是主動上網留言、討論或批評，成為第四權的守門人（watchdogs of the watchdogs），又被稱為「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Bruns, 2003）。

四、新聞本質

在 Web 1.0 時，記者仍處在 News 1.0/Journalism 1.0 的世界，Web 1.0 科技（如：e-mail）讓新聞的守門工作變得更有效率，維持了傳統的編輯理想型（editorial

ideal) (Brasen, 2009, June 19)；但進入 Web 2.0 後，在新聞學內產生了斷裂（disruptive）並造成混亂，Brasen (2009, June 19) 稱此為 News 2.0/Journalism 2.0。新聞已非專業控制下的產物——一個已經完成的事實報導，而是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新聞的生產過程，透過不斷的對話（如：眾人的質疑和批評）和互動，進一步擴展或連結不同的觀點，新聞已演變成持續改變的「過程」(Robinson, 2011; Singer, 2010)。

顯然，新聞的運作大異從前（見表 1），新聞本身雖然是專業，卻也是公民活動（civic activity），其角色主要在鼓勵公眾參與，更甚於專業守門或訊息傳遞。因此，新聞業當前所需解決的難題：除了跟上新技術外，還必須拿捏專業守門和開放參與之間的分寸，以維護新聞品質。記者不僅要有能力生產多媒體、跨平臺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進行即時報導，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性對話 (Mihailidis & Shumow, 2011)。當然，這些改變也意味著新聞教育必須進行徹底改革，才能趕上 Journalism 2.0。

參、西方新聞教育的反思

自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成立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後，一直引發各界爭議。早期的問題偏重在「新聞作為一項技藝（craft），是否需要大學文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世界各國陸續採用高校模式的新聞教育，而新聞業也開始聘僱新聞學系畢業生從事入門工作時，問題也轉向「理論與實務課程，孰重孰輕？」(Egbujor, 2018; Folkerts, Hamilton, & Lemann, 2013; Skinner, Gasher, & Compton, 2001; Šopar, Georgievski, & Trajkoska, 2017)。

表 1：當代新聞的轉變

新聞學	News 1.0/Journalism 1.0	News 2.0/Journalism 2.0
新聞模式	工業時代：客觀新聞	數位時代：網路新聞
傳播管道	單一、有限	匯流、繁多
新聞處理	新聞室內：階層化的專業守門控制	開放後臺：專業與業餘的合作、參與模式
傳播方式	單向線性、由上至下、一對多的傳遞模式	非線性、由下至上、多對多的參與模式
記者身分	新聞組織的專業人員	任何人
讀者身分	訊息接收者且是公民	公民不僅是接受者，也是生產性使用者（producer）或公民記者
新聞本質	新聞成品：事實報導	新聞處在變動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畢竟做新聞不同於做學問，需要有相關的實務技能和實戰經驗，而高等教育偏重在思辨和研究，要求新聞系學生修習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及傳播相關課程 (Sligo, 2004, pp. 195-197)，導致學生在校所學不能完全契合業界所需 (el-Nawawy, 2007; Picard, 2015)。批評者認為，新聞教育的學院化 (academization) 太過學術，讓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一些無用的理論，因而建議新聞教育應採用產業導向 (industry-oriented)，著重在以技巧為主的訓練 (skill-based training) (Corrigan, 1993; Medsger, 1996)。

但支持者反對這種「為職業準備」(preparation for a career)的作法，他們主張新聞教育是在服務民主和公眾而非業界，新聞學也不等於新聞產業 (news industry)，而是為了修正 (correction) 新聞業的弊端，提供更好的新聞報導，才要求學生學習更多知識和調查分析技巧，以善盡其角色義務 (Francis, 2013; Skinner et al., 2001)。換言之，新聞教育不是在培養新聞工作者 (news workers) 而是理想的記者 (ideal journalists)。

不論是強調新聞產業的現實面，抑或新聞學的規範面，新聞教育的確包含職業訓練和學術學科 (academic discipline) 兩部分。誠如 Skinner et al. (2001, p. 344) 所言，「新聞教育猶如一位僕役，同時服侍兩位主人：一方面，新聞教育藉由供應新聞室訓練有素的畢業生來滿足新聞組織的要求；另一方面，新聞學系被要求符合大學標準，即高等教育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遠超過職業訓練」。然而，做新聞和討論新聞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Bovée, 1999)。為了讓學生畢業後既能找到工作，又可以促進新聞、民主健全發展，學界一般都同意兩者不能偏廢，必須採用整合 (integrated) 取向，同時結合理論和實務。但，兩者的比重該如何分配，又是一番論戰。

一、理論 vs. 實務

這問題也從二十世紀末，延燒至今。新聞教育的實作課程原以傳統媒體為主，但在數位時代卻顯得黔驢技窮，無法跟上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在美國的研究顯示，大學所傳授的新聞技巧被認為過時，且和職場所需逐漸脫節 (Adams, 2008; McDonough, Rodriguez, & Prior-Miller, 2009; Wenger, Owens, & Cain, 2018)。Knight 基金會因此建議新聞院校應朝向「數位優先」(digital first) 發展，除了舊有的採訪、報導技巧外，再新增數位匯流技術或多媒體等課程 (Lynch, 2015)。Huang et al. (2006) 亦發現，在美國已有六成的新聞學院重新設計課程，以便讓學

生能在多平臺上生產新聞；至於那些無法新增數位課程的學校，Todd & Levine (2010) 則鼓勵他們和產業合作，務必讓學生能習得數位技能，以適應職場。

儘管有不少學者支持數位（技術）優先的作法，但增加實務課程，勢必壓縮原有的理論課程。Kelley (2007) 以為，數位科技只會不斷推陳出新，技術永遠學不完，學生需要的反而是批判性思考，讓他們瞭解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做出明智的選擇和調適。Taylor (2003，轉引自 Kelly, 2007, p. 6) 也指出，學習多媒體技巧或許能幫助學生找到工作，但學院培訓的只是技術員（technicians）而非思考者。即使有不少批評聲浪，但面對數位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多數的教育方案仍是圍繞在科技／技術問題上，似乎強化個人的科技／技術能力後，一切難題便能迎刃而解，簡化了記者和新聞工作之間關係。

技術與理論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新聞教育者的智慧，但 Skinner et al. (2001, p. 349) 認為，課程的比重或許不是癥結所在，而是兩者該如何結合的問題。學生不僅需要專業技能和廣泛的社會知識，更應瞭解新聞業如何參與整個社會的意義產製。為此，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如何將理論概念應用在實務上，進一步對廣泛的文化、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批判，尤其應對新聞產業進行反思，以協助學生瞭解現有新聞專業的規範與意識形態作用對其工作的潛在束縛，以及未來改變的前景 (Hirst, 2010)。

除了理論與實務之爭外，西方學界面對數位匯流還有兩大論辯：一是新聞教育的方向（direction）是培養專才或通才（specialist or generalist）？二是新聞教育的任務（mission）是採取跟隨者模式或創新者模式（follower mode or innovator mode）？

二、技術通才 vs. 內容專才

首先，新聞教育的方向過往一直偏向訓練學生成為某一媒體、新聞類型或議題的專才 (Deuze, 2006, p. 26)，如報社的政治記者或電視臺的攝影記者。由於不同媒體或新聞類型所需的技能有別，为了提高新聞報導的品質，學生在校只要挑選某項技藝（如：文字、攝影或影音）加以培訓，便能成為這方面的專才。不過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學有專長的記者反而很難適應今日跨平臺的工作環境，迫使教育者重新思考新聞教育的方向與定位：課程是否應按照個別媒體的特性而發展成「序列課程」（sequence courses），還是打破序列，以多媒材、多樣態方式讓學生同時學習各種技能 (Mensing & Ryfe, 2013, p. 37)？

「媒體匯流」(media convergence) 涉及不同媒體內容、媒體形式，甚至媒體組織之間的匯流，記者因此也應具有「角色匯流」(role convergence) 的能力 (Huang et al., 2006, p. 228)。猶如背包記者 (backpack journalist) 身兼數職，能掌握各種數位技術，一人多工完成新聞的生產與出版，包括文字寫作、攝影、剪輯、編輯或貼文等工作。學界雖然擔心學生什麼都學，容易變成什麼都不專精，但在匯流的今日，新聞教育採用通才取向 (generalist approach) 似乎是較有利的作法，有助於學生成功就業 (Larrondo-Ureta, Peña-Fernández, Meso-Ayerdi, & PérezDasilva, 2019; Wotkyns, 2014)。

Lugo-Ortiz (2016) 稱此為「新通才記者」(a new generalist-journalist)，他們必須具備多媒體技巧、社群媒體管理，以及資訊科技的知識，並能將這些能力同時應用在商業或另類平臺上。為了達成此目的，新聞教育似乎無法再沿用「序列課程」，反而須培養學生的工作彈性、多工能力及合作技巧，並能以四種方式訴說故事 (Larrondo-Ureta et al., 2019)：

- (一) 利用各種媒材 (如：文字、圖像、聲音、影像等) 編寫故事，並能以動態、連結方式持續地擴大、延伸故事；
- (二) 除了將每一故事上網並在多平臺發行外，也能根據需要，進行發行版本的調整；
- (三) 將故事從一開始便設計成多平臺的內容，並以跨平臺或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
- (四) 跨媒體的故事 (transmedia stories) 除力邀使用者參與其中外，也能運用各種傳播方式 (如：病毒視頻、電視節目、推文等) 發揮其優勢。

儘管多平臺能讓學生學會以不同的形式說故事，但易演變成新聞的呈現者 (news presenter) 而非報導者 (Gasher, 2015, p. 105)。反對者以為，新聞的內容遠比形式重要，而內容的專業知識無法一蹴可幾，不論是政治、經濟、醫藥、文化等新聞主題，都需要時間慢慢累積知識；學生之後才有能力針對事件問對的問題、建立脈絡、提供分析，以及給予意義 (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

Donsbach (2014) 和 Patterson (2013) 亦主張，記者的職能不應該是通才，而應類似醫生、律師或其他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為了提高記者的質量，應訓練他們具備五種能力 (Takahashi & Parks, 2018)：

- (一) 具有新聞事件發生之歷史與智識脈絡的知識；
- (二) 對他們所報導之特別主題的掌握；
- (三) 擁有過程知識，即瞭解有關支配新聞決策和傳播過程的社會心理因素；

(四) 在寫作、採訪、事實蒐集方面的專業技巧；

(五) 對專業價值和角色的承諾。

對反對者來說，高品質的新聞報導必須要求專業化，也就是須要新聞內容的專才，才能確保新聞判斷的正確性，而此遠非平臺的特定知識所能促成 (Donsbach, 2014; Gans, 2004; 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其實，Lugo-Ortiz (2016, p. 284) 也瞭解通才的主張，可能引發內容變得淺薄的疑慮，而呼籲新聞學院應重新反思教育的目標：究竟是培養學生成為新聞業的入門者，還是為了生產更深入的主題，以提高新聞和公眾的辯論？

三、跟隨者模式 vs. 創新者模式

另一項爭議則涉及最根本的新聞教育典範與任務模式。過去新聞教育遵從「技藝為主」(craft-centre) 的典範，其任務是在訓練未來的記者，Deuze (2006, p. 25) 稱此為「跟隨者模式」——新聞教育反映專業的真正需求，亦步亦趨地緊跟在新聞業之後，以新聞專業的歷史、職業常規與價值，以及專業技能的要求來規劃新聞教育的課程與核心能力。

然而，傳統新聞媒體的好景不常，廣告下滑、人事緊縮，就業市場相對萎靡，如果新聞學院繼續採用「跟隨者模式」，以畢業生的就業成果來看，辦學成效勢必不彰。事實上，今日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就業市場十分多元，包含行銷、公關、市場調查與分析人員等，並非狹義的記者一行 (Shapiro, 2015)。這也意味著新聞系的核心任務未必是「準備」(preparation)——讓學生成為未來新聞行業的一員。

在資訊豐富的時代，人人都能成為記者，似乎沒有必要再接受專業的新聞教育，但這種想法其實是錯的。資訊縱然爆炸，卻流言蜚語四起、假新聞當道，人人更應接受新聞學的訓練，以強化個人在後真理時代 (post-truth era) 的資訊處理能力。De Burgh (2003, p. 105) 曾說，「新聞學——至少可能——比其他許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具有更多的潛力，因為它提供極好的機會將所學的技巧直接關聯至理論，並將反身性實踐 (the reflexive practical) 和應用理論完美結合，讓新聞學成為一門了不起學科——作為一個學術學科具有極大的潛力。」接受新聞教育不一定要成為記者，而是能利用新聞學的學科訓練（如：遇事懷疑並查證），有效區分真理／偽造、事實／意見、原因／藉口 (Bhaskaran, Mishra, & Nair, 2019)。

就此而論，新聞教育應是一種知識取向 (an approach to knowledge)，教導

學生一套新聞學的認識論（a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以查詢方法（method of inquiry）獲得事實的可靠性（factual reliability），讓學生學習如何懷疑和批判、獨立調查、與陌生人應對、辨明資訊的真偽、將原始資料變成可靠的事實，並以白話的敘事方式、透過各種平臺傳遞給大眾——這些能力對各種職業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Shapiro, 2015）。

雖然這些能力也和之前的典範相似，但更強調學生的認知與反思面，也就是新聞教育的典範已從職業準備（「以技藝為主」）走向「以知識為主」（knowledge-centred）或「以認識論為主」（epistemology-centred）的典範（Shapiro, 2015）。Ward (2010, pp. 146-147) 指出，新聞學是一種主動、解釋的文化活動，為了產製有根據的詮釋，必須透過適切的標準來檢測新聞調查（journalistic inquiry），包含檢查偏見、質疑據說的事實和觀點、尋找證據，以及防止大意、未經批判的報導，以證明其選擇的合理性。今日的新聞學已不再追求反映真實，而是抱持開放的態度，努力做出具有效力的詮釋（如：測試並整合多種的事實、來源、角度）。如此的訓練將能協助學生在不斷擴大的媒體平臺上，產製或接收有用的訊息。

Brasen (2009, June 19) 曾提及，新聞學已從 Journalism 1.0 進入 Journalism 2.0，此轉變無可避免地也將引發新聞教育的重新布署。過去新聞教育採用的「跟隨者模式」，隨著傳統媒體的裁員風暴也受到質疑；為了振興新聞學，北美學界主張以「創新者模式」取代。目前已有兩種模式被提出來，分別是「教學醫院模式」（teaching hospital model）和「創業模式」（entrepreneurial model）。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Nicholas Lemann 在 2009 年首次提出「教學醫院」應用在新聞教育的構想，「像教學醫院的新聞學院當他們教育學生時，也能為社區提供重要服務」。Lemann 主要關切新聞學的供應面（supply side），由於傳統媒體的「廣告主一閱聽人」商業模式受創，嚴重危及地方媒體的營生，因而敦促新聞學院應利用現有的設備，替代他們成為新聞的生產中心，教育學生同時造福社區（Anderson, Glaisyer, Smith, & Rothfeld, 2011; Lemann, 2009; Mensing & Ryfe, 2013; Young & Giltrow, 2015）。在 Knight 和新美國基金會（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贊助下，美國已經有不少新聞學院正在進行「新聞的教學醫院」（journalistic teaching hospital）計畫，譬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沃爾特·克蘭基特新聞學院（Walter Cra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以被收購的 Arizona 公共廣播機構（Public Broadcasting Entity），

組成一間由新聞編輯室和實驗室所構成的教學醫院，讓校內新聞、電視、廣播及多媒體等學系的師生能共享資源，在此處進行多平臺的技能學習和跨平臺的小組合作 (Lynch, 2015)。

Newton (2013) 指出，社區需要新聞來維護其社會健康，新聞可謂是社區的命脈 (lifeblood)，因此新聞教育除了協助學生在現實社會裡做中學之外，更應帶領他們參與社區，報導社區所需的新聞。為此，「新聞的教學醫院」應包含六項要素，分別是：

- (一) 學生從事新聞工作；
- (二) 專業人員指導他們提高新聞品質和影響力；
- (三) 教授提供專題知識和提出問題；
- (四) 創新者開拓新工具和新技術；
- (五) 學者進行重大的研究項目；
- (六) 所有人通力合作，不但善盡告知之職，亦提高社區參與。

採用「教學醫院」作為隱喻，是因為它不僅服務社區，還必須進行臨床試驗——研發各種新藥和技術，這也意謂：新聞教育不再墨守成規，而是尋求改變。一方面，藉助有經驗的專家，讓師生能在數位平臺下，以做中學的方式，實際參與新聞操作，為社區提供更好的報導；另一方面，則允許學生探索並嘗試各種新技術和報導形式 (Newton, 2012a, 2013)。Newton (2013) 認為，目前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有三種活動和教學醫院模式有關，分別是：

- (一) 急救 (first aid)：鼓勵個別學生利用社群媒體關心和報導社區的見聞；
- (二) 診所 (clinics)：協助學生在專業的帶領下進行各種的社區報導，如：新聞學院的學生媒體 (student media)，整合學校的資源、設備，在教師的指導下，出版具有專業水準的社區報導；
- (三) 實驗室 (labs)：帶領學生研發數位時代所需的各種傳播技術或新軟體。

Newton (2012b, 2013) 強調，要成立一家教學醫院必須結合上述三種活動，讓教學醫院能提供比商業媒體更有品質的新聞，同時提高社區參與。正因如此，教學醫院最終將能成為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的改變引擎 (the engine of change)，而不再只是為了產業而設的新聞培訓計畫。

即便如此，Mensing & Ryfe (2013) 卻直言，「教學醫院」很難改變現狀，因為學生所練習的仍是目前產業所定義的新聞工作，而且這種模式比較適合資金雄厚的學院；在新聞業加速轉型之際，「創業模式」反而更加適合。此模式要求學

生去除舊思維，以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技能，為新聞學和自己找出新路，在低成本、低風險的數位環境中，開發以新聞實踐為主的新商業模式 (Benedetti, 2015; Breiner, 2013, May 17; Briggs, 2012; Carbasse, 2015)。

過去的新聞室典範 (newsroom paradigm) 將記者和業務分開，記者僅負責內容端，而無須過問接收端，但「創業模式」則結合長久以來新聞學切斷的兩端 (Wagemans, Witschge, & Deuze, 2016, p. 165)，要求學生從需求面著手，瞭解利基 (niche) 對象，並根據其需求去生產內容，再進行出版、宣傳及行銷等事宜，也就是將企業思維帶入新聞生產的每一階段，從內容至販售，皆由學生一手包辦。如此的模式現又被稱為「創業新聞學」 (Carbasse, 2015; Ferrier, 2012; Mensing & Ryfe, 2013;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創業新聞學試圖將企業、管理帶入新聞教育內，學生除了學習新聞技巧外，也應具備商業能力，能將其新聞實踐轉變成新事業。為了培養創業記者，新聞教育必須增開「媒介經濟學」、「產品開發」、「市場行銷」等課程，以協助學生掌握內容產品的行銷、業務、發行、成本及風險等細節 (Carbasse, 2015; Mensing & Ryfe, 2013)。目前除北美外，在拉丁美洲、歐洲等地的新聞學院也陸續採用創業模式，或至少開設「創業新聞學」課程，試圖帶領學生自創品牌或尋求改變 (Carbasse, 2015;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不過，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也發現，這些課程多是針對研究所或畢業生開設且以選修為主，大多數的新聞學院對「創業」仍抱持懷疑，擔心學生無法在公共報導與商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除了倫理考量外，Cohen (2015) 也質疑，創業新聞學恐掩蓋新聞人員在勞動市場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儘管兩種模式各有其缺點，但皆顯示西方學界在面對數位變革所做的努力，他們已意識到新聞教育不能再守缺抱殘，而必須更具動態和內省力，唯有不斷反省新聞教育的目的與任務，才不會被潮流淘汰。誠如 Newton (2012a) 所言，「透過『創意性破壞』的時代 (the era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大學可以引路，但前提是他們願意毀壞和重建自身。」

肆、個案反思

在瞭解新聞學的現況與西方新聞教育的改革後，國內新聞教育又是如何應對數位衝擊？本文以世新大學（簡稱世新）新聞學系所（包含研究所改造）的數位轉型作為個案，說明改革的經過、所遭遇的困難及限制。本人在世新新聞學系任

教二十餘載，於 107 學年接任系主任一職，參與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造計畫，除深知改革的始末外，更試圖從反身性觀點檢視整個轉型的過程，並以此作為國內新聞教育改革的借鏡。

世新新聞學系成立迄今，已有 62 年的歷史，從專科（如：新聞科或編採科）、改制為大學後的分組（如：編採組或國傳組），乃至成立新聞所，歷經多次的學制改革¹，但都以報業模式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軸，並在實習刊物《小世界周報》（簡稱《小世界》）上展現其成果，由大學部三年級學生負責報紙的採訪、編輯、排版、印刷，乃至發行。

在 Web 1.0 時代，系所追求資訊化，除了「電腦排版實務」課外，另增設「電子報新聞採寫」和「電子報」，並新增《小世界電子報》，但實際只是將報刊內容直接鑄入（shovel）電子報內。不過，值得一提，由於臺灣記者的社會聲望不斷下滑，《小世界》在 98 學年度也增加「電視組」和「網路組」，同時在課程上增開「電視新聞製作概論」、「電視新聞實作」及「多媒體新聞與實作」必修課，學生除了必選報紙組外，另一學期可以自選其他組別，不過這些組別的作品並未正式對外，只是在校內發行。報紙組的能力表現，尤其是採寫、編輯，仍被視為新聞系的核心能力指標。

直至近年，新聞系所的對外招生屢屢不利，開始成為校方檢討的對象。在 105 學年，碩士班註冊率僅有 13.33%；在 106 學年，大學部註冊率則是 91.94%，位列新聞學院的八系之末、全校倒數第六。校方高層質疑，新聞系原是世新大學的龍頭科系為何會演變至此，要求立即進行改革。

一、第一波改革：廢紙

從 105 學年起至 108 學年，新聞系的改革歷經兩波。第一波是廢紙並建置網路媒體。因應全球的廢紙聲浪，《小世界》在校方的要求下，全面數位化。雖然過去也有《小世界電子報》，但只是報紙的電子版，一旦廢紙，《小世界》也必

1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前身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高職部「編輯採訪科」，成立於 1956 年 8 月；1960 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並更名為「新聞科」；1962 年再修改回「編輯採訪科」。1991 年隨新聞學院改制，正式成立為新聞學系，並於其下分設「編輯採訪組」和「編輯翻譯組」；1993 年將「編輯翻譯組」更名為「國際傳播組」。1997 年 8 月，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改制為世新大學；1999 年之後增設「碩士在職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2002 年碩士班開始獨立招生。2004 年 8 月因應新聞傳播學院分殊發展需求，取消分組，回歸「新聞學系」的主體特色。自世新大學創校以來，新聞或編採學（科）系即為指標科系，經歷年的發展與蛻變，除維持為全校四學院、三十餘系所之屬一、屬二之核心學系，亦為全國新聞系所的代表之一。

須重新定位。在黃惠英主任的帶領下，《小世界》放棄時事路線，改走以議題為主的專題報導，範圍也不再局限於大文山區，實習學生被分成圖文、影音及網路三組，將其產製的內容全部上網。

由於《小世界》網站初創，系統運作並不穩定，常出現錯誤，必須隨時調整，也引發學生的抱怨。當時網路組的副總編輯王芳瑋表示，新聞系學生普遍缺乏資訊背景，不論是後臺或軟、硬體的維護，對學生來說都是一項考驗。

網站完成後也陸續出現一些 bug，需要隨時調整，重新架設網站也引起與學生間的摩擦，像是「為什麼要重新架設網站？」「為什麼要改成這麼麻煩？」等，規定不夠明確的地方也引起一些爭議，如格式錯誤該扣幾分之類的。約過了一年，新網站因為使用太多外掛而被病毒入侵無法使用，因此又緊急架設一個新網站。雖然外包給了工程師，但遇到問題還是無法立即解決。（王芳瑋，2020 年 2 月 12 日）

當年的《小世界》助教林書瑀也指出，剛成立的網站雖然沒有現在好看，總是數位化的第一步，所有內容可以全面上網，讓更多人看到，不過也切斷了周報和社區的聯繫。

印製報紙時期，《小世界》可透過送報與社區進行面對面的實體接觸，穩固報社和社區之間的情誼。停止印報後，實習記者與社區接觸次數下降，轉往網路發展，觸及人數不再僅限於社區鄰里，改往全國發展，觸及人數比以往更為全面、更寬廣。（林書瑀，2020 年 2 月 14 日）

經過兩年的努力，學生逐漸熟悉並接受《小世界》的運作，懷舊和怨言變少，網站也漸上軌道。

二、第二波改革：數位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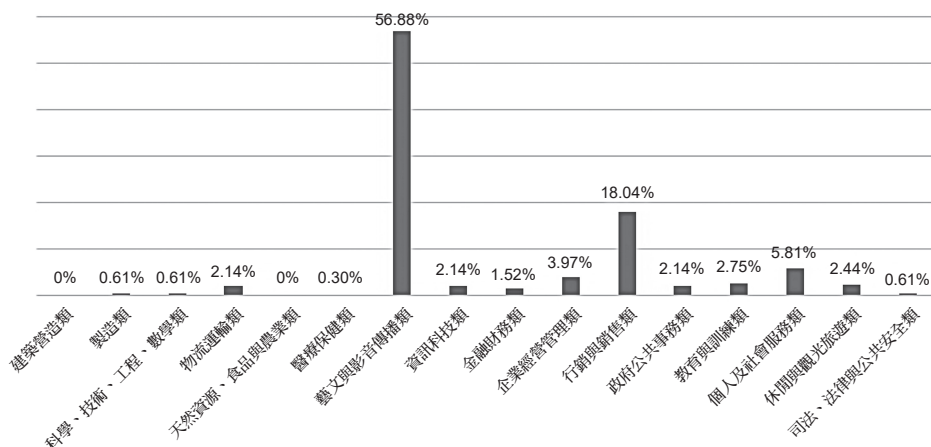
第二波的改革是「數位優先」，確立新聞學系的新特色。《小世界》線上發行後，校方仍認為「數位化程度不夠」、「表現過於靜態」，並歸因於「新聞系＝報業」的課程設計所致，必須盡快進行改造，從系所更名或重新定位著手。由

於系上教師大多反對更名，因此在 107 學年起參考國外的「數位優先」作法，重新定位新聞學系。

根據 2019 年畢業流向的調查資料顯示，新聞系所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相當多樣，從事傳播相關行業占 56.88%，其次是行銷與銷售業占 18.04%，第三則是個人與社會服務業占 5.81%，並非只從事記者一行（見圖 1）²。就實際的就業考量，本系改以 Shapiro (2015) 所建議「以知識為主」的典範，培養學生普遍具有一套新聞學的認識論，並在其感興趣的領域上善用此訓練。新聞學系不再只是為未來記者做準備，而是讓學生能在數位傳播的相關領域上發揮所長，同時擁有批判思維、新聞識讀及資訊處理的能力。

為了順應數位匯流的趨勢，在教育方向上，新聞學系捨棄以往的「序列課程」設計，改以「數位多工」取代，將「基礎採訪寫作」、「基礎新聞編輯」、「廣播新聞」、「電視新聞實作」、「新聞影音專題」等課程，調整為「基礎數位新聞採訪寫作」、「基礎數位新聞編輯」、「數位播音技巧實作」、「影音新聞實作」、「進階融媒體新聞專題」。課程不再強調單一媒體／技能的培訓，而是朝向不同素材在跨／多平臺的應用，試圖訓練新聞系學生成為 Lugo-Ortiz (2016) 所謂的「新通才記者」，具備 Journalism 2.0 的技能，不僅能編寫、發行多媒體和

圖 1：新聞學系所畢業生就業類別與比例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提供。

2 新聞學系在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針對已畢業一、三、五年的學生進行就業調查，有效樣本共計 327 人，其中大學部占 93.58%（306 人）：研究生占 6.42%（21 人）。

跨平臺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性對話或社會動員 (Mihailidis & Shumow, 2011)。

有些學者擔憂，通才取向易導致內容變得膚淺 (Gasher, 2015; Lugo-Ortiz, 2016; Nisbet & Fahy, 2015)，然而，通才和專才並非魚和熊掌的關係。新聞學系在技術上雖然採用「多媒體通才」訓練，但在內容上仍然主張「專才」，保留了基礎理論課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或公共衛生等課程（見表 2），除要求學生培養特定主題的專業知識外，也鼓勵他們以輔系或學程方式加強跨學科的學習。新聞學系對內容專才的要求，亦反映在《小世界》的議題報導走向上，讓學生從中體會專業知識對提升新聞品質的重要性。

為了配合「數位優先」，在實務課程上，新增一些數位技術課程，如：「資料新聞與視覺化」、「新聞探勘」、「虛擬實境與新聞報導」、「360 度全景攝影新聞實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作」等，但實務課的比重並未因此改變，仍維持在 47–48%，這是因為新課多以原有的技術課程進行替換。

在理論課程上，則維持系所既有的傳統——以公共和批判取向為主。除相關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傳播知識外，另有「文化研究」、「媒體批判」、「全球化與傳播」等課程（見表 2），協助學生以批判取向質疑和反思新聞專業的結構問題與意識形態作用 (Hirst, 2010)。不過，理論課程受到「削減必修課」的政策影響，許多課已改成選修，如：「公共新聞學」、「傳播史」、「傳播與文化」等。

儘管在課程設計上已平衡實務與理論的比重，但為避免 Skinner et al. (2001) 所擔憂課程分成兩大塊，從 107 學年起，加強理論融入實務中，在《小世界》增設「新聞評議」和「公民論壇」。前者主要是讓學生有機會將「新聞學」、「新聞倫理」、「新聞法規」等課程所學，應用在檢視和針砭時下的各種新聞亂象（見表 3）；後者則要求學生針對重大公共議題，結合產、官、學、民舉辦公民論壇（見表 4），以落實「公共新聞學」課程的主張——讓不同群體的意見公開論辯，尋求解決之道 (Nip, 2006)，試圖藉由這些努力，讓理論能和實務緊密結合。但值得注意，在理論融入實務的過程中，也有學生反映一些理論的觀點應用在數位實務上有些衝突，例如：新聞媒體的角色究竟是客觀告知，抑或動員參與？在某程度上，這也反映出課程的改革不應只是理論和實務的比重或相容問題，更涉及理論的實質內涵是否符合時代所需。

至於研究所部分，過去以理論課為主，現則增加實務課，尤其是和數據分析相關的課程，如：「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試圖培養研究生的數據挖掘、處理及視覺化能力，並開放「實作論文」作為其畢業的選項。從 107

表 2：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108 學年度數位改革後之課程分類

類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理論類	新聞學、網路傳播概論、運動新聞學、數位新聞美學概論	傳播研究方法、新聞與政治學、新聞與心理學、新聞與社會學、新聞與經濟學、新聞與公共衛生、社區與傳播、公共新聞學、民族誌與新聞敘事、網路新聞學、影音新聞製作概論、媒體典範與新聞經典閱讀	新聞倫理、媒體批判、文化研究、質化研究方法、傳播理論進階、閱聽人分析專題、政治傳播、新聞與資料分析、精確數據新聞報導、全球化與傳播、國際新聞專題分析與報導	新聞與國際關係、新聞與產業、傳播科技專題、新聞與金融市場、新聞法規、新聞媒體文化與消費、新聞與社群分析、運動新聞研究
實務類	基礎新聞攝影、基礎數位新聞採寫、基礎數位新聞編輯、數位播音技巧實作、新聞漫畫、新聞影音拍攝與剪輯	網路新聞實作、資料新聞與視覺化、平面排版實務、報導攝影學、兩岸新聞報導、新聞專題報導、影音新聞實作、360 度全景攝影新聞實作、數位播音技巧實作、進階採訪寫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作、基礎數位雜誌	小世界實習、新聞探勘、行動媒體新聞實作、進階數位雜誌	虛擬實境與新聞報導、深度調查報導、畢業製作實作、畢業製作設計、進階融媒體新聞專題實作、特稿與評論寫作、媒體實習（一）、媒體實習（二）
英文能力類		新聞英文（一）	英語新聞報導經典選讀、英語新聞報導、新聞英文（二）、英文口語訓練、全方位新聞英語	新聞編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此分類表適用於 108 學年入學者；世新新聞學系的課程仍不斷進行改革，未來課程也會有所調整。

學年起結合「新聞講座」和「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課程，讓研究生能將課堂所學的专业知識和數據技能直接應用在新聞專題報導上³，以增強其數據實作能力。

在教育任務上，系所為實現「數位優先」，採用「創新者模式」。如 Deuze (2006, p. 25) 所說，新聞培訓不應只是為了配合產業需求，「而是成為『發展的實驗室』（development laboratory），讓學生能為變化的未來而非靜止的現在做準備。」新聞學系的課程改革正是為了培養學生數位創新，但改革需要時日，無法一蹴可幾，若要立即見效，只能透過《小世界》作為師生創新和實踐的平臺，這和 Netwon 所建議的「教學醫院模式」，不謀而合。

在規模上，《小世界》可能稱不上醫院，但至少是一間新聞教學診所，結合有實務經驗的教師、業師帶領學生實際生產新聞，同時舉辦各種工作坊（如：

3 碩士一年級學生從 107 學年度起透過課程結合，已陸續完成三項新聞專題，分別是里長選舉、校園毒品、癌症治療等，目前已刊登在《小世界》的融媒體專題內。

表 3：《小世界》已發布的新聞評議專題

標題	發布日期
新聞娛樂化衝擊 媒體喪失社會公益性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小編發文風波 學者：應兼顧新聞守門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扒糞式選舉新聞 媒體內容膚淺化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4 小時電視新聞困境 多年仍無打破	2019 年 12 月 9 日
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	2019 年 12 月 2 日
電視媒體大選開票 應據實以報	2019 年 12 月 1 日
數位時代下紙本媒體的轉型與品牌價值	2019 年 11 月 25 日
促進多元 公民記者注入社會新觀點	2019 年 11 月 24 日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媒體塑造的框架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氣象新聞誇大 可信度存疑	2019 年 10 月 21 日
記者素質遭質疑 新聞產業教育陷困境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新聞自由與商業利益的權衡	2019 年 10 月 13 日
自媒體竄起 成傳統新聞勁敵	2019 年 10 月 8 日
臺灣缺乏國際新聞 媒體與受眾的羅生門	2019 年 10 月 7 日
正義背後的情感拉扯 《與惡》高收視帶動社會議題	2019 年 5 月 31 日
媒體侵犯隱私 當事人二度傷害	2019 年 5 月 29 日
教育業界接軌難 學生應增強實力	2019 年 5 月 25 日
網媒合稿亂象竄升 政府控管界線難定	2019 年 5 月 25 日
新聞系學生出走潮？媒體慘況成關鍵	2019 年 5 月 18 日
媒體造神？商業化的臺灣媒體	2019 年 5 月 3 日
新聞業競爭激烈 媒體搶即時背後的真相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4 月 12 日
媒體環境競爭多 新聞產業搶即時	2019 年 4 月 12 日
網媒亂象叢生 付費訂閱成新生機？	2019 年 4 月 12 日
假新聞奪命 燕子颱風吹起的媒體亂象	2019 年 3 月 29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360 度全景攝影等）以培訓學生各項新技能，讓他們能在《小世界》平臺上實驗新的敘說形式。整體來說，《小世界》的運作大致符合 Netwon 所列出的「新聞教學醫院」六要素，唯在社區服務部分，《小世界》現更傾向造福社群。

過去在紙本時期，《小世界》因受限於資源，只能定位在以大文山區為主的社區報，但上線後，學生能自由選做其感興趣的議題，不再受地理局限，即便如此，由於《小世界》的公共旨趣，所有的議題仍偏向主流媒體所忽略的弱勢族群

表 4：《小世界》舉辦的公民論壇

內容	與談人
107-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三）13:10-15:00 《國民參審制度：人人都能參與法律審判？》	聯合報鳴人堂主編許伯崧 新北地方法院法官時瑋辰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忻穎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
107-2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4 月 25 日（三）13:10-15:00 《灰色地帶下的新媒體，抄襲邊界在哪裡？》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副教授胡元輝 宇軒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廖芳萱 立法委員蘇巧慧 ETtoday 新聞雲執行副總編輯譚志東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13:10-15:00 《臺灣罷工預告期，勞資談判鴻溝？》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佳和 新北市勞工局專委胡華泰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靜儀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最高顧問林俊輝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三）13:10-15:00 《找回自己的母語：新住民語在新時代面臨的考驗》	新課綱課審委員、新住民第二代劉千萍 東南亞裔新住民第二代何景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張芳全 新住民語課綱委員、東安國小校長黃木烟
108-1 碩士班公民論壇 2020 年 1 月 3 日（五）13:10-15:00 《癌症——全臺癌症趨勢與醫療資源議題，你知多少》	臺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案助理教授江濬如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科長黃巧文 癌症病友鄭喬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或地方問題（如：老人長照、身障運動、偏鄉醫療和教育等），也就是說《小世界》已從服務特定地理社區，走向服務更廣的社群。

從 107 學年開始，《小世界》廢除了網路組，網路技能（如：設置超連結、繪製圖／表、互動式表單等）成為必備的基本能力，學生只需輪流參與圖文和影音組，進行議題導向的報導。圖文組，顧名思義報導以文字和照片為主，文長需超過 2,200 字，另鼓勵以多媒材（如：聲音、影像）和互動形式（如：投票表單）來增補內容。以 2019 年 6 月的〈登革熱〉為例，整個專題以不同角度、各種形式（包含：圖文、影音、文字雲、數據、懶人包等）深入剖析登革熱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不僅從數據圖表彰顯登革熱的趨勢變化，也製作登革熱遷徙地圖讓民眾更易瞭解疫情的擴散，同時加入病癥互動圖和問答遊戲，考驗民眾對登革熱的基本認識，讓新聞不再只是觀看，也是體驗、學習新知及交換心得的平臺（小世界，n.d.）。

除生產新聞外，圖文組也需另外發行電子版的報紙，同時每學期舉辦一次「公民論壇」。而影音組，則以生產 1 分半至 3 分鐘的影音新聞為主，輔以 600 字以上的文字報導，並每週定期發行電視串帶。此外，為達成數位優先，《小世界》另新增特別小組，包括「網路編輯」、「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攝

影報導」及「360度新聞」，讓學生不僅能進行多媒體、跨平臺的各種新聞實作練習，也能探索並開發創新的報導形式。

前面文獻曾提及，今日的新聞學運作已進入 Journalism 2.0：新聞生產應是開放的過程和（記者—讀者間）雙向對話 (St. Clair, 2015)。《小世界》雖仍保留 Journalism 1.0 的守門機制和截稿時間，但並未將發行後的新聞視為「完成品」，而是一個開放過程，允許內容不斷地更正、增補或下架。同時，也結合社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 [IG]），讓民眾能對新聞議題發表意見，並將意見導入網站平臺內。以 2019 年 12 月的〈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新聞為例，編輯在臉書上除介紹該則新聞外，亦設計一款小遊戲讓民眾體驗面對言語霸凌該如何應對，獲得 105 則留言；這些留言現也導入官網新聞的下方（林育萱、張瓊文、張雅筑，2019 年 12 月 2 日）。

在 Journalism 2.0 時代，《小世界》的讀者主要來自兩方，一是關鍵字搜尋進入，二是經由社群媒體。後者可能未必會點選官網新聞，但會參與社群媒體的討論，因此社群媒體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格外重要。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編輯在臉書上發表了〈行憲快樂〉貼文，文末「祝大家行憲紀念日快樂！！記得返鄉投票」。由於時機敏感，被網友認為有政治企圖而引發撻伐；當下所有編輯亂成一團，害怕引發退讚潮，最後決議將文章下架，但此舉亦引來「怕事」的負評。編輯此次的遭遇已超過 Journalism 1.0 範疇，考驗學生面對「第五權」的危機處理能力。《小世界》過去視社群媒體為推廣（官網內容）平臺，並無特別的守門機制，給予編輯較多的發文自由，但此事顯示：讀者對社群媒體的關注遠高於官網，這也讓師生有機會重新思索新聞學的定義與運作。

整體來說，《小世界》作為新聞教學診所，一方面能夠反映系上課程的成效，並隨時做課程內容的修正；另一方面，也能讓師生實際體驗 Journalism 2.0 的運作，即新聞已不再是守門而已，還包含平臺管理、社群互動及民主參與。學生除能學會各種新聞技能外，也能深切瞭解公民為何需要新聞識讀、又該如何參與公民討論。

儘管《小世界》的運作讓新聞學系看到數位轉型的曙光，但維持一間診所的運行，需要人力和經費。在課程尚未修改到位前，業師指導和工作坊的花費也是一筆可觀的支出；加上《小世界》數位化後，在缺乏資訊相關背景的新聞學系內，如何維護平臺的正常運作，也是一大考驗。誠如 Mensing & Ryfe (2013) 所說，教學醫院模式較適用於資金雄厚的學校；未來若無學校的金援，新聞學系能否依賴《小世界》持續轉型，也是未知數。同時，《小世界》對課程內容的建議，能否

被教師採納，也是問號。就此來看，新聞學系轉型的成敗，似乎仍有待時日驗證。

伍、結語

數位衝擊對新聞業、新聞學或新聞教育帶來了危機，卻也是轉機——在斷裂與變動的新聞環境中，尋求新的可能性。為瞭解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挑戰，本文從新聞學的改變、西方新聞教育的應對，乃至國內個案的分享，試圖藉此說明新聞教育為何要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型可能的遭遇與困難，以供參考。當然，若要深入瞭解國內新聞教育如何面對數位挑戰，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調查各大新聞院校師生們的意見與感受，甚至剖析國內新聞業的實際運作，以及他們對學界的建議與期望。

在梳理文獻的過程中，本人發現一般討論多偏重在追求新聞學的理想和課程改革的策略、成效，較少觸及改革的現實面，如：招生壓力、學校政策、改革經費、師資結構等問題。然而，轉型並非單憑「理想」或「時勢所趨」就能實現，而是牽涉勢力的拉扯，尤其是課程的汰舊換新，更涉及教師的權益，其中的利害唯有各系所正值轉型，才能察覺箇中深淺。本人在參與系所轉型的過程中，發現有三個問題是文獻較少提及，卻有待釐清。

一、新聞教育應進入 Journalism 2.0，但該以哪些規範作為倫理標準？

目前的文獻多建議，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有關 Journalism 2.0 的各種技能，而較少談及一旦守門與參與之間發生齟齬時，新聞人員是要堅守新聞品質、抑或鼓勵言論自由？當「第五權」挑戰「第四權」時，是要恪守專業判斷，還是從善如流？以《小世界》為例，原只有官網設有守門機制，社群媒體則負責促銷和推播新聞。但實際運行後，發現儘管官網設有各種互動機制（如：表單、留言等），但一般網友多只在社群媒體上表態，它儼然成為官網的前哨站，編輯在上面的發言被視為官網的立場。顯然，社群媒體已變成「新聞」的一部分，那是否該進行「守門」？守門的範圍是只限於編輯貼文，還是所有言論？當編輯鼓勵網友參與討論時，若其言論過激、無中生有，甚或惡意中傷，是要海納百川，還是要進行處理？這些問題在在顯示，技術不能先行，必須同時有倫理規範支持。換言之，在教導 Journalism 2.0 技術之前，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帶領學生面對這些衝突：

即在保障言論自由、民主參與的同時，如何兼顧言論品質。新聞倫理的重建恐怕比新技術的學習，更刻不容緩。

二、新聞教育不應重技術而輕理論，但在數位時代，新聞學的理論內涵是什麼？又該教哪些傳播理論？

在翻閱文獻時，發現大多數學者主要關切實務的課程設計，探討哪些技術該教、如何教，但在理論部分，則是說明傳播相關理論對於理解新聞傳播過程的重要性，不能輕廢。然而，不論是新聞學或北美傳播理論，都是經驗性的研究產物，這些理論多停留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它們是否能用來解釋 Journalism 2.0 或數位現象？也就是說，當我們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時，是否考慮其內容？以「傳播理論」為例，究竟該教哪些理論、教什麼，又該如何教。尤其當我們鼓勵理論融入技術時，如果理論的內涵維持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又該如何結合數位科技？這些問題遠非「重理論」或「平衡比重」就能解決，而是該進一步檢討新聞教育理論課程的內涵。

三、新聞教育師資的中老年化，能否應付快速變遷的數位環境？

對已有歷史的新聞學系來說，師資結構至今應該也接近中老年化，以世新新聞學系為例，在 2019 年師資平均年齡是 55.8 歲，他們的專長和技能大多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雖然近年來系所為了因應數位化，也招募不少新老師，但技術級教師按規定仍須有業界至少九年經歷，一般來說也不年輕，當下或許能勝任目前的技術，但未來新聞若走向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或 Web 3.0、甚或 Web 4.0，是否還能應付，也是未知的。其實，不只是技術級教師，如同前述，負責理論的老師也必須與時俱進。當然，年齡絕非影響教／學的關鍵；但老師們是否調整好心態，準備終身學習，帶領學生走在時代尖端，還是靜待新聞學系的沒落？新聞教育的改革，除了學生必須跟上技術外，教師的心態也應適時調整，為數位轉型做好準備。當教師們有這樣的自覺後，也期望學校當局能尊重專業，給予系所更大的自主空間，讓新聞教育的改革能朝正向發展。

參考書目

- 小世界 (n.d.)。〈登革熱〉。上網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shuj.shu.edu.tw/blog/tag/%e7%99%bb%e9%9d%a9%e7%86%b1>
- 林育萱、張瓊文、張雅筑 (2019 年 12 月 2 日)。<〈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小世界》。上網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shuj.shu.edu.tw/blog/2019/12/02/%e5%8a%a9%e9%95%b7%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6%96%b0%e8%81%9e%e5%aa%92%e9%ab%94%e6%88%90%e5%b9%ab%e5%85%87>
- Adams, J. W. (2008). Industry guidance could help J-programs prepare print majors for convergence.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9(4), 81-88. <https://doi.org/10.1177/073953290802900408>
- Anderson, C. W., Glaisyer, T., Smith, J., & Rothfeld, M. (2011). Shaping 21st century journalism: Leveraging a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New America Foundation*. Retrieved August 22, 2019, from https://www.academia.edu/1220873/Shaping_21st_Century
- Benedetti, P. (2015). The big sellout: A critical snapshot of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94-104).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Bhaskaran, H., Mishra, H., & Nair, P. (2019).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st-truth era: Pedagog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indian journalism students’ perception of fake ne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4, 158-170.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9830034>
- Bovée, W. G. (1999). *Discovering journal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Brasen, I. (2009, June 19). News 2.0: The future of news in an age of social media. *CBC News*.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ews-2-0-the-future-of-news-in-an-age-of-social-media-1.796175>
- Breiner, J. (2013, May 17). How J-schools are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skills. *Poynter*.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poynter.org/reporting-editing/2013/how-j-schools-are-helping-students-develop-entrepreneurial-journalism-skills>

- Briggs, M. (2012).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How to build what's next for news*. London, UK: CQ Press.
- Bruns, A. (2003). Gatewatching, not gatekeep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07(1), 31- 44. <https://doi.org/10.1177/1329878X0310700106>
- Carbasse, R. (2015). Doing good business and quality journalism?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nd the debates on the future of news media.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11(1), 256-277. <https://doi.org/10.25200/BJR.v11n1.2015.816>
- Casero-Ripollés, A., & Izquierdo-Castillo, J. (2013). Between decline and a new online business model: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newspaper industry.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0(1), 63-78. <https://doi.org/10.1080/16522354.2013.11073560>
- Cochrane, T., Sissons, H., & Mulrennan, D. (2012). Journalism 2.0: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obile and social media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I. Arnedillo-Sánchez & P. Isaia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Learning 2012* (pp. 165-172). Berlin, Germany: IADIS Press.
- Cohen, N. S. (2015).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nd the precarious state of media wo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 513-533. <https://doi.org/10.1215/00382876-3130723>
- Corrigan, D. (1993). Journalism academia out of touch. *Editor & Publisher*, 126(40), 44-45.
- de Burgh, H. (2003).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case for journal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ism*, 4, 95-112.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3004001484>
- Deuze, M. (2006).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7, 19-34.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00450293>
- Deuze, M., &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 165-181.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6688550>
- Donsbach, W. (2014). Journalism as the new knowledge profess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5, 661-677.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3491347>
- Downie, L., Jr.,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 report by Leonard Downie, Jr., & Michael Schudso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August 15, 2019, from http://www.cjr.org/reconstruction/the_

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page=al

- Ekström, M., & Westlund, O. (2019). The 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 259-270. <http://dx.doi.org/10.17645/mac.v7i1.1763>
- Egbujor, M. I. (2018). The relevan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Kenya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thical standards. Retrieved July 22, 2019, from https://www.globethics.net/documents/4289936/13403252/GE_Focus_46_isbn9782889312320.pdf
- el-Nawawy, M. (2007). Between the newsroom and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for print journalism in Egypt and Jord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9, 69-90. <https://doi.org/10.1177/1748048507072785>
- Ferrier, M. (2012, August). *Media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faculty perceptions of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 Folkerts, J. (2014). Histor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6, 227-299.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14541379>
- Folkerts, J., Hamilton, J. M., & Lemann, N. (2013). *Educating journalists: A new plea for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n Journalism School.
- Francis, D. M. (2013, August 31). Educating journalist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bate on higher education goals.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8, from <https://www.newfoundations.com/GENERAL/EdJournalist.html>
- Gasher, M. (2015). What is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105-110).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Gans, H. J. (2004). Jour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9, 10-16.
- Hirst, M. (2010). Journalism education “down under”: A tale of two paradigms. *Journalism Studies*, 11, 83-98. <https://doi.org/10.1080/02615470903217345>
- 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 221-262.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0600800302>

- Karlsson, M. (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 11, 235-245.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1003638400>
-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2, 279-295.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0388223>
- Kelley, B. (2007). Teaching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26(2), 3-43.
- Larrondo-Ureta, A., Peña-Fernández, S., Meso-Ayerdi, K., & PérezDasilva, J. (2019). Apply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training: How innovative thinking is changing the way universities teach (Web) journalism. Retrieved August 22, 2019, from <http://ocs.editorial.upv.es/index.php/HEAD/HEAD19/paper/viewFile/9312/4589>
- Lemann, N. (2009, November 15). Journalism schools can push coverage beyond breaking new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June 10, 2019,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Journalism-Schools-Can-Push/49115>
- Lugo-Ortiz, L. (2016). The academia, the media, and the ideal. professional: A generalist-multimedia journalist.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271-286. <https://doi.org/10.15581/003.29.4.271-286>
- Lynch, D. (2015). Above & beyond: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January 20, 2018, from <https://www.knightfoundation.org/features/journalism-education>
- McDonough, K., Rodriguez, L., & Prior-Miller, M. R. (2009). A comparison of student interns and supervisors regarding internship performance rat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4, 139-15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0906400202>
- Medsker, B. (1996). *Winds of chang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Arlington, VA: Freedom Forum.
- Mensing, D., & Ryfe, D. (2013). Blueprint for change: From the teaching hospital to the entrepreneurial mode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nline Journalism*, 3(2), 26-44.
- Mihailidis, P., & Shumow, M. (2011). Theoriz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a global media age.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27-47. <https://doi.org/10.29654/TJD.201112.0003>
- Newton, E. (2012a). Journalism education reform: How far should it go?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August 20, 2019,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speeches/journalism-education-reform-how-far-should-it-go>
- (2012b). Promise, peril of “teaching hospit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670-2673
- (2013). The ‘teaching hospital’—A goal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2, 2019,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speeches/teaching-hospital-goal-journalism-education>
- Nip, J. Y. M. (2006). 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7, 212- 236.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00533528>
- Nisbet, M. C., & Fahy, D. (2015). The need for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in politicized science debat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8, 223-234.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14559887>
- Patterson, T. E. (2013). *Informing the news: The need for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Picard, R. G. (2015). Deficient tutelag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4-10).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er.
- Robinson, S. (2007). “Someone’s gotta be in control her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nline news and the creation of a share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Practice*, 1, 305-321.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0701504856>
- (2011). “Journalism as Process”: The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Participatory Online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3, 137-210.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1101300302>
- Sambrook, R. (2012) *Delivering trust: Impartialit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 Shapiro, I. (2015). To turn or to burn: Shifting the paradigm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11-27).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Singer, J. B. (2010). Norms and the network: Journalistic ethics in a shared media space. In C. Meyers (Ed.), *Journalism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p. 117-12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D., Gasher, M. 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 342-360.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100200304>
- Sligo, F. (2004). NZ journalism unit standards: Are they still needed?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0(1), 191-199. <https://doi.org/10.24135/pjr.v10i1.791>
- Šopar, V., Georgievski, B., & Trajkoska, Z. (2017).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Crafting the ideal journalism curricula for South East Europe. Retrieved October 16, 2019, from <http://respublica.edu.mk/attach/Building-Trust-in-Media-in-SEE.pdf>
- St. Clair, J. (2015). Doing it for real: Designing experiential journalism curricula that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new and uncertain world of journalism work. *Coolabah*, 16, 122-142. <https://doi.org/10.1344/co201516122-142>
- Takahashi, B., & Parks, P. (2018). Journalists and communicators' perceptions of their graduate training i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n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principles.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5(94). <https://doi.org/10.3389/fenvs.2017.00094>
- Todd, V., & Levine, G. (2010, August). *Internship supervisors'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s majors' internship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nnual Meeting, Denver, CO.
- Vázquez Schaich, M. J., & Klein, J. S. (2013).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education: Where are we now? *Observatorio (OBS*)*, 7(4), 185-211. <https://doi.org/10.15847/obsOBS742013715>
- Vine, J. (2016).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digital revolu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5(2), 14-26.
- Wagemans, A., Witschge, T., & Deuze, M. (2016). Ideology as resource i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he french online news startup mediapart. *Journalism Practice*, 10, 160-177.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5.1124732>

- Ward, S. J. A. (2010). Inventing objectivity. In C. Meyers (Ed.), *Journalism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p. 137-15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nger, D. H., Owens, L. C., & Cain, J. (2018). Help wanted: Realign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op U.S. news compan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3, 18-36.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7745464>
- Williams, A. T. (2017). Measuring the journalism crisis: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that help the public connect to the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4731-4743.
- Wotkins, R. S., III. (2014).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of journalism. *GSTF Journal on Media & Communications*, 2(1), 28-33.
- Young, M. L., & Giltrow, J. (2015). A mobile responsive expertise: Learning outcomes,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46-63).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Digital Challen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Lin, Yu-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environment for news production, and has had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news industry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crisis remains a turning point, opening up new possibilities in a chaotic, disruptive journalist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elf-reflection of a journalism educato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hallenges and refor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y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the countermeasures of western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case. This study takes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as a case to explain both why journalism education needs to transform and how it should transform,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such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establish ethical standards for Journalism 2.0, to re-examine the connotation of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to adjust the mindset of teachers.

Keywords: Journalism 2.0,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tic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Email: ylin@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0.3.23

Accepted: 2020.9.5

傳播科系學程制度規劃與反思： 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為例^{*}

施伯燁^{**}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南華大學自 2013 年起推動課程革新，從「T 型教育」延伸到「 π 型教育」，並推動課程學程化，旨在透過多元選課組合引導學生主動學習。本研究為瞭解學生實際學習經驗與意見，透過學生學習意見調查與專家座談，調查師生對課程學程化之意見。調查發現，課程革新主要關鍵在於如何規劃必修課程，如何建立與分類課程模組，如何銜接總整課程與實務應用等。因此，進一步提出深化與改善策略，包括重新整合與調整課程模組、減少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強化產業連結與實務課程。本文認為課程規劃重點在於建立系所特色與定位、改變教學與學習主體、適應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學程制度與課程規劃目的在於提高學習者的自主學習動機，而不只是追求特定媒介形式專業或就業技能。

關鍵詞： π 型教育、自主學習、課程革新、課程學程化、學習經驗

* 本論文為「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研究成果，感謝研究助理宋沛岑，系所教師與學生給予寶貴意見，並感謝主編與二位匿名評審費心評閱。

** Email: howard624@nhu.edu.tw

投稿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

壹、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南華大學 2013 年獲得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計畫，開始推動課程革新，從「T 型教育」（通識雅博教育與專業學術教育）進一步提倡「 π 型教育」，其橫軸代表「通識博雅教育」，兩縱軸則分別代表「主修專長」及「跨領域就業學程」，主修專長分為學術型與實務型，呼應 π 型教育與課程分流理念，學生學習內容除依照個人興趣外，可彈性選擇就業、創業及升學等目標，可跨院、跨系修習第二專長或進修雙主修，以具備雙重專業（李坤崇，2014）。

為落實 π 型教育，最主要的策略為推動課程學程化。課程學程化目的在於，大學教育仍不脫課堂教學學習、系所本位藩籬，往往依教師的學術專業來安排，整體課程配當也未必與學生畢業後所面對的環境有適當連結，學習情境也不具備彈性，在不同時地、系所、學制之間流動仍有不少限制。因此，課程應進行跨域整合或研究與實務分流，且專業課程則應朝向課程學程化，設計有系統的模組化課程（教育部，2013，頁 55-56）。

也就是說，各個學系依基礎學域定位，並結合市場脈動，設計相關專門課程形成「模組」（module）¹，各學系再結合不同的模組形成學程。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程化設計，重視整合教學資源，使課程更為專精，順應社會分工，提升就業市場競爭力。機動性、彈性與跨領域整合是學程制有別於過去學系學分制的最大特色，透過多元選課組合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給學生更多自由、自我負責的學習環境（南華大學教務處，2016）。

配合校方規劃之課程學程化，傳播學系經多次課程會議討論，進行課程革新。將課程分為院基礎課程、系核心課程、跨領域學程與系選修模組。在院基礎課部分，包括社會科學概論、傳播理論、心理學、社會學（共計 12 學分）。系核心課程包括基礎媒介實務、大眾媒體寫作、公共關係、新聞英文、傳播研究方法、報刊實務與媒體實習課程（共計 21 學分）。跨領域學程與系選修模則分別規劃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包括公關、影劇、論文等三項專業）及「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包括平面、電視、廣播等三項專業），學生須擇一修習滿 24 學分。課程模組規劃之目的，在於學生可以選擇特定就業領域，持續且深度學習。例如，創意傳播就業學程著重廣告、影劇及論文類課程，就業面向以廣告業、影

1 模組是指將課程進行重組和規劃使其形成具有系統性、標準化之模組課程或學程（教育部，2013），而各校針對課程模組冠以不同名稱，諸如學程、學群、課程、領域或模組，其概念強調課程進行系統性規劃。

視業或研究人員為主；另一學程，著重平面、電視與廣播類課程，就業方向著重平面媒體、電視新聞與廣播電臺，以媒體產業、媒體就業技能分類課程架構。

教育部與南華大學的教育理念，從 T 型教育一直延伸為 π 型教育，強調以課程學程化改善學生學習情況，增加就業能力與多元專長。因此，傳播學系課程陸續革新，期待學生透過多元選課組合主動學習。而實際推動過程中，是否能夠達到理想目標，是本研究主要問題意識。具體研究問題包括：第一，自 103 學年度起，該系推動課程學程化制度後，學生實際的學習經驗與意見為何？第二，南華大學傳播學系規劃雙學程，分別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及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是否能夠增進學生自主學習意願，創造多元且彈性學習空間，如何更加深化與改善課程與學程規劃？第三，課程學程化制度，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多元選課組合，創造主動學習環境。而目前所推行的學程制度，是否能夠有效推動自主學習，讓學習過程與學習主體有所改變？為此，本研究嘗試透過自主學習觀點（heutagogy），探討學程推動的問題與困境，以期更加深入瞭解傳播領域課程規劃實務。

貳、文獻探討

為瞭解傳播領域課程研究之變遷，本文分別回顧近年來有關傳播領域課程規劃相關討論，以及自主學習教育觀點，探討傳播課程與學生學習相關議題。

一、傳播領域課程變革

面對媒介科技快速發展，傳播教育是否需要進行課程調整或改革，從過去文獻來看，國內也曾引起諸多討論，聚焦傳播學術與實務間如何縮減學用落差，傳播課程與教學應重視通才教育？還是專才與實務技術訓練，傳播教育核心課程應該為何？學術與技術類課程的比重為何（翁秀琪，2001；陳世敏，2000；潘家慶，1996；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鄭瑞城，1998；閻沁恆，1991）？

另外，則是近年科技議題，引起教學實務與課程設計的討論。在數位媒體變化，以及 Web 2.0、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網路技術發展後，媒體與教學本質是否應該改變，在課程或教學規劃，教師與學生應該如何因應（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胡元輝，2014；皇甫河旺，2012；翁秀琪，2013；蘇蘅、吳岱芸、吳俊葵編，2018）？

過去，在傳播科系或傳播學院課程規劃方面，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簡稱

政大傳院）曾提出多次課程規劃方面相關討論。政大傳院自 1996 年始即有改制學程之議（王石番、陳世敏，1996；潘家慶等人，1996）。許瓊文（2007）指出，傳播教育應該重視內容，而科技不也只是實務，她建議傳播教育的課程不應該把科技只當作是技術，且未來研究應該蒐集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法，並追溯到過去畢業學生對實習媒體的評價，修正課程設計與實習媒體的走向，以適應科技。

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整理各方看法，提出目前傳播環境的改變主要包括數位科技促成媒體革命、競爭浪潮席捲業界學界、社會媒體領先商業傳媒、多元整合實踐內容創新。課程設計則可關注溝通之內涵及傳播本質的變遷，而非以新科技為主體。然而，各校、各系應有自己的特色、目標，而不應採用統一之評量標準。例如，選擇菁英教育路線或遵循普通教育路線的方式與發展必然不同，以學生是否能夠有效學習為關鍵考慮。倪炎元認為，私立大學要考慮迎合學生即將砍半、少子化的趨勢，所以思考的事也不太一樣，學生只有務實的目標是能否找到一份工作，但還有另一個重點，就是師資，目前的教師多是受傳統媒體訓練，做課程調整時他們第一個受到影響（蘇蘅等人編，2018）。

過去針對傳播課程規劃，建議課程主要皆從老師角度和視野規劃，與傳統系所制式思維大同小異，過於強調明確學習目標和路徑（鍾蔚文，2012）；其次，應該蒐集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看法，亦包括畢業學生與實習媒體等觀點（許瓊文，2007）；而且，面對新科技、新課程，也涉及教師專業與教學觀念的改變（翁秀琪，2013；蘇蘅等人編，2018）。

二、深層學習（deeper learning）策略引入

從傳播領域的課程規劃討論，可以發現近年討論焦點逐漸從系所（教師）本位思考，轉向以學生學習為目標，與教育部推動課程革新的方向接近，更加關注如何讓學生有效學習。除了傳播領域課程規劃討論外，研究者認為近年來引起討論的自主學習觀點，能夠更深入說明課程學程化背後教育哲學觀點的轉變。

自主學習觀點是 Hase & Kenyon (2000) 將 Vygotsky (1978) 的「側近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概念進一步延伸，從認識論層面，提出教學哲學的發展與演變。他將教育哲學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傳統教育—成人教育—自主學習」（pedagogy-andragogy-heutagogy, PAH；表 1）。傳統教育觀點強調由教師主導知識傳授，建立有系統的教學模式，強調認知與內容層次，學習者處在接收位置。而成人教育觀點是指面對外在環境時，人們尋求新的資訊與技能

表 1：PAH 教育觀點的比較與轉換過程

變項	傳統教育	成人教育	自主學習
主導者	教師	學習者	學習者
應用範疇	學校	終身學習	論文研究
認知層次	認知	後設認知	認識論
知識產出	主體理解	過程協商	脈絡形塑

資料來源：Luckin, Clark, Garnett, Whitworth, Akass, Cook, Day, Ecclesfield, Hamilton, & Robertson (2010, p. 78)。

解決問題，這種學習方式往往不在學校，而是一種終身學習模式，其主導者由教師轉換為學生，重視學習者的自主學習與互動過程。

成人教育過程，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主導性有所轉換，但在認識論層次仍是追求第一層次（技能與認知）的學習。而自主學習觀點，強調由學習者自主建立問題意識，進行高層次思考與學習，此一模式是未來重要教育形態。自主學習是一種「深層學習」，是由學習者自行建構意義與學習路徑，是學習者中心而非教師中心。

現今教育往往面對外在情境變化快速，教學內容無法處理過快、過多且動態的資訊。特別是媒介科技發展與媒介教育，得面對快速變遷的教學內容與複雜情境，因此，自主學習成為電子媒介時代非常重要的教育哲學。例如，Cochrane, Antonczak, Gordon, Sissons, & Withell (2012) 綜合 30 餘個教學個案與學科領域，提出了透過教學媒介輔助建構自主學習的關鍵因素。Cochrane & Rhodes (2013) 也建立為期三年（2009–2011）的「行動學習」（m-learning）課程，觀察學生如何利用社群媒體、網路工具，從初期教師主導的技能學習層次，逐漸轉化為學生自主高層次學習過程，其教學過程建立師生團隊、合作學習制度，並跳脫傳統校園圍籬，與真實情境連結在一起（課程結合大學周邊社區與社會團體）。同樣，陳佩英、黃天仕、許美鈞與侯仲宸（2016）以「研究方法」課程進行探討，瞭解如何透過新媒介（社群媒體等）與自主學習教學方式提高教學成效。Mulrennan (2018) 在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所開設的「社群媒體」課程，同樣認為新媒介環境中的教育形態，已經逐漸改變過往教學模式，學生自主學習十分重要。

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可以瞭解傳播科技變遷，學習必須建立更強的學習動機。傳統教育哲學重視教師提供結構化的學習資訊，但面對高度變化的學習環境，特別是傳播領域，其外在環境變化快速，學生必須具備更強的主動性。因此，

學程分流與模組化的目地之一，便是提供更具彈性的課程架構，讓學生學習可以透過個人問題意識與學習動機，建立高層次學習過程。本文認為，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可以更加理解課程學程化背後的教育哲學。

參、研究方法

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可以瞭解學程化的目標，旨在面對環境變遷，改變由上而下的教育模式，透過彈性學習架構，讓學習者得以發展出高層次學習。而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推行學程制度後，學生的學習經驗為何？目前的學程制度是否能夠增加學習自主性，如何深化與改善？為能瞭解學生對課程學程化的意見，以及未來深化與改善的方向，本研究分別以學習意見調查與專家座談法進行資料蒐集。

一、學生學習意見調查

為瞭解學生對學程制度之看法，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進行三次發送與回收）。第一次調查期間為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 日，旨在瞭解該系學生對該系所課程規劃、學程模組滿意度與個別課程意見，問題包括：「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滿意？」、「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有何寶貴意見？」、「請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滿意？」、「請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有何寶貴意見？」、「請問您覺得本系應開設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就業或學習最有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或擬開課程）」、「請問您覺得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學習或就業較無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針對本系課程，請問您有何寶貴建議？」第一次調查，共 63 名學生填答（全系共約 221 人）。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4 日，進行第二次問卷調查，共 40 名在學學生回應。第三次調查，於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發放，共 110 位在學學生回應（本次問卷調查為跨學年度進行，因此調查對象有所變動，103 學年度學生畢業，增加 107 學年度新生）。三次調查皆以 Google 表單進行設計，公告於系所 Facebook 社團，再進入班級宣導，具名填答，以便檢視填答者是否為該系學生，並排除研究生、校友、校外人士等無效問卷（請參考附錄：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因問卷調查以便利抽樣與自願填答為之，本研究立意挑選開放式問題的回應，與學程規劃有關的意見進行討論，排除其他與本研究無關、個別課程教學

意見等。

二、專家課程意見座談

除學生意見收集外，南華大學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進行課程外審會議，邀請南部某國立大學傳播學系 A 教授、南部某私立大學傳播學系 B 教授，以及無線電視臺資深地方新聞記者 C 委員，與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討論，分別以口頭及書面交換意見。討論焦點包括：（一）課程架構與設計是否能凸顯系所之發展方向特色或願景（能否反映學系專業之知識內涵、能否反映學系專業之技能需求、能否反映學系專業之職場倫理、能否反映職場對跨領域人才之需求、能否反映學生背景特徵及系所資源條件）；（二）課程設計與內涵是否呼應系所基本素養或核心能力（能否培養學生達到基本素養、知識、技能；能否符合專業領域學術理論架構；能否符合教育目標、學分分配是否適當、課程銜接順序合理；能否培養學生應用所學之能力；能否配合外部環境之變化，考量產業需求；能否培養學生將所學應用在產業實務；能否有效因應國際化、資訊化及知識經濟之衝擊）；（三）課程與生涯地圖（能否符合未來出路；能否有順序安排課程；能否跨領域多向度學習；能否指引學生瞭解課程規劃的整體脈絡；能否建構學習歷程的橫向連結與縱向整合）；（四）除整體課程外，亦針對各別課程進行討論。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實際瞭解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推動學程制度後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其次，以學生學習意見與專家座談，探討如何深化或改善這些問題；第三，嘗試透過自主學習觀點加以詮釋，課程規劃與調整對師生關係、學習主體帶來的可能影響。

一、學程制度的問題與挑戰

首先，在學習意見調查部分，研究者將學生的學習意見進行統整，主要可以觀察到四個主要問題，分別是必修課程該如何規劃、如何建立與分類學程模組、「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如何銜接，以及如何面對實務課程與媒體產業。

第一個問題是必修課程該如何規劃。過去學者指出，必修課程強調營造學生的共同知識和經驗，依辦學理念設計一套課程，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陳杏

枝、游家政，2015）。潘家慶等人（1996）研究指出，國內傳播學者大多數認為需制定必修課程（59.5%），建議傳播學院學生應修 9–15 個學分為傳播專業核心，系所專業核心應修習 15–21 學分。也就是說，傳播科系教師們認為，傳播科系的必修課程學分數應該是在 24–36 學分之間。

然而，配合課程學程化，系所必修課程學分數減少，各個不同學程與學習路徑如何銜接亦有困難。例如，原有課程模組分流為新聞與影劇等不同類型之後，新聞類、論文類或廣告類等系所必修課程是否該有所改變。例如，修習影劇模組課程學生，對修習新聞類型課程便有意見：

我個人意見是，都已經大三，個人學程走向早應決定好，不應再有任一學程必修課才對：請試想，一個不同學程、對課程完全沒興趣的學生，被迫去選取這堂課，你認為他會真心的在這堂課上付出嗎？（問卷序號 3，2018 年 10 月 25 日，學程規劃）

本系課程是各種領域皆有接觸，但部分同學還是只喜歡某領域的課程，當另一部分的課程設為必修，同學會有被強迫修課的感覺。（問卷序號 50，2018 年 10 月 25 日，學程規劃）

第二個問題是，就目前所分的創意傳播就業學程及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是否足夠？如何分類傳播領域的專業課程？如何兼顧教師教學與學生需求？成為規劃學程的難題之一，也沒有統一標準。例如，政大傳院從新聞系、廣電系及廣告系，轉變成跨系所的學程制度，包括「新聞與資訊」、「媒體與文化」、「策略與創意溝通」、「傳播設計」、「媒體創新與管理」、「影音企劃與製作」及「實驗學程」；其他各校傳播學系也大多有學程制度，如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影像藝術學群」、「影視傳播學群」，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媒體製作」與「傳播管理」領域；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意傳播學程」、「行銷傳播學程」、「流行音樂傳播學程」；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規劃「廣電暨新聞模組」與「公關暨廣告模組」；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選修模組包括「影視行銷模組」與「影視製作模組」²。

學程與課程模組規劃，一方面需與教師專業符合，配合教師需求，另一方面，

2 此五間學校與南華大學傳播學系性質較為接近，均成立於 1995 年之後，亞洲大學、明道大學等為資訊傳播學系，大葉大學為傳播藝術學程，故未列入。

也得顧及產業及學生學習。南華大學傳播學系課程模組，規劃創意傳播就業學程與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透過這兩種課程模組分流，期待提高學生學習彈性與動機。然而，學生學習意見調查表示，為什麼要分兩個領域？如何分？是否會限縮學習範疇，意見仍有所歧異。例如「可以不要分領域，讓同學能夠多方學習，不會有壓力」（問卷序號 56，2017 年 12 月 28 日，學程規劃）或「畢製修一個，課程能不能不要硬分成兩個學程」（問卷序號 40，2017 年 12 月 28 日，學程規劃）。

自採課程學程化後，將課程一分為二，但傳播領域的分類與學習，很難將專業明確分類，特別是近年傳播產業更強調多元或整合能力，課程分流是否有助學生多元學習，還是限縮學習範疇。例如，想修習電視新聞與廣告的兩個專業，但這兩類專業分屬不同就業模組。又或者，修習創意傳播就業模組，如果只對廣告有興趣，同時也得修習影劇與論文兩個專業；若對平面專業有興趣，也必須同時修習電視新聞與廣播專業。因此，就原有學程制度，第一個問題在於為何將這些相關專業結合成共同模組，又如何分類出兩者間差異。另一方面，系所也僅能就現有課程與師資結構進行安排，以符合教師與專業課程訓練需求。

第三個問題是總整課程如何規劃。總整課程的目的，是作為大學教育最後的學習經驗，整合大學四年所學。推動學程制度後，重視學生系統性學習不同媒體專業，因此分別規劃「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與「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課程，整合大學四年學習經驗。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課程需由廣告、影劇與論文選擇二類專業製作專題，而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則由平面、電視新聞與廣播選擇二類專業製作專題。然而，每個課程局限三種作品類型，要求至少完成二種類型，也引起學生不同看法。例如「區分領域會造成修課困擾，希望畢製不要綁一起選擇變少」（問卷序號 43，2017 年 12 月 28 日，畢業製作）、「分模組會讓有些人無法選到自己最想修的兩個畢製類別」（問卷序號 56，2017 年 12 月 28 日，畢業製作）。

畢業製作課程面對的第一問題是，因應學程制度畢業製作一分為二，需各別從三種媒體專業選擇二個類別進行專題製作，但這二類受限於不同課程，以致學生難以彈性選擇，從而認為畢業製作課程因區分領域後，學生無法彈性選擇有興趣的專題類型；另一方面，也表示為何要分別從三個專業選擇二類進行專題，為何要製作二種不同類型的專題，製作一類、二類或多類媒體專業的意義何在。推動課程學程化，總整課程如何依學程專業分門別類進行，還是以整合學習經驗的角度，再將各個學程專業予以綜合規劃，形成總整課程規劃的困難之處。

最後，過去相關討論指出，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學生的學習目標往往不同，

私立學校學生更重視實務課程與畢業後是否能夠順利找到工作（蘇蘅等人編，2018），從各個私校的學程規劃觀察，也多以媒體製作實務為主。在南華大學學生的學習意見調查中，學生確實希望在大學期間，能夠有更多實作、實習或實務課程。例如，學生在問卷調查中提出許多實務課程需求，例如「希望訓練更多實作經驗以及技術指導」（問卷序號 26，2018 年 4 月 26 日，實務課程）、「希望能有更多媒體實習的機會和更多實作機會」（問卷序號 20，2018 年 4 月 26 日，實務課程）。因此，如何將實務與學術分流，又得兼顧學術與人文教育是推動學程化的困難之一。例如：

希望有更多進階的媒介實務技巧，另請業師教授多元課程並不收費。（問卷序號 42，2018 年 4 月 26 日，實務課程）

希望系上有更多業界來的講師或業師，除了告訴我們業界需要什麼，也可以幫助本系和業界搭條橋，未來或許對系上學生有幫助。（問卷序號 20，2018 年 4 月 20 日，實務課程）

二、課程深化與改善策略

從上述意見討論，可發現課程調整所需面對的問題包括必修課程、課程模組、總整課程以及實務課程規劃等。過去相關討論指出，各校、各系應有自己的特色、目標，而不應採用統一之評量標準（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因此，課程調整與規劃在不同校系會有不同之目標與考量，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之地理區位、學系資源、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面向而言，也有其特定之內、外部、優、劣勢、機會與威脅。因此透過專家座談與討論，提出三個調整方向，包括以專業職能為導向，調整課程模組，建立系所特色，其次提高修課彈性、多元性、連續性與自主性，最後則是增加實務課程與業界師資。

（一）重新整合與分類課程模組

過去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意傳播就業學程與傳播多媒體就業學程。這兩個學程分別涵蓋六個傳播就業領域。從學習意見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分類架構需要調整，包括是否能夠更加明確、具體，與課程、就業領域更加銜接，以及是否

能夠更彈性選擇課程，增加自主學習空間。

經多次討論後，主要調整方向需與既有課程融合，避免原學程與修課學生受影響，考量現有師資與課程，以及發展系所特色等。此外校方也要求參考教育部推動之「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niversity Career and Competency Assessment Network, UCAN）（UCAN 計畫辦公室，n.d.），與系所學程模組結合。UCAN 系統鼓勵學生在學期間能夠瞭解學習目標，並與就業市場接軌，規劃各類型的職場能力與課程安排，於入學時便進行職能與性向測試。UCAN 系統在傳播領域所規劃的就業職能，包括「藝文與影音傳播」、「影視傳播」、「印刷出版」、「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新聞傳播」、「行銷傳播」等。經討論後，將課程模組改為「廣告公關新聞」、「數位影音設計」、「影劇表演藝術」學程，希望能夠更明確說明學程學習目標與專業職能。

首先，廣告公關新聞學程著重印刷出版、新聞傳播、廣告行銷、通訊傳播就業職能規劃，強調廣告、公關與新聞工作專業知識及技能，可從事新聞記者、編輯、文創、公關、廣告等產業。其次，數位影音設計學程著重影視傳播、視覺藝術就業職能，培養影音與多媒體設計相關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可從事各類影音媒體前製、製作與後製等相關專業工作。最後，影劇表演藝術學程著重表演藝術就業職能，重視培養影視內容創作與舞臺相關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能，可從事導演、設計、特定場所表演歌唱、舞蹈等演出人員。

（二）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

過去課綱安排，重視專才訓練，循序漸近式教學，總整課程也依專業類別製作畢業專題。例如，修習創意傳播畢業製作課程，必需從廣告、影劇與論文三者擇二個專業進行畢業專題製作。然而，總整課程設限專業類別，卻往往也限制修課者想修的領域。因此，課程修訂第一部分便開放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二類畢業專題，不受過往所修習的課程限制。另一方面，也將各個學程的必修學分數降低，學生只要在三個學程之中，自由選擇二個學程，達 15 學分以上即可，不需大量修習單一學程，創造更多組合的可能。例如系所教師之一指出：

三個學程的課程在設計上面是互相支援。以數位影音設計學程作為基地可向左右開展與廣告公關新聞學程，或是影劇表演藝術學程，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廣告公關新聞與影劇表演藝術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在細節上看是類似的課程，所以著重的方向是截然不同，如數位影音設計的劇本分析就與影劇表演藝術的劇本分析就是不同的方向，前者是針對電視臺或是電視劇的腳本做分析後者則是針對電影或是舞臺劇的腳本分析。（教師 A，2019 年 11 月 14 日，學程規劃）

（三）加強學術與實務連結

推動學程制度的目的之一在於，過去傳統大學課程過於重視學術研究，而輕忽實務應用，強調應該將理論與實務課程分流（李坤崇，2014；教育部，2013）。然而，大多數私校學生更重視技能與實務需求，難以形成特定領域的學術學程。此外，從過去傳播領域的課程規劃與研究中，也不斷強調傳播領域的課程應該同時重視人文精神、學術發展以及實務課程。因此，在傳播領域的課程規劃應該以「匯流」代替分流，加強理論與實務間的課程連結。

具體的方法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將理論與實務課程結合，例如廣告公關新聞學程，開設消費者心理學、廣告符號分析、民意與市場調查等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另一方面，則是調整課程與師資，請教師開發更多新課程，讓學生瞭解傳播實務應用面的需求，例如數位影音設計學程，新開數位錄音、數位音樂製作、流行影音與文創產業分析、網紅經營、影視燈光與成音實務、商品攝影與設計、數位編曲與配樂、健康宣導影音等。在影劇表演藝術學程，則新開影劇表演藝術概論、肢體開發與舞蹈律動、影視化妝髮型設計、劇場表演藝術、聲音表情與配音訓練、經典影劇劇本導讀、網路影視表演製作、同人誌與 Cosplay、女性主義影視實務、劇場技術實務、活動主持技巧訓練等。

透過新課程的規劃與討論，讓教師與學生更進一步關心媒體產業變化。但課程變動也涉及教師專業，因此新聘三位兼任師資，陸續開設數位音樂製作、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歌唱技巧入門等。此外，也與在地的表演藝術中心合作，開設燈光、舞臺等劇場課程。亦於 104 學年度起安排證照課程，輔導學生考取證照（如剪輯、拍攝、後製等電腦軟體應用或美容造型設計），每學期至少開設一門證照輔導課程。

三、綜合討論

本文透過學習意見調查與專家座談，瞭解問題所在，參考他校傳播科系規

劃，凝聚系所教師、學生共識，提出修訂方向，並與傳播科系產學專家，共同提出調整策略，將學程制度推動過程所遇到的問題加以改善。其中幾個面向值得更進一步討論，包括課程與學程規劃、教學與學習主體、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

（一）透過學程制度建立系所定位與特色

推動學程制度過程，不只是將原有課程加以分類，而是回到系所的師資、學生與內外部的資源與競爭加以檢視。如國立大學規模、資源、目標與學生特質均與私立普通大學不盡相同，應視學生特質予以建立特色（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蘇蘅等人編，2018）。因此，如何建立適合的學程，發展長期目標，成為傳播科系共同探討的問題。就佛光大學、義守大學、長榮大學、靜宜大學、玄奘大學等傳播學系而言，相似的學程為影視製作方面，較為不同的有「廣告行銷」、「廣電新聞」、「流行音樂」、「傳播管理」等學程。有些學校偏重影像創作與分析，有些學校則重視新聞、公關與傳播管理。各個學校都有不同的區分方式：靜宜大眾傳播學系以影像藝術與影視傳播分類，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分為創意傳播、行銷傳播、流行音樂傳播，長榮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分為廣電新聞、公關廣告，玄奘大學則有影視行銷與製作兩個學程。

此外，有些傳播科系成立流行音樂、影視技術等學程，這些學程有別於其他傳播科系，逐漸具有特色。也就是說，學程制度最重要目的不只在於建立不同專業類別，而是各校、各系也得以根據系所師資、學生學習目標，發展出不同的定位與特色，例如有些學校重視電視新聞，有些學校重視影像創作或表演藝術等，培養更多元的傳播專業。

（二）發展問題意識與深層自主學習

其次，過去研究指出多數課程規劃以教師為主，學生是被動接受的角色（林文剛，1999；鍾蔚文，2012）。以自主學習觀點而言，現今學習處在非線性、高度動態、複雜環境，學習者必須自行建構學習的動機與意義，發展高層次的學習，發現問題、解決矛盾（Hase & Kenyon, 2000）。

因此，推動學程制度的目的，不只是解決系所課程過於單一，將各種實務課程加以分流。更重要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自主性。因此，系所必修課程大幅降低，提供更多課程模組。這麼一來，學習的主動權在學生身上，如何去修課、排課，發展自身的專業類別，變成學生的責任。也就是說，未來系所不

再用單一的學習架構，而是嘗試建立更多元的學習環境，學生自行摸索自身的能力、興趣與未來就業的目標。例如，一位高年級的學生在學習意見調查表示：「大學四年時間寶貴，希望能盡量多選擇一些自己想學習的課程」（問卷序號 29，2018 年 4 月 21 日，課程意見）。

從傳統教育哲學的觀點而言，學習的目的在於課程資訊接收的多寡。因此，必修課程與數量便十分重要，有效學習是指能夠修多少課、多少學分。而對自主學習觀點而言，學習的有效與否，在於學生是否能夠發展出自己的問題意識，從認知與技能層次，轉換成解決問題的深度思考。這麼一來，總整課程更為重要，利用總整課程，讓學生反省大學所學，如何進一步應用在媒體工作與傳播產業。

也就是說，從自主學習的觀點而言，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主被動關係在改變。對於電子媒體世代的學習，資訊取用快速、容易，學習態度成為學習的關鍵因素，系所課程難以一體適用所有學生。因此，透過彈性化的學程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同質化，另一方面，也透過課程模組化建立有更加自主的學習環境。

（三）師生共同面對與適應媒體變遷

此外，學程制度規劃需兼顧教學、學生面向外，最重要的是產業與或社會需求。例如，課程委員 C 從業界的經驗與角度提及「傳播產業人才近年來供需失衡，薪資凍漲，應多方位學習。」（課程委員 C，書面意見，2019 年 11 月 14 日）。近年來媒體產業人才飽和，工作日益複雜，難以用媒介表現形式明確分類，學生也難以僅學習單一技能，更重視多方位的能力，他強調課程應該多加強新媒體的運用能力。例如：

從職場需求，無論報社電視臺到廣播電臺，除了文字撰寫能力外，影音的製作拍攝很重要。手機與電腦運用愈來愈廣，課程可以加強手機電腦運用課程。另外，報紙與雜誌，寫作方式和傳統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現今報章雜誌，即使學校刊物給予教導傳統寫作方式外，建議加強影音的製作。國內傳統報紙和雜誌，寫手已經脫離不了即時新聞影音的製作。（課程委員 C，書面意見，2019 年 11 月 14 日）

過去討論指出，進行課程調整對教師影響甚鉅，教師通常受傳統媒體訓練，面對新媒體、新環境，推動課程調整成為難題。透過課程調整過程，可以發現新

課程需要大量的師資與專業，很難在一時間進行大幅改變，只能嘗試讓教師將原有的課程與內容加以「調整」。也就是說，藉由學程制度推動過程，不只是課程架構的調整，也讓教師、學生共同面對媒體環境變遷，探索教學與學習如何改變。

伍、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傳播領域課程學程化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並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為個案，檢討如何改善學程制度，並提出調整策略與建議。

透過學生學習意見調查以及專家座談，本文歸納該系推動學程制度，主要問題分別在必修課程規劃、課程模組分類、總整課程以及實務課程等，並針對相關問題提出改善策略，包括重新整合與調整課程模組、減少跨組修課與總整課程限制、強化產學連結與實務課程。本文認為各個傳播學系有其特色與目標，無法一體適用，透過學程制度的分析與檢討，瞭解既有課程架構之不足，漸進修訂。

其中有幾個面向值得更進一步討論，包括學程規劃、師生關係、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在學程規劃部分，課程規劃就像所有立意良善的中央統籌計畫一樣，不管一開始的規劃是多麼地周延，隨著時間點拉長，就會產生問題（陳杏枝、游家政，2015）。因此，課程與學程模組規劃，會隨著教師、學生與內外環境而不斷演變，也需更加瞭解學程制度的目標所在，避免因學程制度而造成更多限制。其次，學程制度最重要的是改變學習主體，透過學程制度，讓師生建立自主學習觀念，改善傳統單向教育體制，透過學程制度得更加瞭解學生想學的是什麼或不是什麼，發展出高層次的學習需求與潛力。

另一方面，學程制度重點是彈性適應外在環境變化。過去的系所本位的教學模式，以特定領域或專才的方式培育學生。而媒體產業與環境變遷快速，學程制度也提供更多樣化的學習方向。透過學程制度，各個學校傳播科系，可以更具體發展出其定位與課程特色。最後，媒介科技與傳播教育議題方興未艾，但相關研究與文獻主要集中於 1996–2001 年間。但傳播教育與學習樣態仍不斷演化，且速度加劇、變化更多，如何提高學習動機，適應媒介環境變遷是未來重要課題，期後續更多相關研究參與。

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皆為自願填答樣本，未來可進行更嚴謹之課程與學習成效調查，將校友、學生進行分層抽樣，瞭解學習情形及學習過程，提高信度與效度。此外，透過問卷調查法可以蒐集到的回應有限，若能夠以深度訪談輔助，深入評價課程規劃與架構，表達個人修習經驗，得加強理論與

資料詮釋。本研究主要以南華大學傳播學為個案，探討其特有問題。然而，公、私立大學（或科技大學）間，其資源、師資、環境不一，各校性質與學生學習動機、目標、能力亦不相同，無法進行通則化推論，如文獻建議，應針對不同學校、教師與學生，發展適合其特性與特色之課程或學程。未來，期待各校公開更多經驗資料與研究討論，瞭解傳播課程規劃與學習成效差異性，進行比較研究。

參考書目

- UCAN 計畫辦公室 (n.d.)。〈職能與職業查詢〉。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取自 <https://ucan.moe.edu.tw/search/search.aspx#a1>
- 王石番、陳世敏（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劃研究》（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中華傳播學刊編輯部（2008）。〈傳播教育及研究如何因應傳播未來發展趨勢訪談紀要〉，《中華傳播學刊》，13：233-240。<http://doi.org/10.6195/cjcr.2008.13.08>
- 李坤崇（2014）。〈模組化、學程化及分流化的成果導向課程模式〉，《教育研究月刊》，240：5-18。<http://doi.org/10.3966/168063602014040240001>
- 林文剛（1999）。〈論傳通教育課程內的傳播科技：一個浮士德的交易？〉，《新聞學研究》，58：269-283。[http://doi.org/10.30386/MCR.199901_\(58\).0012](http://doi.org/10.30386/MCR.199901_(58).0012)
- 胡元輝（2014 年 6 月）。〈涉世學術的追尋——從知識生產角度反思大學傳播教育的定位〉，論文發表於「2014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臺灣，臺北。
- 皇甫河旺（2012）。〈新聞傳播教育的變與不變〉，《傳播研究與實踐》，2（2），35-39。<http://doi.org/10.6123/JCRP.2012.018>
- 南華大學教務處（2016 年 10 月）。〈105 學年度課程學程化說明手冊〉。上網日期：2020 年 5 月 15 日，取自 http://academic2.nhu.edu.tw/files/archive/776_d0d7a1f5.pdf
- 翁秀琪（2001）。〈臺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http://doi.org/10.30386/MCR.200110_\(69\).0002](http://doi.org/10.30386/MCR.200110_(69).0002)
- _____（2013）。〈新素養與 21 世紀的傳播教育——以新素養促進公共／公民參與〉，《傳播研究與實踐》，3（1）：91-115。<http://doi.org/10.6123/JCRP.2013.005>
- 陳世敏（2000）。〈傳播學入門科目的實現與理想〉，《新聞學研究》，65：1-18。

[http://doi.org/10.30386/MCR.200010_\(65\).0001](http://doi.org/10.30386/MCR.200010_(65).0001)

陳杏枝、游家政（2015）。〈核心課程？還是分類選修？：某私立綜合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改革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61（1）：69-100。<http://doi.org/10.3966/102887082015036101003>

陳佩英、黃天仕、許美鈞、侯仲宸（2016）。〈當「研究法」遇見數位學習：教與學翻轉的經驗談〉，《數位學習科技期刊》，8（1）：51-70。<http://doi.org/10.3966/2071260X2016010801003>

教育部（2013 年 12 月 4 日）。〈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5/pta_2189_2524507_39227.pdf

許瓊文（2007）。〈數位化媒體教育課程實驗初探與省思：以某大學實習媒體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1：3-47。<http://doi.org/10.6195/cjcr.2007.11.01>

潘家慶（1996）。〈新聞系課程設計問題〉，《傳播研究簡訊》，6：14-15。[http://doi.org/10.6335/CRN.1996.6\(8\)](http://doi.org/10.6335/CRN.1996.6(8))

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新聞學研究》，53：85-106。[http://doi.org/10.30386/MCR.199607_\(53\).0006](http://doi.org/10.30386/MCR.199607_(53).0006)

鄭瑞城（1998）。〈大學教育和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2）：4-6。[http://doi.org/10.6335/CRN.1998.15\(2\)](http://doi.org/10.6335/CRN.1998.15(2))

閻沁恆（1991）。〈臺灣地區之傳播教育〉，《新聞學研究》，45：139-149。[http://doi.org/10.30386/MCR.199112_\(45\).0008](http://doi.org/10.30386/MCR.199112_(45).0008)

鍾蔚文（2012）。〈尋找傳播教育的新典範〉，《傳播研究與實踐》，2（2）：41-50。<http://doi.org/10.6123/JCRP.2012.019>

蘇蘅、吳岱芸、吳俊葵編（2018）。〈《新聞學研究》五十週年座談：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新聞學研究》，134：179-217。[http://doi.org/10.30386/MCR.201801_\(134\).0005](http://doi.org/10.30386/MCR.201801_(134).0005)

Cochrane, T., Antonczak, L., Gordon, A., Sissons, H., & Withell, A. (2012, November). *Heutagogy and mobile social media: Post web 2.0 pedag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cilite2012 Conferenc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Cochrane, T., & Rhodes, D. (2013). iArchi[tech]ture: Developing a mobile social media framework for pedagogical transformati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9, 372-386. <http://doi.org/10.14742/ajet.191>

Hase, S., & Kenyon, C. (2000). From andragogy to heutagogy. *Ultibase Articles*, 5, 1-10.

- Luckin, R., Clark, W., Garnett, F., Whitworth, A., Akass, J., Cook, J., Day, P., Ecclesfield, N., Hamilton, T., & Robertson, J. (2010). Learner generated contexts: A framework to support the effective use of technology for learning. In M. J. W. Lee & C. McLoughlin (Eds.), *Web 2.0—Based e-learning: Applying social informatics for tertiary teaching* (pp. 77-84). Hershey, PA: IGI Globa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88703644_Learner-Generated_Contexts_A_Framework_to_Support_the_Effective_Use_of_Technology_for_Learning
- Mulrennan, D. (2018). Mobile social media and the news: Where heutagogy enable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3, 322-333.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7720762>
-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附錄：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學生學習意見調查問卷

各位同學好，為瞭解同學修課與學習情形，請各位如實作答，資料呈現將匿名處理，作為改善系所課程之參考。

1. 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2. 請問你對本系整體修課與學習情況是否有何寶貴意見？

3. 請問你對本系「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4. 請問你對系所「課程規劃」（「創意傳播」與「傳播多媒體」模組）是否有何寶貴意見？

5. 請問您覺得本系應開設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就業或學習最有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或擬開課程，可複選）

- | | | | |
|------------------------------------|---------------------------------|------------------------------------|-----------------------------------|
| ☐ 基礎媒介實務 | ☐ 大眾媒體寫作 | ☐ 公共關係 | ☐ 新聞英文 |
| ☐ 傳播研究方法 | ☐ 報刊實務 | ☐ 媒體實習 | ☐ 廣告學 |
| ☐ 影劇表演 | ☐ 傳播表演藝術 | ☐ 人際傳播 | ☐ 團體溝通 |
| ☐ 腳本設計 | ☐ 影像美學 | ☐ 健康傳播 | ☐ 女性主義 |
| ☐ 故事分析 | ☐ 傳播與符號 | ☐ 口語傳播 | ☐ 說服談判 |
| ☐ 公共傳播 | ☐ 流行文化 | ☐ 社區參與行動 | ☐ 閱聽人研究 |
| ☐ 獨立電影 | ☐ 廣告創意 | ☐ 廣告文案設計 | ☐ 兩岸戲劇通俗文化 |
| ☐ 媒體動畫與特效製作 | ☐ 公關危機傳播 | ☐ 公關策略企劃 | |
| ☐ 影劇導演實務 | ☐ 視覺傳播 | ☐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 |
| ☐ 創意傳播畢業製作 | ☐ 網路廣播 | ☐ 數位媒體實務 | |
| ☐ 傳播基礎軟體 | ☐ 虛擬攝影棚 | ☐ 網新聞編輯 | ☐ 雜誌編輯 |

- | | | |
|------------------------------------|-----------------------------------|---|
| ☐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 ☐ 影視作品評析 | ☐ 網際網路與通俗文化生產 |
| ☐ 進階新聞 | ☐ 廣播新聞 | ☐ 廣播專題製作 |
| ☐ 數位編輯設計 | ☐ 科學傳播經典賞析 | ☐ 當代科學傳播議題 |
| ☐ 電視新聞製作 | ☐ 電視專題製作 | ☐ 數位廣播製作 |
| ☐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 ☐ 電視節目企劃製作 | ☐ 文化研究 ☐ 網頁設計 |
| ☐ 數位布展 | ☐ 電視深度報導 | ☐ 紀錄片製作 |
| ☐ 數位媒體規劃 | ☐ 數位攝影 | ☐ 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 |
| ☐ 整合行銷傳播 | ☐ 旅遊傳播 | ☐ 微電影製作 |
| ☐ 紀錄片製作 | ☐ 數位音效製作 | ☐ 自媒體傳播 |
| ☐ 數位影像處理 | ☐ 商品攝影與設計 | ☐ 劇團表演實務 |
| ☐ 歌唱技巧入門 | ☐ 播音主持技巧 | ☐ 其他：_____ |

6. 請問您覺得哪三門課程，對同學學習或就業較無幫助？（以下為本系現有課程，可複選）

- | | | | |
|------------------------------------|-----------------------------------|--|---------------------------------|
| ☐ 基礎媒介實務 | ☐ 大眾媒體寫作 | ☐ 公共關係 | ☐ 新聞英文 |
| ☐ 傳播研究方法 | ☐ 報刊實務 | ☐ 媒體實習 | ☐ 廣告學 |
| ☐ 影劇表演 | ☐ 傳播表演藝術 | ☐ 人際傳播 | ☐ 團體溝通 |
| ☐ 腳本設計 | ☐ 影像美學 | ☐ 健康傳播 | ☐ 女性主義 |
| ☐ 故事分析 | ☐ 傳播與符號 | ☐ 口語傳播 | ☐ 說服談判 |
| ☐ 公共傳播 | ☐ 流行文化 | ☐ 社區參與行動 | ☐ 閱聽人研究 |
| ☐ 獨立電影 | ☐ 廣告創意 | ☐ 廣告文案設計 | ☐ 兩岸戲劇文化 |
| ☐ 媒體動畫與特效製作 | ☐ 公關危機傳播 | ☐ 公關策略企劃 | |
| ☐ 影劇導演實務 | ☐ 視覺傳播 | ☐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 |
| ☐ 創意傳播畢業製作 | ☐ 網路廣播 | ☐ 數位媒體實務 | |
| ☐ 傳播基礎軟體 | ☐ 虛擬攝影棚 | ☐ 網新聞編輯 ☐ 雜誌編輯 | |
| ☐ 多元文化與媒體再現 | ☐ 影視作品評析 | ☐ 網際網路與通俗文化生產 | |
| ☐ 進階新聞 | ☐ 廣播新聞 | ☐ 廣播專題製作 | |
| ☐ 數位編輯設計 | ☐ 科學傳播經典賞析 | ☐ 當代科學傳播議題 | |
| ☐ 電視新聞製作 | ☐ 電視專題製作 | ☐ 數位廣播製作 | |
| ☐ 廣播節目企劃與製作 | ☐ 電視節目企劃製作 | ☐ 文化研究 | |
| ☐ 網頁設計 | ☐ 數位布展 | ☐ 電視深度報導 | |
| ☐ 紀錄片製作 | ☐ 數位媒體規劃 | ☐ 數位攝影 | |

- | | | |
|------------------------------------|---------------------------------|----------------------------------|
| ☐ 傳播多媒體畢業製作 | ☐ 整合行銷傳播 | ☐ 旅遊傳播 |
| ☐ 微電影製作 | ☐ 紀錄片製作 | ☐ 數位音效製作 |
| ☐ 自媒體傳播 | ☐ 數位影像處理 | ☐ 商品攝影與設計 |
| ☐ 劇團表演實務 | ☐ 歌唱技巧入門 | ☐ 播音主持技巧 |
| ☐ 其他：_____ | | |

7. 針對本系課程，請問您有何寶貴建議？

Planning and Reflection of the Course Module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of Nanhu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Shih, Poye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2013, Nanhua University has promoted curriculum innovation, expanding from “T-shaped education” to “ π -shaped education,” and executing “curriculum modules” with the aim of guiding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by combining multiple course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this research surveyed students and found the key to course learning to be how to plan required courses, how to build and classify course modules, and how to link courses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fore, further deepening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clude reintegrating and adjusting course modules, reducing restrictions on courses and capstone courses,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onnections and practical courses. This article posits that the focus of curriculum planning is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oning of the department, change the learning subject, and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Curriculum planning aims to increase the motivation of learner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heutagogy), not merely to pursue specific employment skills.

Keywords: π -shaped education, heutagogy, curriculum innovation, curriculum modules, learning experience

* Email: howard624@nhu.edu.tw

Received: 2019.8.31

Accepted: 2020.10.29

從公眾角度再思科技政策的媒體建構： 以《電業法》修法為例^{*}

徐美苓^{**}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特聘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政經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內容分析 2016 年《電業法》修法過程中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報導及評論，以再思媒體增進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分析結果顯示，新聞論述針對修法批評多於內容描述，然多非以證據或事實支持論述立場；儘管議題涉及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少透過環境框架論述之，而是大量集中在強調效率或公平分配的經濟層面，也多引述經濟相關消息來源。大多數報導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要素之檢定；除此，本研究並無觀察到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在增進公民參與要素程度有系統上的差異，但前者有較多多元觀點，特定主流媒體也比特定另類媒體有較多公民參與元素的優點。本研究最後討論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政策管道的局限，並據此提出未來延伸研究建議。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眾理解、科技政策、新聞再現、《電業法》

* 本論文係作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科技風險政策論述的媒體建構與公眾感知：以《電業法》修法為例」（MOST 106-2511-S-004-009）之部分研究結果，作者感謝研究助理莊育寧、伍先恩及柯姿韻參與計畫之資料蒐集與內容分析編碼。

** Email: mlshiu.mlh@gmail.com

投稿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9 月 4 日

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以臺灣近年進行的能源轉型科技政策為例，探討在相關的國家政策修訂過程中，專家與常民論述如何在公共領域中被定義、展開、爭辯及決定。本研究特別著重從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角度，分析能源轉型過程中發生的關鍵事件，其曝光與多方爭辯如何使得與能源轉型政策相關的知識、觀念、態度與信念等，在公共論述中被建構與對話（或不對話）？

2018 年 11 月「以核養綠」公投提案將看似陌生的《電業法》一詞搬上檯面。2016 年重啟修法的《電業法》乃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兌現非核家園與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在修法過程中也引發不少討論與報導。鑒於大眾媒體無可避免是科技議題論述建構的主要場域 (Slovic, 2000, pp. 220-231; Wilkins & Patterson, 1987)，本研究以對《電業法》修法有相當程度討論的媒體報導或評論為主，納入分析的關鍵事件包括 2017 年初《電業法》修法前後（蔡英文就任總統至修法通過日）的論述。本研究重點不在對《電業法》修法內容進行專業檢核，而是聚焦在媒體中的論述再現。

在眾多科技政策中，何以本研究獨厚《電業法》？自氣候變遷問題漸受關注，發展可替代傳統能源如煤炭、石油與天然氣的「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成了各國如何減緩氣候變遷之重要策略與行動。國際此一趨勢成為臺灣相關政策追隨方向，政府透過能源發展基金及科技部相關預算進行科技研發，也希望發展再生能源之應用（高銘志，2013）。然而在再生能源發展的過程中，核電一直是「替代能源」（alternative energy）選項論述中無法避免的主力競爭對手，故核電與再生能源成了臺灣公共論壇中的熱門爭辯話題，各類替代能源出現在大眾媒體論述的頻率愈益增加，相關研究也分別檢視新聞媒體在臺灣替代能源問題建構上的角色及民眾對議題的參與程度（徐美苓，2015），以及以媒體訊息設計的方式發展與測試能增進公眾對議題參與的有效報導要素 (Hsu, 2019) 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前，臺灣政府歷年的政策規劃乃是以「核電為主，再生能源為輔」為低碳能源方向（呂怡貞，2012；經濟部能源局，2008 年 6 月 5 日）。福島核災則對同處地震帶且擁有四座核電廠的臺灣帶來震撼，再度掀起對核電存廢的激烈討論（高銘志，2013）。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在 2016 年上任後，確立非核家園的綠色能源（簡稱綠能）發展方向，其中逐步推進臺灣能源轉型的《電業法》修法，即為新政府的重大選前承諾之一（經濟部，2016 年 10 月 24 日；經濟部能源局，2016 年 10 月 20 日）。此能源

轉型是大架構、大面向的翻轉，包含建立智慧電網及智慧節電系統。《電業法》修法與再生能源發展的構連，以及自展開修法後其過程中的種種爭議媒體報導，引發研究者欲進一步探討涉及科技專業的《電業法》政策在媒體中被建構的樣貌，是為本研究發想的源由。

貳、文獻探討

一、《電業法》修法及爭議

臺灣的《電業法》於 1947 年制定，主要內容乃針對過去的傳統電力產業。1980 年代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率先推動電業自由化，後來各國紛紛跟進，包括臺灣在內（許志義、王京明、黃鈺愷，2015），並於 1995 年開始推動《電業法》修法。然《電業法》21 年來歷經立法院（簡稱立院）審議六次，有關市場架構及電業管理制度部分卻都無疾而終，逾 50 年未予修正（蘋果日報，2016 年 12 月 17 日）。直至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臺，提出「2025 非核家園」及「啟動國家能源轉型」的願景，希望透過修法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一方面加速綠能產業的投資與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藉由開放綠能進入電力市場，補足核電即將退場的能源供給問題。

易言之，修法前的《電業法》已無法面對當今減碳壓力及趨勢，特別是臺灣原先的老舊電力系統和《電業法》架構，使得綠能產業發展遇到很難跨越的障礙瓶頸，即在臺灣電力公司（簡稱臺電）獨家電力產業經營下，用戶難以確保能買到真正的綠電及多樣化的低碳電力；再生能源業者也無法將生產的電力直接賣給公司行號或用戶；用戶只能購買由能源局和臺電發明，並僅能在臺灣使用的所謂「虛擬綠電」（virtual green power）（王京明，2016）。

行政院版的《電業法》修正草案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拍板定案，期在同年年底的立法院會期審查通過。官方強調修法的重點是「開放電業市場」，即前述「電業自由化」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基於「綠能先行」的規劃，開放民間新設綠能發電與售電業，打破過去由臺電壟斷的格局；第二階段則將臺電拆解成三個部分，分為公部門的發電與售電業以及擁有遍布全臺電網的輸配電業，同時也開放民間新設非綠能的一般發電與售電業。民眾將擁有更多元的購電選擇權，可自由和各家售電業者簽約購電。在連結能源轉型、減碳及非核家園部分，2016 年

修法版本的《電業法》內容訂下「電力排碳係數¹」的限制，希望藉此導向低碳的清潔能源，也因而點出再生能源的發展刻不容緩（陳文姿，2016年10月24日）²。

政府對《電業法》修法的快馬加鞭，使得以往屬於專業且冷門的科技政策論述及討論，在公共論域中活絡了起來，包括坊間舉辦的各類研討會、工作坊及論壇，網路上的介紹、宣導及評論，以及大眾傳媒的報導等。以前者言，研究者於2016年所參與氣候變遷或再生能源相關的校外論壇及研討會中，便有11場提及《電業法》修法。研究者另初步搜尋網路上有關非報導性質的《電業法》修正草案論述，發現各方意見與批評不少，也包括兩極化的支持與反對意見。支持論述多為經濟部公布或製作的宣導內容，以及支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廠的民間團體，如「臺灣環境保護聯盟」、「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等（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2015）。質疑修法論述的來源則相對多元（見陳文姿，2016年10月24日），除了電子布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上的匿名文章，有抗議權益受損的臺電工會³，也有曾分別站在反核（徐光蓉，2016）與所謂反反核（蕭長展，2016）兩造的民間團體或代表。茲以後兩者曝光度較高的質疑論述為例，研究者約略彙整出其重點：

- （一）雖然與一些反核團體或代表同樣質疑修正草案會圖利財團，反反核代表認為若政府重點是推動綠電，應該是修正《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讓綠電自由化，故認為《電業法》修法是假命題。
- （二）相對於前述反核團體代表質疑政府合理化對臺電的失控，反反核代表認為把臺電拆分後會削弱其競爭力，增加臺電供、售電的成本，而且讓一個公用售電業承擔全臺的供電義務對臺電不公平，也會影響到員工權益，使得電價上漲，認為應該要在制度設計上讓所有人分攤供電義務。
- （三）反核團體代表認為行政院版《電業法》根本是「臺灣電力公司電業法」，

1 所謂電力排碳係數，是指電力生產過程中，每單位發電量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15年國家電力排放係數是每度電排放0.528公斤的二氧化碳，其中燃煤發電的電力排放係數最高（每度電約0.8–0.9公斤），而再生能源近乎是0，若未來要達到非核、又要符合排碳量規定，勢必要增加更多燃氣機組與再生能源（陳文姿，2016年10月24日）。

2 本研究分析範圍雖至2017年1月《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之時，之後的發展即令未納入分析，仍值得注意：由「以核養綠」方發起的全民公投第16案「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114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於2018年11月25日通過，並由經濟部公告自2018年12月2日起失其效力。該條文訂定核電不再運轉的期限，通稱「2025非核家園」條款（經濟部，2018年12月5日）。

3 例如臺電工會揚言要採取在颱風天不出勤維修和占領官署等理性而有效的手段來爭取參與《電業法》修正方向的定奪權利，以保護修法後臺電員工既有權益。

要求再生能源發電業準備備用供電容量，是故意打壓再生能源與小型發電業，2025 年前再生能源能將無法達到預期的 20% 發電量。相較之下，反核代表認為再生能源如風力和太陽能仍無法取代核能和火力，而天然氣及再生能源使用量的提升會增加發電成本及營運成本。

這些坊間各類研討會及網路的介紹評論等場域，對《電業法》修正案的討論仍屬專業，且論述提出及接收者多為主動發聲或有相當的議題參與度。屬於一般媒體報導內容的接收者就多為偶然、被動的議題接觸常民了。鑒於此議題在大眾傳媒論述中有一定的顯著度，引發研究者欲從媒體論述作為此研究分析的起點，特別是媒體內容的報導主軸。

除此，臺灣近年借助新媒體之力崛起的另類（alternative）媒體逐漸顯露其社會影響力。相對於強調科層分工權力結構的主流媒體，另類媒體在組織上被視為是平行、對等的，甚至由下而上，故多被視為能提供主流社會的異議之聲與選擇，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改革（管中祥，2014 年 6 月 26 日）。過去比較臺灣主流與另類媒體在環境相關報導上的研究便發現，相對於主流媒體多為間斷、看外界風向決定內容的報導，另類媒體多能詳細記載整起事件經過，提供較多有關環境風險的訊息和觀點（張傳佳，2013），或對於與未來相關之環境風險議題或個案報導量較主流媒體為多，在議題內容上也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林佳弘，2014），特別是在國光石化及六輕開發案的影響評估報導上。由此，比較主流及另類媒體在《電業法》修正草案報導上的異同亦為分析要點。

基本上，《電業法》第一階段修法的重點是在綠能先行與綠能自由化，然民間所發的綠電透過躉購⁴方式販售給臺電，缺乏透明、市場競標的綠電自由交易平台（王京明，2018），無怪乎引發各類民間團體的激烈爭論。這些團體包括支持能源轉型、鼓勵公民參與成立電廠者，也包括有政治意識形態傾向的反核及擁核等團體，研究者因而好奇不同類型的媒體是否也會影響到《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主軸，故：

研究問題一：媒體透過哪些主軸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主軸上有何異同？

4 躉是「整批」之意。躉購源自德國 2000 年《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 EEG）的躉購費率（Feed-in Tariff, FIT）制度，被視為是對綠電的「保證收購」。一般的補貼是由政府補助設備購買，但難保證設備被良好維護；德國開啟的躉購制度則是由民眾掏錢買再生能源設備，政府再以躉購費率收購綠電 20 年，理論上綠電發愈多，民眾愈有利（陳文姿，2018 年 8 月 8 日）。

二、科技議題的框架化（framing）

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會受到不同新聞框架（也就是報導手法）的影響 (McComas & Shanahan, 1999; Nisbet, Brossard, & Kroepsch, 2003; Nisbet & Hoge, 2007)。研究者在初步檢視《電業法》修法報導時，即發現有媒體似乎特別著重在臺電工會抗爭《電業法》修法的報導，至於修法的背景與修法內容卻鮮少在報導中被介紹或討論，被凸顯的訴求則為難以判斷是否與臺電員（勞）工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反漲電價，而來自傳媒如此簡易的情感訴求，藉由「漲價」的價值面向與常民熟悉的社會經驗連結，或能對閱聽人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上述討論引發研究者除分析新聞內容，也考量進一步探究《電業法》修法議題的框架化，包含新聞如何從被感知的真實選擇和凸顯某些層面，藉此定義其作為一種問題、提出問題形成的因果解釋，甚或提供道德評估與處理方式的建議 (Entman, 1993)。易言之，框架化基本上涉及新聞論述評價最主要從何面向切入，即記者為文的方式或陳述的策略，關乎其背後的哲學或意識形態（徐美苓，2015）。

至於本研究的新聞報導框架分類，與替代能源相關的文獻顯示，能源獨立、對環境的益處或傷害、公平正義、經濟效益等類別曾被用來分析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生化燃料（biofuels）框架，分析結果也發現2004年後的媒體框架多與負面經濟效益有關 (Delshad & Raymond, 2013)。在臺灣，劉淑娟（2001）將再生能源相關報導依數量多寡歸納出經濟收益、政策刺激及環境輿論三個類目，也依此推估市場上對再生能源的市場擴散與滲透程度的影響；徐美苓（2015）分析主流與另類媒體各替代能源報導框架差異，則是採用經濟發展、競爭力、效率、成本效益、能源或電力供給、（人身）安全或健康、環保／生態、減碳、減緩暖化或氣候變遷，及政府或官僚體系的作為或不作為、無能／政治力介入等五個框架，結果發現除了核能最常使用政府作為及安全健康的框架報導，其他替代能源則多採用經濟發展框架。上述經濟、環境、健康、政府作為／治理／課責等框架類目，也曾出現在針對美國氣候變遷 (Nisbet, 2010) 及中國霧霾報導（李子甜、徐美苓，2020）的分析中。參考上述文獻，本研究欲從蒐集的《電業法》修法報導文本中彙整出可據以分析的媒體框架。

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媒體與消息來源常一起共同建構議題的意義。傳統新聞報導因客觀性的要求使得記者需將消息來源的意見引入報導中（臧國仁，1998，1999）。除此，不同的社會力量欲爭取發言機會則有賴策略的行動，在媒體文本中的展現則為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故消息來源作為框架提供者對新聞

報導的角色也不容小覷，不少研究均有佐證（王慶，2014；Van Gorp, 2007）。在科學與環境議題中，媒體的報導依賴較多的消息來源為專家或權威系統（謝君蔚、徐美苓，2011；Gamson & Modigliani, 1989）。然當新政策涉及科技議題時，一如本研究關切的《電業法》修法，除了專家與權威消息來源，又還有哪些發言者共同參與了議題的建構？由上，除了檢視各類型媒體在框架上的差異，本研究將消息來源納入一併檢視，探討《電業法》修法議題中不同新聞框架中的消息來源引述差異。故：

研究問題二：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為何？

研究問題 2a：《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述？

研究問題 2b：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所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在報導框架上
有何異同？

三、以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為前提的科技報導

科學議題牽涉許多複雜特性，一般民眾難以輕易瞭解其來龍去脈，而須間接透過新聞工作者的報導來瞭解議題真相，媒體所扮演的把關、引介及教育功能也就更顯得重要（黃俊儒、簡妙如，2006）。然科技議題的呈現也須考量專家與常民在認知與判斷上的差異，特別是後者的認知與判斷並非完全依據數學式的理性計算（Ratzan & Meltzer, 2005）。換言之，媒體呈現科技訊息時，不須摒棄以科學專業為基準的訊息傳布方式，但宜在語言上使用常民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

檢視有關科技政策再現的研究文獻，研究者發現針對上述特質或現象進行的分析並不多，少數相關研究則點出能顧及常民理解的報導元素比例不足。例如徐美苓、楊意菁（2011）曾分析臺灣四家主流報紙 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間全球暖化新聞內容，發現各媒體在暖化報導上有其特色，溝通訊息呈現的優缺點亦各有軒輊。不符合增進理解必要條件者雖不多，如含錯誤資訊、可讀性低、出現未經查證或無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或引述消息來源超越其專業範圍等缺點，但能通過優質訊息標準檢視充分條件者也非多數，如有提及風險或危害特性、提及民眾可採取之措施或行動、使用對照或比較方式呈現風險、置於較宏觀範疇來討論，及提及相關的政策或法規等。而國外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的新聞分析顯示，1990 年代以來的報導似乎過於強調災難式的預言（Linder, 2006; Revkin, 2007），使得相關論述經常只是停留在議題的表面（自然

變異等），沒有導入更深層或更細節的討論，以致於人們對全球暖化的認知經常是片斷不完整的。除此，科學新聞常被評為善於將複雜仍充滿不確定性的科學資訊，簡化成清楚確定或立場對立的答案 (Boyce, 2007; Levi, 2001)，例如當發現全球暖化的科學解釋不確定性高時，媒體會傾向於強調利益團體間的衝突 (Corbett & Durfee, 2004)。Boykoff (2007) 建議媒體應提供有關議題更多的情境知識以取代衝突對立式的呈現；然 Hsu (2008) 檢視臺灣戴奧辛食品風險新聞，發現新聞提及包括危害物質特性、民眾可預防之措施或知識、食品安全或較宏觀之環境保護議題，以及相關政策或法規等情境知識的比例不高，多在一成以下。

至於主流及另類媒體的差異，除了前述張傳佳（2013）與林佳弘（2014）分別就國光石化議題比較兩類媒體的議題處理結果，徐美苓（2015）分析臺灣四家主流與另類媒體替代能源議題報導的差異，發現另類媒體在增進公眾議題參與的元素上有優於主流媒體的趨勢，雖然兩類型媒體基本上符合的報導比例均相當不足。本研究則欲進一步將媒體比較分為公眾理解科學及公民參與兩面向。首先，從前者的角度出發，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三：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增進公眾理解科學元素的程度為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再者，從增進公民參與角度來看，《電業法》修法內容牽涉欲解決的經濟與環境風險問題（如發展再生能源以降低碳排放量），即政策本身引發的爭議亦意涵政策周全與否的不確定性。議題的溝通若僅依據過去的權威解說（canonical account）模式（謝瀛春，1991），將無法因應與解決當今科技爭議，故有漸轉向從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整體意涵予以檢視的趨勢。的確，科學活動不只包括科學知識的成果與科學社群內部所進行的探索活動，也與社會活動、社會事業、社會體制相關（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電業法》修法內容和法條爭議的社會性關聯較強，民眾難有立即切身感受或覺得在日常生活上有強烈個人威脅，故從過去相關的討論（黃廷宜，2008；Tulloch & Lupton, 2003）推估，此議題在常民的風險清單排序中優先性可能並不高。易言之，若公共論述過度強調「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中的科技知識內容面，容易簡化科技社會問題的社會性格，無形中過度提高了公民在科技社會相關議題中參與意見的門檻（黃俊儒、簡妙如，2010）。

科學議題所牽連的事件或情況常包含難以控制之眾多變因意識形態，彼此之間盤根錯節且因地制宜（黃俊儒、簡妙如，2006），故專家常對科學議題不見得有共識。從前述《電業法》修法的公共論述觀之，不少專家之間的解釋或判斷便存有很大的歧異。另就是雖然不少人強調公共政策需以科學證據為依據，政客卻可能因為政治或意識形態，忽視、質疑或曲解科學的解釋，甚至還可能利用了科學專業知識相對匱乏的常民百姓（Knight, 2016）。由此，從「公眾意識」（public awareness）轉到「公民參與」的溝過程，被視為是增加決策問責過程能見度的手段（Irwin & Michael, 2003; Wynne, 1992），亦即公眾需被視為積極參與政策決定過程的行動者，而「科學與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研究也愈來愈關切公眾在科技發展初期階段的參與方式轉向（徐美苓，2015；Aitken, 2009）。

由此，Palenchar & Heath (2007) 從科技風險的角度切入，指出新聞若能妥善呈現不確定性，可達到促進民眾對議題深思並審議（deliberate）的目的。此乃因人們在確定的狀態下即不再進行審議，亦即「不確定」會促使人們尋找解答的知識，因此不確定是風險管理必經的過程。一旦不確定產生的爭議過大時，適當的政策就必須解決此一不確定性。這樣概念指出科學風險的不確性觸發了不同觀點的討論，科學與專家知識不是唯一的知識來源，媒體新聞報導即須提供多元不同的觀點及框架，形塑議題的公共討論。

黃惠萍（2005）以核四案為例，提出一個適用於爭議性公共議題的審議式新聞報導模式。這項模式試圖將審議式民主的公開、平等、非專制及相互性原則，鑲嵌於新聞報導的過程與內容，以使公共議題的媒體論述，透過辯論型式的資訊內涵，提升導引公民審議的力量，避免議題在公共論壇中淪為少數人掌控。這裡的「公開性」，指新聞媒體需傳達與議題相關的重要論點及背後的證成理由等實質訊息給大眾，以別於煽動性或言語攻防式的表象訊息；「平等性」則意味公民的近用媒體權，其所表達的意見同樣會被報導重視；「非專制性」則延續平等性原則，但更強調少數人的聲音不會被忽略；「相互性」則指需用他人能夠接受的理據陳述自己的論點（同上引，頁 49-50）。我們可進一步從新聞分析中，萃取出可據以檢視報導內容是否有增進公民參與之元素。故，本研究關切：

研究問題四：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為何？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有何差異？

綜合上述，在《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中，媒體一方面須扮演好橋接角色，消化並提供深入淺出的正確知識，包括條文中提到許多專有名詞，如備用容量、電力排碳係數、電網分工等的解釋（張博倫，2016年11月27日）；另一方面若能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含不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技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遇見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科學知識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螺旋，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黃俊儒、簡妙如，2010）。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擇

本研究主要就《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進行系統、客觀和定量的內容分析。我們首先以《電業法》、電業自由化、核能、臺電、再生能源、廠網分離、能源轉型、輸配電分離、經濟部、能源局等關鍵詞聯集，蒐集主流及另類媒體的相關報導。新聞蒐集時間以2016年5月20日，亦即蔡英文政府上任後為起點，至2017年2月11日《電業法》修正案三讀通過後一個月為止。主流媒體分析樣本的選擇以平面媒體閱報率高並有完整線上資料庫的新聞媒體為主，包括《中國時報》（簡稱《中時》）、《聯合報》（簡稱《聯合》）、《自由時報》（簡稱《自由》）及《蘋果日報》（簡稱《蘋果》）；另類媒體的選擇則以相關議題顯著度較高的媒體進一步篩選，再依據實際報導數量選擇《環境資訊電子報》（簡稱《環資》）、《風傳媒》、《民報》及《新頭殼》四家⁵。

本研究接著依下列原則篩選出欲納入分析的新聞：（一）字數200字以上；

5 《環境資訊電子報》為臺灣環境資訊中心所設立新聞資料平臺中的電子報，創辦於2000年4月16日。此平臺內容由許多專家學者及民間環團，提供國內外環境教育與環保資訊；主題涵蓋全球變遷、溫室氣體控制、環保生活、環境污染防治、生態保育、能源節約與能源效率、綠建築等各面向，詳見環境資訊中心（n.d.-b）。《風傳媒》成立於2013年7月，該媒體自詡在新聞內容要做到「廣納多元觀點」、促進大家的「獨立思考」能力，故不僅藍綠，甚至從中共紅色觀點出發的報導或文章都有，除了主流的政治、國際、財經、軍事新聞外，也盡量觸及一些位於社會角落或邊緣，需要大眾更多關懷的議題，希望帶給臺灣社會更多元之意見及思辨對話，詳見Chris（2016年9月1日）。《民報》成立於2014年，由宜蘭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導演吳念真等各界人士跨界籌辦，強調以全民力量辦報，並擴及公眾、社會運動議題，提供社運及弱勢團體發聲平臺。該報自稱是最具有臺灣主體意識的媒體，「結合各行各業的專家，各個領域的學者，認真理性的在這報紙上探討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問題，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為臺灣的將來深入思考我們共同的命運」，詳見陳永興（2019年3月20日）。《新頭殼》成立於2009年，由前陳水扁政府的中央通訊社董事長蘇正平等資深親民進黨系媒體工作者創辦的網路媒體。該媒體採社會企業模式，以議題為中心，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推動閱聽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不接受置入性行銷，並自我期許不涉特定政治立場，但其立場為民進黨系，並為蔡英文想想論壇專欄作家。《新頭殼》的報導重點放在國際新聞和彰顯公民力量，詳見Newtalk新聞網（n.d.）。

(二) 攸關議題之內容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三) 排除屬於「非新聞」類文章，如副刊作品、明顯列出之廣編稿或資訊介紹等；(四) 國外相關報導需提及對應國內措施之篇幅達全篇 50% 以上；以及(五) 僅分析新聞文字部分，照片及影像由於蒐集不易，故不納入。

二、內容分析類目建構與前測

除媒體名稱，本研究內容分析類目建構的分析單位有兩種，一是以「則」為主；另一是以「日」為主。就前者言，分析的類目有以下，主要乃試圖回答研究問題一與研究問題二。

(一) 報導主軸

分析時基本上以全文判斷，若無法從全文判斷，所依據的優先順序為：標題、導言、篇幅、先出現之主軸。從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坊間就《電業法》的討論多聚焦在實質內容及背景、相關批評及抗爭等，故本研究分析報導主軸的分類也將環繞於此，共分為：

1. 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2. 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包含《電業法》修法的原因、修法的過程及未來發展（影響）介紹。
3. 針對《電業法》修法的批評／建議／（選舉）政見。
4. 其他：例如宣導或花絮、相關人物／團體／組織（事蹟）介紹或特寫、輔助知識類等。

(二) 報導框架

本研究參考 Delshad & Raymond (2013)、Nisbet (2010)、劉淑娟（2001）、徐美苓（2015）、李子甜、徐美苓（2020）等的報導框架分類，並檢視欲分析之《電業法》修法報導內容，經來回討論與前測，衍生出以下框架類別：

1.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2. 公平正義、分配均勻。
3. 環保／生態：強調減碳或環保／生態／環境污染等相關問題。
4. 政府作為／治理：強調政府可信度或效能。
5. 其他。

鑒於一則新聞可能同時有多種框架，本研究將聚焦在最主要者，判斷方式則如上述報導主軸。

（三）消息來源

本研究依報導的出現順序，選取論及議題的前 10 個，共分 13 種：

1. 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2.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包括能源局。
3. 環境、警、檢、調、法、監察等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4.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5. 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7. 其他非政府之議題相關團體或個人。
8.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9. 工會。
10. 業者（工商企業界、證券公司、建設、地產業者）或業者代表。
11. 純粹記者描述，無引述任何消息來源。
12. 調查或學術報告、法規、政策、條文、其他媒體。
13. 其他。

本研究的另一分析單位為「日」，以整日該媒體所有報導或文章內容一起進行判斷。據此分析的類目主要乃針對研究問題三與研究問題四，欲檢視可增進公眾理解及公民參與的科技報導元素。本研究首先參照並彙整相關研究對科學報導品質論述評估標準（徐美苓、楊意菁，2011；張博倫，2016 年 11 月 27 日；Boyce, 2007; Hsu, 2008; Levi, 2001），整理如下。

（四）公眾理解科學要素

本研究以「是」或「否」登錄此要項，分析類目包括：

1. 是否出現錯誤的資訊。
2. 是否有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即內容可讀性問題。
3. 是否有未經查證或無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
4. 消息來源身分是否交代不清。
5. 是否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6. 是否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

7. 是否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

（五）公民參與科學要素

本研究接著參照文獻（如黃俊儒、簡妙如，2006，2010；黃惠萍，2005；Palenchar & Heath, 2007）中有關科學不確定性及公共議題審議的討論，藉以建構如何在新聞內容分析中檢視《電業法》修法議題報導之激勵公民參與元素的呈現，類目包括：

1. 立場或觀點：指內容是否透過語言文字或論述再現特定立場或特定消息來源的立場，或偏重特定立場的觀點，分為：
 - (1) 單一觀點：只描述《電業法》修法的贊成觀點，或是單純說明《電業法》修法造成的現象，又或是單純描述全球國家齊聚一起討論《電業法》修法議題，但並未提出反對或不同意見者。
 - (2) 對立觀點：若有贊成與反對觀點，或除了說明《電業法》修法造成的現象，也提到不認同此一說法觀點。
 - (3) 多元觀點：若除了談贊成與反對觀點外，還談到第三種觀點，如說明《電業法》修法應該在怎樣的狀況下同意（如廢核料妥善處置等），而非只是說明贊成或反對的觀點。
2. 促進公民審議之元素：以下類目的選項則以「是」或「否」登錄之，前三者表示優點，後三者則為缺點：
 - (1) 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支持報導或立場。
 - (2) 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
 - (3) 是否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 (4) 是否僅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
 - (5) 是否針對有爭議或含不確定性之議題，報導明顯需包含多方觀點，但只包含單一方面／觀點的消息來源；或雖引述不同方消息來源試圖呈現平衡，但明顯篇幅或數量上不均衡，僅是表面平衡。
 - (6) 是否針對無爭議之議題，該議題報導卻藉平衡以示對立：即是否對於明顯非屬對立性質議題或事件，卻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並非真正對立）。

本研究內容分析由三名具有傳播背景的碩士生進行，正式分析前共進行各三

次練習與前測⁶。前測樣本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將所有樣本以「日」為單位分層，隨機抽取一碼代表該層（日）被抽取日期，抽出日期則每月該日新聞為前測樣本納入分析，樣本數以新聞總則數十分之一為標準。經兩次前測，刪除若干不合適的新聞後，分析的新聞總則數為625，故本研究隨機抽取64則以進行第三次前測。整體 Scott's π 信度值為 .96，各分析類目的信度則介於 .81–1.00 之間⁷，達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可接受之標準。在正式分析前，本研究對於信度較低的類目則以討論方式再次確認編碼原則。

肆、新聞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布與新聞發展趨勢

本研究共蒐集八個媒體 261 天內的相關報導 625 則，平均一天有 2.39 則新聞（ $SD = 4.17$ ），可見此議題在媒體中的能見度並不低。所有媒體中以占近三成（28.64%）的《聯合》（ $n = 179$ ）報導數量居首，其他主流媒體皆占一成至一成五之間，排序分別為《自由》（ $n = 91$, 14.56%）、《中時》（ $n = 86$, 13.76%）與《蘋果》（ $n = 79$, 12.64%）。《風傳媒》是唯一則數超過《自由》、《中時》與《蘋果》三家主流媒體的另類媒體（ $n = 92$, 14.72%），僅次於《聯合》；其餘另類媒體如《民報》（ $n = 43$, 6.88%）、《環資》（ $n = 29$, 4.64%）與《新頭殼》（ $n = 26$, 4.16%），比例皆不到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在本研究分析期間的《電業法》相關報導所占比例差距甚大，除《風傳媒》外，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高於另類媒體。

二、報導主軸及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一與《電業法》修法議題的報導主軸有關。所有報導中比例最高的主軸為「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接近五成（ $n = 300$, 48.00%）；其次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占四成五（ $n = 283$, 45.28%）；而「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比例不到一成（ $n = 37$, 5.92%）；「其他」類比例則不到百分之一（ $n = 5$, 0.80%）。

6 本研究練習以每次 10 則為原則；前測之所以進行三次，乃因前兩次前測雖整體信度值超過 .80，仍分別有若干重要題項的個別信度低於 .70，為提高正式分析編碼時的信度，故進行到第三次前測。

7 Scott's π 的計算公式如下 (Wimmer & Dominick, 2013)：信度 = (觀察值同意度 - 期望值同意度) ÷ (1 - 期望值同意度)。

本研究接著比較不同媒體的主軸分布差異。經扣除五則「其他」選項，將報導主軸與各媒體進行交叉分析（見表 1）可發現，主軸報導量排序最高的「針對修法的批評／政見」類別中，除《民報》比例最高，高達六成三（62.79%），與比例最低的《新頭殼》，僅兩成左右（19.23%）外，其餘媒體比例皆在四成五至五成五之間；主軸整體排序第二高者為「有關《電業法》的內容」，其中《新頭殼》比例高達近七成七（76.92%），比例在四成五至五成間的媒體由高至低依序為《聯合》（49.72%）、《自由》（49.44%）、《環資》（48.28%）、《風傳媒》（45.65%），其餘皆在四成以下；比例最低的報導主軸為「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其中僅《蘋果》（10.25%）與《中時》（11.63%）超過一成。整體而言，各媒體分布趨勢除了《聯合》和《新頭殼》，其餘媒體分布趨於一致，分布比例也與整體趨勢同；而《聯合》和《新頭殼》的主軸分布比例高低前二者順序對調，分別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及「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

經進一步卡方分析發現各媒體的報導主軸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 $\chi^2(14, 620) = 29.25, p < .05$ 。經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發現，主要差異來自於偏藍營的主流媒體《中時》比所有其他媒體有較高比例的「人民、團體或業者之抗議行動或爭執、糾紛」類新聞（11.63%）；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新頭殼》（76.92%）有比例最高的「有關《電業法》的內容」類新聞，且顯著高於《蘋果》（34.62%）；同樣是偏綠營的另類媒體《民報》（62.79%）則有比例最高的「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類報導，且顯著較《新頭殼》（19.23%）為高。上述媒體的差異顯示《電業法》的報導主軸恐較難以主流 vs. 另類媒體予以區分，相關的卡方分析結果也顯示此區分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 $\chi^2(2, 620) = 3.87, p = .144$ 。

三、報導框架、消息來源與媒體差異

研究問題二與媒體再現《電業法》修法的框架樣貌有關。在所有報導中，框架分布比例最高者為超過五成（ $n = 327, 52.32\%$ ）的「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 $n = 211, 33.76\%$ ）的「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排序第三者為略超過一成的「政府作為／治理」（ $n = 74, 11.84\%$ ）；而「環保／生態」比例僅占 1.28%（ $n = 8$ ）；「其他」框架比例則不到百分之一（ $n = 5, 0.80\%$ ）。

在《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分布部分，本研究扣除五則「其他」類的

表 1：《電業法》報導主軸的媒體分布（%）

報導主軸	《蘋果》 (n = 78)	《自由》 (n = 89)	《中時》 (n = 86)	《聯合》 (n = 177)	《風傳媒》 (n = 92)	《環資》 (n = 29)	《民報》 (n = 43)	《新頭殼》 (n = 26)	總計 (N = 620)
人民、團體或業者之 抗議行動或爭執、糾 紛	10.25	4.49	11.63 ^a	5.08	2.17	3.44	4.65	3.85	5.97
有關《電業法》的內 容	34.62 ^a	49.44	39.53	49.72	45.65	48.28	32.56	76.92 ^a	45.64
針對修法的批評／ (選舉)政見	55.13	46.07	48.84	45.09	52.18	48.28	62.79 ^a	19.23 ^a	48.39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hi^2(14, 620) = 29.25,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 調整後的標準化殘差大於 1.96。

報導後，占比最高者為近四成（ $n = 242, 39.03\%$ ）的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其次為占四分之一強（ $n = 165, 26.61\%$ ）的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再來依序為兩成左右的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n = 125, 20.16\%$ ）、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n = 116, 18.70\%$ ）及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n = 114, 18.39\%$ ）；此外，占比一成五左右的消息來源則有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 $n = 100, 16.13\%$ ）及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n = 94, 15.16\%$ ）。至於報導占比一成或以下的消息來源包含工會（ $n = 68, 10.97\%$ ）、記者描述（ $n = 59, 9.52\%$ ）、業者（ $n = 49, 7.90\%$ ）、環境檢警調等其他中央單位或個人（ $n = 40, 6.45\%$ ）及學術報告、法規條文或其他議題專業人士或個人（ $n = 25, 4.03\%$ ）。

本研究接著透過交叉分析，一探各報導框架多透過哪類消息來源以建構其論述（研究問題 2a）。由表 2 可發現在占比最高的「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中，構成其論述的消息來源排序前三名依序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接近四成（ $n = 124, 37.92\%$ ），「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n = 80, 24.46\%$ ）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n = 71, 21.71\%$ ），後兩者皆在兩成至兩成五間。

在比例次高的「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中，引述消息來源前兩名皆占四成左右，依序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n = 92, 43.60\%$ ）及「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n = 83, 39.34\%$ ）；而排序第三的「工會」則占兩成左右（ $n = 44, 20.85\%$ ）。

對比例第三高的「政府作為／治理」框架言，構成其主要論述的引述消息來源前三名依序為「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n = 29, 39.19\%$ ）、「議題（例如環保）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n = 24, 32.43\%$ ）及並列第三的「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與「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n = 20, 27.03\%$ ），這些消息來源皆占此框架整體報導的三成至四成間。

占比排序最後的「環保／生態」框架僅有八則，消息來源近四分之三引述自「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n = 6, 75.00\%$ ），「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也占了六成左右（ $n = 5, 62.50\%$ ），另有五成為「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n = 4, 50.00\%$ ）。

整體而言，《電業法》修法報導的消息來源種類算是多元，然因仍多透過與經濟相關的框架以建構，無論是「經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或「公平正義、分配均勻」，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不同的是，「經

表 2：《電業法》修法報導各框架的消息來源分布（%）

消息來源	經濟發展、效率、能源、 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 (<i>n</i> = 327)	公平正義、 分配均勻 (<i>n</i> = 211)	環保／生 態 (<i>n</i> = 8)	政府作為／ 治理 (<i>n</i> = 74)	各消息來源 占比 (<i>N</i> = 620)
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	24.46	8.53	0.00	20.27	18.39
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	37.92	43.60	50.00	27.03	39.03
臺電等議題相關國營事業單位或個人	12.84	18.00	12.50	13.51	15.16
環境檢警調等其他中央單位或個人	6.42	4.27	25.00	10.81	6.45
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	21.41	9.48	75.00	39.19	20.16
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	17.43	39.34	12.50	32.43	26.61
工會	5.81	20.85	0.00	6.76	10.97
業者或業者代表	9.17	8.05	0.00	1.35	7.90
其他非政府相關團體或個人	14.07	13.70	62.50	27.03	16.13
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	21.71	14.69	0.00	18.92	18.70
調查或學術報告、法規、政策、條文、其他媒體	5.20	2.37	12.50	1.35	4.03
純粹記者描述	12.23	5.21	0.00	10.81	9.52
整體百分比	188.67	188.09	250.00	209.45	193.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由於消息來源為複選題，故整體百分比超過 100%。

濟發展、效率、能源、電力供給或財益獲損」框架也仰賴其他官方或菁英消息來源，包括「中央首長、單位或個人」及「研究單位、學者、大學專業教授」，而「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另仰賴屬民間與勞方的消息來源，包括「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工會」。至於構成「政府作為／治理」框架的引述來源則較為多元，兼含官方與民間團體或個人。較為可惜的是，同樣涉及環境議題，《電業法》報導卻極少透過「環保／生態」框架論述之。

本研究接著比較《電業法》修法議題各媒體在報導框架上之異同（研究問題 2b）。經扣除僅有八則的「環保／生態」框架後之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的框架並無統計顯著上的差異， $\chi^2(14, 612) = 9.25, p = .815$ 。進一步將媒體分為主流、另類兩類再予以就報導框架進行交叉分析，也同樣無統計顯著的差異，

$\chi^2(2, 612) = 0.02, p = .991$ 。

四、科學報導增進公眾理解元素之檢定

研究問題三關切的是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其符合科學報導增進公眾理解元素的程度。這部分的分析以「日」為分析單位，試圖觀察同一媒體同日中所有報導如何呈現《電業法》修法相關議題，有效樣本為 394 日。比較各主流及另類媒體間的異同，從表 3 可發現，九成以上的報導均符合七項元素之檢定，除了「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一項有近一成（8.38%）不符合外，其餘六項均低於 1.00%，甚至完全無該問題，例如「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及「出現錯誤資訊」兩項。少數幾個有缺點的項目如在「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的項目中，僅《聯合》（1.18%）及《新頭殼》（4.35%）中各出現一則；「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中，也僅《環資》（3.85%）及《民報》（8.70%）各有一則及兩則報導有此問題；至於新聞中出現「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及「未經查證或沒有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的情形也僅各一則，皆出現於《民報》（分占 3.03%）報導中。

本研究將代表公眾理解程度缺點的七個題項得分予以加總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間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 $F(7, 216) = 2.00, p = .057$ 。本研究另將媒體區分為主流 vs. 另類兩類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也同樣沒有發現統計顯著結果， $F(1, 216) = 0.35, p = .556$ 。換言之，在增進公眾理解元素的缺點方面，各主流與另類媒體間並無多大問題，彼此間的差異亦不大。

五、科學報導增進公民參與元素之檢定

本研究最後關切媒體報導《電業法》修法議題時符合可增進公民參與的程度（研究問題四）。同樣是以「日」為分析單位，先檢視各主流及另類媒體報導的立場或觀點，即同日所有文章呈現的觀點是單一觀點、對立觀點還是多元觀點，而非指單一消息來源。如表 4 上半部所示，《電業法》修法相關整日報導超過一半是以單一觀點呈現（54.32%），其次是占近四成（38.07%）的多元觀點，以對立觀點呈現者不到一成（7.61%）。雖然本研究無法進一步以卡方檢定各媒體在觀點分布上的統計顯著差異，但除了《環資》，所有媒體同一天的整體報導立場均以單一觀點為多；偏泛藍意識形態的主流媒體《中時》則是所有媒體中對立

表 3：《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當日符合增進公眾理解元素之分布（%）

變項	《蘋果》 (n = 51)	《自由》 (n = 57)	《中時》 (n = 55)	《聯合》 (n = 85)	《風傳媒》 (n = 64)	《環資》 (n = 26)	《新頭殼》 (n = 23)	《民報》 (n = 33)	總計 (N = 394)
出現錯誤的資訊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									
是	7.84	7.02	10.91	7.06	9.37	19.23	8.70	00.00	8.38
否	92.16	92.98	89.09	92.94	90.63	80.77	91.30	100.00	91.62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未經查證或沒有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3	0.25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6.97	99.75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									
是	0.00	0.00	0.00	1.18	0.00	0.00	4.35	0.00	0.51
否	100.00	100.00	100.00	98.82	100.00	100.00	95.65	100.0	99.49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3.85	0.00	8.70	0.76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6.15	100.00	91.30	99.24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未有證據但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3	0.25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6.97	99.75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以上所有交叉分析細格中的期望觀察值小於 5 者超過 20%，故無法進一步進行卡方檢定。

表 4：《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當日對特定立場或觀點的論述形式分布 (%) ^a

立場或觀點	《蘋果》 (<i>n</i> = 51)	《自由》 (<i>n</i> = 57)	《中時》 (<i>n</i> = 55)	《聯合》 (<i>n</i> = 85)	《風傳媒》 (<i>n</i> = 64)	《環資》 (<i>n</i> = 26)	《新頭殼》 (<i>n</i> = 23)	《民報》 (<i>n</i> = 33)	總計 (<i>N</i> = 394)
單一	47.06	54.38	45.45	47.06	67.19	46.15	65.22	72.73	54.32
對立	9.80	7.02	12.73	8.24	6.25	3.85	4.35	3.03	7.61
多元	43.14	38.60	41.82	44.70	26.56	50.00	30.43	24.24	38.07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立場或觀點	主流 (<i>n</i> = 248)	另類 (<i>n</i> = 146)	總計 (<i>N</i> = 394)						
單一	48.39 ^b	64.38 ^b	54.31						
對立	9.27	4.79	7.61						
多元	42.34 ^b	30.82 ^b	38.07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chi^2(2, 394) = 9.95, p < .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表 4 上半部細格內期望觀察值小於 5 者超過 20%，故無法進一步進行卡方檢定。^b調整後的標準化殘差大於 1.96。

觀點比例最高者（12.73%）；至於多元觀點呈現比例，除了《環資》，基本上主流媒體比例均較另類媒體為高。本研究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所進行的卡方分析亦證實了此點，主流與另類媒體在報導的立場或觀點上有統計顯著差異， $\chi^2(2, 394) = 9.95, p < .01$ ；調整後的殘差分析則進一步顯示，主要差異來自另類媒體的單一觀點（64.38%）較主流媒體（48.39%）為高，而後者（42.34%）則較前者（30.82%）有較多的多元觀點，詳見表 4 下半部。

接著，我們以其他六項登錄「是」或「否」的公眾審議指標檢視《電業法》修法各媒體報導。表 5 中所列的前三項為正面陳述（即優點），後三項則為負面陳述（即缺點）。在優點部分，各媒體均無任何一則報導符合「強調公民或弱勢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符合其他兩項參與指標優點者則略超過二成，其中支持其論述立場的依據是否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一項的媒體差異則達統計顯著水準， $\chi^2(7, 394) = 16.62, p < .05$ 。進一步以調整後的殘差分析結果發現，主要差異來自另類媒體的《民報》與《新頭殼》，前者有超過三成五（36.36%），後者則完全闕如。儘管如此，我們可從《民報》2016 年 1 月 10 日一則報導內容略窺此類目論述的樣貌：某公眾人物指出，若《電業法》修正案 96 條法條通過，將使整個臺灣今後永世都「完全被臺電綁架，可能走上復辟核電之路，讓廢核僅剩口號」，另名反核大將則呼應「痛批小英政府根本不懂電，貿然修法誤國誤民」。上述消息來源負面質疑論述的提出，並未在新聞文本中有任何證據以為支持。至於是消息來源本身未提或媒體僅擷取其批評部分於新聞中，則不得而知。除此，在報導是否「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一項，卡方檢定顯示各媒體差異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chi^2(7, 394) = 6.87, p = .442$ 。

至於負面陳述的公眾議題審議指標中，所有《電業法》修法相關報導均無出現「針對有爭議議題，報導只包含單一觀點的消息來源，或僅是表面平衡」及「針對無爭議之議題試圖藉引述不同消息來源營造對立」兩項問題。而「整日報導僅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一項目則高達近六成（58.63%），除了另類媒體中的《風傳媒》（43.75%）與《新頭殼》（39.13%），其餘媒體均超過六成，然整體言，各媒體間仍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 $\chi^2(7, 394) = 11.77, p = .109$ 。

本研究接著將代表公民審議程度三個優點及三個缺點題項得分予以分別加總，再個別進行媒體間的比較。在優點部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間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 $F(7, 358) = 2.45, p < .05$ 。透過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則發現，主流媒體《蘋果》（ $M = 0.73, SD = 0.73$ ）與另類媒體《新頭殼》（ $M = 0.09, SD = 0.29$ ）間之差異達統計顯著水準，亦即《蘋果》比《新頭殼》的《電業法》

表 5：《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當日符合公眾審議指標之分布（%）

變項	《蘋果》 (n = 51)	《自由》 (n = 57)	《中時》 (n = 55)	《聯合》 (n = 85)	《風傳媒》 (n = 64)	《環資》 (n = 26)	《新頭殼》 (n = 23)	《民報》 (n = 33)	總計 (N = 394)
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支持立場									
是	29.41	17.54	23.64	15.29	28.13	26.92	0.00 ^a	36.36 ^a	22.34
否	70.58	82.46	76.36	84.71	71.88	73.08	100.00 ^a	63.64 ^a	77.66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hi^2(7, 394) = 16.62, p < .05$									
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									
是	33.33	19.30	29.09	23.53	23.53	23.08	8.70	24.24	24.11
否	66.67	80.70	70.91	76.47	76.56	76.92	91.30	75.76	75.89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hi^2(7, 394) = 6.87, p = .442$									
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 ^b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整日報導僅出現單一觀點消息來源									
是	60.78	64.91	65.45	61.18	43.75	69.23	39.13	54.56	58.63
否	39.22	35.09	34.55	38.82	56.25	30.77	60.87	45.45	41.47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chi^2(7, 394) = 11.77, p = .109$									
只包含單一觀點的消息來源，或僅是表面平衡 ^b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針對無爭議之議題試圖營造對立 ^b									
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a 調整後殘差分析的絕對值大於 1.96。^b 由於交叉分析細格中的期望觀察值小於 5 者超過 20%，故無法進一步進行卡方檢定。

修法報導有更多可增進公民議題審議優點（見表 6）。另在缺點部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則無發現各媒體之間有統計顯著差異， $F(7, 230) = 1.03$ ， $p = .410$ 。

本研究同樣將媒體區分為主流與另類兩類，再就上述的公民審議程度優缺點各進行一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而分析結果均顯示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優缺點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公民審議程度優點： $F(1, 358) = 0.01$ ， $p = .938$ ；公民審議程度缺點： $F(1, 230) = 2.12$ ， $p = .147$ 。

伍、結果摘述與討論

一、結果摘述

本研究關注作為對常民百姓傳遞重要資訊及溝通科技政策重要管道的大眾媒體，是如何再現重啟修法的《電業法》相關論述，藉以再思其在增進公眾理解與公民參與重要科技政策上的利基／困境。透過內容分析《電業法》修法期間各四家主流及另類媒體共 625 則的報導或評論，本研究發現各媒體相關報導所占比例差距甚大，主流與另類媒體的報導量多寡並無固定趨勢，雖然除了《風傳媒》外，基本上皆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量多於另類媒體。

由於《電業法》修法具有爭議性質，故報導主軸近半聚焦於批評，其次才是有關《電業法》的內容。何以《電業法》修法報導主軸以批評類居多，可從新聞論述針對電業自由化的討論中看出。例如對於電業自由化的定義，本研究所分析的新聞媒體多引述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所發布的「《電業法》修

表 6：《電業法》修法報導各媒體符合公眾議題審議優點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N = 358$ ）

新聞媒體	<i>M</i>	<i>SD</i>	Bonferroni 法事後檢定
《蘋果》（ $n = 44$ ）	0.73	0.73	《蘋果》>《新頭殼》*
《自由》（ $n = 52$ ）	0.40	0.60	
《中時》（ $n = 52$ ）	0.56	0.70	
《聯合》（ $n = 76$ ）	0.43	0.68	
《風傳媒》（ $n = 60$ ）	0.55	0.72	
《環資》（ $n = 21$ ）	0.62	0.81	
《民報》（ $n = 31$ ）	0.65	0.76	
《新頭殼》（ $n = 22$ ）	0.09	0.29	
$F(7, 358) = 2.45, p < .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p < .05$

正草案」簡報，然新聞論述在定義電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為批評點，而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另如 2017 年 1 月 9 日的《民報》則透過旅日作家劉黎兒以公眾角度對政府作為提出質疑，例如財團壟斷、電價上漲等，此時自由化定義的闡述主要為批評政府違背初衷的鋪陳：「電業自由化基本是就要將包山包海的綜合電業的臺電，拆解為公營發電業、輸配電業及售電業三大塊，但『臺電電業法』不但把拆解延後多年……，拆解本身也成騙局」。除此，特定另類媒體分別有比例最高的修法內容（例如《新頭殼》）及批評類（例如《民報》）主軸，這些媒體的政治立場均為偏綠營；而特定偏藍營主流媒體（例如《中時》）則有比例最高的抗議或爭執類主軸，也因此其論述呈現有最高比例的對立觀點。除此，主流與另類媒體以及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在內容主軸及觀點分布上並無系統性的差異。

在新聞框架部分，比例最高者為超過半數的「強調發展、效率、能源或電力供給」框架，其次為略超過三分之一的「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框架；「政府可信度或效能」與「環境／生態」框架的比例皆不到兩成。上述結果從消息來源的分布來看則不意外：整體而言，接近四成之「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為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其次分別為比例介於兩成至三成間的消息來源有「議題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及「政府立法單位或民意代表」，其餘消息來源皆低於兩成。

檢視整日所有報導議題的基本及背景知識、連結公眾對議題的理解及參與元素，儘管所有新聞均無出現錯誤資訊、使用消息來源超越其權責或專業範圍的引述、或消息來源引述不平衡等問題；僅分別有一則出現沒證據卻出現誇張或聳動的用詞、未經查證或沒有有效證據的因果推論或斷章取義；除兩則外，無消息來源身分交代不清的問題；整體報導多為引述消息來源引述之堆砌或缺乏記者彙整或結尾僅有三則；呈現對立觀點與出現艱澀難懂專業術語而未見解釋意涵者也分別占一成不到。然所有媒體也並無強調公民或弱勢群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明確針對特定對象應有作為提出建議者則略超過四分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媒體論述立場的支持多非以事實或證據為主，僅占四分之一不到；而另類媒體之間的差異高於主流媒體之間。此很明顯地反映在《民報》與《新頭殼》二媒體上。雖然兩者同屬偏綠營政治立場，但分開看，《民報》報導主軸在於對《電業法》的批評，而《新頭殼》則多在《電業法》的內容。兩者在增進公民參與之審議元素上的差異，也反映在《民報》有較高比例的論述立場是以證據或事實為基礎，《新頭殼》則完全無。

二、討論與研究意涵

綜合上述分析，並對照研究者過去參與觀察各項會議過程中所釐出的《電業法》論述內容與面向，本研究發現當今新聞媒體作為提供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政策的管道，存在以下局限。

（一）行禮如儀的政策報導方式，雖無大缺失，卻也難引發公民參與

《電業法》的修法過程曾被評為缺乏詳細淺顯的解釋，使得一般民眾不易參與此重大影響民生的政策，也無足夠的凝聚力可影響政策，只能仰賴環保團體和學者監督（張博倫，2016年11月27日）。除此，相較於各新舊能源如核能、燃煤、太陽能、風能等的興衰與優劣多能引取社會關注及討論，在此能源轉型版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版《電業法》，卻因修法內容的複雜及修法結果的不確定，使得民眾難以一窺修法精要（環境資訊中心，n.d.-a）。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此議題在媒體報導中的能見度並不低，在公共領域中也有相當的討論。然基於其媒體再現方式，使得即使廣為討論，也不容易增進公民參與。除了報導論述完全無「強調公民或弱勢團體，使其意見被報導及重視」，相關論述因多透過「強調發展、效率、能源或電力供給」或「強調公平正義、分配均勻」的經濟框架予以建構，使得經濟相關政府單位或個人不免成為最大宗的消息來源，甚至高出排序第二的相關民間或社會團體、基金會甚多。由此，代表公民或弱勢團體的聲音難免被削弱。

（二）傳統新聞報導模式導致複雜如科技政策，仍過度依賴現場報導的論述再現，包括偏重現場發言的消息來源論述邏輯

我們從議題主軸的分析可看出，雖然整體有四成五比例著重在《電業法》的內容，但卻有更高的比例是針對修法的批評／（選舉）政見，除《新頭殼》僅占近二成外，其他媒體均至少有近五成到六成左右的比例。例如新聞論述在定義電業自由化時，多藉《電業法》修法的爭議條例作為鋪陳，並藉消息來源的引述作為批評點，並非著重在修正草案的內容。此類新聞不少來自公聽會的現場報導，透過與會者對相關議題立場的發言，展現出來的便是多所批評。

從新聞內容分析結果觀之，這主軸分布差異與媒體的政治意識形態較無系統性的關聯。基於一般新聞所謂客觀平衡報導的常規，有關電業自由化影響的電價面向負面論述甚至會透過引述匿名網友的報導，作為爭議性內容的平衡，然如此

引述則涉及消息來源可信度的問題。也因為過度仰賴事件或活動現場的描述，特別是透過活躍消息來源的引述，即使抗爭主軸非報導絕大比例，但臺電工會以質疑電業自由化為名反對臺電民營化的論述，卻透過消息來源的引述被轉移成電價上漲的風險，模糊掉了整體電業自由化可帶給公眾的利益。換言之，臺電員工的工作權益取代了電業自由化對其他公眾利益的討論。

若從增進公眾理解與參與的角度切入，我們需要透過媒體對政策的制訂或改變有更深入的彙整與分析，方能瞭解在公聽會中各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s）的訴求與攻防及其背後涉及的宣稱，與綠能轉型等重要政策轉向有何關聯？而非僅是將兩造衝突（例如臺電與環保團體）呈現而不議，甚至反而強調兩造或多方利害團體間對電力市場自由化開放與否的衝突。由此，對一涉及科技風險政策如此複雜的《電業法》修法議題言，我們需要的是更多非現場活動的深度報導。

（三）另類媒體的加入，並未大幅度深化科技政策報導的內涵與面向

相對於主流媒體，另類媒體或被視為以推動整體社會進步為目標（管中祥，2014 年 6 月 26 日）。雖然過去國內有關環境風險報導的相關研究發現另類媒體多能針對議題提供較為深入與多元的訊息與觀點（林佳弘，2014；張傳佳，2013），但本研究卻未發現另類媒體系統性地凸顯其不同於主流媒體的特色。易言之，所有媒體報導主軸多聚焦於批評，論述立場支持也均非以事實或證據為主。除此，就同一日立場形式言，另類媒體的立場雖較少對立觀點，但其單一觀點卻高於主流媒體，多元觀點也少於主流媒體。觀點的過於單一，誠如 Palenchar & Heath (2007) 所言，將使人們對議題的感知框限在確定的狀態，不再為了尋解答的知識而進行深思審議及討論。易言之，由於另類媒體的加入並無提供議題報導更多元的觀點，進而無助於增進公民對議題的參與。

上述特色也點出了另類媒體投入科技政策爭議報導，其特色似多在著重形式上的多元。例如前述提及《民報》與《新頭殼》的差異，比較此二另類媒體的成立宗旨發現，《民報》志在從多元的角度分析、評論，深入思考臺灣共同的命運；《新頭殼》經營初期採社會企業模式，結合關注社會議題的公民記者，推動閱聽大眾擁有近用媒體的權利，然由於無法找到可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新頭殼》於 2016 年底停止營運（陳宛茜，2016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3 月底由社會企業轉型為獨資企業（何醒邦，2017 年 3 月 28 日）。由此觀之，在創辦初期具另類媒體宗旨的網路原生媒體，亦可能因其商業模式及後續的經營變化，使得議題

內容展現特色與其他另類媒體有差異。

（四）科技政策報導的經濟框架傾斜，使得環境及其他面向難以凸顯

儘管《電業法》修法意味解決碳排減量及能源轉型等環境問題，相關報導極少透過環境框架論述之，而是仍大量集中在經濟層面，無論是強調效率或公平分配。雖修法涉及廠網分離，臺電員工福利、電價上漲等投資與勞工福利問題，經濟框架主導可以理解；然環境框架低至一成左右，則不免過於低估環境與能源轉型之關聯，也可能使得環境框架中意涵公眾利益部分被犧牲。

媒體框架化與民眾的認知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呢？Scheufele & Scheufele (2010)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媒介透過特定方式對一個議題進行框架，將使得閱聽人的某些基模（schemas）比其他基模更具「可近性」（accessibility）與「適用性」（applicability），因而影響態度、決策及情緒。此過程對常民而言尤為顯著，因常民對科技的理解不同於專家所強調的明確、正式與科學性的解釋等理性分析，反而多植基於文化常識、社會共享經驗或個人觀察的心理反應（Furnham, 1988, pp. 1-21），有時甚至會將感覺放在第一順位（Lorenzoni, Nicholson-Cole, & Whitmarsh, 2007; Lundgren & McMakin, 2009, pp. 11-22）。過去無論是國外有關再生能源報導分析，包括美國（Delshad & Raymond, 2013）、西班牙（Heras-Saizarbitoria, Cilleruelo, & Zamanillo, 2011）、瑞典及挪威（Skjølsvold, 2012）等地，或是臺灣有關核電發展政策的語言框架差異比較（徐美苓、施琮仁，2015），均證實了此點。

來自傳統燃煤、天然氣、核能及如水力、太陽、風力等再生能源的電力，每一項都會影響環境，公眾希望使用什麼樣的電力也與《電業法》修法有關。因此，當修法的環境面向被忽略，例如所訂定「電力排碳係數」的限制，是否真能藉由低碳的清潔能源以有助能源轉型等，若不見新聞論述多著墨討論，公眾對此議題的認知也就很容易框限在由其他利害團體所強調的電價、電力供應、電業市場結構等經濟優先面向。

總結本研究，作為一個傳播研究者，研究者深信並非表面上有媒體與閱聽眾高關注度的議題，方是值得分析的課題。有時一些因為種種因素被媒體或其他利害相關者瑣碎化的議題，冰山之下更有值得探究之處。誠如本研究緣起與相關文獻中所強調，研究者選擇《電業法》修法作為分析主題，乃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決定，也是延續氣候變遷及再生能源建構相關研究的不可或缺及需要持續蒐集

資料的主軸。易言之，《電業法》修法乃攸關臺灣能源轉型的重要政策，與公眾息息相關。從公眾參與科技風險決策角度觀之，作為傳遞資訊及維護公共利益重要管道的媒體，並未善盡增進公眾參與議題的角色，無怪乎表面上呈現的《電業法》修法議題，是一公眾參與門檻很高的課題。若能讓民眾體認到《電業法》是含不確定特質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民眾或可避免每每遇見相關議題便認為自己因科學知識上的局限而卻步，最後逐漸陷入沉默螺旋，而將所有決定權拱手於專家（黃俊儒、簡妙如，2010）。

最後，《電業法》修法作為一個靶子，可延伸出不少子題於公共論述中，包括媒體報導在內。除此，對應公眾對議題的理解與參與，Pezzullo & Cox (2018, pp. 11-28) 指出公眾對環境議題的參與包括對議題的知曉、關切與參與動機，公眾對環境議題相關資訊的近用與獲知權利、對負責單位的評論，以及透過法律對相關單位要求問責的權利等。未來相關研究尚可透過對媒體再現質量化的剖析及相關議題公眾意見資料的蒐集，點出科技風險政策公眾參與充足與不足之處，並可提供未來相關新聞實務工作及新聞教育工作的推動，例如規劃如何採訪及報導環境議題或政策。換言之，透過層層剖析，《電業法》修法新聞論述與社會政治相互映照，可點出作為風險社會下新聞媒體所需扮演的角色。

參考書目

- Chris (2016 年 9 月 1 日)。〈【那些老人不知道的新媒體】風傳媒營運長溫芳瑜：網媒不但內容為王，還要深度結合技術、即時呼應社群！〉，《INSIDE》。
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1782-intel-data-centric-2020>
- Newtalk 新聞網 (n.d.)。〈關於我們〉。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newtalk.tw/about>
- 王京明 (2016)。〈電業法修正與綠能發展〉，《經濟前瞻》，166：20-23。
- _____ (2018)。〈我國第一階段電力改革綠能先行政策的期中檢討〉，《經濟前瞻》，179：68-74。
- 王慶 (2014)。〈媒體歸因歸責策略與被「霧化」的霧霾風險——基於對人民網霧霾報導的內容分析〉，《現代傳播》，12：37-42。
- 李子甜、徐美苓 (2020)。〈《人民日報》霧霾新聞框架建構 (2011-2017)〉，《新聞學研究》，142：59-109。[http://doi.org/10.30386/MCR.202001_\(142\).0002](http://doi.org/10.30386/MCR.202001_(142).0002)

- 呂怡貞（2012 年 9 月 14 日）。〈臺大公共論壇：臺灣再生能源蘊藏量評估〉，《科學人》。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easylearn&id=2040>
- 何醒邦（2017 年 3 月 28 日）。〈【獨家】府方關切網媒熄燈 電競新貴入主《新頭殼》〉，《上報》。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4028
- 林佳弘（2014）。《臺灣石化產業環境影響評估報導之分析——以國光石化及六輕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光蓉（2016 年 12 月 26 日）。〈《臺電電業法》過關，未來綠電不行，空污紫爆連年〉，《Facebook》。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omlovestaiwan/posts/898996276902627/>
- 徐美苓（2015）。〈新興環境議題的媒體建構：以臺灣替代能源新聞報導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32：19-57。
- 徐美苓、施琮仁（2015）。〈氣候變遷相關政策民意支持的多元面貌〉，《中華傳播學刊》，28：239-278。 <http://doi.org/10.6195/cjcr.2015.28.07>
- 徐美苓、楊意菁（2011 年 7 月）。〈科技風險與全球暖化報導品質分析〉，論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臺灣，新竹。
- 高銘志（2013）。〈福島核災後我國再生能源最大化政策之實現——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修正芻議〉，臺灣環境法學會（編），《21 世紀環境國家新挑戰》，頁 189-256。臺北：元照。
- 陳文姿（2016 年 10 月 24 日）。〈《電業法》修法吵什麼？帶您一次看懂六大爭議〉，《環境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200545>
- （2018 年 8 月 8 日）。〈「躉購」係啥？專訪綠電保證收購制度創始人 深度解析〉，《環境資訊中心》。上網日期：2020 年 3 月 41 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ode/213314>
- 陳永興（2019 年 3 月 20 日）。〈陳永興醫師給股東們的一封信〉，《民報》。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peoplenews.tw/declaration>
- 陳宛茜（2016 年 11 月 30 日）。〈新頭殼確定熄燈！胡元輝：對網路獨立媒體不悲觀〉，《聯合影音網》。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6 日，取自 <https://video.udn.com/news/604124>
- 許志義、王京明、黃鈺愷（2015）。〈我國電業自由化違反競爭法行為態樣之探

討》，《公平交易季刊》，23（4）：1-34。

張博倫（2016 年 11 月 27 日）。〈電業自由化打開電力市場〉，《喀報》。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0085?issueID=633>

張傳佳（2013）。《獨立／主流媒體的環境報導——以國光石化開發案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黃廷宜（2008 年 5 月）。〈高科技政策中的風險溝通——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為例〉，論文發表於「2008 TASPAA 夥伴關係與永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臺中。

黃俊儒、簡妙如（2006）。〈科學新聞文本的論述層次及結構分布：構思另個科學傳播的起點〉，《新聞學研究》，86：135-170。

——（2010）。〈在科學與媒體的接壤中所開展之科學傳播研究：從科技社會公民的角色及需求出發〉，《新聞學研究》，105：127-166。[http://doi.org/10.30386/MCR.201010_\(105\).0004](http://doi.org/10.30386/MCR.201010_(105).0004)

黃惠萍（2005）。〈審議式民主的公共新聞想像：建構審議公共議題的新聞報導模式〉，《新聞學研究》，83：39-81。

經濟部（2016 年 10 月 24 日）。〈一張圖看懂電業法改什麼〉，《經新聞》。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economic-news.tw/2016/10/one-photo-electric-industry-law.html>

經濟部能源局（2008 年 6 月 5 日）。〈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2795

——（2016 年 10 月 20 日）。〈電業法修正草案總說明〉，《電業法修正專區》。上網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electricitylaw.tier.org.tw/1050726%E9%9B%BB%E6%A5%AD%E6%B3%95%E4%BF%A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E6%96%87.pdf>

——（2018 年 12 月 5 日）。〈經濟部依中選會公告之公投結果 公告電業法第 95 條第 1 項失其效力〉。上網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取自 http://www.topsolar.org.tw/show_news.php?PID=345

管中祥（2014 年 6 月 26 日）。〈另類媒體的生存〉，《獨立評論 @ 天下》。上網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1565>

- 臧國仁（1998）。〈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傳播研究集刊》，3：1-102。http://doi.org/10.6334/CRM.1998.3
- _____（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臺北：三民。
- 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2015年7月17日）。〈電業法修正：能源民主最後一里路〉。上網日期：2019年4月1日，取自 http://taiwanrena.blogspot.tw/2015/07/blog-post_17.html
- 劉淑娟（2001）。《加速再生能源市場化之分析——以太陽光能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長展（2016年10月23日）。〈電業自由化吵什麼〉核終黃士修：反對民進黨假藉自由化裂解臺電〉，《沃草國會無雙》。上網日期：2019年4月1日，取自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WLAecc6Jb5tm1LEHtWRv>
- 謝君蔚、徐美苓（2011）。〈媒體再現科技發展與風險的框架與演變：以基因改造食品新聞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0：143-179。https://doi.org/10.6195/cjcr.2011.20.07
- 謝瀛春（1991）。《科學新聞的傳播：理論與個案》。臺北：黎明。
- 環境資訊中心（n.d.-a）。〈邁向新電業法〉。上網日期：2019年4月1日，取自 <http://e-info.org.tw/taxonomy/term/46235>
- _____（n.d.-b）。《環境資訊電子報》。上網日期：2019年4月1日，取自 <https://e-info.org.tw/newspaper-calendar>
- 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7日）。〈綠能卡在哪？原來我們的電業法已經超過五十年〉。上網日期：2019年4月1日，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61217/Q5ZSNMXNDPARCWLLOPGTLLKEDM/>
- Aitken, M. (2009). Wind power planning controvers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xpert' and 'lay' knowledges. *Science as Culture*, 18, 47-64. https://doi.org/10.1080/09505430802385682
-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Boykoff, M. T. (2007). Flogging a dead norm? Newspaper coverage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from 2003 to 2006. *Area*, 39, 470-481. https://doi.org/10.1111/j.1475-4762.2007.00769.x

- Corbett, J. B., & Durfee, J. L. (2004). Testing public (un)certainty of science: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global warm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26, 129-151. <https://doi.org/10.1177/1075547004270234>
- Delshad, A., & Raymond, L. (2013). Media framing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biofuel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30, 190-210. <https://doi.org/10.1111/ropr.12009>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1993.tb01304.x>
- Furnham, A. (1988). *Lay theories: Everyday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NY: Pergamon Press.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1-37. <https://doi.org/10.1086/229213>
- Heras-Saizarbitoria, I., Cilleruelo, E., & Zamanillo, I. (2011). Public acceptance of renewables and the media: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PV solar experience.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15, 4685-4696. <https://doi.org/10.1016/j.rser.2011.07.083>
- Hsu, M.-L. (2008, July). *Evaluating the news coverage of dioxin-related risks in Taiwan: Quality and barri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ockholm, Sweden.
- (2019, July). *News framing, argument type and public engagement in rooftop solar energy: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experiment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drid, Spain.
- Irwin, A., & Michael, M. (2003). *Science, social theory and public knowledge*.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A. J. (2016). *Science, risk, and polic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evi, R. (2001). *Medical journalism: Exposing fact, fiction, fraud*. Ames, IA: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Linder, S. H. (2006). Cashing-in on risk claims: On the for-profit inversion of signifiers for “global warming.” *Social Semiotics*, 16, 103-132. <https://doi.org/10.1080/10401610600571111>

org/10.1080/10350330500487927

- Lorenzoni, R., Nicholson-Cole, S., & Whitmarsh, L. (2007). Barriers perceived to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mong the UK public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7*, 445-459.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07.01.004>
- Lundgren, R. E., & McMakin, A. H. (2009). *Risk communica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ealth risks*. Hoboken, NJ: Wiley.
- McComas, K., & Shanahan, J. (1999). Telling stories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narratives on issue cycl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30-5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99026001003>
- Nisbet, M. C. (2010). Knowledge into action: Framing the debates over climate change and poverty. In P. D'Angelo & J. A. Kuypers (Eds.), *Doing news framing analys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 43-8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Nisbet, M. C., Brossard, D., & Kroepsch, A. (2003). Framing science: The stem cell controversy in an age of press/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8*(2), 36-70. <https://doi.org/10.1177/1081180X02251047>
- Nisbet, M. C., & Hume, M. (2007). Where do science debates come from? Understanding attention cycles and framing. In D. Brossard, J. Shanahan, & C. Nisbet (Eds.), *The public, the media,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pp. 193-230). Cambridge, MA: CABI. <https://doi.org/10.1079/9781845932046.0193>
- Palenchar, M. J., & Heath, R. L. (2007). Strategic risk communication: Adding value to society.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4*, 120-129.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6.11.014>
- Pezzullo, P. C., & Cox, J. R. (2018).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5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atzan, S. C., & Meltzer, W. (2005). State of the art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Past lessons and principles of practice. In M. Haider (Ed.), *Global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pp. 321-347). London, UK: Jones and Bartlett.
- Revkin, A. C. (2007). Climate change as news: Challenges in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J. F. DiMento & P. Doughman (Eds.), *Climate change:*

- What it means for us,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pp. 139-160). New York, NY: MIT Press.
- Scheufele, B. T., & Scheufele, D. A. (2010). Of spreading activation, applicability, and schemas: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and their oper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measuring frames and framing effects. In P. D'Angelo & J. A. Kuypers (Eds.), *Doing news framing analysi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pp. 110-13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kjølsvold, T. M. (2012). Curb your enthusiasm: On media communication of bioenergy and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technology diffusi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 6, 512-531. <https://doi.org/10.1080/17524032.2012.705309>
- Slovic, P. (2000).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UK: Earthscan.
- Tulloch, J., & Lupton, D. (2003). *Risk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Sage. <http://dx.doi.org/10.4135/9781446216392>
- Van Gorp, B. (2007). 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60-78. <https://doi.org/10.1111/j.0021-9916.2007.00329.x>
- Wilkins, L., & Patterson, P. (1987). Risk analy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7(3), 80-92.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1987.tb00996.x>
-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13).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10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Wynne, B. (1992).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 281-304. <https://doi.org/10.1088/0963-6625/1/3/004>

Media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blic: The Case of Revising the Electricity Act in Taiwan

Hsu, Mei-Ling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the revision of the Electricity Act in Taiwan in 2016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presentations of certain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 that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of the issue. It was found that news stories focused more on criticisms than on the issue itself. Regardless of subject matter, little was based on evidence and facts. The news discourse was also framed economically, focusing either on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or on fairness and distributional justice. Little news discourse was framed environmentally. Economy-related sources were also used frequently. Generally, the news stories meet the criteria examining the mechanisms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aspect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e study did not find mainstream media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alternative media in terms of civic engagement elements, but the former revealed more varied perspectives than the latter. Some mainstream media were also found to demonstrate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elements that could increase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revision process of the Electricity Act than specific alternative media. Finall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civic engagement, public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policy, news representation, Electricity Act

* Email: mlshiu.mlh@gmail.com

Received: 2019.8.20

Accepted: 2020.9.4

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的官方論述策略 *

顏瑞宏 **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旨在檢視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活動，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採取何種論述策略來傳達政治意圖。研究以講稿為文本，運用批判論述分析中的論述歷史取徑，考察文本中的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與意識形態操作。研究發現，論述形構為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及鬥爭重建秩序；主要以政黨為召喚對象，中國人民及臺灣均在論述裡「被消失」，最強烈的他者則是美國。習近平的反美演說動員了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民本思想及全球化論述等；港臺布局上則提出團結與和平框架，向民主制度進行鬥爭。而在鞏固政權的期待中，講稿內容則以虛假關係等四類論證策略來扭曲歷史，並藉著去價值化、去協商化、去延續性及再主權化的論述策略來建構所需的意識形態。

關鍵詞：閱兵、論述策略、批判論述分析、論述歷史取徑、意識形態

* 作者感謝銘傳大學倪炎元教授、世新大學胡光夏教授及國防大學傅文成副教授對研究方法、研究創意的啟發與指導；亦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斧正，惟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 Email: gnufather@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11 月 7 日

壹、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201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建政70週年，中共自稱為「建國」¹，當日在天安門前舉行閱兵活動。官方指出，與國慶50週年、60週年與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等閱兵相較，此次規模相對盛大（孟祥夫，2019年8月30日）。活動由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親自主持，但客觀環境卻是自其擴大集權以來最複雜的一次，內有經濟成長停滯及香港「反送中」運動方興未艾之憂，外有中美貿易對抗、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衝突、兩岸情勢險峻之患。

這樣困境主要是由中美貿易戰所形塑，並提升為全面性的經濟戰爭，涵蓋金融、貨幣、科技及外交等領域。經濟上開始出現滑坡，2019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下探6.0%，創27年來新低紀錄；同年9月對美出口較2018年同期銳減22%，疲軟之勢連帶拖累製造業與外資活動，進口則呈連續緊縮（Bradsher, 2019, October 17）；對全球貿易順差總體雖較2018年增加20.1%，但對美順差下降8.5個百分點（Agence-France Presse, 2020, January 14）。此外，中共當局在經濟上的宏觀調控開始面臨更大風險，因為美國政府已全面指控中國企業竊取商業科技機密，開始加強風險審查，並將先進製造、輕量化武器、人工智慧等27項科技行業列入審查範圍，劍指「中國製造2025」（顏慧欣，2019）。

而在香港問題上，港人藉反送中示威，對中共現有體制發出挑戰。隨著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 1963–）會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後，香港瞬間成為中美雙方在國家主權、政治制度、人權治理及民族主義等多個方面的角力場（Tao, 2019, July 13）。臺灣方面，在中美貿易戰及印太戰略催化下，通過美國對臺軍售的臍帶，近年來已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壓迫中共的關鍵節點（李宗憲，2019年6月7日）。這讓中共的對臺政策備受質疑，除內部民意有所怨懟外，兩岸關係也從「冷和」走向「冷對抗」（龔祥生、劉姝廷，2019）。

整體而論，經濟下行與港臺問題，激化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對中共體制和習近平政權的穩定性造成衝擊。而美國要求中共將市場開放、核查及透明制度法律化，在習近平看來，這將對共黨專政體制形成挑戰（Friedman, 2019, August

1 1949年中共建政，當時播遷臺灣的國民政府將其稱為「僭政」；爾後依據兩岸分治的事實而以「建政」稱之。就兩岸現勢而論，屬於中性語彙；中共則認為「建國」，主張現代中國是其於1949年所建立之「新中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僭政」、「建政」與「建國」等不同用語的揀擇，可以體現兩岸對中國史觀與繼承法統認知的差異，同時也凸顯了彼此在國際身份上的話語權爭奪。相關考證與討論可參閱辛灝年（2015）、葉駿（2019年10月3日）對這些詞彙承載史觀的辯證與論述。

27)。進言之，中美對抗屬於雙方內在矛盾自然升級的結果，牽扯了國家主權、經濟利益、政治體制、民主觀念等層面的衝突。

在這樣的環境下觀察中共閱兵活動甚具意義，因為閱兵將是習近平回應中美對抗形勢的論述場域。閱兵是威權國家的產物，旨在傳達主政者的政治意圖，是考察集權國家政策發展的指標。中共是標準的威權政體，習近平於 19 大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後，更加牢固了黨和自身的集權體制。因此，習近平在國慶閱兵典禮上的正式講話，即是政治訊息的製造與宣傳，亦是面向各方的權力對話及宣示，能夠作為觀察其政治意志與政策方向的有效標的。

目前有關中共的政治或政策研究，多數都偏重在國家安全戰略、國家發展戰略、政策評估、黨政軍關係、軍力發展及派系權鬥，較少探討領導人的公開論述。部分從官方會議切入的研究，多會受到會議屬性的影響，局限了研究的關照層面。研究主題甚少聚焦於大型閱兵這類題材，而閱兵卻是中共對內部、兩岸及國際社會均具指標性意義的論述場域。進言之，習近平在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公開講話，展示了內部治理、兩岸關係及涉外事務的政策路線與意識形態，這些論述等同中共黨國體系的複製，承載了論述語境的使命、價值觀、世界觀與意識形態 (Weiss & Wodak, 2003)。為考察中共當局在內外交迫形勢下的政策重點與方向，本研究嘗試從論述策略視角，分析習近平閱兵演講，循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途徑，檢視習近平採取何種策略、編組來傳達政治意圖，並揭露其如何操作意識形態，藉以回答幾個問題：一、中共官方以何策略來形構論述？二、操作論述謬誤的策略與目的為何？三、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建構策略為何？

貳、閱兵論述的儀式觀與中共閱兵歷史的流變

一、閱兵儀式與傳播的儀式觀

閱兵儀式是一個有組織、有意義的符號象徵體系，這些符號及論述宣揚了官方意欲塑造的集體價值觀與精神。藉由刻意安排的隆重儀典、激情橋段，以及各種儀節控制所形成的通過儀式 (rites of passage)，讓群眾專注於特定的思想、價值觀與情感對象，經歷分離 (separation)、闖限 (limen) 及聚合 (aggregation)，循「結構—反結構—結構」過程，融入閱兵儀式再造的時空中，並從中獲得新身分，再以此回到現實社會，透過社會實踐再為閱兵儀式強化社會結構與秩序 (林柏州, 2009; Turner, 1995; van Gennep, 1909/1961)。這種交融 (communitas)

關係能誘發歷史記憶與情感，使其併同儀式被牢記（李華君、竇聰穎、滕姍姍，2016），從而鞏固社會共識、政治認同與群體團結，聚變出對未來某種時刻的集體想像（王海洲，2008），為眾人提供政治方向及更大的歸屬共同體，民族與國族認同的建構於焉實現 (Nash & Scott, 2001)。

閱兵是對武裝力量進行檢閱的軍事儀式，同時也是一種儀式性傳播 (ritual communication)，能夠有效傳達或模塑共識與文化價值。整個閱兵操演過程就是國家機器製造和供給政治訊息的生產流水線（王海洲，2009），亦即通過特定論述對參演官兵、民眾，以及從媒體接收訊息的受眾，在認知、態度與行為上形成制約，讓閱兵成為強化或重溫集體記憶的記憶點 (memorial point)，而官方精心設計的論述則會轉化成民眾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林柏州，2009；Chang, 1997）。Larsen (2000) 也表達了類似看法，認為媒體在儀式性的傳播過程中扮演著煽動者 (instigators) 角色，會在大眾間建立起共享的情緒或精神狀態，藉以組織觀者、參與者的注意力及行為，從而協助構成儀式。

從上述討論可以掌握儀式的基本特質與作用。儀式具社會性，目的在使個人融入團體，並圍繞著一個神聖的組織或象徵性符號去聯繫彼此與展開互動 (Larsen, 2000)。這樣的交融過程可區分為自發性 (spontaneous)、意識形態 (ideological) 及規範性 (normative) 三種類型：自發性交融是指打破人類識別 (human identities) 的結構性界線，通過神秘參與感的相互聯繫，對儀式當下表現自我的人給予直接認同；意識形態交融係在複製自發性交融的互動經驗，藉儀式把人們聚集起來，使其重拾、共享集體記憶，從而完成認同或救贖；規範性交融則是促進交融的基礎，訴諸儀式中正式、強制的共識來凝聚個體間關係，並使其與團體連結，從而鞏固、延續社會系統 (Schechner, 2002)。

然而，將閱兵儀式及其論述視為一種傳播形式來看待，主要是基於儀式傳播的概念，但要理解閱兵儀式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有必要以傳播儀式觀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作為理論指引，以考察閱兵論述的相關傳播活動。

傳播儀式觀由美國文化研究學者 James W. Carey 所提出，他將傳播觀區分為傳遞觀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及儀式觀 (Carey, 1992)：傳遞觀基於功能主義、行為主義與效果研究的典範，指涉將訊息傳授 (imparting)、傳送 (transmitting) 或發送 (sending) 給他人的過程，具有地理和運輸上的隱喻 (metaphor)，傳播被視為出於控制目的的技術、過程與社會行為；儀式觀源自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基於庫利 (Charles H. Cooley) 的自我控制、米德 (George H. Mead) 的符號理論、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的場景社會學，以

及文化研究的典範，指一種吸引人們以共同體或集體身分聚集起來的神聖儀典，亦是一個現實得以生產（produced）、維繫（maintained）、修正（repaired）與蛻變（transformed）的符號過程，具有儀式、神話的隱喻，傳播則被理解為在時間上對社會秩序的維繫、建構與延續。

與傳遞觀不同，儀式觀重視傳播對維持身分認同及社會關係的過程（樊水科，2011）。儀式觀認為，傳播活動並非通過傳送者的控制來發揮作用，其路徑在於群眾的神秘參與、共享文化、自我控制，以及彼此就儀式秩序（ceremonial order）所進行的相互約束（劉建明、徐開彬，2015；Goffman, 1957; Schechner, 2002）。Rothenbuhler (1998) 亦指出，儀式的過程與作用係建立在「儀式即傳播，傳播即儀式」觀點上，任何形式的儀式都是具有規範性的傳播機制，能夠約束參與者自律守規，而人們會在參與過程中構建自我、共享信仰。

依此觀點來理解閱兵論述，即可掌握在新媒體科技影響下，即便中共的宣傳控制屢受挫折，但其意識形態何以始終未被西方「顏色革命」所終結。換言之，看待中共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須從傳播儀式觀出發，人們藉由共同理想的投影，以及對中共展示的物質形式體現，在社會中產生出人為（artificial）的真實符號體系，其作用不僅止於提供資訊或改變認知與態度，而在使民眾從儀式隱喻中確認（confirmation），讓社會基本秩序得以維持和延續 (Carey, 1992)。

按照 Hobsbawm & Ranger (2012) 的說法，閱兵是一個建構認同與記憶共同體（memory community）的過程，處於國家機器職責位置的菁英會依現實需要，通過歷史文化的回溯和現實感的強化，為社會培養共同傳統與歷史傳承，生產統一性的社會敘事，藉重複儀式灌輸特定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發明（invention）出民族認同的集體記憶，創造共同政治想像，起到強化權威機構地位、提煉權力合法性、增進認同與說服、凝聚社會成員等作用（蕭阿勤，1997；Hobsbawm & Ranger, 2012）。於此過程中，愛國主義經常被用來製造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以便各種象徵符號和論述得以有效運作，為主政者發展及維持社會秩序（王皓昱，1997）。

二、中共閱兵的歷史流變

中共自 1949 年建政迄今，一共舉行過 21 次閱兵活動。毛澤東主政期間的 1949–1959 年，每年舉行國慶閱兵，前後合計 11 次，後因文化大革命、中越戰爭（Sino-Vietnamese war）而暫停；1981 年鄧小平在張家口機場重啟閱兵，1984

年依託建政 35 週年之名恢復國慶閱兵，1989 年因六四天安門事件再次告停，迄 1999 年江澤民才又舉辦建政 50 週年閱兵，2009 年胡錦濤接續辦了 60 週年閱兵，至此定下「逢 9 才辦，10 年 1 次」的閱兵慣例（吳明杰，2019 年 9 月 30 日；許農合，1999）。

此慣例在 2015 年被習近平打破。自該年 9 月 3 日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閱兵後，習近平陸續主持了香港回歸 20 週年、建軍 90 週年閱兵，還有南海、青島海上閱兵（fleet review），以及建政 70 週年閱兵。上任至今閱兵 6 次，除稍遜於毛澤東外，已超逾鄧小平以降的各代領導人（李銀祥，2015 年 9 月 4 日；Blanchard, 2019, April 23; Chan, Lau, & Ng, 2017, June 30）。閱兵型態從典禮校閱到沙場、海上點兵，受閱部隊則在陸、空軍外，增列海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合保障部隊與維和部隊，折射出中共軍力發展、戰略外溢及國內外政治需求的變化。

此次閱兵是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鳴砲升旗、習近平講話、部隊校閱到「同心共築中國夢」群眾遊行，歷時 2 小時 40 分鐘（〈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受閱部隊〉，2019 年 10 月 2 日）。校閱活動按閱兵式、分列式程序進行，依改革重構的聯戰軍力體系，編成 59 個方（梯）隊，總規模約 1.5 萬人、飛機 160 餘架、裝備 580 臺（套）（王智盛，2019）。所有武器裝備均為國產現役，40% 以上首次亮相，新型機占總數比達 31.6%，展示了連續作戰、快速打擊、減少接戰循環（engagement loop）的能力，以及部分已超越美國的高超音速導彈科技，標識著中共戰略核力量、常規力量的重大轉變（Bondaz & Delory, 2019）。

三、中共閱兵的內外形勢

習近平主政後，強力促進個人集權，催生新時代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敢於鬥爭的意識形態，以「中國夢」為目標，積極推進反貪打腐、軍事改革與一帶一路的戰略建設，但在國際上卻受到「中國夢」對撞「美國優先」的深刻影響。中共在此情勢下舉行閱兵，而與所處的內、外部環境則是呈現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一方面閱兵對專政合法性與權力宣展的論述，受到國際情勢及戰略形勢的結構性制約，另方面習近平也在藉由閱兵論述，面向不同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進行民族主義、國家認同、國際關係、知識與信仰體系的召喚、重複、固化及刻寫，以複製特定的論述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發揮規訓、

控制、教育和宣傳作用，達到建構合法性、強固權力關係與模塑意識形態之目的（王海洲，2010）。

換言之，環境架構經常是閱兵論述的影響因素或限制因子（limiting factors），而閱兵論述則是基於維持或改變環境作用的實踐反應。因此，對於整體情勢的理解，可為後續分析提供考察脈絡的基礎，尤其此次閱兵係在內憂外患下舉行，與歷次重大的國慶閱兵有所不同（表 1），故有必要對閱兵當下的所在環境略做梳理。

「美國優先」是牽動閱兵所處情勢的主要因素。可回溯到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西部「鐵鏽帶」藍領階級助川普（Donald J. Trump）入主白宮，表達對就業機會外移和中國商品大量進口的長期不滿，反映出不再信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浪潮，以及對全球化公平性的追求（林竣達，2017）。而藉操縱貨幣、匯率及不當傾銷、補貼等手段損害美國利益的中共則首當其衝。

在美國支持中共加入 WTO 後的 2001–2017 年間，美中貿易逆差增長，全美蒸發約 340 萬個工作機會，工人集體損失約 370 億美元工資（Scott & Mokhiber, 2018）。社會氛圍推高美國優先的政策共識，川普（Trump, 2017）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時，即將中共列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與俄羅斯同為企圖改變世界秩序的戰略競爭對手（rival），美國亦開始針對中共結構性的產業補貼、侵犯知識產權，以及市場換技術、准入限制等國家領導的經濟計畫（state-led economic planning）展開抨擊與關稅懲罰（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美國優先」除反映在中國政策上，還同時表現在其他的經濟及安全戰略方面，包含放棄全球及多邊協定主導權的一系列「退群」行動²，以及要求盟邦提高安全軍費等（周暘展，2018；Taylor, 2017, October 13）。美國傾向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的決策，引發國際間對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的普遍擔憂，此樣氛圍則給了中共反擊美國的支點（原倩，2018）。習近平用愛國主義和全球化效益展開說服，讓人們認知「美國優先」是美國人的利益，而「中國夢」是追

2 例如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等。

表 1：中共重要國慶閱兵內、外形勢分析表

變項	建政日	建政 10 週年	建政 35 週年	建政 50 週年	建政 60 週年	建政 70 週年
意識形態	馬列主義 反資反美	左傾思想 階級鬥爭 興無滅資	政左經右 改革開放	三個代表 與時俱進	科學發展觀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國夢 敢於鬥爭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體制	黨的領導 政治協商	高度集權 民主集中 計畫經濟	黨政分離 集體領導 隔代指定接班 一國兩制	權貴資本制度	以人為本	個人集權 打破接班制度 取消主席任期制
核心事件	建政大典 兩岸分治	反右鬥爭 大躍進 823 炮戰	現代化建設 軍改整編	改革開放 20 年 香港回歸 美機轟炸中共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	改革開放 30 年 新疆烏魯木齊七五事件 首辦奧運會	反貪打腐 軍事改革 一帶一路
挑戰	未獲國際普 遍承認	經濟瀕臨崩潰 中蘇分歧 美援臺海	陳雲勢力掣肘 中英香港移交談判	南海爭議升溫 美中關係陷入低潮	習江權鬥 經濟滑坡 貿易戰 香港示威 兩岸冷對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求大家的、世界的利益（黃健群，2018），同時透過一帶一路及區塊鏈等去美元化布局，提供國際社會另一種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的「中國方案」戰略選擇（吳明澤，2016；李永峰，2019；楊增嶸、杜成敏，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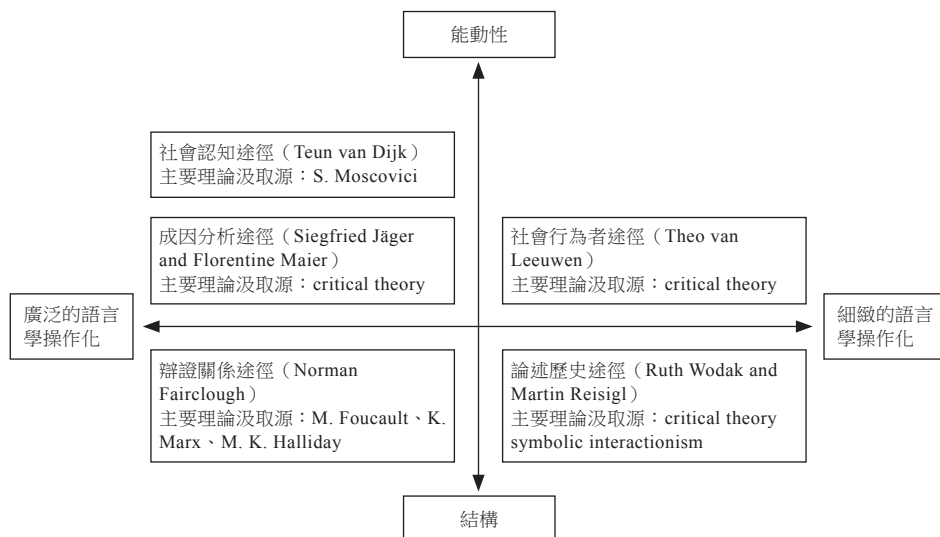
「美國優先」在與「中國夢」不斷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圍堵抗中」局勢。川普於 2017 年 11 月東京峰會後，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提出印太戰略，建構出現階段壓縮中共地緣政治形勢的主要力量（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Tokyo, Japan, 2017）。在美國主導下，以印太戰略弧（Indo-Pacific strategic arc）對中共擴大圍堵（Rimmer & Ward, 2016），並藉軍售模式增加防務出口，提高聯盟軍事嚇阻與擊潰能力，用以反制中共軍力擴張；臺灣也在 2019 年 6 月被美國國防部納入《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與新加坡、紐西蘭、蒙古國被認定是印太地區四個值得信賴、有能力且為天生夥伴的國家（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中共為求突破，除在世界各地尋求關節要點設置軍事或中繼基地外（曾復生，2018 年 10 月 25 日；謝英傑、謝志淵，2018），亦傾力發展高科技武器，縮小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差距，積極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然而，從美國優先到印太戰略，各種威脅的直接或間接作用，讓中共深陷經濟滑坡、權鬥增溫、貿易對抗升級、香港民運挑戰治權及兩岸冷對抗加劇等形勢，政治與國家利益發展空間遭到壓迫。可以預知的是，習近平勢將透過閱兵演說借力或突圍。

參、研究途徑與分析策略

CDA 的學派系譜可區分為語言學、社會心理學及社會學等三個領域（倪炎元，1999）。各個研究取向在語言與社會關係的假設上，採取了不同的中介途徑，對論述主體性的認識有宏觀與微觀之別，分析單位則可區別為個人心理認知及社會結構等類型，而分析操作涉入的語言學程度，從語言、語用到論證，亦有廣泛及細緻的差異（Wodak & Meyer, 2009）。基此，CDA 至少包含論述歷史取徑（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社會認知取徑（sociocognitive approach, SCA）、辯證關係取徑（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DRA）、社會行為者取徑（social actors approach, SAA）、成因分析取徑（dispositional analysis approach, DAA）（Wodak & Meyer, 2016）（圖 1）。核心概念均聚焦在社會論述中的權力、

圖 1：CDA 各類研究途徑的語言學及結構化程度象限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Wodak & Meyer (2009, pp. 20-22, 2016, p. 20)。

正義、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遷 (Reisigl & Wodak, 2016; Wodak, 2014)，惟因各自的流派和取徑差異，主要的研究視角及操作方法則有不同。

目前國內運用 CDA 的研究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是探討理論流派、背景及操作策略，如倪炎元（2012）檢視 Fairclough 的理論定位、內涵與應用問題，梳理出可供研究參用的若干分析策略；其二是方法建構或應用探索，如王雅玄（2005）將 CDA 從論述理論的討論延伸到方法論的問題，針對教科書的分析架構，重建出一個可行的研究模式；其三是直接就文本進行分析，諸如部落主題競賽得獎作品（姚竹音，2016）、《賽德克·巴萊》小說（紀乃淳，2013）、太陽花學運時間的總統發言與經濟部官網內容（倪炎元，2017）、《大尾鱸鰻 2》電影劇情與導演發言（黃之棟、朱容萱，2019），以及媒體對白玫瑰運動、東南亞新二代的新聞報導等（王孝勇，2012；李美賢、闕河嘉，2018），多數關注種族及社會運動議題，常以揭露語言權力、身分認同和社會意識為旨趣。

整體觀之，國內研究較少以 CDA 分析國家階層的政治論述，閱兵儀式這類具高度政治意涵的議題則付之闕如，研究視野難以觸及國家認同、國際對抗、政治權力運作及國家意識形態等面向。而本研究旨在揭露中共如何透過閱兵論述建立國家認同、政治記憶與抗敵想像，並藉意識形態操作，持續進行召喚與復刻，讓專政權力的合法性反覆獲得確認及維持，故能補強論述研究在此環節的闕短。

國內學者倪炎元（2018）、林東泰（2019）在綜理 CDA 各學派的論述理論與分析架構後認為，維也納學派 Wodak 的研究策略從政治論述出發，最適合用於意識形態及政治行動領域的分析。本研究以閱兵論述為題，涉及政治認同、身分召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等非常複雜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衝突，故採 CDA 的 DHA，參照 Wodak 在處理當代認同政治、操縱與說服特徵診斷、謬誤批判及意識形態除魅所提示的操作架構進行分析。

DHA 在分析文本時，必須關注三個面向：首先是確定文本論述的核心主題，並沿主題向外推斷；第二是指出命名及調語策略；第三是針對論述主張及其操作合理化的謬誤進行論證，從條件句（假如 X，那麼 Y）或因因果形式（Y，因為 X）的論證架構中（argumentation schemes）識別出論者用來聯繫、合理化結論的策略或結論規則（conclusion rules）（Reisigl & Wodak, 2009）。實際操作上，Reisigl & Wodak (2001) 在一個針對種族歧視與反猶太主義的論述研究中，提示了五個 DHA 的論述策略及其作用；另也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書中，指出了各個論述策略的具體分析指標（Reisigl & Wodak, 2009）（表 2）。

對 Wodak (2001) 而言，DHA 的分析策略和純粹語言學不同，不僅汲取了語言學的功能分析和語境分析，同時還援引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分析觀點，故其分析途徑屬問題取向，並非單純固定在語言學單位。進言之，DHA 將語言從攜帶意

表 2：DHA 論述策略分析指標

策略	目標	分析指標
指謂／命名（referential/nomin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象／事件，以及過程／動作的論述建構	如何命名、分類；隱喻、轉喻或提喻；用以表示過程、動作的動詞和名詞
調語（predication）	對社會角色、客體、現象、事件／過程及動作的資格歸類評斷	如何給予刻板印象；使用哪些調語、介詞、述詞、分詞及構句；明喻、隱喻或其他修辭；有何引喻、召喚及預設／暗示
論證（argumentation）	對真理、規範的辯護和質疑	主題為何；有何謬誤；如何將排斥、歧視、壓抑他者的論述合理化
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perspectivation, framing, or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言說者的觀點、位置及其與論述對象的距離	直證或間接的觀點策略；標籤與論據的表達角度或框架；是否引自他人；有何隱喻手法
強化或淡化（intensification or mitigation）	論述力道的增強和減輕	論述是否被削弱或強化；用何模式表達？語助詞、標籤問題、虛擬問題、猶豫或模糊表達；誇飾或輕描淡寫；是否以非斷言式的疑問句間接表達行為；表達感受與想法的動詞為何？

資料來源：Reisigl & Wodak (2009, p. 95)。

義系統的符號組合轉而視為各方勢力競奪的體現，分析指標不僅關注文本的語言學形式，還須跳脫語言學單元，追問建構一組論述的陳述（statements）為何，以及論述所承載的社會衝突、矛盾與權力關係為何（倪炎元，2018）。

用 Wodak 的話說，論述是一組與社會脈絡相互依存的符號實踐，而 DHA 就是在還原與重建脈絡，分析過程須從微觀到宏觀層次，涵蓋文本的語言學分析、論述形式間的互語性分析、語言外在鏈結的社會變項，以及論述實踐所涉入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歷史脈絡等鉅觀情境；進言之，除了辭彙、句法的功能分析，從語言學延伸的語境分析，以及語言和語言、非語言間的互語性分析，或是非語言學的實踐等，全都屬於 DHA 的分析範疇 (Reisigl & Wodak, 2009)。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稿進行分析，首先針對文本中的陳述進行識讀，將指向相同對象、採取相同陳述、運用相同的概念群組及聚焦相同主題的陳述聯繫起來，提煉出多組具有特定功能的「論述」，再直接檢視編組成各個論述的陳述，關注其語詞、句法、語意、論證所再現的意涵，特別是針對意識形態操作的部分，如自我指謂、認同召喚、他者建構、框架競爭等，以揭露演講中的論述形構、策略、謬誤及政治意圖。具體操作步驟係以 DHA 的「指謂／命名」、「謂語」、「論證」、「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及「強化或淡化」等五個策略的分析指標為指引：

- 一、指謂／命名策略：習近平講話中的不同個人或群體如何被命名與分群？
- 二、謂語策略：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被賦予了哪些刻板印象、特徵及評價？選用的修辭預設、召喚了哪些暗示或隱喻？
- 三、論證策略：習近平的論辯主題與基模為何？透過何種論辯策略或技巧來排斥、壓迫或扭曲他者？用以合理化的論點有何謬誤？
- 四、觀點、框架或論述再現策略：習近平所持的觀點、標籤、價值觀與論據為何？他是立於什麼位置、循何角度加以表達？
- 五、強化或淡化策略：使用的動詞、語氣為何？趨於強烈或緩和？有沒有被淡化的缺席者？

此外，DHA 強調論述實踐與歷史語境、社會體制運作間的辯證關係，著重對互語性及行動場域的分析 (Wodak & Meyer, 2016)。故本研究在針對文本展開 CDA 之際，將閱兵論述置於習近平言說當下的政治脈絡中進行脈絡還原與再脈絡化。舉例來說，Wodak 曾在《海德爾現象》（*The Haider Phenomenon*）及《質化研究實踐》（*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等書中，示範了類似的實例分析。她研究奧地利自由黨領袖海德爾（J. Haider）的媒體受訪紀錄，第一步先確立出

文本中關於種族歧視的論述形構，接著運用語言學分析，辨識出海德爾在論述上的種族偏見，以及隱晦的標籤化、誤現他者、孤立等語言特徵及策略，例如頻繁使用「我們」這個概念隱喻、連結黑人與毒品，以及把母語非德語的族群歸為他者等；為了進一步掌握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目的與影響，Wodak 通過對歷史背景、政治形勢及社會文化的檢視，對放到特定語境來的語言學分析結果進行形式分析，從奧地利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高失業率及排外氛圍等歷史脈絡的還原過程中，揭露出海德爾論述在社會實踐中的排外、製造對立及種族歧視等操作 (Wodak, 2004; Wodak & Pelinka, 2002)。

概括來說，本研究是以文本的修辭為起點，向語境分析延伸，並超越文本與論述的內在邊界，運用背景知識將習近平的閱兵論述嵌進一個更大的政治與國際關係情境中，亦即納入習近平言語之外所連結的國際情勢、政治社會及體制架構等變數，在分析過程中進行語言及非語言實踐的交叉檢證，透過論述實踐與社會實踐的辯證來驗證文本分析結果，嘗試還原中共閱兵論述的政治實踐意義。

肆、閱兵論述與政治實踐

習近平於閱兵典禮上的演說全文總共 883 字。就字數頻次與篇幅配置論，習近平用 126 個字向烈士及各界致意；用 298 個字讚頌中國轉弱為強；用 90 個字強調堅持共產黨領導；用 188 個字向港澳臺及國際社會揭示「和統兩制」、「和平發展」方針；最後用 173 個字進行召喚。整體而論，凸顯中國「強起來」的文字占逾全部講稿的 3 分之 1，充分意味這就是習近平最為關切的議題。另文稿中以 3 段均由「前進征程上」開頭的段落，申述黨的領導、港澳臺關係及國際戰略等相關範疇的發展方針，相繼提出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等 5 個堅持，其中又以「共產黨領導」為先，顯見其乃習近平至為堅持的理念。

一、論述形構與治理策略

(一) 黨的絕對領導

1. 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

綜覽整個講話文本，全文論述結構係以「70 年前的今天」、「70 年來的今天」及「前進征程上」為核心，以時間軸作為鋪陳的次序，並用「毛澤東宣告建國」、

「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及「5 個堅持」分別占據過去、現在與未來等各個橫斷時空的行動主體位置，其中 5 個堅持則以「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先行。習近平透過論述鋪排，以中共接合了中國的發展歷程，刻意凸顯建黨與建國的關聯，將建國的意義聚焦於「共產黨建國」、「毛澤東宣告建國」的歷史空間，強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的功績」即切斷了 70 年的國家發展，在建國的論述裡取得了鬼影子優先性，通過共產符號一體化來網綁愛國主義，讓愛黨與愛國形成強制性的關係與聯繫，向民眾召喚聽黨話、跟黨走的集體意識，以消弭「把愛國、愛黨對立起來」的反抗論述。

進言之，鏈接國家從「站起來」、「富起來」演進到「強起來」發展想像的中共，成為引領國家建成、建設、建強的決定性關鍵，因而在論述中取得了「先進性」的行動者位置，複製著黨代表先鋒隊、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政治認同。藉由專政權力的仲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因而區分開來。對比共產黨統治階級的先進性，作為被統治階級的「各族人民」、「中華兒女」自然被置於「落後性」位置，固化了黨唯一代表人民的壟斷地位及對國家絕對領導的資格，一方面鞏固共黨專政的合法性，偷渡「反黨就是反國家、反人民」的價值論述，另方面則在建構我群與他者，透過暗示先進性來製造「落後」的負向標籤（negative labeling），將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從關係對立及固定起來，防杜專政體制被迫鬆動或崩盤。

2. 以習核心代表黨的絕對領導

習近平講話中僅提到 1 個「我」，用以代稱自己向各界致賀。以象徵個人的「我」指謂自己作為黨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中央軍委的代表，旨在宣告自身對黨政軍各體系的絕對控制，演繹「習核心」在黨的指導思想中之最高地位，以及其在黨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位一體」制度下的絕對權威，確立自己作為單一領導核心的權力及全黨至高領袖的領導體制。

習近平閱兵講話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相異之處在於「對歷任領導人頌揚的捨棄」。鄧、江、胡 3 人分別在建政 35、50、60 週年閱兵講話時，將各個前任領導人納入論述，習近平卻僅保留毛，中間歷任領導人則被缺席，透露出習近平冀在政治地位上超越鄧、江、胡而與毛齊名的意圖。對照其治理實踐，在閱兵結束 24 天後召開四中全會，會中仍未指定接班人選，且在公報中載明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證走入第二任期的習近平仍在積極鞏固黨與自身權力，極可能利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的修憲成果尋求連任，預料在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應該仍無交權打算。

（二）民族偉大復興

1. 愛國主義優先

習近平的閱兵論述瀰漫著濃厚的國族主義、民族主義，為召喚愛國主義累積集體行動與政治動員的能量。通篇講話中，總計使用 10 次「偉大」來修飾祖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復興或成就、中共及中國人民等，是全篇稿中頻數最高的狀語，不僅是對國家、民族語彙的修飾，更是對國家認同及民族自信的召喚。在謂語策略上，偉大的祖國反覆與「我們」相鏈結，而所動員者均是正面修辭，包括感到自豪、沒有任何力量能撼動、萬歲，以及努力奮鬥等，以定義我群延伸召喚的邊界，直接賦予民族及國家優越感的身分與價值認同，再將其轉化成政治資產，作為後續愛國主義政治演繹的基礎。

閱兵講話裡，完全沒有被直接建構的他者，均是透過我群的召喚而對立出來。論述中，中國被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屹立在世界東方的，並暗喻長期有股力量在撼動、阻擋中國進步。藉撼動、阻擋等謂語的張力來操作對立，建構出資本主義的、屹立在世界西方的他者，而這裡暗喻的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甚至就是直指美國。習近平的論述目的即在暗批美國策動貿易戰、香港「逆權」運動及顏色革命，雖未直接公開批評，但習近平以肯定句表達「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撓……」的斷言式論述，即在對美國釋放全篇講話中力道最強的警告，亦向內部民眾傳達對美國作為阻撓外力應有的警惕。

進一步說，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框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行動，暗示其不友善的對中交往態度。另方面，提到被收編用來指謂中國的祖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時，則是動員了屹立及前進等正面修辭，明示了中國砥礪前行的意志與決心。習近平在民族主義架構下，操作對立的謂詞修飾，以及暗示與明示的刻板印象牽連，製造出「團結抗美」的集體想像。將它置入中共建政 70 週年所處的戰略情勢中理解，在美國優先與中國夢相競而成的國族主義對抗系統中，習近平輸入了反美情緒與抗美想像，進而產出愛國主義優先的意識形態，為警告美國提供有的放矢的支撐，亦為民眾應當如何警惕美國揭示了集體行動的價值認同及方向指引。用英國大文豪 Samuel Johnson 的話說，愛國主義成了中共的最後

避難所（the last refuge），是製造共同敵人、渲染共同敵意的催化劑，也是強化敵我區別、團結抗敵共識的精神嗎啡。

2. 各族團結奮鬥

在命名／指謂策略上，習近平操作了「我們」這個代名詞，將各民族、海內外共享中華文化的各群體納入以共產黨為中樞的「中國」我群中。作為我們的各族、各群體則被形容為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將共黨個體特質等同各族、各群體的整體特質，剝奪了不同民族表達對「十一國慶」歧異立場的能動性。

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等謂語讓中共「我群」的集體認同自象徵性邊界產生出實踐中的邊界，再通過從國家級慶典上傳散的權力轉換，將這些謂語所象徵的鉅觀概念——團結，塑造成能夠規範或作為群體行動指引的社會邊界，並在這條認同邊界上，為黨國意識形態區分出我群與他者。

中共在中國族屬（ethnicity）認同流動性與非斷裂性的強勢擴張，對各族的歷史及政治、文化、宗教等權利造成普遍性的壓迫或箝制，無比喜悅、為祖國自豪等謂語恰好成為對各族人民被迫作為中共我群的反諷。包括新疆再教育營對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族的大規模拘押、駐村工作隊與網格化管理（grid management）對藏人日常生活的全面滲透，以及港警處理反送中、三大罷³的過度執法（湯惠芸，2019年8月5日；劉致昕，2019年7月25日；Hornby, 2016, April 3），自證了習近平的團結召喚，更接近是一場強制改變國族認同的同化運動。隱藏在召喚背後的社會政治與歷史情境，正是中共通過對思想、信仰體系的清洗來實現意識形態控制的現實。

習近平還頌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莊嚴、偉大的歷史，以建國的框架，篩除竊政的事實，刻意淡化中共前身係受蘇共資助建立的俄屬蘇維埃政權，無法代表新中國的史實，以及入侵西藏與3次鎮壓拉薩的歷史責任，藉以削弱中華民國、西藏從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港民在國慶當日發起「十一國殤」集會的競爭論述。這些淡化則是習近平召喚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根本支撐。

（三）鬥爭重建秩序

習近平運用了5次「堅持」、2個「團結」、4次「前進」，以強烈的意志性動詞，展現在「征程」上實踐共產黨永續執政、一國兩制解決兩岸問題、開放

3 罷工、罷市、罷課運動的合稱。

市場換價國際影響力的決心。「征程」是充滿戰鬥與克服險阻意涵的語彙，習近平以「堅持」貫穿論述，預示了可能趨劣的內外部形勢，亦指明了後續解決治理困境、兩岸矛盾及美國壓迫等問題的核心原則與方向。在中共的征程中，共產黨是主體，人民是客體，臺灣是兩岸關係中被消失的客體，改革開放則是進入沒有改革的開放新常態。相同之處就是權力的壟斷：人民沒有議政的權力，臺灣沒有論述的權力，美國沒有就民主、自由、人權及結構性改革和中共協商的權力。以權力壟斷為本質的「堅持」政策，維持其運行的政治動能即是鬥爭，鬥爭雖不曾閱兵講話中被說出（*unsaid*），但卻始終隱晦地附著在論述的實踐行動裡。

1. 以鬥爭支持港臺工作

習近平提出「團結」的價值框架來遏制兩岸三地對一國兩制的討論與分歧，修辭策略是將「團結」與「和平」兩組價值互為因果。但中共在現實的「和統兩制」政策裡堅持保留「收回兩制放權」及「武力犯臺」選項，致使兩岸三地無法取得共識或交集，互為框架的團結、和平訴求即在實踐過程中與港臺的「民主」價值框架形成競爭。可以說，習近平的閱兵論述是在以團結價值向民主價值鬥爭，延伸民族主義及民主制度於兩岸三地間的競逐關係，進而獲取「和平」話語權的意識形態布局。

在團結與民主的框架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來表現權力效果，講話中完全不提及臺灣，讓臺灣從對話彼端被消失，兩岸關係的再現論述也從兩岸一家親轉向一國兩制，進而削弱臺灣主體性。通過對論述裡的權力（*power in discourse*）做出不對等的結構安排，並藉鬥爭及作為其主要表現形式的武統暗示來獲取壟斷性的論述權力（*power over discourse*），讓習近平能在兩岸論述的競爭中主導話語權（*power of discourse*）⁴，把統一的論述內涵從兩岸對等共構導向中共片面決定，將對臺決策自以往的策略行動選擇提升到直接改變賽局結構。

然而，港臺皆認為和平應植基於民主，而非以武力相脅的團結。尤在兩岸方面，中共將武統作為和統的同構，用以支撐「拒團結則遠和平」的威懾隱喻。例如裝設逾千枚導彈瞄準臺灣、在東部戰區火箭軍第 61 基地部署 7 個導彈旅⁵，以及證諸此次閱兵的裝備展示，射程 280 公里的 PHL-16 自行火箭砲取代了舊有

4 此處分析係循 Holzsheiter (2005) 針對語言權力提出的三個面向，從語言內在、語境及社會實踐等對應層面，考察習近平如何通過國慶閱兵論述進行權力爭鬥；有關語言權力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Wodak (2012)。

5 配備東風 -21C、東風 -16、長劍 -10 等短、中程戰術彈道飛彈，主要針對臺灣與美軍沖繩基地。

的 PHL-03⁶，對臺火力涵蓋從新竹沿海向內陸延展 150 公里 (Fisher, 2019, October 1)。這些都是習近平以鬥爭開展對臺工作的實質內涵。面對中共仗恃武統的團結召喚，臺灣則以控訴「無誠信」及「非民主」進行對抗。

關於港澳治理及兩岸發展方針，習近平則以未來進行式而非未來完成式展開論述：「前進征程上，我們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透露出中共雖高度重視港臺工作，但卻沒有絕對性的急迫感。因中共認知，港臺問題實際就是美國問題，對美鬥爭才有急迫性。因此，港臺鬥爭工作現階段應會呈現「戰略擱置，戰術頻擾」的趨勢，目前並不會設定具體時間表。

證諸四中全會即可發現，中共提出「建立以國家安全為由的自治區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作為對港鬥爭工作的主軸，會後再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釋出對港 16 條措施，訴諸既聯合又鬥爭的兩手策略。可以預見，聯左、拉中既已先行，後續的干擾戰術就會出現打右鬥爭，並以司法體系改革為主要目標，包括依憲治港、清洗外籍法官、加大政法系統干預力道及加速《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進程等，均是中共對港開展團結鬥爭的高度可能選項。

2. 以鬥爭支持美中對抗

閱兵講話中，美國被以否定修辭的方式，作為被隱喻的「撼動」、「阻擋」力量，未被放在阻撓行動的主體位置，削減了美國「妨礙」中共發展的責任。顯然，習近平選擇了低強度的抨美策略，代表中共面對貿易戰攻勢，現階段仍以鬥而不破為原則。從辯證的角度觀之，演講裡透露出的中美對抗，基本涵蓋了「空間鬥爭」與「行動鬥爭」兩種意涵。

空間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所謂的祖國地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緣政治裡應被集體認知為「無以撼動」的共識，也就是中國作為亞洲崛起霸權的事實。惟中、美將彼此視作競爭對手是無庸置疑的，習近平在論述裡暗地鑲嵌空間鬥爭，即在針對所處的地緣政治困境，對美釋放警告訊號，對國際推銷「全球化」選項，對內則召喚共體時艱、警惕阻撓外力的民族主義與鬥爭路線，為營造「類戰時經濟」模式預做鋪墊。

進一步說，論述中影射的對手就是美國，將美國對中共的競爭行為以「撼動

6 PHL-03 最大射程 150 公里，可從福建平潭覆蓋臺灣新竹地區；2017 年曾在中共建軍 90 週年閱兵中出現。

祖國地位」標籤化，讓民族情緒能在對抗中起到關鍵作用。習近平還試圖通過全球化論述來聯合國際力量，亦即論述中提及的「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向國際社會暗示，在美國選擇走向孤立主義之際⁷，中共將擔當大國責任，填補美國引發的秩序真空，並持續以市場開放交換世界各國「互利共贏」。目的即在操作全球化論述同美國孤立主義鬥爭，具體實踐包括利用國際安全建制增添威望、布局「一帶一路」獲取國際秩序影響力等，通過內外戰線的統一來推進反美鬥爭，並藉此將經濟收益轉換成地緣政治利益。

行動鬥爭係論述裡所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前進步伐是指中共的國家發展進程，習近平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訂下的目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⁸。具體行動包括籌建並主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布局帶路戰略、建設航太與網路強國、推進中國製造 2025、發展軍工產業，以及爭奪人工智慧、機器人等科技領先地位。中共支持這些目標的行動，經常涉及由國家主導的匯率操縱、不當補貼、技術強取、強迫轉讓，以及系統性收購、商業竊密、智慧財產權盜取等不公平的行為與政策。美國就此發動反制，而習近平則以「阻擋的力量」將美國反制行動標籤化。藉論述操作鬥爭的手法和「空間鬥爭」如出一轍，不同之處在於空間鬥爭係與美展開地緣政治競逐，而行動鬥爭則是在貿易談判、金融科技、技術創新、知識產權、軍事戰略外溢等範疇，挾民族主義和美國進行攻防與較量。

四中全會召開前，習近平提出以區塊鏈核心技術作為國家金融發展目標，用意就在乘既有優勢對美發動金融鬥爭，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主權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DCEP）構建一個取代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及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HIPS）等美元清算結算系統的新交易網絡（聶建中，2020）⁹，削弱美元國際流通能力，讓人民幣、石油與美元脫鉤。由區塊鏈技術驅動的金融戰，實踐了習近平演講裡釋放的行動鬥爭訊號，展露出中共通過去紙幣化、去美元化，試圖重構後美元時代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戰略意圖。

7 例如自阿富汗與敘利亞北部撤軍，以及一系列從國際組織退群的行動等。

8 係指在中共成立 100 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0 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9 SWIFT 及 CHIPS 經常是美國用來對外實施金融封鎖與制裁的機構。

二、論證謬誤與實踐意圖

從實踐推論的角度看，習近平致力突破內外困境，並以此作為實踐意圖，而在閱兵的儀式情境下，將透過公開講話來達到目的。但其論述實踐必須面臨歷史、政績與西方普世價值的挑戰，操作論證謬誤就成了習近平誤導民眾理解真實的選項，而鞏固政權穩定的信念，則會促其決定採取行動。

在 Wodak 的分析實例中，也可經常見到運用謬誤論述來達到政治目的的例子。例如，Reisigl & Wodak (2009) 針對捷克卸任總統 V. Klaus 在美國眾議院的發言紀錄進行分析，發現 Klaus 運用八項訴諸斷言的論證策略來操作不確定性謬誤（the fallacy of uncertainty）與自然謬誤（the fallacy of nature），誘導民眾認知錯誤的氣候知識，以促使碳排放管制政策獲得鬆綁。基此，本研究將從論述謬誤及其辯證策略的診斷著手，嘗試揭露習近平政治實踐的意圖。

（一）「Y，因為 X」的論證架構¹⁰

透過「Y，因為 X」的命題假定為論述提供理解架構，並操作論證策略來扭曲或置換因果關係，將其論述合理化，以達政治認同與收編之目的。

1. 共產黨的政治自我呈現

以「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論證，為「中華民族擺脫悲慘，走上實現偉大復興壯闊道路」的聲稱提供論證前提；其中存在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兩者並無因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不再貧弱、不再受欺凌，開始富強的基點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毛澤東則是以「三面紅旗」策動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後續更釀造文化大革命，讓國勢走向衰退。習近平的論述功能係在哄抬毛歷史定位、象徵繼承毛政治遺產、強調共黨專政合法性，以及表明政治結構決不妥協。宣示中共堅持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決不改旗易幟，藉此回應美國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同時復辟毛澤東鬥爭理論，用以化約黨內權鬥及中美衝突，為後續劃分敵我、動員群眾及統一戰線預做鋪墊。

2. 意識形態的鬥爭隱喻

以「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論證，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

¹⁰ 此部分的分析係從論證前提的架構切入，運用邏輯推理技巧來辯證習近平閱兵講話的謬論，有關後續述及的虛假關係、後此謬誤等非形式謬誤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動……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前進步伐」的聲稱提供論證前提；宣稱是中共實踐了社會主義路線，才讓國家的地位與富強之路不被阻撓。其中存在後此謬誤（post hoc fallacy），中共崛起不必然是拜「社會主義」之賜，應是奠基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本身就是鄧小平將社會主義向西方資本主義修正的過程，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主義，把國家發展重心轉移到經濟現代化，並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取代計畫經濟路線（姜新立，2018）。此論證功能在藉社會主義的鏈結，偽稱共產黨領導對中國取得今日成就與躋身強國之列的貢獻，頌揚社會主義對中國政治的實用邏輯，鞏固「黨的絕對領導」之合法性與權威感，並進一步喚起民族自信，釋放「對抗阻撓力量」的訊號，預為美、中鬥爭構築心理防線。

（二）「訴諸斷言」的論證形式¹¹

召喚民眾對中共領導，以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堅持，卻未提供其他理據。

1. 共黨居主的神話動員

論證訴求為「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屬真理斷言（claim of truth），宣稱歷史古今的實踐，決定了中國夢的未來成就。語態上，「億萬人民」和「中國」主客易位，變成創造今日中國的客體，雖然未被省略，沒有減損「創造」的配價（valency）能力，但選擇應作為受詞的「中國」為語用主體，隱晦地削弱了人民對國家建設的貢獻與主導性。

由中國代替億萬人民成為建設國家的主要行動者，將使中國這個指謂 70 年前由毛澤東宣告成立、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載更多角色功能。億萬人民變成從屬，習近平真正召喚的我群是以自身為核心的中共統治集團與政黨。習近平還以祈使句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緊密地團結起來」，黨、軍與人民的依附關係從次序配置即可窺見，亦透露出習近平為「中國明天」擘劃的中國夢，無疑只能是以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為前提。

若以國家為主體，此論證即屬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11 有關真理斷言、規範權利斷言等訴諸斷言的論證技巧，可參考 Reisigl & Wodak (2009) 關於捷克卸任總統 Klaus 在美國眾議院就氣候變化與變遷議題進行答詢的論證策略分析；另邏輯推理部分，後續述及的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等概念的討論，可參見 Bennett (2012)。

將中國的「美好明天」以自利偏誤歸因為「接受共產黨領導」所致，卻將建政前的「悲慘命運」暗喻是西方列強的欺凌所為。事實上，近代中國的悲劇除肇自西方強權外，喬裝成中國領航者的中共亦有責任。1931年中共於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70年前中國遭受日本侵略、蘇聯蠶食和國共內戰的歷史間，陸續作為假抗日、武裝保衛蘇聯及分裂中國的俄屬蘇維埃政治實體（辛灝年，2015）；70年後卻藉歸因謬誤爭奪話語權，混淆及重新定義歷史發展，巧妙置換歷史定位，任意掩蓋了錯誤與責任。

2. 對預設港臺團結的合理化

論證訴求為「我們要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屬規範權利斷言（claim of normative rightness），訴求須堅持和統及兩制，港澳才能繁榮，對臺才有和平。此論述動員了不當預設的謬誤（fallacy of inappropriate presumption），將和統及兩制作為港澳臺治理「良制」的訴求合理化。事實上，習近平同樣沒有為此訴求提出證據，且將不應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視作必然，進而產生當如是說的不恰當論證。

尤其中共的和統公開夾雜武統選項，而一國兩制已在香港被證實是失敗的實驗，反送中運動更是對中共一國兩制承諾跳票的深刻揭露，讓兩制政策急遽流失民意市場。在兩岸事務方面，繞過政府的談判、缺乏民意基礎的協商，以及華而不實的兩制承諾等，已使臺灣官方將和統及兩制定調為「和統是宣傳，武統才是目的」、「一國兩制沒有臺灣方案」與「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主權」。習近平對和統及兩制的不當預設，目的在將中共當局與港臺間的價值矛盾去脈絡化，隱去彼此的衝突及不和諧，並藉託中華兒女之名，召喚港臺民眾團結在統一及中國夢的後設敘事下。

伍、習近平「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再建構

一、去價值化策略

習近平宣稱代表我群的全國各族人民是「團結」的，藉由修飾策略對我群特徵進行評價，同時也將「他者」定義出來並予標籤化。亦即各族人民均應團結在中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並服膺其民族復興及一國兩制政策方針。那些違背團結規範的就是他者，三無農民、退役軍人、宗教及邊疆民族反對勢力、

維權律師、異議人士，以及司法冤獄、遭當局強制拆屋的上訪民眾等，均因反抗專政體制與威權政策，成為出現「不團結」偏差行為的他者，一旦透過對比蘊涵（implicature by contrast）將這些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族群以偏差歸類，即可宣告對其指摘、譴責或糾錯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習近平以「我」而非具有全體人民表徵的「我們」，代表黨中央及國家權力機構向各界致意，人民從國慶的主體變成客體，顯露出中共的黨治特徵與假託民本思維的人治本質，自我揭露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論述矛盾。此外，演說所強化的「5 個堅持」係以共黨基本理論、路線、方略，以及和平統一、和平崛起為主要內涵，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完全「被消失」。中共意識形態的去價值化就是刻意提倡團結、和平的價值訴求，排拒能與西方國家開啟溝通、尋求共識，但卻與其專政體制相矛盾的價值意識，藉以防堵西方布局「顏色革命」。

由此觀之，習近平獨以團結、和平進行喊話，之於臺灣是在勸誘促統，之於美國則在暗示鬥爭底線。而致力摒除自由、民主與人權價值，並挪取中國儒家思想強調權威、秩序、集體大過個人的傳統意識，以及士大夫菁英入世的政治文化，目的即在召喚「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認同。習近平刻意在西方普世價值的對立面，豎起以王道、富強、善群等中華文化進行包裝的東方價值，就是企圖以民族主義支撐民本政治思想，用「民本」對抗「民主」¹²，合理化習近平以黨治國、我將無我的意識形態，從體、用兩面阻斷民主思潮向中共人治、黨治的合法與權威性根基發出挑戰。

二、去協商化策略

面對全球經濟與貿易，習近平強調中國將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惟自 1978 年以降，「改革」與「開放」一直以並列式複合詞（compound word）的形態被使用，但此次閱兵講話卻刪除了「改革」，「改革開放」變成以「開放」的語彙單獨存在，呼應了 2018 年習近平自己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的宣示：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 年 12 月 19 日）。改革的消失，傳達出中共國際交往方針將有轉折的訊號，同時也在低調回擊美國把民主、人權納入貿易談判的舉動。美國要求中共在經濟、政治、宗教及人權等更多領域實施自由主義，

12 民本政治的主體為統治者，民主政治的主體則是人民。

習近平則默以「只談開放，不談改革」回應，對任何侵害共黨政權延續的威脅，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權等中共集權治理的軟肋，均直接略去以協商作為決策選項的可能。

換言之，中共雖倡議互利共贏的全球化或雙、多邊貿易合作，但不會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為此做出相應變革，順應開放的改革之舉宣告走入歷史。習近平「新時代」的全球經濟參與就僅止於市場開放，且是以中共有參與制定的規則或秩序為前提，亦即一種賣方市場（seller's market）的態度。尤其 2019 年 5 月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赴美貿易磋商失敗，加上中共判定香港反送中運動有美國在背後支持，導致中共認定貿易戰已由經貿、外交問題延伸到政治主權問題。這使北京當局強烈警惕到美國可能以開放倒逼改革，故而斷然否決「改革」協商，避免美國敲打與中共派系鬥爭相互利用，防杜貿易戰失利及香港反送中運動遭江澤民上海幫的「倒習」勢力操作升級，以維繫習近平個人集權，並穩固共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支配地位。

三、去延續性策略

中共自 1978 年改以混合經濟模式取代計畫經濟後，「改革」與「開放」始終合併稱之。四十餘年後，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而獨以「開放」代之。顯然習近平正試圖弱化改革開放及其總工程師鄧小平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用，藉由淡化「改革過程」，讓「開放成果」穿越時空與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路線勾串起來，從而建立屬於自己的「新時代」，與改革開放時期做出區隔。

具體而論，中共不論施行文革、改革開放、左傾、右傾、階級鬥爭或經濟建設，都是在「政黨居主」（the primacy of party）結構下，以主義、思想、理論共構而成的意識形態為指導（李亞明，2006）。中共意識形態體系基本上是由各代領導人與政黨間相互利用、促動、制約或妥協建構而成。逐漸鬆動的專政基礎，須仰賴領導人設法維護及解套，領導人的政策主張則須委身意識形態結構之中，才能被認定是黨的集體智慧結晶，並因而獲得職務以外的實際權力。然而，隨著領導政權多屆遞嬗，意識形態結構需要吸納更多卸任黨魁的政策主張，導致結構體持續膨脹，最終無以容納（李英明，2017）。

進言之，中共意識形態的論述範疇有限，習近平必須讓鄧小平理論及依附其下的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退出意識形態結構。故習近平將開放的條件從「改革」置換成「鬥爭」，把長年僭越人民作為改革主體的「鄧」以「毛」代換之，

促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斷裂，製造民眾認知真空，進而確立改革開放的非延續性，將鄧小平理論推入歷史，宣告意識形態結構從改革開放轉向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即能越過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直接上連毛澤東，形成意識形態串接，以便於自我宣稱「習思想」承繼於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係有別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新時代意識形態代表。除褪去鄧小平理論對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功能，亦讓習近平得藉意識形態承繼的斷裂，擺脫老人政治束縛，創造出更加充分的決策裕度，為後續採取左傾策略應對貿易戰及香港民運，預做準備。

四、再主權化策略

習近平於國慶前日的晚宴上，同時提到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隔日閱兵講話卻略掉九二共識，將兩岸關係與一國兩制對接，就「習五條」宣稱要「探索」兩制臺灣方案¹³的行動釋出階段性答案。顯然習近平在兩岸關係的主控上，較 2019 年初更加自信，給出的態度則是：求同原則不變，但對存異的容忍度將驟降。習近平還以「繼續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替兩岸關係的發展做出片面總結。

中共在淡化九二共識、只談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向「我們」這個集體表徵進行召喚，我們係指涉堅持共產黨領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的各族人民與海內外中華兒女。習近平沒有召喚臺灣民眾，讓臺灣民眾喪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動性，奪去臺灣參與兩岸關係規則制定的權利及論述能力。此外，相對於「我們」的召喚，臺灣民眾被塑造成他者，對習近平維繫國族認同，以及激發境內民族主義「出征」臺灣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總的來說，閱兵講話中關於兩岸的論述，就是轉向封閉主權爭議的模糊空間，將命題的預設層次回歸「主權化」格局，把兩岸事務的討論明確置於該架構下。這將剝奪臺灣在主權上「各自表述」的權利，直接確立「和平統一」的總基調就是「一國兩制」。兩岸的統一論述便從「主權爭議」降格為「制度協商」，由務虛轉向務實，自一貫的「雙方協商後擱置」改變成「片面預設後擱置」，呈現一種沒有急迫性卻又收緊論述彈性的操作。

13 「習五條」為 2019 年 1 月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提出的對臺工作綱領，其中最受關切者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王堯、馮學知，2019 年 12 月 19 日；習近平，2019 年 10 月 1 日)。

陸、結語

本研究處理了中共建政 70 週年閱兵的官方論述，聚焦在閱兵典禮上的習近平演說。研究發現，習近平形構了黨的絕對領導、民族偉大復興、鬥爭重建秩序等 3 組論述。而透過 Wodak 提示的分析架構，本研究發掘出講稿中採取的幾項論述策略：

首先，在自我指涉上，習近平以「我」指稱自己作為黨政軍最高機構代表的身分，重複演示了「三位一體」的至高領導權威與絕對的政治控制力。習近平另以「我們」指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各族人民、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塑造而成的「中國」想像與認同，並嫁接了共黨專政的國統與法統正當性，讓愛國與愛黨劃上等式，剝奪不同民族對「中國」族屬認同的歧異與反抗動能。

第二，在調語策略上，習近平多次鏈結「偉大的祖國」與「我們」，並動員感到自豪、努力奮鬥等正面修辭，在我群中醞釀民族優越感及團結意識，作為激發愛國主義的燧石；而閱兵論述的他者，係透過我群的召喚被對立出來，最明顯者即是被隱喻為妨礙力量的美國。習近平以撼動、阻擋等負面修辭來指涉美國對中政策，喚起民眾對近代屈辱歷史及美帝殖民主義的集體記憶，操作「團結抗美」共識，藉以驅策群眾並對美形成警惕。

第三，在價值框架上，習近平以「建國」框架隱去「竊政」的事實，並透過暗示共產黨的先進性來製造他者的落後標籤，確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優劣、主從關係，同時借力愛國主義，召喚民眾「聽黨話、跟黨走」的政治認同。習近平還召喚了「民本為體，民族為用」的政治觀，從體、用兩面對抗西方民主思潮；在港臺布局上，習近平提出「團結」與「和平」的價值框架，將兩者互為因果，並於「和平」裡包藏武力解決選項，藉和平來裹脅團結，以「民族團結」向「民主制度」鬥爭。在兩端框架的競爭中，習近平透過「排除」讓臺灣從論述裡「被消失」，削弱臺灣在兩岸關係中的論述與實踐能力。

第四，在與美國的價值鬥爭中，習近平以全球化論述來對抗美國的去全球化政策，藉由連結國際「反美孤立主義」，將全球化戰線從經濟談判轉向政治掙扎。值得注意的，習近平將美國隱喻是阻撓中國的力量，卻未將其置於主要位置，減弱美國阻撓行動的責任，顯然中共雖對貿易戰不願示弱，但對節外生枝亦不樂見。

第五，在強化策略上，「堅持」被頻繁用來動員民眾支持共黨專政與中共當局的政策，映射出習近平捍衛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及一國兩制方針的決

心。習近平還將「5 個堅持」塑造成對抗西方勢力及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解決方案，惟在「堅持」論述中，除「和平」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卻完全匿跡。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不斷升級之際，中共做此論述特別值得警惕。

第六，在論證策略上，習近平確實操作了許多論證謬誤來達到政治目的，包括以虛假關係、後此謬誤來扭曲史實，藉以鞏固共黨專政和社會主義路線；亦訴諸真理斷言及規範權利斷言，各自動員歸因謬誤、不當預設謬誤，試圖湮滅歷史錯誤與政治責任；習近平還將北京當局與港臺間的矛盾去脈絡化，把論述的表象（representation）指向和諧社會，藉祖國統一的召喚，將港臺民眾團結在中國夢的集體想像下。

在意識形態建構部分，習近平採取了去價值化、去協商化、去延續性及再主權化等策略。總的來說，習近平終結鄧小平以降的改革開放時期，揭示後改革開放「新時代」，假託民本政治思想，以延續共黨專政結構、抑制反對派系，以及鞏固「習核心」個人集權；對香港及兩岸問題則趨向「戰略擱置，戰術頻擾」，在涉及主權議題上，透過行政、法制、宣傳等措施強硬表態，對港從自治轉向高壓，對臺則棄「一中各表」而就「一個中國」，但在港臺問題的徹底解決上，卻無具體時間表。因中共當局認知，解決港臺問題必先解決美中問題。

與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衝突上，中共操作反美情緒，召喚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動員國族主義與民族精神，抗衡「美國優先」引發的多元衝擊，並藉以支持兩國在空間、行動上展開的長期鬥爭。換言之，習近平的閱兵論述普遍展露一種「鬥爭」格局，而作為亞洲區域強權，此般政治路線與政策方針，恐有導致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雙輸結果或使各方陷入利空之虞¹⁴。

本研究在主題、理論觀點與方法上，結合了儀式、傳播及 CDA，以中共閱兵論述的儀式傳播為主題，有助拓展傳播文化研究的領域；此外，CDA 應用於儀式傳播研究的嘗試，一方面延伸了論述研究的範疇與知識，另方面隱喻作為研究儀式傳播與傳播儀式觀的聯繫窗口，藉由 CDA 對其進行解讀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明確了儀式傳播分析從傳播儀式觀出發，朝文化轉向的可能。

本研究基於傳播儀式觀，認知中共閱兵論述為一儀式性傳播，既是儀式，也

14 納許均衡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參與者的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中，參與者在知悉彼此均衡策略下，只要有人不改變策略，個別參與者就無法改善自己的狀況（Osborne & Rubinstein, 1994）。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就是典型案例。在賽局中，當任何一方通過不合作而獲得優勢時，所有參與者隨時都會面臨囚徒困境，該模型證明了參賽者堅持以自我利益作為出發點時，雙贏或雙輸結局的概率相當（巫和懋、夏珍，2002）。

是傳播。中共通過儀式隱喻，將民眾聚集起來，使其在符號互動中，共享復刻的歷史文化、召喚而來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以及我群與他者共構的團結抗美想像，並就儀式秩序自我構建、相互約束，藉此連結社會，最終完成對共黨專政合法性、權威性的確認，並將自我納進中國夢的集體想像中。

然而，中共閱兵儀式的隱喻，必須從承載社會控制與意義體系的閱兵演講中探尋。故本研究從文本中窺看論述內在結構的不一致，從而揭露隱藏於論述實踐中明示、暗示的操縱或說服特徵，有利於洞察習近平的政治意圖及中共在其領導下的政策趨勢。惟本研究的局限在於，這場閱兵活動實際上吸引了兩岸三地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許多媒體及網路社群也都提出體現各自主張的論述，但因研究目的之故，並未處理更多與意識形態競爭相關的部分；此外，習近平通過閱兵論述進行的政策宣傳，其具體效益為何，亦是本研究未能關照的範疇。

參考書目

-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京舉行〉（2019年11月1日）。《解放軍報》，第1版。
- 〈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和群眾游行 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並檢閱受閱部隊〉（201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第1版。
-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第2版。
- 王孝勇（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149-202。https://doi.org/10.6523/168451532012030040004
- 王海洲（2008）。《合法性的爭奪：政治記憶的多重刻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_____（2009）。〈作為媒介景觀的政治儀式：國慶閱兵（1949-2009）的政治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16（4）：53-60。
- _____（2010）。〈政治儀式中的權力宣展與合法性建構——中國社會變革與政治發展中的國慶大閱兵（1949-2009）〉，《學海》，4：140-149。https://doi.org/10.16091/j.cnki.cn32-1308/c.2010.04.016
- 王堯、馮學知（2019年12月19日）。〈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訪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主任劉結一〉，《人民日報》，第2版。
- 王雅玄（2005）。〈社會領域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方法論的重建〉，《教育

研究集刊》，51（2）：67-97。

王皓昱（1997）。〈歐洲舊「法西斯主義」：政治福音與集體癡狂〉，《東吳政治學報》，7：105-131。

王智盛（2019）。〈《深度觀察》中共建政 70 週年與「十一大閱兵」〉，《交流雜誌》，167：21-24。

李永峰（2019 年 11 月 10 日）。〈人民幣 3.0 抗美元霸權，中國推動區塊鏈領先全球〉，《亞洲週刊》，33（44）：26-30。

李亞明（2006）。〈中共「政黨居主」的政治體制改革策略〉，《復興崗學報》，87：121-146。<https://doi.org/10.29857/FHKAJ.200609.0005>

李宗憲（2019 年 6 月 7 日）。〈臺灣新角色：貿易戰、軍售和印太戰略中的「臺灣牌」〉，《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555739>

李英明（2017）。〈習近平思想：新的中共意識形態模式的興起〉，《展望與探索》，15（9）：8-13。

李美賢、闕河嘉（2018）。〈臺灣「東南亞新二代」的形象建構〉，《傳播文化與政治》，7：133-174。

李華君、竇聰穎、滕姍姍（2016）。〈抗戰勝利 70 週年閱兵儀式的象征符號、閾限和國家認同建構〉，《新聞大學》，136：93-99，114。

李銀祥（2015 年 9 月 4 日）。〈戰略視界下的勝利日大閱兵〉，《中國國防報》，第 4 版。

吳明杰（2019 年 9 月 30 日）。〈【政軍杰論】內外交迫封城閱兵的習武帝〉，《放言》。上網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fountmedia.io/article/35732>

吳明澤（2016）。〈一帶一路、亞投行與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前瞻》，163：79-84。

巫和懋、夏珍（2002）。《賽局高手：全方位策略與應用》。臺北：時報文化。

辛灝年（2015）。《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辛灝年講演錄》。臺北：博大。

林東泰（2019）。《批判話語分析總論：理論架構、研究設計與實例解析》。臺北：巨流。

林柏州（2009）。〈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國慶閱兵的政治意義——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949-1964）〉，《史學彙刊》，23：193-224。

林竣達（2017）。〈川普會逆轉全球化嗎？〉，《新社會政策》，49：45-58。

- 孟祥夫（2019年8月30日）。〈系列活動共慶新中國七十華誕〉，《人民日報》，第2版。
- 周暘展（2018）。《川普上任後的美、中關係發展趨勢及其對臺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814/THE.NCCU.NSMCS.001.2018.F11>
- 紀乃淳（2013）。《小說賽德克·巴萊中族群意識形態之批判論述分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https://doi.org/10.6344/NTUE.2013.00354>
- 姚竹音（2016）。〈揭開習以為常的認同與差異：「部落的呼喚」得獎作品之後殖民批判論述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0（1）：60-85。[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3](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3)
- 姜新立（2018）。〈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評析〉，《展望與探索》，16（11）：1-8。
- 倪炎元（1999）。〈批判論述分析與媒介研究之初探——兼論其在華文媒介上的應用〉，《傳播管理學刊》，1（1）：205-233。
- _____（2012）。〈批判論述分析的定位爭議及其應用問題：以 Norman Fairclough 分析途徑為例的探討〉，《新聞學研究》，110：1-42。[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1](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1)
- _____（2017）。〈2014年臺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42：23-57。
- _____（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臺北：五南。
- 原倩（2018）。〈薩繆爾森之憂、金德爾伯格陷阱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學動態》，10：50-59。
- 習近平（2019年10月1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人民政協報》，第2版。
- 許農合（1999）。《1949-1999 國慶大閱兵》。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黃之棟、朱容萱（2019）。〈你還是不懂我的明白——「大尾鱸鰻2」原住民族歧視風波的批判論述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6（1）：89-126。
- 黃健群（2018）。〈「一帶一路」與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策略與挑戰〉，《展望與探索月刊》，16（5）：94-110。
- 曾復生（2018年10月25日）。〈川普槓中 引爆印太軍備競賽〉，《中時電子報》。上網日期：2019年11月11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81025004163-262104?chdtv>

- 湯惠芸（2019 年 8 月 5 日）。〈香港反送中運動首次發起全面三罷 多區暴發 警民衝突〉，《美國之音》。上網日期：2020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hk-anti-extradition-to-china-gernal-strickes-live-q-and-a/5029210.html>
- 楊增嶸、杜成敏（2018）。〈「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實質評析〉，《思想教育研究》，7：75-79。
- 葉駿（2019 年 10 月 3 日）。〈建政與建國的糾結〉，《中時電子報》。上網日期：2020 年 9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1003004319-262105?chdtv>
- 樊水科（2011）。〈從「傳播的儀式觀」到「儀式傳播」：詹姆斯·凱瑞如何被誤讀〉，《國際新聞界》，33（11）：32-36。
- 劉致昕（2019 年 7 月 25 日）。〈現代集中營——來自新疆「再教育營」的證言：電擊、老虎凳、監視性交的夫妻房〉，《報導者》。上網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xinjiang-re-education-camps-truth>
- 劉建明、徐開彬（2015）。〈「儀式」作為傳播的隱喻之原因探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4）：80-84。
- 蕭阿勤（1997）。〈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35（1）：247-296。
- 謝英傑、謝志淵（2018）。〈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52（4）：121-139。[https://doi.org/10.6237/NPJ.201808_52\(4\).0009](https://doi.org/10.6237/NPJ.201808_52(4).0009)
- 聶建中（2020）。〈數位人民幣開啟數位貨幣暨電子支付金融之影響〉，《展望與探索》，18（5）：1-9。
- 顏慧欣（2019）。〈近期美中貿易戰發展動向之研析〉，《經濟前瞻》，182：9-14。
- 龔祥生、劉姝廷（2019）。〈習近平對臺措施與成效評估〉，歐錫富、龔祥生（編），《2019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頁 46-64。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 Agence-France Presse. (2020, January 14). China trade surplus with US dropped 8.5% to \$296 bn in 2019. *Bangkok Post*.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835484>
- Bennett, B. (2012). *Logically fallacious: The ultimate collection of over 300 logical fallacies* (Academic edition). Sudbury, MA: eBookIt.com.

- Blanchard, B. (2019, April 23). China shows off new destroyer as Xi views naval parade. *Reuters*. Retrieved Octo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military-anniversary/china-shows-off-new-destroyer-as-xi-views-naval-parade-idUSKCN1RZ0AA>
- Bondaz, A., & Delory, S. (2019, September 24).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A revealing example of Chinese strategic power. *The 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Retrieved December 1, 2019, from <https://www.frstrategie.org/en/publications/strategic-imagery/military-parade-70th-anniversary-prc-revealing-example-chinese-strategic-power-2019>
- Bradsher, K. (2019, October 17).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s as Challenges Mount: The U.S. trade war is only part of the problem, as Beijing grapples with weakening investment and falling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7/business/china-economic-growth.html>
- Carey, J. W. (1992).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an, M., Lau, S., & Ng, N. (2017, June 30). Hong Kong's PLA garrison stages biggest military parade in 20 years as Xi Jinping inspects troop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October 5, 2019, fro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00671/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inspects-pla-troops-hong-kong>
- Chang, H.-p. (1997). *Taiwan: Community of fate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Munster, DE: LIT Verlag.
- Fisher, R. (2019, October 1). Arms racing with China: 70th Anniversary Military Parade, part 2: Intimidating Taiwan. *The Epoch Times*. Retrieved July 1, 2020, from <https://epochtimes.today/arms-racing-with-china-70th-anniversary-military-parade-part-2-intimidating-taiwan>
- Friedman, T. L. (2019, August 27). How Trump and Xi Can both win their trade war.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20,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27/opinion/trump-china.html>
- Goffman, E. (1957). Alienation from interaction. *Human Relations*, 10, 47-60. <https://doi.org/10.1177/001872675701000103>

- Hobsbawm, E., & Ranger, T. (Eds.). (2012).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zscheiter, A. (2005). *Power of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iscourse: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global discourse of child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Germany.
- Hornby, L. (2016, April 3). China reverts to 'grid management' to monitor citizens' lives. *Financial Times*. Retrieved July 1, 2020,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bf6a67c6-940e-11e5-bd82-c1fb87bef7af>
- Larsen, B. S. (2000). Radio as ritual: An approach to everyday use of radio. *Nordicom Review*, 21(2), 259-274. <https://doi.org/10.1515/nor-2017-0384>
- Nash, K., & Scott, A. (Eds.). (2001).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UK: Blackwell.
- Osborne, M. J., & Rubinstein, A. (1994). *A course in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eisigl, M., &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UK: Routledge.
-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pp. 87-121). London, UK: Sage.
- (2016).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3rd., pp. 23-61). London, UK: Sage.
-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Tokyo, Japan. (2017, November 6). *The White Hous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9,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abe-japan-joint-press-conference-tokyo-japan>
-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January 26). *The White House*. Retrieved October 20, 2019,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world-economic-forum>
- Rimmer, P. J., & Ward, R. G. (2016). The power of geography. In D. Ball & S. Lee, (Eds.), *Geography, power, strategy and defence policy: Essays in honour of Paul Dibb* (pp. 45-69). Canberra,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Rothenbuhler, E. W. (1998). *Ritual communication: 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 mediated ceremon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echner, R. (2002).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ott, R. E., & Mokhiber, Z. (2018, October 23). The China toll deepen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trieved November 13, 2019, from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the-china-toll-deepens-growth-in-the-bilateral-trade-deficit-between-2001-and-2017-cost-3-4-million-u-s-jobs-with-losses-in-every-state-and-congressional-district>
- Tao, I. (2019, July 13). Top US Officials meet with Hong Kong media tycoon critical of Beijing, much to China's ire. *The Epoch Times*. Retrieved September 15, 2020, from <https://epochtimes.today/top-us-officials-meet-with-hong-kong-media-tycoon-critical-of-beijing-much-to-chinas-ire>
- Taylor, A. (2017, October 13). Ditching deals has become Trump's main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9,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10/13/ditching-deals-has-become-trumps-main-foreign-policy>
- Trump, D. J.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 Turner, V. (1995).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van Gennep, A. (1961). *The rites of passage* (M. B. Vizedom & G. L. Caffee, Tra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9)
- Weiss, G., & Wodak, R. (200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1-13). London, UK: Sage. <https://dx.doi.org/10.4135/9780857028020.n1>
-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197-213). London, UK: Sage.

- (2012). Language, power and identity. *Language Teaching*, 45, 215-233. <https://doi.org/10.1017/S0261444811000048>
- (201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Leung & B. V. Street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studies* (pp. 16-302). London, UK: Routledge.
- Wodak, R., & Meyer, M.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pp. 1-33). London, UK: Sage.
- (2016).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3rd., pp. 1-22). London, UK: Sage.
- Wodak, R., & Pelinka, A. (2002). From Waldheim to Haider—An introduction. In R. Wodak & A. Pelinka (Eds.), *The Haider phenomenon* (pp. vii-xxvii). London, UK: Transaction.

The Official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Chinese Regime Toward the Parade i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s Founding

Yen, Jui-Hu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discourse strategies Xi Jinping uses to convey his political intentions by examining the parad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rough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self-reference, calls for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frame contests, and manipulation of ideologies from relevant texts. It finds that the core discourse revolves around “the absolut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struggle to rebuild the order.” The main target audience of Xi's discourse is the Part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aiwan being “disappeared.” In Xi's discourse, the most obvious “other” is the U.S. Xi Jinping has used patriotism, nationalism, people-centered ideology and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to shape anti-American sentiment. In his strategy for Hong Kong and Taiwan, Xi has proposed a framework of “unity” and “peace” to fight against the “democratic system.” Xi Jinping manipulates spurious relationships and the other three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to distort history and consolidate his regime. The ideology thus constructed main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alue,” “de-negotiation,” “de-continuity,” and “re-sovereignty” strategies.

Keywords: parade, discursive strateg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deology

^{*} Email: gnufather@gmail.com

Received: 2020.2.7

Accepted: 2020.11.7

社群公關倫理的理論與實踐^{*}

鄭怡卉^{**}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

摘要

專業倫理是公關學門中具有學理與實踐價值的研究主題，也隨著社群媒體的出現，值得開展更多的討論。現今公關實務包含經營社群平臺與網路聲量等工作，新媒體促成了產業轉型的同時也帶來了爭議，倫理的討論亦更形重要。過往相關文獻較為哲學性的論述與個案分析，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資料的蒐集，從實務人員的觀點探討社群媒體所衍生的專業倫理議題。調查結果中，受訪者認為社群公關實務中隱私權、企業保密、訊息真實性，以及法律規範為重要議題，約半數受訪者表示組織有公關專業倫理相關守則，約三分之一表示有新媒體相關守則，但對於倫理規範的實用性則大多抱持保留的態度，本文最末則根據研究發現探討可延伸之學理觀點，以及實務應用的意涵。

關鍵詞：網路公關、社群媒體、公關倫理、道德管理

* 作者感謝所有百忙中協助與參與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公關從業人員。本研究感謝科技部贊助，本文資料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公關從業人員的新挑戰：網路新媒體的應用與專業倫理之考量」（MOST 100-2410-H-004-164-SS2）之部分研究成果。

** Email: icheng@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

壹、研究背景

在過往大眾媒體時代，公關實務工作多著重在新聞發布與媒體關係的建立，也仰賴主流的新聞媒體與記者協助傳遞訊息給社會大眾，因此其中專業倫理的討論，也傾向由新聞與資訊內容的角度進行探討；然而隨著網路發展與社群媒體日漸普及，公關實務工作內容變得更加多元，專業倫理議題也面臨新的挑戰。在 Wright & Hinson (2012) 的調查中曾發現，企業在社群媒體上主要的管理者經常是企業溝通人員或公關人員，他們除了要負責監測不同社群上的公眾意見外，Men & Tsai (2012) 更認為企業使用社群媒體，必須要經營網路上與公眾的關係，反映著現今公關人員的社群媒體相關實務除了透過網路搜集與瞭解公眾意見，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網路上為組織創造曝光與聲量，例如為企業或品牌在臉書上建置官方粉絲專頁、與網路意見領袖之部落客進行合作，產製社群媒體內容，或者於網路論壇上為品牌創造更多的討論等，其中衍生出了新的公關倫理議題，例如 Gallicano, Bivins, & Cho (2014) 就曾討論當企業執行長的部落格由雇用的寫手撰寫內容時，是否應加以揭露相關事實；Sweetser (2010) 的研究則認為企業於社群媒體上的資訊若未適當揭露或透明化，將影響公眾對組織的信賴感。總而言之，新媒體的採用促成了公關實務工作轉型，同時也讓產業面臨更多爭議，因此倫理議題的討論應該更形重要。

面對網路時代下公關專業倫理的新議題，部分學術研究已嘗試展開一些貼近實務的討論，DiStaso & Bortree (2014) 曾在 Arthur W. Page Center 的贊助下，邀請多名學者進行以新媒體與公關倫理為主題進行相關研究計畫，最後集結成《公關中社群媒體的專業倫理實務》(*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一書，書中各章節探討的主題廣泛地從企業社會責任、環境議題、危機溝通與政府公關等多個角度切入（例如：Bortree, 2014; Coombs, 2014; Sweetser, 2014; Tirkkonen & Luoma-Aho, 2014），書中研究較多以個案分析的方式，描繪與討論組織如何於社群平臺上回應與管理議題（例如：Coombs, 2014; Logan & Tindall, 2014; Sisco, 2014），亦有內容分析研究比較組織在不同社群平臺上的發文，以探討組織如何與公眾進行對話（例如：Berg & Sheehan, 2014; A. M. Lee, Gil de Zuñiga, Coleman, & Johnson, 2014）；從這本專書的內容與研究主題可見，社群公關實務有諸多面向都牽連著專業倫理的議題，也顯示出相關研究未來仍有許多值得延伸探討的可能。

近二、三十幾年公關學者以網路與新媒體為主題的研究日益增加，但整體

而言，其中探討相關倫理議題的研究則仍是少數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Ye & Ki, 2012)，有學者認為其背後原因可能是因為公關實務工作上對於專業倫理的標準和要求實際上並不高，也有可能是因為理論性的學術論述，對於公關從業人員協會或坊間企業組織在訂定工作倫理守則時，通常也不太會被採用作為編訂規章時的參考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S. T. Lee & Cheng, 2012)。此外，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也曾批評多數的公關倫理研究受到同為傳播學門中新聞倫理文獻影響，認為公關專業倫理的研究在學理上往往難以跳脫新聞倫理討論的框架，以至於研究結論往往無法提供公關實務從業人員一個清楚的指引方針。

過往在公關學者與公關實務人員提出的意見中，大多都認同倫理是公關專業的重要核心 (Bowen, 2004; Day, Dong, & Robins, 2001; Fitzpatrick & Gauthier, 2001; Grunig, 2001)，例如美國公關人員協會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n.d.) 就條列出了公關從業人員的專業守則項目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PRSA] Code of Ethics)，內容涵蓋倡議 (advocacy)、誠實 (honesty)、專業 (expertise)、獨立性 (independence)、忠誠 (loyalty)，以及公平 (fairness) 等核心價值，然而學者們亦曾評論倫理的守則雖有其參考的價值，但原則性的條文若對應公關實務中繁忙瑣碎的日常工作，很可能會顯得過於模糊，因而倫理守則對於從業人員在具體實踐上的助益並不大，也可能無助於公關人員在組織面對倫理挑戰時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Curtin & Boynton, 2001; Huang, 2001; Fitzpatrick, 2002)。

早期一項北美地區的調查研究就顯示，組織於內部倡議倫理議題時，公關人員往往未能發揮具有決策性的影響力 (Fitzpatrick, 1996)，較近期的研究也發現，既有的公關教育與訓練仍欠缺足夠與倫理相關的內容，難以預備公關人員成為組織或企業在倫理議題上的管理者或領導者 (Bowen, 2008)；同樣的，國際公關從業人員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cators, IABC) 針對會員的調查也顯示，企業公關人員在職訓練的課程中，專業倫理的內容所占不多，約有七成受訪者表示過去在求學過程中也極少接觸倫理相關的內容 (Bowen, 2006)；更近期以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成員為樣本的研究也發現 (S. T. Lee & Cheng, 2012)，約半數受訪者在職涯中未曾有倫理相關的訓練，而大專以上學歷的受訪者中，也約有半數表示過去在校園中不曾修習相關課程內容。由這些發現皆可看出公關專業倫理的理念與實務之間，可能仍存有相當的落差，也凸顯出如何將公關倫理的認知轉化為更具有道德性的實踐作為，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學術

主題。

國外公關學者與公關專業協會對於從業人員在倫理素養上的重視與要求，與前述研究結果相對照之下，可看出理論與具體實踐之間的落差，而目前在中文的文獻中尚未找到有類似的調查或研究，可提供接近本地的觀察。目前在臺灣的公關專業協會組織主要有二，一為「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¹，另一為「臺灣／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Taiwan/Taipei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ssociation, TIPRA）」²，兩協會在成立宗旨或組織目標中都提及倫理相關的理念，例如誠實、促進公眾利益，與提升專業地位，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針對倫理議題的守則或論述，但從其創辦理念與協會活動中，仍可看出協會成員並未放棄對於專業理想的追求。

然而對應臺灣的社群媒體實務現況，「網路口碑行銷」、「業配文」、「論壇寫手」以及「網軍」等現象，已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注意、討論甚至批評，例如新聞報導 2013 年間臺灣三星電子公司曾指派集團子公司鵬泰顧問有限公司進行網路宣傳，聘請寫手或是自家員工假裝是網友分享公司產品的使用心得，並攻擊競爭對手宏達電的產品，成為「寫手門」事件，繼網路熱烈轉發該事件相關資料，媒體也加以報導，最後政府對三星處以千萬元的罰款（嚴思祺，2013 年 10 月 24 日）；又例如在 2019 年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編列了 1,450 萬預算雇用網路小編澄清網路不實謠言，受到質疑以人民納稅錢培養「網軍」，此後「1450」便成為政治性「網軍」的代名詞（勞倫溼，2019 年 8 月 14 日；蔡晉宇，2019 年 12 月 4 日）；網軍的案例亦可見於在 2020 年 1 月，檢警起訴之前被媒體冠上稱號的「卡神」，起訴書認為她於 2018 年間曾指揮網軍汙衊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其網路霸凌行徑間接造成該處處長輕生之不幸（王聖黎，2020 年 1 月 22 日）。寫手門事件中的從業人員當初面臨什麼樣的情境，如何進行道德上的思辨，而網軍不一定由專業的公關人帶領，類似的宣傳手法在公關實務的觀點中如何定位等問題，都可延伸討論整體公關產業對於相關議題的意識與重視程度如何，以及實務中如何進行討論與管理上的應對，亦即本研究希望探討的主題。

綜合以上，公關倫理議題所關注的是公關從業人員對於是非的認知與判斷，以及其實務工作中如何實踐道德的作為，本文即希望透過調查臺灣地區的公關公

1 財團法人公關基金會（n.d.）在成立緣起中提及，「宣揚公共關係的真理念，提升公共關係事業的社會地位」之宗旨。

2 臺灣與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n.d.）在組織目標中提出，「維持並保證公關之合法、誠實、淨化和真實，以促進及保障一般大眾之利益」之協會宗旨。

司與組織內部的公關人員，瞭解目前在地公關人員對於相關倫理議題的認知，並嘗試探討既有的公關教育與組織內部訓練如何傳遞與管理相關的倫理知識，除了有助提升公關實務在專業倫理的管理，亦企盼能為未來在地公關專業倫理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延伸討論的基礎。

貳、文獻回顧

一、社群媒體採用與公關倫理

早期社群公關的研究主要為調查不同領域的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也逐漸觀察到新媒體為公關產業帶來轉型的趨勢，例如：Eyrich, Padman, & Sweetser (2008) 以 IABC 與 PRSA 的成員為研究對象，廣泛詢問其公關工作中是否有使用各種網路工具，約有四成受訪者表示已使用部落格於公關工作中，而採用社交網站的受訪者則接近兩成半，也發現公關公司的實務人員比起企業內部、教育組織或非營利組織之公關人員，更有意願採用新媒體。後來 Curtis et al. (2009) 調查美國非營利組織時則發現，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更為普遍，半數以上的受訪者已採用社群網絡、部落格與微型部落格（如：推特 [Twitter]）等；Avery et al. (2010) 也針對美國不同地區的政府公共衛生部門進行類似調查，發現使用社群媒體於健康宣導工作的政府人員比例略低於兩成，其中社群網站採用度最高，其次為部落格與網路論壇，從中可觀察到，新媒體的採用其實受到組織與環境性因素的影響。

後續也有類似的研究調查在中東地區進行，當地學者也觀察到公關產業有逐漸增加運用社群媒體的趨勢 (Alikilic & Atabek, 2012; Khajeheian & Mirahmadi, 2015)，Alikilic & Atabek (2012) 針對土耳其公關協會成員所進行的小樣本調查中（ $N = 126$ ），社群網站採用比例雖不到五分之一，但仍被視作是公關未來最重要的溝通工具。總而言之，前期的這些調查呈現出不同國家與不同產業領域的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也可窺探出公關從業人員看待新媒體帶來產業轉變所抱持的態度，可能因所屬組織或情境而有不同，另一方面這類調查也凸顯出在公關產業內，公關人員必須思考如何協助組織應用與管理社群網站等新媒體工具。Diga & Kelleher (2009) 的研究調查就發現，愈是經常運用社群媒體的公關人員，往往愈認為自己在組織內有較高的專業權力與決定權力。

除了調查不同領域的公關人員採用社群媒體的情況，過去以社群媒體為主題的公關研究亦有相當的數量著重在探討社群媒體在公關實務中的功能與效益，

例如分析與比較不同新媒體的特性，以及它們與在組織溝通中可發揮什麼特色 (Seltzer & Mitrook, 2007; Smith, 2010; Sweetser & Metzgar, 2007; Trammell, 2006; Yang & Kang, 2009)，這類研究結果大多歸納認為新興媒體的特性，往往更符合公關學者主張的雙向對等與對話式的溝通 (Grunig, 1992; Grunig & Hunt, 1984; Kent & Taylor, 1998, 2002)；以 Seltzer & Mitrook (2007) 的內容分析研究為例，在比較組織在部落格與傳統網站的介面後，研究結果認為組織在部落格的互動式溝通表現更佳。由這類研究的結論中可觀察到，比起早期研究認為官方網站是組織與公眾對話的重要媒介（例如：Kang & Norton, 2006; Kent, Taylor, & White, 2003），有學者們認為，溝通形式較為新穎的部落格或其他社群媒體，更有利於組織與公眾進行有效的互動與對話，而得以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

之後 Waters, Burnett, Lamm, & Lucas (2009) 的研究，也透過內容分析研究檢視非營利組織的臉書 (Facebook) 粉絲專頁，以瞭解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人員如何運用臉書平臺上不同的功能，結果發現，整體而言非營利組織在臉書上有關資訊揭露的道德表現頗佳，有其開放性與透明性，但平臺上影音與互動功能的應用則較少，因此建議非營利組織的公關人員未來可再加強善用平臺本身多媒體的特性。綜觀以上研究可看出，社群公關的研究逐漸觸及了倫理議題，但學者尚未聚焦在道德面的探討，而是在公關效益的討論中，表示良好的溝通是立基於透明與開放的資訊，以及充足的對話與互動之上。

更後期有公關學者開始以社群實務的公關倫理作為研究主題，但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理論概念大致未脫離之前的研究取徑，例如 A. M. Lee et al. (2014) 以 25 間美國五百大企業為觀察對象，採取內容分析法比較其臉書與推特的經營情況，研究結論認為企業在臉書上的資訊內容更為充足完整，並且更能做到回應問題，以及與消費者互動與進行對話，因而具有更高的道德性。藉由 A. M. Lee et al. 的研究與推論可觀察到兩點，首先，相關研究仍依循著早期用於探討新媒體採用的對話理論 (Kent & Taylor, 1998, 2002)，同時，社群媒體因為具有高度互動的特性，似乎被視為是公關進行更符合倫理溝通的利器，這類推論可能偏漏了伴隨社群媒體便利功能而來的爭議性問題，單純依循對話理論也可能難以探討社群公關實務中負面議題的全貌。

大約同期的 Bowen (2013) 同樣透過內容分析與個案式的研究取徑觀察社群公關實務的倫理面向，但她在研究中嘗試提出自己的主張，條列出具有理論性的道德規範，她建議社群媒體公關倫理規範應包括（同上引, p. 126）：公平謹慎 (be fair and prudent)、不欺瞞 (avoid deception)、尊嚴與尊重 (maintain dignity and

respect)、對等(is it reversible)、透明(be transparent)、可清楚識別身分(identify)、註明資料出處與來源(verify sources and data)、建立責任(establish responsibility)與檢驗動機(examine intention)等。Bowen 提出的規範性建議主要依據其企業案例的分析,她以五則正、反面的案例探索公關實務在社群媒體上所面對的專業倫理議題,其中負面案例包含了:零售商 Walmart 設置假部落格,速食連鎖店 Carl's Jr. 請名人發送推特訊息卻未揭露付費的事實,後面兩個案例違背了公關誠實不欺與必須公開揭露客戶身分的準則,其溝通手段的不當造成了倫理上的爭議,也是其道德問題的本質。

Bowen (2013) 關注於探討溝通手段或溝通過程的正當性,以及個人倡議條列式的社群公關倫理規範,主要是採取了過去道義論(deontology)的觀點,Kant (1783/1977) 的道義論的理論核心強調個人有責任遵守規範與原則,簡單的來說,從道義論的觀點,要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看重的是過程中該行為是否遵循規範,而較不強調行為最後的產生的結果或影響;Bowen (2013) 的論點即依循了規範性理論的框架,透過正、反面案例情境進行主觀的觀察與分析,所歸納出來的各項概念之中,少部分雖是公關價值的描述(例如:尊嚴與尊重),更多數是社群公關作為的守則(例如:公開識別身分與註明出處),她的論點可作為調查公關人員如何看待社群媒體的應用實務所涉及的道德議題時的參考。由社群公關研究的理論脈絡至此亦可觀察到,採取道義論而關注溝通手段正當性的學術討論較多,而看重溝通結果對於他人乃至對於社會的影響的功利主義取徑(utilitarian approaches)或「結果論」(consequences) (Gower, 2007),則較少被提出一起進行探討,這點亦值得未來研究者嘗試開展公關倫理理論架構時作為參考。

二、倫理知識與道德管理

從理論到實踐,公關人員倫理相關的認知從何而來,如何建立,又如何於工作中落實,過去相關研究所瞭解的仍頗為有限。S. T. Lee & Cheng (2011) 曾訪談 20 位美國公關產業具有領導者地位的資深實務人員,研究結果發現公關倫理議題的領導者本身俱備的價值理念,有其一大部分扎根於個人的價值觀,而不一定與其職務或專業背景有關,顯示出公關專業倫理的知識,即公關工作中是非的判斷過程裡所隱含的知識,有個人化的特質。Kupperman (1970) 定義「倫理知識」(ethical knowledge) 為「知道何謂對,何謂錯,以及我們有責任做什麼,還有

何為價值的知識」(同上引, p. 8), 而當倫理的知識有其個人化、抽象、與難以傳遞的本質 (S. T. Lee & Cheng, 2012), 如何於組織中管理與實踐倫理的理念, 以及提升人員在決策過程中的價值判斷的能力, 便成為公關專業倫理在組織管理上面臨的挑戰。

所謂倫理的管理 (ethics management) 即是希望透過正式化、有系統的管理手段, 協助組織達到實踐倫理作為的目標, 並且妥善回應社會上不同利益關係人的期待 (S. P. Kaptein, 1998; Wieland, 2003)。一般來說, 倫理管理在組織管理的設計上可能包含了幾類面向, 例如: 正式的倫理守則、負責相關政策與俱有監督功能的倫理委員會、相關的溝通管道與平臺 (例如: 通報或諮詢熱線)、專職負責執行倫理政策的高階主管、提升倫理意識與認知的相關在職訓練、對不道德的行為有正式處罰性規範, 以及對合宜的道德行為提供誘因與獎勵 (M. Kaptein, 2010; S. P. Kaptein, 1998; S. T. Lee & Cheng, 2012; Weaver, Treviño, & Cochran, 1999; Wieland, 2003)。在企業倫理的討論中, 倫理的管理大多偏重討論如何將倫理的議題於組織內正式化與結構化, 例如設立倫理委員會 (Sims, 1992; Weber, 1981), 以及探討管理者如何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實踐與執行, 例如經理人可與員工在正式的會議中, 或在日常的聊天中進行討論 (如: McCoy, 1985; Murphy, 1988)。

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的論述提供了適合探討公關倫理管理的學理角度, McPhail (2009) 就認為倫理相關的知識有其抽象、較為個人化的部分, 是隱性的知識而非清楚外顯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vs. explicit knowledge)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在學理的概念上, 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主要區別之處在於知識可以透過明文方式呈現而得以被分享與傳遞的難易程度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顯性的知識通常可以很容易以文字表達, 在組織內也可常見以守則、規章或專利的形式呈現, 而隱性知識相較於顯性的知識則比較不容易表現或呈現, 不易訴諸於正式文字, 也不容易透過正式的管道傳遞給他人, 然而這類隱性的知識對於組織而言往往是重要知識的核心, 也是組織創新的泉源, 提倡知識管理的學者就主張組織必須將重要的隱性知識加以管理, 於組織內作有效的傳遞與共享, 才能夠促使組織進步 (Drucker, 1993, 1994;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 Toffler, 1990)。另外一方面, 隱性知識相較於顯性知識的概念上, 還有個人化的特色, 亦即隱性知識往往深藏於個人心中, 也附帶著獨特情境條件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 Sullivan, 1998), 例如倫理知識最終在行為上的展

現，即可能是個人與情境互動的結果 (Trevino, 1986)。

組織針對倫理議題進行的管理工作，即透過正式化的途徑或手段影響員工道德意識與行為，學者將之視作組織控制與管理員工的一種機制，目的是為了建立員工行為的標準，並確保員工行為符合倫理與法律的規範 (Weaver et al., 1999)；也就是說，組織針對倫理議題所建立的管理機制，有其目的性 (S. T. Lee & Cheng, 2012)，而在執行上，不同組織的倫理管理機制所重視的面向與控制的程度則有所差異，偏向強制性與重視順服性的倫理管理機制 (coercive or compliance-based control) 更為強調行為的規範與限制，例如透過懲罰的手段來管束組織認為不合宜的行為，相反的，以價值為基礎的倫理管理機制 (value-based control)，則更為希望建立員工對於企業核心價值的認同，再藉此確保組織成員作出合宜的行為 (Adler & Borys, 1996; Etzioni, 1961; Gouldner, 1954; S. T. Lee & Cheng, 2012; Scott & Meyer, 1991)，而其中領導者通常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即是透過樹立行為模範 (modeling)，亦即以身作則的方式，傳達組織所認同的價值、態度與行為以影響員工 (S. T. Lee & Cheng, 2012)；也有學者認為，強制性與價值型的倫理管理機制亦可能同時成立，因為這兩種機制都強調遵守規範與準則，一方面監督組織成員的行為，一方面約束不合宜、違規的行為，而重視員工價值認同的管理控制機制，則更常採取透過教育訓練的手段，希望激發員工自身對於倫理價值的嚮往，以及對於組織核心價值與目標的認同，最終建立起重視倫理價值的企業文化 (S. T. Lee & Cheng, 2012; Paine, 1994; Trevino, 1990)。

前面所提及的 PRSA 與 IABC，亦多藉由文字性的守則與規範以管束公關產業的從業人員，雖然對於文字性守則的熟習程度有助於提升個人的道德意識 (Wotubra, 1995)，然而一般性的守則不一定能適用於公關人員日常所面對的多樣情境，實際在執行或應用上往往有其困難 (Curtin & Boynton, 2001; Fitzpatrick, 2002)，一般來說，在國際間知名的公關公司與本地較具規模的公關公司，可以見到有專業倫理相關的規範或教育訓練，但攸關新媒體的倫理議題如何在組織內進行管理，是透過正式的文字守則、獎罰機制的設計、教育訓練的課程或工作坊、同仁間的聊天討論，或者僅憑藉個人對於職場一般的直覺判斷，在過去的文獻中尚未見有相關著墨，仍待進行更多的研究與探討。

因此基於前述的討論，為瞭解臺灣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與新媒體相關議題的觀點，以及探討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與倫理知識的管理方式，本文提出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臺灣公關人員是否看重專業倫理的議題？

研究問題二：哪些社群媒體的相關倫理議題受到公關人員的重視？

研究問題三：公關人員如何看待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

研究問題四：公關人員如何管理新媒體相關的倫理議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國內公關公司與國內企業或組織內部的公關人員，有鑒於臺灣地區未有如美國之大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可提供實務人員名單供調查研究使用，本研究樣本之建構，首先依《動腦雜誌》所排名之國內大型公關公司名單、《天下雜誌》列名於標竿企業之 25 大行業名單，以及喜馬拉雅研究基金會出版之非營利組織名錄，總共 314 家組織，逐一整理出公關相關部門聯絡資訊後，每家分別以郵件與電話並行詢問參與研究意願，再配合各公司意願提供紙本問卷或問卷網頁連結方式進行資料搜集，最後共回收 194 份有效問卷。估計各公司的回覆率，以收到回應同意參與研究的家數除以有效家數（包含回應答應填答、拒絕參與、與聯繫上但未有回應者，資料錯誤或聯繫不上的無效樣本則加以扣除），計算出回覆率約為 17%。受限於實務人員參與研究之意願，本次研究回覆率略為偏低，但與過去以臺灣地區五百大企業公關人員為母體的研究相比差距不大（劉千祥，姚惠忠，2018；Huang, Lin, & Su, 2005），樣本數也頗為接近。

問卷問題除了基本題項外（年齡、性別、學歷、教育背景、公司類別與所服務的產業類別，以及網路新媒體的使用情況等），主要包含四大部分：

一、有關公關專業倫理的認知，參考 S. T. Lee & Cheng (2012) 研究，相關題項主要有三部分：（一）對於倫理議題的重視程度與工作情境包含有三題，分別為「『公關專業倫理』對於公關是重要的議題」與「在我的公司是重要議題」，以及「工作中我常遇到相關的難題」；（二）關於倫理責任的看法，包含三題：「是公關人員個人的責任」、「管理階層是推廣的重要角色」與「管理階層比一般人員有推廣責任」；（三）為探究受訪者對於倫理知識的本質有何認知，由 S. T. Lee & Cheng 相關題項中挑選較適用於一般情境之問題（例如刪除參與「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之題項），最後問卷共編修七項與知識管理概念更為扣連之題項：「可從工作中學習而來」、「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可

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與「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等，上述題目之答項皆使用李克特氏 (Likert) 五點同意度量表 (1 分 = 「非常不同意」，2 分 = 「不同意」，3 分 = 「普通」，4 分 = 「同意」，5 分 = 「非常同意」)。

二、關於網路新媒體倫理相關議題的看法，參考 Bowen (2013) 的原則，對應臺灣情境與產業現象提出初探性題項，詢問受訪者「在新媒體應用上，以下您認為是否認為是『公關專業倫理』的迫切議題？」，包含：「訊息的真實性」、「隱私權相關議題」、「企業保密相關議題」、「配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僱用寫手發表訊息」、「付費給部落客」、「不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虛擬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付費創造活動票數或按讚」、「言論批評他人」、「言論攻擊他人」、「大眾不信任網路資訊」、「社會認為公關人員道德感低」、「公關人員的價值觀」、「公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等，共 16 個題項，答項使用 Likert 五點同意度量表 (1 分 = 「非常不同意」，2 分 = 「不同意」，3 分 = 「普通」，4 分 = 「同意」，5 分 = 「非常同意」)。

三、有關組織如何將倫理知識進行管理，參考過去研究 (S. T. Lee & Cheng, 2012; Nonaka & Takeuchi, 1995; Polanyi, 1966)，倫理知識管理的相關題項包含兩題：(一) 為瞭解組織是否有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題目為「請問您公司是否有任何關於『專業倫理』的文字守則或規範」，項包含「是」、「否」與「不確定」；(二) 探詢有關倫理守則的應用與管理方式之題目，該題為複選題，題項包含：「新進人員訓練」、「簡短文字海報」、「發給每位員工」、「規定員工閱讀後簽名」、「遇到難題時的參考」、「不太有用」，或「其他 (請說明)」等 7 項。

四、組織內與新媒體相關的倫理守則與所規範的面向，其中有三類題目：(一) 組織是否有規範，題目為「請問您公司是否有『新媒體』或『網路』相關工作守則或規範？」，答項包含「是」、「否」與「不確定」；(二) 新媒體或網路相關的工作守則或規範內容為何，題目為複選題，答項包含：「發布訊息的審核流程」、「確定訊息正確無誤」、「確定內容符合事實」、「必須公開註明身分」、「禁止負面或攻擊性言論」、「禁止談論工作機密」、「說明政府相關法規」、「隱私權議題」，與「其他 (請說明)」；(三) 有關倫理議題與規範如何與組織中進行溝通與討論，該題目為複選題，答項

包含：「從未討論」、「開會討論」、「員工訓練」、「同事間聊天」、「詢問上司意見」、「上司直接表達意見」，與「其他（請說明）」等。

肆、研究結果

根據填答者在人口結構的資料顯示，本次研究樣本約有八成左右為女性公關從業人員（81%），平均年齡為 32.7 歲，大約八成左右就職於本國企業（82%），近兩成服務於外商或以外資為主的公司（18%）；約五成左右的受訪者任職於公關顧問公司（公關代理商），服務產業別或主要工作領域以消費性產品為最多（約六成），其次有高科技產業、企業社會責任、醫藥產業與財務金融產業等；學歷背景方面，約六成的填答者具有大學學歷（63%），三成多有碩士以上學歷（35%）。

在新媒體的使用情況上，受訪者表示最常使用的幾個平臺中以臉書最為頻繁（93.7% 表示使用臉書；73.9% 回答「經常」，12.7% 回答「偶爾」，7.0% 「很少」，6.3% 「從未」），其次部落格與網路論壇使用情況也頗為普及（73.6% 表示使用部落格；24.8% 回答「經常」，28.9% 回答「偶爾」，19.8% 「很少」，26.4% 「從未」；69.6% 表示使用網路論壇；18.8% 回答「經常」，29.5% 回答「偶爾」，21.4% 「很少」，30.4% 「從未」），使用行動通訊軟體的受訪者也不少（54.7% 表示使用行動通訊軟體；25.6% 回答「經常」，13.7% 回答「偶爾」，15.4% 「很少」，45.3% 「從未」），亦即社群媒體中最常見的工作實務為建置官方粉絲團、與部落客合作、網路論壇的合作活動，以及設立 Line 平臺上的官方帳號。

一、專業倫理與新媒體議題（RQ1 & RQ2）

關於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重視程度如何，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公關專業倫理對公關是重要議題，幾乎有 90% 的受訪者是同意的（59.3% 的受訪者表示「同意」，30.4% 表示「非常同意」）；詢問對於其公司是否為重要議題時，同意度較前題略低，約為 80%（49.5% 表示「同意」，29.9% 表示「非常同意」）；至於受訪者是否認為自身工作常遇到倫理相關的難題，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同意」（45.6%）以及「普通」（35.8%），部分表示「不同意」（11.4%），少數表示「非常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分別為 6.2% 與 1.0%）。攸關公關倫理責任的認知，僅約半數受訪者同意是公關人員個人的責任（38.3% 表示「同意」，11.4% 表示「非常同意」），相較之下，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更同意管理階層在倫理議題的推廣上

擔任重要角色（55.2% 表示「同意」，28.9% 表示「非常同意」），並且認為管理階層比一般公關人員具有推廣責任（53.6% 表示「同意」，24.7% 表示「非常同意」）。為探討受訪者是否因組織情境不同而看法有異，因此進一步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題項的認知與態度，資料分析結果並未發現兩組受訪者有顯著差異。

有關新媒體在公關實務中可能面對哪些專業倫理上的挑戰，資料顯示有多項相關議題值得關注（請見表 1），其中，受訪者認為最迫切的主題為「隱私權議題」（ $M = 4.11, SD = 0.73$ ）、「提供真實訊息內容」（ $M = 4.07, SD = 0.68$ ）、「企業保密相關議題」（ $M = 4.03, SD = 0.77$ ）與「法律上相關規範」（ $M = 4.03, SD = 0.77$ ）；其次為「公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M = 3.75, SD = 0.86$ ）、「言論批評他人」（ $M = 3.70, SD = 1.15$ ）、「言論攻擊他人」（ $M = 3.69, SD = 1.21$ ）、「配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 $M = 3.63, SD = 0.90$ ）、「大眾不信任網路資訊」（ $M = 3.61, SD = 0.87$ ）、「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 $M = 3.59, SD = 0.86$ ）、「虛擬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 $M = 3.59, SD = 0.93$ ），其次為「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 $M = 3.55, SD = 0.91$ ）、「不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 $M = 3.55, SD = 0.89$ ），

表 1：社群媒體倫理議題

議題類別	整體樣本		公關公司		非公關公司	
	<i>M</i>	<i>SD</i>	<i>M</i>	<i>SD</i>	<i>M</i>	<i>SD</i>
隱私權議題	4.11	0.73	4.08	0.80	4.15	0.65
提供真實訊息內容	4.07	0.68	4.02	0.72	4.13	0.64
企業保密相關議題	4.03	0.77	4.04	0.84	4.01	0.69
法律上相關規範	4.03	0.77	4.01	0.85	4.05	0.69
公關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3.75	0.86	3.69	0.89	3.81	0.84
言論批評他人	3.70	1.15	3.71	1.17	3.69	1.14
言論攻擊他人	3.69	1.21	3.70	1.22	3.69	1.21
配合客戶不合宜的要求	3.63	0.90	3.72	0.94	3.54	0.85
大眾不信任網路資訊	3.61	0.87	3.69	0.85	3.52	0.88
不以真實身分發表訊息	3.59	0.86	3.71	0.80	3.48	0.92
虛擬帳號參與投票或按讚	3.59	0.93	3.67	0.91	3.51	0.95
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	3.55*	0.91*	3.70*	0.83*	3.40*	0.98*
不公開廠商贊助或合作關係	3.55	0.89	3.63	0.89	3.48	0.88
付費給部落客	3.45*	0.89*	3.61*	0.91*	3.27*	0.9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答項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 $p < .05$

以及「付費給部落客」（ $M = 3.45, SD = 0.89$ ）。進一步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新媒體倫理議題的看法發現，資料分析顯示多數題項無顯著差異，但有兩個題項發現存有差異：「僱用寫手發表論壇訊息」公關公司人員較非公關公司人員更認為是迫切議題（ $M = 3.70, SD = 0.83$ vs. $M = 3.40, SD = 0.98; F = 7.0, df = 1, p < .05$ ）；「付費給部落客」公關公司人員亦更認為是迫切議題（ $M = 3.61, SD = 0.91$ vs. $M = 3.27, SD = 0.91; F = 5.0, df = 1, p < .05$ ）。

二、倫理知識與管理（RQ3 & RQ4）

有關公關人員如何看待專業倫理知識的本質，受訪者最同意「可從工作中學習而來」（ $M = 4.08, SD = 0.62$ ）、「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 $M = 3.96, SD = 0.65$ ）、「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 $M = 3.83, SD = 0.70$ ）、「可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 $M = 3.83, SD = 0.79$ ）、「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 $M = 3.69, SD = 0.75$ ）；同意度次高的問卷題項為「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 $M = 3.62, SD = 0.84$ ）與「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 $M = 3.56, SD = 0.83$ ）（請見表2）。進一步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倫理知識本質上之看法，資料分析結果未發現兩組受訪者有顯著差異。

關於公關人員倫理知識的管理，與新媒體相關議題的應對上，約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組織制定有專業倫理守則，近兩成表示沒有，有趣的是約三成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組織是否提供公關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51% 答「是」、13% 答「否」、36% 答「不確定」）。組織制定有倫理守則的受訪者表示，守則中「有

表 2：公關倫理知識本質

項目	<i>M</i>	<i>SD</i>
隱性知識		
可從工作中學習而來	4.08	0.62
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	3.83	0.70
可從同事間的聊天學習	3.69	0.75
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	3.62	0.84
顯性知識		
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	3.96	0.65
可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	3.83	0.79
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	3.56	0.8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答項使用 Likert 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普通，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獎勵也有懲罰」占 29%，僅有懲罰性規範者次多，占 25%，另外有 22% 表示「兩者皆無」，約略同比例 22% 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而組織沒有提供文字守則的受訪者卻大多也表示，雖然沒有文字上的規範，同仁間多存在有相當的共識（77% 答「是」，4% 答「否」，19% 答「不確定」）。若組織有文字性規範，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相關規範多用於新進人員的訓練（91.3%，複選題），其他方式則是發給員工（56.6%），規定員工閱讀後簽名（50.7%），較少真的作為遇到倫理困境時的參考（35.9%）。

關於組織是否有新媒體的相關規範，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有，四成表示沒有，而兩成多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31.4% 答「是」，42% 答「否」，26.2% 答「不確定」）；關於新媒體相關倫理守則的規範內容，回答組織有新媒體相關倫理規範的受訪者表示，相關規範面向有幾個主要項目（請見表 3），包含：「確認訊息正確無誤」（27.5%）、「確定內容符合事實」（27.5%）、「禁止負面或攻擊性言論」（25.1%）、「發布訊息的審核流程」（21.9%）、「禁止談工作機密」（21.9%）、「隱私權議題」（21.1%），較少規範「必須公開註明身分」（8.5%）或「說明政府相關法規」（9.7%）。當問及組織如何討論新媒體規範議題時（複選題），受訪者表示較多於「開會討論」（31.7%）與「員工訓練」（28.9%）時，少數是「上司直接表達意見」（19.0%）、「詢問上司意見」與「同事間聊天」（皆為 18.3%），極少數選擇「從未討論」（3.5%）。

進一步資料分析比較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之從業人員在前述倫理管理題項發現，多數題項無顯著差異，僅有三個題項存有差異：「公司是否有新媒體或網路相關工作守則或規範？」兩者回答「是」的比例相當（皆約三成比例），但公

表 3：社群媒體倫理規範項目

規範項目	%
確認訊息正確無誤	27.5
確定內容符合事實	27.5
禁止負面或攻擊性言論	25.1
發布訊息的審核流程	21.9
禁止談工作機密	21.9
隱私權議題	21.1
說明政府相關法規	9.7
必須公開註明身分	8.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N = 194，該題為複選題。

關代理商答「不確定」較多（38% vs. 15%），非公關代理商答「否」較多（52% vs. 34%）（Pearson Chi-square = 14.40, $df = 2$, $p < .05$ ）；「公司如何討論新媒體或網路工作守則或規範的相關議題？『是否從未討論』」，發現公關公司討論較多（94% vs. 72%, Pearson Chi-square = 9.32, $df = 1$, $p < .05$ ）；「公司如何討論新媒體或網路工作守則或規範的相關議題？『詢問上司』」一題，非公關公司比例較高（67% vs. 47%, Pearson Chi-square = 3.91, $df = 1$, $p < .05$ ），約略顯示出公關公司在管理上較積極回應新媒體倫理議題，從業人員也較具獨立性。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延伸自公關專業倫理文獻，並融入知識管理的觀點，探討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改變公關實務工作樣貌的重要議題，有別於過去文獻中偏重於哲學思辨與規範式的討論角度，本次研究嘗試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臺灣地區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觀點與認知，尤其著重在辨識新媒體相關實務的重要倫理議題，以及探討公關倫理知識的本質與倫理實踐的管理方式。本次研究抽樣的母體局限於臺灣地區公關公司與組織內公關部門人員，而根據願意參與調查人員所提供資料而得出之研究結果，選擇不回應或不參與研究之公關人員，可能在面對倫理議題的意見或態度上與受訪者有所不同。

在研究背景上，與過去幾份公關人員採用新媒體的問卷調查資料相比 (Alilikic & Atabek, 2012; Avery et al., 2010; Curtis et al., 2009; Eyrich et al., 2008)，本次研究中臺灣公關人員對於部落格、社群網站、網路論壇，甚至過去研究少見納入討論的行動通訊軟體，所採用的比例都相當高，前後研究時間點的差別，顯示出社群媒體在公關實務的應用有成長的趨勢，另外，在地域上的不同也顯示出，臺灣地區在網路通訊普及的背景下，社群媒體已然成為公關產業普遍採用、甚或倚賴的重要溝通工具，這樣的發現作為本次研究的背景，更顯得適於討論公關人員如何看待社群媒體應用相關的倫理議題，也可見該議題有其探究的現世價值與必要性。

首先，關於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的重視程度，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對於整體公關產業或者對於個別組織來說，倫理議題都被肯定是重要的主題，若比照 S. T. Lee & Cheng (2012) 針對美國公關協會成員的調查結果，其中近乎 98% 的受訪者同意專業倫理對於公關是重要議題，近 90% 則同意專業倫理在受訪者的公司是重要議題，僅略高於本次研究結果的數字，顯見臺灣地區公關人員對於倫理

議題的認知程度已與美國公關產業頗為相當；早年 Wu & Taylor (2003) 曾採用質化的問卷訪問 22 位臺灣公關人員，探討臺灣公關人員在組織內的角色與專業性，這份研究發現臺灣公關人員多被視為僅扮演企業對外溝通的一個窗口，工作的本質上也比較接近協助行銷或商品銷售的功能，雖然該研究與本次研究所採用的方法與抽樣方式並不相同，研究主旨也有所出入，但本次研究發現臺灣公關人員現今在新媒體的多元運用上扮演重要企劃角色，對於專業核心的倫理議題亦具有高度的重視程度，對比早期公關人員在企業內較為狹隘與業務導向的角色定位，還是可觀察出臺灣公關產業已經有所改變的端倪。

臺灣公關產業在過去十多年間的專業性與倫理意識感應是有進步的，但也許仍然還有可再提升的空間，尤其研究發現約半數的受訪者表示組織制定有專業倫理守則，約一成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而有大約三成半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組織是否提供公關專業倫理的守則或規範，比例不低的受訪者不確定或不知道任職的公司是否有倫理規範，顯然是個有趣的現象；又頗為巧合的是，S. T. Lee & Cheng (2012) 以美國公關從業人員協會為樣本的調查結果中，也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確定」組織是否有倫理守則，顯見中外公關人員對於專業倫理議題都有相當的意識感，但實際上日常工作中對該議題的關注程度卻也都有所落差，因此如何拉近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還是一項有待產業努力的課題。

本次研究也發現，面對網路新媒體、社群媒體為公關產業所帶來的衝擊與改變，在地公關人員認為新媒體應用所衍生的專業倫理議題有多個面向，其中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主題包括有：隱私權相關議題、企業保密相關議題、提供真實的訊息或內容，以及法律上相關的規範，對照現今網路媒體上出現「殭屍粉絲」、「網軍」、「網紅業配文」等現象，顯現攸關社群公關實務的「訊息真實」、「資訊揭露」等相關倫理以及法律面向，最急切需要被產業、組織管理者，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加以重視與改善。

再回顧前文提及的「寫手門」事件與「1450 網軍」的社會討論，雖然決策者與執行者不一定具備公關專業的背景，其作為顯然有損公關產業的社會地位與大眾對於公關從業人員的信任感，面對這樣的威脅，公關產業更應提高對相關議題的重視，加強透過內部員工訓練教育以及與外部協會組織的合作，學校教育單位也應加強相關的課程內容，共同致力於提升在地公關從業人員的專業倫理意識、思辨判斷能力，以及強化個人與組織實踐道德的勇氣。

呼應早期 Eyrich et al. (2008) 調查發現公關公司的從業人員採用新媒體最為積極，本次研究進行公關公司與非公關公司從業人員比較時發現，公關公司於新

媒體倫理議題的回應上也更為積極，而其從業人員在倫理判斷上更具獨立性，顯見一般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在相關的管理實務上可更關注這些議題與現象。總結來說，相較過去為大眾傳播媒體議題設定為主的時代，社群媒體時代下的公關實務的確面對更複雜的溝通環境與更多元的倫理挑戰，網路新媒體資訊流通快速與匿名性等特性，促使資訊真實、資訊揭露、負面言論、隱私權等議題更形重要，公關人員也必須更具備權衡利益的敏感度與更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感。

若進而探討前述研究發現在學理上的意涵，可發現受訪者最為重視的隱私權議題，在過往學者探討社群公關倫理的論述中較為缺乏，對照 Bowen (2010, 2013) 關於網路與社群媒體溝通之倫理規範論述，似乎比較難找到可直接對應的概念；隱私權議題既是在過往公關專業倫理的討論中較未觸及的主題，公關未來研究論述中可以進一步探討其背後所代表的公關核心價值與理論性意涵；而研究發現公關人員重視企業保密相關議題、提供真實的訊息或內容，則呼應了過去公關專業倫理相關文獻也經常圍繞著「誠實」與「訊息真實」的核心概念進行討論。

「何謂真實」本身可能是一個抽象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一定存在一個具體的、絕對的答案，對於什麼是真實的認知經常與個人觀點、意見有關，真實的概念背後牽連著多個複雜的考量因素，包含資訊的完整程度、資訊的選擇、溝通資訊的動機，以及個人解讀訊息的角度等等 (Deaver, 1990; S. T. Lee & Cheng, 2012; Seib & Fitzpatrick, 1995)，許多公關倫理議題與實務工作領域也與訊息真實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性，例如資訊的正確性、資訊的揭露、資訊的透明度、客戶的機密與保密協定、媒體關係中與記者的互動往來、工作中利益的衝突與迴避，以及考量避免對他人造成心理上或實質上的傷害等等 (Fitzpatrick & Bronstein, 2006; S. T. Lee & Cheng, 2012; Parsons, 2016; Seib & Fitzpatrick, 1995)，本次研究的發現顯示出，在社群媒體的網路時代，訊息的揭露與真實性依然是公關專業倫理的重要議題，也是網路公關實務工作進行倫理價值的判斷時，緊扣著其他倫理道德議題與挑戰的核心主題。

再從學理上檢視 Bowen (2013) 的論述，延伸 Kant (1783/1977) 道義論的觀點，提出社群媒體的行為倫理規範，可看出其論述著重在社群媒體工具性的角色出發，所提出的社群媒體道德規範項目背後，強調的概念是公關人員應遵守規範性的行為準則，同時也認為檢視過程中行為是否遵循規範，比起行為最後的結果或所造成的影響更為重要，然而準則性的規範有其籠統與難以落實的缺點 (Curtin & Boynton, 2001; Fitzpatrick, 2002; Huang, 2001)，Bowen (2013) 所提出的規範性項目中，也並未處理本次研究發現公關從業認為「企業機密與保密」的迫切議題，

因此規範式的倫理論述顯然也難以處理與解釋倫理價值間的衝突性。其次，研究發現臺灣公關從業人員認為「言論批評他人」、「言論攻擊他人」社群公關的迫切議題，一方面可能與產業現象有關，顯示實務上待改善的議題，另一方面受訪對象對於該議題的重視，除了呼應過往公關倫理論述中提及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do no harm）的倫理價值，可能也反應了華人文化中對於善與道德的定義與重視。相較於 Bowen (2013) 認為社群媒體的情境過於多樣與瑣碎，難以將龐雜的情境、不同的結果，甚至文化因素的差異性納入討論，本研究認為，如果組織資源與地域性的因素已證實影響了公關人員對社群媒體的採用 (Alikilic & Atabek, 2012; Avery et al., 2010; Curtis et al., 2009; Eyrich et al., 2008)，未來社群媒體公關倫理議題的探討亦不應忽視組織、產業環境與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功利主義取徑的「結果論」也應可同時適用於討論社群媒體溝通的倫理道德議題，並有助深入描繪與理解公關人員在社群公關實務中如何進行價值的權衡與判斷。

關於公關倫理知識的本質，雖然大多數的受訪者同意倫理知識多基於個人經驗的判斷、由工作中的經驗而來，也同意相關知識難以文字表達，顯示倫理知識本身可能是個人化與比較抽象的隱性知識，但是大多數的受訪者也同意倫理知識可透過正式會議討論學習、可由相關課程或案例學習，以及可由正式的倫理守則學習，亦即認為倫理的隱性知識，除了可透過同事間的聊天這類非正式的管道獲得，依然可以透過正式的、外顯的方式習得，這樣的發現與 S. T. Lee & Cheng (2012) 調查美國公關人員的結果頗為相似。如 Nonaka & Takeuchi (1995) 曾提出理論認為，知識的創造即透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彼此交互作用的過程而來，交互作用有不同的形式，例如隱性知識可透過非正式管道或社會化觀察的方式傳遞（tacit to tacit, socialization），隱性知識的傳遞也可透過正式的管道例如倫理守則與教育訓練（tacit to explicit, externalization）。而公關倫理知識也許本身同時具有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概念，雖然仰賴個人的經驗，也抽象不易以文字表達，但依然不難傳遞、溝通、學習與建立共識。

學理上若再從道德發展理論（moral development theory）(Kohlberg, 1969; Piaget, 1965) 來看，個人學習價值判斷的歷程中在較初級的階段是他律期（heteronomous stage），僅以外在的社會或組織規範作為判斷對錯的標準，重視的是行為的後果，而非行為的動機，而在較為進階的自律期（autonomous stage）時，個人理解規範的意義，對於內在動機與情境因素加以考量，以作出審慎的判斷，因此組織若僅提供員工倫理守則很可能是不夠的，而是要再透過管理人員的身體力行或者提供其他更多觀察與學習的方式，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使規

範背後的價值得以被內化 (Curtin & Boynton, 2001; S. T. Lee & Cheng, 2011)。綜合而言，未來公關專業倫理的討論，仍可再更進一步剖析公關人員價值判斷所涉及的知識中，其中正式可見的面向與較為抽象隱晦的知識面向有何關聯，以及如何能透過管理者的角色與功能，彌合兩者的落差，使公關人員在專業倫理上的認知與信念更得以具體實踐於工作中。

未來研究若繼而探討公關專業倫理與社群媒體應用的議題，可考慮納入其他個人與組織的變項，公關從業人員個人心理特質的相關變項中，例如對於公關職涯的投入與承諾之程度 (career commitment)，可能也與個人的倫理認知有所關聯，在過去的研究中，組織的文化與組織核心價值也曾發現對於倫理知識的分享與管理模式有所影響 (Al-Alawi, Yousif Al-Marzooqi, & Fraidoon Mohammed, 2007)，最後，本次研究發現公關管理階層在專業倫理議題的推廣上被賦予重要角色，並且被認為比一般公關人員具有責任，因此未來研究亦可更進一步探討高階管理者的角色與不同的領導特質 (Turner, Barling, Epitropaki, Butcher, & Milner, 2002)，在公關產業環境中如何影響組織在社群媒體倫理議題的回應與管理方式；對於跨文化或跨國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亦可以思考融入社會文化的觀點或面向 (Hofstede, 1984)，比較與觀察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價值傾向的公關從業人員對於社群媒體公關倫理議題的態度與看法。

最後，總結而言，透過上述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新興的社群媒體的確為公關專業帶來諸多新的挑戰，實務界在回應倫理議題上已有相當的進展，但基於倫理道德認知有抽象的、滿載情境因素的本質，也即便公關人員對於正式的倫理訓練與會議討論的管道抱持支持的態度，實際上卻可能大多僅局限於倫理守則的制定，還待建立與開發更多有系統的管道以傳遞倫理知識，並且學習如何面對新媒體在不同倫理議題面向上所帶來的挑戰，對於學術研究者而言，無論是社群媒體的倫理議題，或是公關倫理知識的傳遞與管理，亦都是仍可繼續探索與創建理論的領域。

參考書目

- 王聖藜 (2020 年 1 月 22 日)。〈楊蕙如網軍案 背後業主浮現〉，《聯合報》，上網日期：2020 年 5 月 1 日，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15/4301782>
- 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 (n.d.)。〈基金會簡介〉。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publicrelations.org.tw/01.html>

- 勞倫溼 (2019 年 8 月 14 日)。〈「1450」的真正意思是什麼，一張圖看懂緣由於此〉，《網路溫度計》。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s://dailyview.tw/popular/detail/5995>
- 臺灣與臺北市國際公共關係協會 (n.d.)。〈協會宗旨〉。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pra.tyaad.com.tw/introduction/purpose>
- 劉千祥、姚惠忠 (2018)。〈危機回應內容、形式、媒體選擇、發言層級相對重要性之研究：企業公關人員觀點〉，《傳播與社會學刊》，44：111-149。
- 蔡晉宇 (2019 年 12 月 4 日)。〈楊蕙如只是小咖 小英有直屬網軍？賴神被剿曾這樣說……〉，《聯合報》。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3/4203885>
- 嚴思祺 (2013 年 10 月 24 日)。〈臺灣三星電子「寫手門」案裁罰千萬〉，《BBC 中文網》。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3/10/131024_samsung_taiwan_fine.shtml
- Adler, P. S., & Borys, B. (1996). Two types of bureaucracy: Enabling and coerciv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61-89. <https://doi.org/10.2307/2393986>
- Al-Alawi, A. I., Yousif Al-Marzooqi, N., & Fraidoon Mohammed, Y. (2007).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knowledge shar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1(2), 22-42. <https://doi.org/10.1108/13673270710738898>
- Alikilic, O., & Atabek, U. (2012). Social media adoption among Turkish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 56-63.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1.11.002>
- Avery, E., Lariscy, R., Amador, E., Ickowitz, T., Primm, C., & Taylor, A. (2010). Diffusion of social media among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in health departments across various community population size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2, 336-358.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1003614427>
- Berg, K. T., & Sheehan, K. B. (2014). Social media as a CSR communication channel: The current state of practice.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99-11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rtree, D. S. (2014).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crisis: A case study of BP's YouTube response to the Deepwater Horizon crisis. In M. W.

-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111-125).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wen, S. A. (2004). Expansion of ethics as the tenth generic principle of public relations excellence: A Kantian theory and model for managing ethical issue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6, 65-92. https://doi.org/10.1207/s1532754xjpr1601_3
- (2006). *The business of truth: A guide to ethical communication*. San Francisco, C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cators.
- (2008). A state of neglect: Public relations as ‘corporate conscience’ or ethics counsel.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 271-296.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0801962749>
- (2010). An examination of applied 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on top corporate websites.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4(1). <https://prjournal.instituteforpr.org/wp-content/uploads/An-Examination.pdf>
- (2013). Using classic social media cases to distill ethical guidelines for digit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Exploring Questions of Media Morality*, 28, 119-133. <https://doi.org/10.1080/08900523.2013.793523>
- Coombs, W. T. (2014). Nestlé and Greenpeace: The battle in social media for ethical palm oil sourcing.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126-13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urtin, P. A., & Boynton, L. A. (2001). Ethics in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R. L. Heath (Ed.), *Handbook of public relations* (pp. 411-421). Thousand Oaks, CA: Sage. <http://dx.doi.org/10.4135/9781452220727.n33>
- Curtis, L., Edwards, C., Fraser, K. L., Gudelsky, S., Holmquist, J., Thornton, K., & Sweetser, K. D. (2009). Adoption of social media for public relations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 90-9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9.10.003>
- Day, K. D., Dong, Q., & Robins, C. (2001).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An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f iss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R. L. Heath (Ed.), *Handbook of public relations* (pp. 403-410). Thousand Oaks, CA: Sage. <http://dx.doi.org/10.4135/9781452220727.n32>
- Deaver, F. (1990). On defining truth.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5, 168-177.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9008839111>

- doi.org/10.1207/s15327728jmme0503_2
- Diga, M., & Kelleher, T. (2009). Social media use, perceptions of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public relations role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 440-44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9.07.003>
- DiStaso, M. W., & Bortree, D. S. (2014).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http://dx.doi.org/10.4324/9781315852171>
- Drucker, P. F. (1993).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 (1994). Theory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https://hbr.org/1994/09/the-theory-of-the-business>
- Etzioni, A. (1961).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Eyrich, N., Padman, M. L., & Sweetser, K. D. (2008). PR practitioners' use of social media tool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4, 412-414.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8.09.010>
- Fitzpatrick, K. (1996). The role of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ic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2, 249-258. [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96\)90048-X](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96)90048-X)
- (2002). From enforcement to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SA's member code of ethics 2000.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7, 111-13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28JMME1702_03
- Fitzpatrick, K., & Bronstein, C. (2006). *Ethics in public relations: Responsible advocacy*. Thousand Oaks, CA: Sage. <http://dx.doi.org/10.4135/9781452204208>
- Fitzpatrick, K., & Gauthier, C. (2001). Toward a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6, 193-212.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28JMME1602&3_8
- Gallicano, T. D., Bivins, T. H., & Cho, Y. Y. (2014).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ghost blogging and ghost commenting.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21-3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ouldner, A. W. (1954).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Gower, K. K. (2007). *Leg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public relations* (2nd ed.).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Grunig, J. E. (1992). *Excell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2001). Two-way symmetrical public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R. L. Heath (Ed.), *Handbook of public relations* (pp. 11-30). Thousand Oaks, CA: Sage. <http://dx.doi.org/10.4135/9781452220727.n1>
- Grunig, J. E., & Hunt, T. (1984).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Hofstede, G. (1984).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uang, Y.-H. (2001). Should a public relations code of ethics be enforce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1, 259-270. <https://doi.org/10.1023/A:1010719118448>
- Huang, Y.-H., Lin, Y.-H., & Su, S.-H. (2005). Crisis communicative strategies in Taiwan: Category, continuum,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1, 229-238.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5.02.016>
- Kang, S., & Norton, H. E. (2006).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 of the World Wide Web: A public relations tool for the digital ag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 426-428.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6.08.003>
- Kant, I. (1977).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e forward as science* (J. W. Ellington & P. Carus, Tran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83)
- Kaptein, M. (2010). The ethics of organization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U.S. working popu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2, 601-618.
- Kaptein, S. P. (1998). *Ethics management: Aud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ethical content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 Kent, M. L., & Taylor, M. (1998). 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 321-334. [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99\)80143-X](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99)80143-X)
- (2002). Toward a dialogic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8, 21-37. [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02\)00108-X](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02)00108-X)
- Kent, M. L., Taylor, M., & White, W. J.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 site design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iveness to stakeholder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63-77. [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02\)00194-7](https://doi.org/10.1016/S0363-8111(02)00194-7)

- Khajeheian, D., & Mirahmadi, F. (2015). Social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relations: A study of banking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 79-87.
- Kohlberg, L. (1969). State and sequence: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socialization. In D. A. Goslin (Ed.),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47-480). Chicago, IL: Rand McNally.
- Kupperman, J. J. (1970). *Ethical knowledge*. London, UK: George, Allen & Unwin.
- Lee, A. M., Gil de Zuñiga, H., Coleman, R., & Johnson, T. J. (2014). The dialogic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Assessing the ethical reasoning of companies' public relations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157-175).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ee, S. T., & Cheng, I.-H. (2011). Characteristics and dimensions of ethical leadership in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3, 46-74.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X.2010.504790>
- Lee, S. T., & Cheng, I.-H. (2012). Ethics management in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 conceptualizations of ethical leadership, knowledge, training and complianc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7, 80-96. <https://doi.org/10.1080/08900523.2012.694317>
- Logan, N., & Tindall, N. T. J. (2014). Coca-cola,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cosmopolitanism: How public relations builds global trust and brand relevance with social media.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138-153).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cCoy, C. S. (1985). *Management of values: The ethical difference in corporate policy and performance*. Marshfield, MA: Pitman.
- McPhail, K. (2009). Where is the ethical knowledge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Power and potential in the emergence of ethical knowledge as a compon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 804-822. <https://doi.org/10.1016/j.cpa.2008.09.004>
- Men, L. R., & Tsai, W.-H. S. (2012). How companies cultivate relationships with public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 Relations Review*, 38, 723-730.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1.10.006>
- Murphy, P. E. (1988). Implementing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 907-915.
-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ine, L. S. (1994). Managing for organizational integ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06-117.
- Parsons, P. J. (2016). *Ethics in public relations: A guide to best practice* (3rd ed.). London, UK: Kogan Page. <https://doi.org/10.5860/CHOICE.42-3525>
- Piaget, J. (1965).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Public Relations Society of America. (n.d.). PRSA code of ethics. Retrieved April 30, 2020, from <https://www.prsa.org/ethics/code-of-ethics>
- Scott, W. R., & Meyer, J. W. (1991). The rise of training programs in firms and agencie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L. L. Cummings & B. M. Staw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297-326).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Seib, P., & Fitzpatrick, K. (1995).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 Seltzer, T., & Mitrook, A. M. (2007). The dialogic potential of Weblogs in relationship building.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3, 227-229.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7.02.011>
- Sims, R. R. (1992). The challenge of ethical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 505-513. <https://doi.org/10.1007/BF00881442>
- Sisco, H. F. (2014). Natural or not? A case study of Kashi's viral photo crisis on Facebook.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49-6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mith, B. G. (2010). The evolution of the blogger: Blogger considerations of public relations-sponsored content in the blogospher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 175-177.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10.02.006>
- Sullivan, P. H. (1998). *Profiting from intellectual capital: Eextract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 New York, NY: Wiley.

- Sweetser, K. D. (2010). A losing strategy: The impact of nondisclosure in social media o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2, 288-312.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1003614401>
- (2014). Government gone wild: Ethics, reputation, and social media.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205-21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weetser, K. D., & Metzgar, E. (2007). Communicating during crisis: Use of blogs as a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ool.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3, 340-342.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7.05.016>
- Tirkkonen, P. M., & Luoma-Aho, V. (2014). Authority crisis communication vs. discussion forums: Swine flu. In M. W. DiStaso & D. S. Bortree (Eds.), *Ethical practice of social media in public relations* (pp. 192-204). New York, NY: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52171>
- Toffler, A. (1990).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 Trammell, K. D. (2006). Blog offensive: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attacks published on campaign blog posts from a political public relations perspectiv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 402-406.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6.09.008>
- Trevino, L. K. (1986).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s: A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ist model.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1, 601-617. <https://doi.org/10.5465/amr.1986.4306235>
- (1990).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ethics: A cultural approa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4, 195-230.
- Turner, N., Barling, J., Epitropaki, O., Butcher, V., & Milner, C. (2002).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moral reason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7, 304-311.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7.2.304>
- Waters, R. D., Burnett, E., Lamm, A., & Lucas, J. (2009). Engaging stakeholders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using Facebook.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 102-106.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9.01.006>
- Weaver, G. R., Treviño, L. K., & Cochran, P. L. (1999). Corporate ethics programs as control systems: Influences of executive commitmen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41-57. <https://doi.org/10.2307/256873>
- Weber, J. A. (1981). Institutionalizing ethics into the corporation. *MSU Business Topics*, 29(2), 47-52.
- Wieland, J. (2003). *Standards and audits for ethics management systems: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New York, NY: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662-05107-8>
- Wotubra, T. R. (1995).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behavior, with a focus on sales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 10(2), 29-42. <https://doi.org/10.1080/08853134.1990.10753821>
- Wright, D. K., & Hinson, M. D. (2012). Examining how social and emerging media have been used in public relations between 2006 and 2012: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 6(4), 1-40. <http://www.prsa.org/intelligence/PRJournal/Documents/2012WrightHinson.pdf>
- Wu, M.-Y., & Taylor, M. (2003). Public relations in Taiwan: Roles, professionalism, and relationship to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9, 473-483.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3.08.008>
- Yang, S.-U., & Kang, M. (2009). Measuring blog engagement: Testing a four-dimensional scal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5, 323-324.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09.05.004>
- Ye, L., & Ki, E.-J. (2012). The status of online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published articles in 1992–2009.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4, 409-434. <https://doi.org/10.1080/1062726X.2012.723277>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on Social Media

Cheng, I-Hu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Ethic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public relations as it encompasses value both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With the advent of social media, the relevant ethical issues are in need for more exploration. Today's public relations work may involve management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online buzz, showing that new media has brought forth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Meanwhile, some controversial practices, however, also urge us to pay even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ethics. Past literature on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have been rather limited to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and case analyses. Thus, the current study was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of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with a survey.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issues of privacy, confidentiality, and truthfulness, as well as legal regulation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critical. About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their organizations have codes of PR ethics, and about one-third, guidelines for new media. The data also show reserved attitude toward whether codes of ethics may be useful for making decisions under various circumstances.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hallenges for ethics management in practice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internet-related public relations, social media, PR ethics, ethics management

* Email: icheng@nccu.edu.tw

Received: 2019.10.14

Accepted: 2020.7.16

校準正典歷史：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

張惠嵐^{**}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評介《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Erkki Huhtamo 與 Jussi Parikka 編）一書。該書收錄，諸如：恩斯特、帕瑞卡以及皮亞斯等人之作，旨在闡述媒介考古學式的研究，婉拒以線性進步的歷史敘事觀來理解媒介，而是更加強調媒介的物質基礎，並將其與媒介文化的條件聯繫起來。架構分四部分，首先，闡述媒介考古學，是一浮現中的「論述旅行」學科，其核心精神與媒體取證觀、基礎設施研究等多重論理基礎相呼應。第二，介紹本書結構與內容。第三，闡述文化技術概念，如何幫助媒介考古學挖掘更古老的媒介。第四，本文建議媒介考古學應考慮「媒介即網絡」以及「網絡即媒介」的概念，從更為考古學式的視角來理解媒介。

關鍵詞：媒介考古學、成為媒介、物質結構、文化技術、網絡式

* 作者感謝主編夏春祥教授、執編、編委會，以及學刊二位匿名評審者的修改建議。

** Email: huilanchang1990@gmail.com

投稿日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11 月 30 日

壹、重新打撈靜默的歷史

在新媒介湧現的年代裡，我們無法不思索其深層的歷史問題。新媒介研究在這樣的歷史場景下登臺，於二十世紀初蔚為傳播領域的研究主流。然而，對於歷史的隱略不談，不見其問題縱深，在後繼諸多的研究脈絡裡，它終得直面諸多質疑。一如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 1943–2011）早已向我們揭示，遠早在古希臘文明時期，便已有處理資訊「分流」的「歷史經驗」。因而，媒介史所宣稱的新舊媒介之間的斷裂，很可能是一場歷史誤會、一種論斷式的宣稱。

那麼，何以媒介歷史敘述，總是獨厚「斷裂」，而輕忽「連結」？即便，「新」如虛擬實境，這樣的「當世」媒介，其實也並非獨厚數位時代的新現象。倘若追尋其技術譜系起落，它可能與「早期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全景圖（panorama）、立體鏡、電影，甚至與柏拉圖洞穴寓言等」（Goddard, 2020; Huhtamo, 2013a, 2013b），有其相互關聯的技術與文明歷史。換言之，將媒體歷史推向更為悠遠的文明尺度，使得關於數位媒體的「新穎性」（newness）的主流敘述變得更為複雜，亦值得商榷。

一如傳播哲學學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提醒，言猶在耳：

與大眾媒體相比，數位媒體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但，如果我們將數位設備置於廣袤的傳播實踐歷史之中，新媒體可能看起來很像舊媒介或古老的媒介。像新媒體一樣，記簿、索引（卡）、人口普查、日曆及目錄等這些古老媒介，事實上一直從事紀錄、傳輸與處理文化的工作；其涉及對於主體、物件與數據等的職掌；（也）組織時間、空間與權力。（Peters, 2015, p. 19）

究其實，彼得斯的觀點給予我們兩個線索。其一，意圖重新追尋「何謂（新）媒介」、「如何『成為』媒介」（becoming media），以及「如何與其他媒介相互關聯而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part of media system）等基本追問。

其二，試圖以一個悠遠的歷史光譜想像媒介的「存在脈絡」。循此視野，倘若我們可以先暫時擱置，關於媒介之舊與新、類比與數位、物質與非物質等的討論，而是進入物質沉積的結構迴路中，以此摸索與拆解媒介的過去與未來。

正是在上述契機下，媒介考古學從一個作為學術方法上的註腳（例如在傅科〔Michel Foucault〕、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或基特勒那裡），成為想像媒

介歷史的另類途徑（之一）。然而，媒介考古學也並非只是歷史的傳聲筒，它不是簡單地將媒介「早期」的歷史重新講述一次，因為所謂的「前」，並不單意指時間上的前，更是指向具多重空間維度的技術結構。媒介考古學不僅想知道技術軌跡的發展，更想知道它的社會（文化）軌跡，以及，此一社會軌跡與前一時代的技術關聯性。

對於歷史「偏倚化」的反撲，舉凡：人類文明溝通歷史的脈絡裡，曾短暫出現的物件或者一段軼事，皆是媒介考古學的考掘範圍；舉例而言，郵政系統此一技術設置（郵局的改革、郵票的發明）與文學作品之間的關聯（Siegert, 1999）。表面上，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技術（技藝）與事件，如何透過思想史、文化史的眼光，綢繆出圍繞在文化技術周圍卻未曾被挖掘出相關聯的軼事，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

可以說，媒介考古學意在提供我們一不同的想像媒體歷史的「可能方案」，例如：關注媒介技術彼此之間如何互相關聯，以此凸顯在「當代」媒介浮現背後的隱藏歷史（hidden histories），並透過這個想像的過程，重新校準正典歷史。

作為一篇書評，本文目的不在僅止於反映書中觀點，而是試圖以更具脈絡性的理論座標定位媒介考古學，唯有定位這個理論座標，我們方能勾勒出具物質傾向的媒介研究輪廓。

以下從四部分展開論述。首先，闡述媒介考古學的多重論理基礎。第二，介紹本書結構與內容。第三，闡述文化技術概念，如何幫助媒介考古學挖掘更古老的媒介。第四，未來媒介考古學應朝向一種網絡式的考古。

貳、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多重歷史背景及其論理基礎

一、理論座標

媒介考古學是 20 世紀 80 年代之交，在德國媒介研究、英美脈絡下的數位人文，以及新媒體研究等推波助瀾下，浮現的新興領域。

尤其，德國媒介研究一脈，強調硬體與物質銘刻的視角，遠離英美取徑的「文本化」取向，轉而關注媒介的物質結構（the material structure），此思維引起相當的共鳴，如：專注於研究媒介格式的史特恩（Jonathan Sterne, 2006, 2012）、Matthew G. Kirschenbaum (2008) 採取的媒體取證（media forensics）觀點，或者拉圖爾（Bruno Latour, 2005）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甚或是近年異軍突起的基礎設施研究（infrastructure studies）、平臺研究（platform

studies) 與軟體研究 (software studies) 等，它們都在技術、物質、文化等面向與媒介考古學，形成相互輝映與對話的可能性。

向來，在傳播研究領域，對於意義的產出途徑，始終相信以「人」作為「分析起點」，致力於探究各種詮釋的技巧，便可得到關於意義的解答。從英美文化研究至實證研究等，大抵不脫離這個範疇。

恰恰相反，媒介考古學的目標，並不是要產出一個可概化的媒介模型、理論或方法，而是意在對一種特定敘事模式的反動。在媒介考古論者的眼中，歷史不是作為一種可及標的，而是作為「發動引擎」。

究其實，媒介考古學進行了幾層的視角倒裝，通過此一倒裝過程，意圖陌生化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媒介歷史，甚至是正史。第一層倒裝，對於線性歷史的反撲及其不滿；第二層，在「不成意義」之處，嘗試將其意義化；第三，相信意義的產出途徑，不來自於人，而是來自挖掘的對象物自身；第四，撬開黑盒子，關注媒介技術細節。

二、發跡過程

究其實，與任何的人類古文明的發跡過程相似，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已存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早在它尚未以媒介考古之名顯形之前。只是，從未被以學術建制化的方式，認可它在媒介研究中的定位。

胡塔莫 (Erkki Huhtamo) 與帕瑞卡 (Jussi Parikka) 認為，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可溯及幾位重要的理論思想家，包含：班雅明、吉迪恩 (Siegfried Giedion)、庫爾提烏斯 (Ernst Robert Curtius)、史騰貝爾格 (Dolf Sternberger)、瓦爾堡 (Aby Warburg) 以及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等人，他們對於媒介考古學的影響來自於多方面 (Huhtamo & Parikka, 2011, p. 2)。這種悠遠的繼承傳統，使得媒介考古學的多重根源，折映出它在學科領域 (in-interdisciplinary) 之間的「論述旅行」 (discursive travelling) 此一基本性格。

或許這麼說，媒介考古作為一種方法上的游移視野，雜食性格是其基本折射，它沒有一套既成的方法途徑可遵循，也不遵從某一學派之說，而是在所謂的「不成意義」之處，嘗試將其「意義化」，指出潛藏其中的互有關聯性。媒介考古學觀察與分析的對象，可能僅是正典媒介歷史叢林裡，毫不起眼的一顆星，卻從中看見旁及周遭的時代星叢，依此建構出當世的媒介文化生態。

儘管媒介考古來自這些不同思想淵源，胡塔莫與帕瑞卡 (Huhtamo & Parikka,

2011, p. 51) 也自承媒介考古學尚未有一明確的界定。基特勒 (Kittler, 2006, 轉引自 Armitage, 2016, p. 32) 更曾言明, 要為媒介考古學下一清楚的界定是件困難的任務。進一步的問題是正如胡塔莫所言, 我們應將媒介考古理解為一領域 (field), 或者, 視為一旨在探索尚未寫就的媒介歷史的取徑 (Kluitenberg, 2011, p. 51)。

目前, 當代致力於媒介考古研究的學者, 可約略區分為三部分: 以德國為首的媒介理論學者, 如基特勒、恩斯特 (Wolfgang Ernst), 以及自成一體系的齊林斯基 (Siegfried Zielinski) 的「類媒介考古學」(an “anarchaeology” of media archaeology); 美國媒介考古學者胡塔莫, 以及芬蘭數位媒體理論學者帕瑞卡等。同時, 他們對於媒介考古學的基本看法, 以及採取的研究路數亦有相異之處。例如: 恩斯特將媒介考古視為一種分析方法, 以此探索媒介機器的微觀時間; 齊林斯基談的是媒介的深層時間 (deep time) 考古, 著重於探索視聽技術的演進歷程; 帕瑞卡則將媒介考古學帶至數位文化的脈絡來思考。倘若探究這些不同的走向, 大抵也說明了媒介考古學作為一發展中的概念, 致力於在線性的媒體歷史之外, 想像媒介可能的過去與未來。

其中, 來自德國媒介物質主義學派基特勒的「硬體」分析 (hardware drive analysis), 對於媒介考古學的深遠影響, 恐怕來自他對於物質性 (materiality) 的強調, 儘管基特勒從未自承是媒介考古學家 (Parikka, 2012, p. 67)。

細察基特勒對於「媒介本體」的規定, 其實是很「基於物質」(substance-based) 的論理方式 (Parikka, 2012, p. 64-70)。在基特勒眼中, 所謂技術物質 (硬體) 並非無涉於人文社會活動, 恰恰相反的是, 他擅用文學與軼事, 以及數學與電腦科學等語彙, 如: 電報繼電器 (telegraph relay)、圖靈通用機 (universal discrete machine)、拓撲學 (topology) 等, 來拓展媒介技術的歷史光譜。這種基特勒式 (Kittlerian) 的媒介「硬體本體論」研究, 為媒介考古學提供相當啟發性的思考與理論資源, 亦即介入媒介「內部」的方式, 是「非人」的, 也是「硬核」的 (同上引, p. 77)。此種看似硬體導向 (Hardware driven) 的媒介論, 其實是通過近距離地閱讀 (close reading) 技術/硬體, 以此追索其譜系與社會文化的起落。此一基本觀點, 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一基本指引。

參、本書結構：尋回媒介的存在視域

2011 年, 由胡塔莫與帕瑞卡合編的《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一書出版，圈引諸多媒介理論學者的灼熱目光。儘管在相關的學術討論中，對於收錄在本書中的幾個篇章，是否可界定為媒介考古學的研究範疇，稍有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於鬆動媒介研究的疆界，以及鬆綁對於特定研究路徑的想像，確實做出具體貢獻。一如彼得斯 (Peters, 2008) 敏銳地指出，既有媒介研究的分析視角著眼於文本—閱聽人—制度等典型的研究取徑，卻可能錯過或掩蓋了那些使得媒介設備與網絡得以運行的技術、歷史、形式等物質沉積層。

而本書所談的媒介考古學式視角，確實是在彼得斯所談的典型取徑以外，另闢蹊徑，意在與人類中心主義保持距離，拓展媒介的深層時間與空間維度。

綜觀而論，本書就其學術價值，有三方面貢獻。首先，這是首次在歐洲以外，在英語世界裡，對媒介考古學進行全面綜論的出版之作，讓不諳德語的讀者，亦能以較系統性的方式，親近媒介考古學的基本面貌；第二，以相對系統性的方式，為我們揭示媒介考古學多重的理論取徑、方法探索，以及各式歷史個案；第三，本書各章進行的媒介考古學研究，為我們展示它如何與更廣泛的學科與文化領域融合，從而繪製更為廣泛的媒介物質論圖像；此一思維亦在後繼傳播領域持續發酵，相關的研究剪影並非寂寥，儘管它們不是頂著媒介考古學的頭銜，但其思維與精神卻如穿針引線般地隱藏其中，為媒介揭開厚重的歷史序幕，例如：《紙知識：關於文檔的媒介歷史》(*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Gitelman, 2014)、《雲的史前歷史》(*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 (Hu, 2015)、《觀察者的技術：論 19 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rory, 1990)、《海底網絡》(*The Undersea Network*) (Starosielski, 2015)、《手稿、唱片凹槽與書寫機器：愛迪生時代的科技》(*Scripts, Grooves, and Writing Machines: Representing Technology in the Edison Era*) (Gitelman, 1999) 等。

此處，為使餘下段落，有更清楚的結構布局與認識，有必要先說明本篇書評依據何版本進行評述。主要依據兩個版本，首先，是 2011 年由胡塔莫與帕瑞卡合編的英語版；第二，時隔七年，由中國復旦大學出版社於 2018 年出版的譯著，這也是《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在中文世界的第一本翻譯本。隔年，胡塔莫親赴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出席「媒介考古學與中國傳播研究」圓桌論壇，為該譯著新書發表會揭開討論序幕。兩位編者亦在中譯本〈序言〉提及，「媒介考古學將如何推動中國的文化形式與中國歷史的對話，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媒介環境……我們渴望看到，未來來自中國的媒介考古學家能揭示中國的媒

介文化及其發展」(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 2018, 頁 2), 在在都顯露出他們對於媒介考古作為跨域全球思潮, 如何在任何媒介環境下重新發掘那些備受忽略或遺忘的歷史, 甚至是對中西交融的對話, 都有著高度盼望。

以下分兩部分。首先, 評介者對於該譯本的字詞選用及概念的選擇是否適當等問題, 提供淺見; 其次, 進一步討論該譯本如何可能對華人傳播學術社群(特別是臺灣), 提供對話基礎與多元的啟發。

首先, 中國傳播學術社群有很多用詞, 與臺灣學術社群不同。例如: 「信息」(information)、「互聯網」(internet)、「軟件」(software)、「數字」(digital)、「通信」(communication)等用語。建議讀者可參閱原文, 並理解這些字詞在本地社群所指涉的意涵, 才不致在閱讀過程產生困惑。

再者, 不知是否為對岸習慣的翻譯用法, 亦或, 校譯疏漏, 一些專有學術用語, 該譯本有別於學界習慣的通用譯法, 如: 中譯本第 105 頁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 1996 年出版的《檔案熱: 佛洛伊德學派印象》(*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一書, 譯為《檔案發燒》。然, 考察學界對該書名之通用譯法, 較常見者另有譯為《檔案惡》、《建檔狂熱》等, 未見《檔案發燒》之譯法。

作為一本引介西方媒介考古學思潮的翻譯書籍, 該書之譯介工作歷時兩年有餘, 譯者也用心撰寫〈總序〉與〈譯後記〉, 勾勒譯介此書之緣起。其重要性不僅在於, 為中文世界的學術社群留下一本經典思潮譯著, 亦可望對此領域感興趣的學者與研究生, 提供一親炙此思潮的入門參考。而由於媒介考古學的多元學科背景與思潮交匯影響, 該書所涉及的專業知識領域甚廣, 從精神分析、電流學、媒介操作過程涉及的一系列程序、知識、信念、脈絡, 以及擴及至計算機專業領域等, 媒介考古學幾乎無役不與, 可以想見對譯者而言, 需費相當心力統籌與組織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正典學術文獻, 以及, 非正典的歷史軼事脈絡, 並需將西方語脈轉譯為華文世界的讀者可以理解的中文語脈, 其過程涉及一定的困難度。

大體而言, 即便面對如此龐雜的學理脈絡, 該譯著大抵呈現原意, 龐而不雜地譯介各章, 承如唐海江於〈譯後記〉所言, 「書稿定稿時, 也邀請計算機領域的學者, 就其專業術語進行審核, 以確保該術語合乎專業領域的規範」(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 2018, 頁 342)。同時, 對於在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疑惑或需釐清之處, 譯者也逐一提供譯註, 幫助華人閱讀者能更好地理解該文意。

進一步而言, 評介者以為書中幾個概念的翻譯, 或許可有其他譯語選擇的可能, 在此僅先列舉兩例, 供討論與參酌。例如: 第三篇 Jeffrey Sconce 討論造成

思覺失調症患者（原文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時出現妄想的「有影響力的」機器，該書譯為「影響機器」（the influencing machine），以評介者角度來看，此一譯法較接近直譯。以 Sconce 的觀點來說，他主要闡述此機器具有廣大影響力，主要與統攝心靈的控制相關，甚者，其產生「妄想」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是可推及至後來二十世紀出現的各式媒介技術對於人的精神與心靈的掌控。考量這層語意脈絡後，若改以「攝心／御心機器」取代「影響機器」稱之，或許更能妥切傳達原意。

此一譯法有其優點，若華人閱讀者未先讀原文，而直接閱讀該譯本，單從其字面義較能領略其意涵；其次，從更廣的語脈來看，Sconce 在闡述與演繹該概念時，也確實隱約地傳達出「統御心靈」這層意思；第三，細究精神分析學家 Victor Tausk 於 1919 年發表的著述 *On the origin of the “Influencing Machine” in Schizophrenia*，該篇較合適的譯名應為〈思覺失調症之有影響力的機器的起源〉，重點在於強調此一機器「是有影響力的」，作為動詞使用；相較於譯本將其稱為「影響機器之起源」（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2018，頁 71），是一較為靜態的名詞式呈現，前者之譯法來得更為適切。

而第十二篇〈面向對象如何讓計算機成為一種媒介〉（How Object Orientation Made Computers a Medium）一文，譯者將通篇文章中反覆出現的計算機領域的關鍵術語：「物件導向」（object-orientation, OO）一詞，譯為「面向對象」。儘管，譯者曾在文首之處提供譯註：「面向對象」是指「一種程序設計範型，也是一種程序開發的方法。它將對象作為程序的基本單元，將程序和數據封裝其中，以提高軟體的重要性、靈活性與擴展性」（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2018，頁 269）。評介者推敲譯者之所以捨棄「物件導向」一詞，而改以「面向對象」稱之，或許是譯者考慮到 Casey Alt 在討論計算機如何成為一種媒介時，他的「分析『作法』」是通過討論與分析程式語言的特徵及其如何在系統環境中「展開自己」的操作方式，由此凸顯計算程序的媒介性。這在媒介學領域，趨近於一種朝向本體論式的分析方式（moving toward medium）。

以我們也熟悉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主流說法，即是「打開技術黑箱」（un black-box），朝向面對這些對象（objects）本身。亦即，可將該譯語理解為，唯有「保持面向對象」的信念，對對象／物件進行詳細的本體分析，方能實現計算機作為媒介，以及，計算無所不在，此一願景。

倘若前述推論有理，建議當該術語在不同意義層次上出現時，給予相應的譯

名。因檢視通篇之翻譯後，譯者選擇「面向對象」一詞，但未並列該英文原文，儘管，在中譯本第 202 頁由兩位編者對該文的短評側寫中，已列出“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一詞，但譯者仍以「面向對象程序設計」稱之，之後通篇中未曾再出現該專業術語之英文原文。

循此，評介者以為，嚴格區分二者之不同有其必要性。如：以「功能層次」而言，當描述作為一種計算機程序設計的範型時，以計算機領域術語「物件導向」稱之；而當它放在「現象分析層次」時，就必須有意識地提醒，「面向對象」指的是，以媒介考古學作為分析視閥，檢視計算機如何能被宣稱描述為一種媒介，通過朝向對象自身，亦即，將計算機、計算過程、程式語言等一系列的操作過程置於分析核心，將這些過程等同於媒介的輸入與輸出來處理，使計算機為自己爭得在媒介研究領域的論述空間。

第二，簡體字有翻譯本，而繁體字無。在原著英語版問世後不久，英美傳播學術社群，即陸續刊出幾篇書評 (Goddard, 2013; Mager, 2013; Potts, 2013)。由於媒介考古學正面挑戰與質疑媒介歷史的正統敘事觀，一時之間，其強調歷史縱深的思維及高度跨越學科邊際的視野，成為跨域全球的媒介思潮。該譯本除了是在諸多反響脈絡下，中文世界對此思潮的第一本譯著，理應具有代表性之外，更在於如何可能對華人傳播學術及其社群產生影響，一如胡塔莫與帕瑞卡關切媒介考古學如何在西方世界之外落地生根。隨著此譯本將要推及至華人傳播社群的關鍵時刻，值得吾輩進一步思索，臺式媒介研究如何可以接軌此思潮並提出進一步的研究議程。

至少，在過去的十年內，尤以中國大陸的傳播學術社群，謬力耕耘經典媒介思潮的譯著。但，這並非偶然，而是對於提問媒介研究本應有的契闊歷史格局的人文渴望，一如主譯該書的唐海江教授在〈總序〉中提及，「……但遺憾的是，有關歷史與文明維度的媒介研究的譯著卻屈指可數，且不少譯著以既定學科視野對作品加以分類，這不僅嚴重限制了媒介研究本應有的闡釋力，也極大削弱了對當下世界變化的縱深理解與想像力……」（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1），而該譯著作為「媒介與文明」譯叢之一，即是冀望於想像媒介的歷史縱深如何與文明社會的起落互涉。

這是該譯著出現的機緣，但更深一層的思考是，我們如何以此為起點，摸索該譯著與華人傳播學術社群的關係。在國內傳播領域，少見對於傳播觀念史、思想史或媒介歷史之經典，進行「有系統性」的翻譯或引介，箇中原因，或許與作為學術邊陲社群的臺灣，早年在受英美西式傳播研究洗禮下，對於傳播思想或媒

介歷史等研究的興趣不濃厚，少有契機對媒介歷史研究提出叩問。不過，或許是受惠於 1980 年後基特勒學派對媒介研究的諸多質詰及其思想遺產帶來的貢獻，近五年來，臺灣傳播學術社群對於德式媒介研究的興趣亦日益濃厚，而來自德國的文化技術學派，則是在諸多學術思潮裡最靠近媒介考古學的一支隊伍。只是，向來，國內對於德語式的媒介研究，除了仰賴翻譯進口之外，對於以英語出版的相關經典思潮內容，亦缺乏有系統性的翻譯引介。

值此脈絡下，我們格外珍惜譯著的出現，在英美脈絡的媒介研究下，提供另一趨向德式的媒介研究思潮，不僅有可能為國內傳播學術社群提供一重新論理化傳播觀念史、思想史或媒介歷史的契機，更可能激起從事獨具文化、歷史、物質脈絡的臺式媒介考古研究，提出一種合適的文化回應或迎擊，以激盪出對「西方思潮」的質詰與反思漣漪。例如：如何對電視、電報、電影、報紙、打字機等有形媒介（甚或是，不一定被認定為媒介的技術物）的設置發展脈絡，進行再一次的「歷史化」脈絡重建工作，不是在源出的歷史上打轉，而是旁及周遭相關的時代網絡。

再者，可進一步思索，媒介考古學是一觀念、方法、途徑，同時，它也遙遙指向一浩瀚且盤根錯節的技術文化文獻，本身即具有發展為媒介理論的潛力，因此，如何能在華人傳播文化的底蘊下，另闢蹊徑，正如唐直指的那樣，「用媒介概念重新打量過往的歷史，包含媒介概念缺乏的歷史」（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2），這或許是媒介考古學式的媒介研究，能被寄予厚望的主因。

亦即，在不被理解為媒介的關鍵所在，或者，一些被認定為與形成媒介認知無涉的過程，在脫離既有媒介研究認定的範疇之後，反而更能無拘束地探索何謂媒介，並浮上檯面成為媒介歷史或媒介渠道的一部分，而這正是媒介考古學的主力貢獻：重新尋回媒介的存在視域，並依此繪製成另類的媒介歷史群像的研究。

以下便逐一分述本書內容。

本書架構分三部分，共 13 篇（不含導言與後記）。首先，本書導言〈媒介考古學的考古〉（*Archaeology of Media Archaeology*）（Huhtamo & Parikka, 2011, p. 1-21），可謂是爬梳媒介考古學的「史前史」，其目的不在告訴讀者一「線性」歷史，並將其收攏為既成之論。而是，舉凡媒介考古學在何時何處發跡，此一看似妾身未明的「領域」或「方法」，其接收情形如何？在何領域發酵？有何新穎之處？如何幫助我們拓展媒介研究的視野？以及，對於當代數位文化研究的可能啟示為何等相關論題，兩位編者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分別闡述，提供讀者一基本認識

輪廓。

儘管當前學界對於媒介考古學難以有一清楚的界定範圍，大抵而言，媒介考古學與主流進步的媒介歷史敘事觀保持距離，它的目的不是追尋線性的歷史源頭，而是傾向挖掘媒介潛藏的秘密、被遺忘、忽視與受壓制的歷史（concerned with excavating secret, forgotten, neglected, and suppressed histories）（Hertz & Parikka, 2012; Huhtamo, 2013a; Huhtamo & Parikka, 2011; Kluitenberg, 2007, 2011; Parikka, 2012; Zielinski, 2008; Zielinski & Wagnermaier, 2007）。

第二部分，依據兩位編者對於各篇文章的理解，將其劃分為三面向：

第一個面向收錄四篇文章，旨在闡述媒介考古學如何作為解構歷史神話的「想像的引擎」（engines of/in the imaginary）。第一篇由胡塔莫徵引文學領域中的「主題」（topos）概念，作為穿透媒介文化表層的考古學式工具，探究同一主題如何反覆出現在各式媒介（裝置）文化中，嘗試分析不同媒介文化之間有何主題是一再地復現，有其延續性，同時亦潛藏斷裂性。例如：十九世紀時，曾出現「在你背後發生何事」（What is happening behind your back？）此一主題，當一位母親正專注於把玩西洋鏡（zoetrope）時，另一名陌生男子在其背後親吻她無暇看顧的女孩。後來此一主題反覆現身於不同的媒介裝置之上，從西洋鏡、望遠鏡至萬花筒等。有趣的是，時序轉進至二十世紀中期後，此一偷親吻女孩的男人，從軍官轉變為正逐戶銷售商品的銷售員。在這裡，我們看到「主題」在不同媒介裝置之間的「『變體』過程」，嚴格來說，胡塔莫試圖端詳「主題」在縱深時空維度中的變遷軌跡，闡述藏匿於其中的文化邏輯如何進一步生成它們。

同時，胡塔莫也特別提醒讀者，我們不應將識別不同媒介文化「主題」的過程，誤認為是一種對於既成事實的陳述，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存在差異。因為有時對於「主題」的描述，是來自於挪用修辭、旅遊指南，甚或詩歌等不同傳統的結果。

我們不妨將「主題」視為一想像工具，透過這個想像的歷史濾鏡，重新梳理各形各色的媒介裝置，讓它們彼此重新展開對話。

第二篇 Kluitenberg 談的是〈虛擬媒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Imaginary Media），他試圖抗拒技術決定論的誘惑，轉而開展「『想像的』媒介考古」，亦即，嘗試從各式媒介裝置的歷史之中遠離，轉向圍繞在科技媒介之上的各式想像敘事，包含它已實現與未實現的媒體機器（unrealized media machines）。

這是一篇有趣的想像考古嘗試，探索各式交流型態的虛擬媒介，以「『與神靈世界』交流的虛擬媒介」為例，如：通過早期的機械時鐘與手勢，揭示人與神

靈之間的禱告與交流此一過程，是可以經由機械鐘——這一類半自動式的裝置，在規定的時刻定期組織禱告；它不僅是代表永恆的秩序，同時亦如同神靈干預一般控制人類生命律動。

再者，以「『與靈魂世界』交流的虛擬媒介」來說，則是試圖通過電子技術與亡靈對話，來記錄與解譯超自然聲音，Kluitenberg 以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說法來解釋生命在逝後仍有其物質影響，例如：在電影中常出現調查人員動用攝像機、曝光技術等不同的技術設備，來捕捉消逝的形影。

此一考古目標，並非建立單一歷史（a history）或一組媒體與科技的想像譜系（lineages），而是探究這些橫跨不同歷史、論述語境（discursive setting）及其脈絡的行動中的想像（Kluitenberg, 2011），以此完成齊林斯基提出的「類考古學」（anarchaeology）工作，探掘歷史之中潛藏的秘密路徑，以冀通往媒介可能的未來。

接續兩篇，則將視角轉至與媒介考古看似毫無關聯的精神分析領域，聚焦精神、心靈、記憶等概念，以此重新脈絡化現代媒介文化。第三篇由 Sconce 執筆，以一部 1999 年上映的科幻黑色驚悚題材電影《黑客帝國》（*The Matrix*），揭開技術與心靈控制的討論序幕。他認為「不應將精神分析學家於 20 世紀 30 年代提出的『攝心／御心機器』（the influencing machine）概念，視為一種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而是應將其視為與控制心靈有內在聯繫的一種投射」（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2018，頁 24）。

之所以稱為「攝心／御心機器」，乃是源於 1919 年由精神分析學家 Victor Tausk，對一些自稱受到機器影響的分裂症患者的臨床研究。患者自稱他們的身體與心靈，受到一臺只有自己能看見的電器設備裝置控制，這個神秘設備由盒子、電池、無線電、按鈕、電線等組成，某些病患還能描繪出這臺機器的雛形。

Sconce 認為，我們不應將這種妄想視為技術的後果，而應將之視為權力與制度等的合流形成的電磁傳輸，正試圖統攝心靈、意識與身體的運作。

亦即，他以一種類似深層挖掘的歷史視野，將精神分析領域中的「殊異」現象概念化為一種「普遍」現象，試圖論證這些技術「妄想」本身，不應被理解為攝心機器的感知效果，而是積極證明了自我、能量、神秘學之間的可能聯繫，就像「無線電熱」在二十世紀開始席捲歐洲之後，這些技術運作原理，頓時成為人們勾勒現代世界的核心基礎。

或許，Sconce 意在言外的是，這類關於幻象或妄想的現象，其實也成為胡塔莫筆下所言的媒介主題，不斷地復甦與重現。亦即，從精神分析的領域出走，

其實攝心／御心機器正成為一種「廣泛的週期性現象」，從前述提及的《黑客帝國》，或更為人所熟知的《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乃至 Sconce 於 2000 年出版的《幽靈媒介：從電報至電視裡的電子精靈》（*Haunted Media: Electronic Presence from Telegraphy to Television*）一書中，認為從電報的發明至電視與計算機（電腦）的引入過程，皆與超自然現象或精神現象相關。簡言之，這種經典的技術妄想一直貫穿至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技術身上，仍然像鬼魅的影子般揮之不去。

第四篇德國電影理論家 Thomas Elsaesser 試圖從媒介考古的視域，重新論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聚焦在記憶的概念化問題，闡述佛洛伊德對精神的分析，不僅是理解感知的方式，同時也是理解存儲與處理等問題的方式（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24）；亦即，凸顯佛洛伊德將身體與心靈視同為儲存與記錄的中介，在此一層次上，精神分析本身即可被視為一種媒介理論。

乍聽突兀，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媒介理論有何關係？Elsaesser 通過對佛洛伊德的經典文章〈神秘手寫板小記〉（*Notes on the Mystic Writing Pad*），如何可以用來解釋電影技術裝置，展開媒介考古視域的解讀。同時，在此脈絡下，將佛洛伊德當作一名媒介理論家來研究，從佛洛伊德將精神視為記憶的存儲裝置開始，以及，即便他抗拒與媒介技術打交道，但在他的著述中，卻經常流露出他對於他所處時代的技術有一定的瞭解，例如：用蒸汽機來解釋心理學的概念，以及，用阻力、轉移、放電、傳導性等來闡述精神分析理論，而後者，幾乎是只有當電力，此一媒介技術在高度發展的情形下才會出現的關鍵字眼，卻也同時成為佛洛伊德對於精神的分析與考察視角。

簡言之，能源、交通革命、媒介技術等與精神及心理之間的聯繫與重疊，在佛洛伊德這裡，並無巨大差別，甚至成為一種重疊視域。這都佐證了佛洛伊德將精神與心靈視為媒介機器這層基本觀察。

從一個典型的精神分析理論，強調對感知與認同的分析，轉而以媒介考古視域下的記憶與存儲，正是在此一歷史重建過程中，Elsaesser 發掘了佛洛伊德及其理論思想如何可以聯繫至媒介研究，從而提出頗為新穎的考古嘗試與關鍵主張。

本書第二個面向，編錄四篇文章，聚焦「介面」（interface）。此面向的考古視角，討論「介面」作為連結機器與人的中介，如何在不同歷史脈絡與文化空間中，開啟不同的互動維度；以及，介面如何不僅只為數位時代的側翼，而是可與媒介的格式、美學等相提，以此追蹤媒介彼此之間如何相互靠攏的過程。

第五篇由日本學者 Machiko Kusahara 探討一產自日本的光學玩具 Baby Talkie，摸索其浮現與消失的歷史。此一裝置在 1930 年左右，短時間內在日本富裕家庭甚為流行；這是一混合式的媒體裝置，它是小型版本的西洋鏡與留聲機結合的產物，以便將動畫圖像添加至音樂中。她從幾個軸線來說明 Baby Talkie 是在多重脈絡中浮現而來，例如：從硬體設計的角度（兩部分獨立的機身設計、尺寸、材料、介面切口數、直徑大小等），考察 Baby Talkie 的技術構造如何與留聲機結合，並透過 Baby Talkie 收藏盒上展示的圖片，描繪此裝置如何操作出一幅現代家庭的娛樂裝置景象。

同時，Kusahara 亦徵引許多不同的歷史材料，將 Baby Talkie 與其他類似的家庭娛樂設備聯繫在一起，例如：1920 年代在美國蔚為流行的有聲活動電影機（Kinetophon 以及 Moviefun），來討論當時日本文化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她的考古學式研究旨在透過回望這些被遺忘的設備裝置，探問 Baby Talkie 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中被引發出來的？同時如何可以作為通往它們所處時代的敲門磚。

第六篇 Wanda Strauven 則是考察電影如何逐漸成為觸摸媒介，她將電影回置於前時代的家庭娛樂設備領域，此一人機交互過程之中。她從遊戲或者更廣義的「玩」的視角，重新脈絡化電影歷史，以考古學式的提問，闡述電影是如何嵌入至一更廣的媒介（歷史）環境中，試圖凸顯電影與其他媒介之間的關係網絡，彼此如何相互維繫與參照；同時，電影如何不受限於流動影像（moving images）的限制，將其拓展至電腦遊戲、無線通訊、繪畫等領域¹。

Strauven 進一步將電影與早期光學玩具、西洋鏡以及電子遊戲等形式相提，討論它們的形式設計觸摸與否，通過此類觸摸／行動感知（眼—腦，或手—腦）的操作鏈，再次指出人機交互的重要性。

第七篇則是跨入遊戲文化的考古領域，由德國媒介理論學者皮亞斯（Claus Pias）通過徵引文史材料，諸如：網絡協議、電腦遊戲、軍事命令、網球教學、哲學語句等，來分析電腦遊戲傳統的起源與視覺、文學傳統、人體工程學、運籌學與控制論之間的聯繫與重疊，以此積極重構技術在更廣泛範圍內的認識論意涵。

皮亞斯對計算機本身的遊戲過程進行歷史性的重構，視時間性、節奏與操作，是界定電腦遊戲的基礎框架，而這正好也是計算機遊戲為用戶提供的框架。他對於遊戲機器的觀點受益於基特勒與德勒茲的啟發，不是將「玩」歸屬為人類

1 若讀者對這類研究有興趣，評介者建議可參考曼諾維奇 (Lev Manovich, 2013b) 談 Photoshop 的例子。

的範疇，而是將觀察重點放在工具、裝置、符號、人體等的組合之上。

他通過上述看似毫無聯繫的資料，以及對於 ping 和 pong 的分析，呈現幾個遊戲文化的重點：「遊戲可以在沒有人的參與前提下運行，以及，人機互動的過程，是一種雙向測試，執行一種全然普通的責任感與在場感」（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162）。這種責任的履行是一種對於規則的服從，例如：ping 向某個特定 IP 傳送數據包，通過觀察數據包往返移動的旅行時間，推得傳輸通道的連接或中斷與否。即便，ping 與 pong 是一簡單的程序，然而，等待反饋，是 ping 的職責，以此來確認通路仍然存在。而遊戲玩家的職責，則是成為「端口」（port）。

「端口」一詞，是計算機用語，指的是計算機與外界「通訊交流的出口」，以此凸顯在遊戲過程中，即便是作為主體的人，也需遵循遊戲程序設定的規則，否則將可能提早結束遊戲，形成象徵意義上的死亡。玩家一但進入遊戲程序，就對遊戲程序的執行負有責任，與「機器與機器」之間的遊戲一樣，都僅僅是通訊流中的一個在場節點而已。

皮亞斯的通篇文章，透過對於 ping 與 pong 技術細節的描述以及涉足至其他領域的關聯性（如：遊戲場或網球場的擊中概率，使用的是傳統的運籌學方法），為我們展示對於電腦遊戲文化的研究，可以如何回到一個「非人」的考古嘗試。

向來，論及媒介之「新」穎性時，大抵不脫離一個速度學的討論範疇，即，強調媒介之新在於，技術推陳出新的速度以及擴散速度。與此路徑相反，第八篇由近年活躍於國際學術圈的新媒體理論學者 Wendy Hui Kyong Chun，轉而探討新媒介的持續短暫性，她主張，數位媒體不是關於持久性的幻想，而是關於使短暫存在的實踐和過程，凸顯數位記憶的健忘性與可擦拭性。Chun 認為，與其不斷強調「速度」是定義新媒介的重要特徵，不如強調是「非共時性」（nonsimultaneity）的新，才讓數位媒介具有持續的短暫性特性（The enduring ephemeral）。例如：一則舊的推文被當作新發現，而新發布的內容則有可能是陳舊的資訊，內容是處於不間斷地重複發布，一次又一次進行回應的過程之中，凸顯出新的非共時性特徵，而此一特質迥異於現今我們對於媒介的認識。

她在文章開頭便指出，「與其追問何謂當前的新媒介？不如探詢過去的新媒介為何？以及，新媒介將會是什麼？」（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179）循著這層問題意識，Chun 通過分析幾個小型個案來凸顯數位媒介的短暫持續性，如其中一個案：「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它是由大量的網絡爬蟲程式，以及自動備分網頁的服務器組成，這是一線上的網際網

路頁面的圖書館。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聯繫能力，常讓人誤以為它也具有恆久的記憶能力，但它的本質是時刻更新，其記憶的資訊內容也具有稍縱即逝的特點，但透過「網際網路檔案館」，此一大型線上媒體機器，可讓我們自由地控制要走向過去或前往未來，此一存儲與備份的行為，將未來扭轉成為過去的檔案。

亦即，網際網路本身沒有記憶能力，而網際網路檔案館作為一種時間機器，即是保存短暫的數位記憶的嘗試，它像是一種非物質場所，資訊之間並不真正進行實質的內容交流，而是通過保存來使網際頁面能短暫的存續在浩瀚的互聯網絡之中。

借用 Chun 的語彙來說：「媒介考古學沒有採用傳統歷史的方法，也沒有趨向進步主義」（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2018，頁 181），她做的媒介考古學較類似朝向一種重新論理化數位媒介的理論分析，尤以她獨具的系統設計工程學的背景，嘗試轉化至她對於數位媒體的分析與理論化之上，堪稱獨樹一格。在文章中，也可見這樣的推論與分析蹤影，如：討論記憶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過程，她所徵引的討論材料則擴及至早期的再生儲存器設備（水銀延遲線與威廉姆斯管），以及，在討論數位媒介的短暫性時，則援引「擴展記憶的儲存器」（Vannevar Bush 於 1945 年提出的一種名為 memex 的機器設想），透過建立相關路徑所發展出來的聯合索引系統，如何可以與後來的網際網路相結合，以解釋數位媒介的短暫性現象等。此一新穎的分析嘗試本身，不僅試圖對媒介之新提出挑戰與質疑，也透過一些不為人熟知的技術運作原理，重新思索記憶、數位媒介、短暫性之間的關聯性。

本書第三面向，集結五篇文章，探討「類比／模擬與數位」。讀者讀到這裡，一定留意到，此選輯的基本架構，基本反映了媒介考古學的深層時間觀，亦即，過去、現在與未來。

綜觀而論，這五篇文章雖分散討論記號、噪音、垃圾郵件、病毒、代碼等，但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通過一些看似被視為通訊過程的「意外」（accidents），甚或是支微末節的技術細節等，將重心轉移至媒介技術的表面物質及其深層的通訊如何運行等問題，試圖「再次復甦」這些無生命體的技術，如何往往牽動著媒介系統的耦合（coupling）或潰敗，由此處窺探在當代數位文化脈絡下，媒介考古學如何回應這些技術與它們之間的聯繫。

第九篇 Paul DeMarinis 通過錄音與樂譜以及當代藝術實踐等例子，析論物質銘刻（material inscription）的實踐行為如何回應至當代的媒介文化。他以電報、留聲機、光聲機等三大媒介技術裝置為例，探究它們「有何共同的技術基礎與社

會互動環境，揭示它們如何嵌入我們的媒介文化，即信息與噪音的文化之中」（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207）。這三大媒介技術都是實踐訊息與噪音之間的轉換工具，DeMarinis 通過建立起技術細節，以此架構出記號的點、中斷、破折，以及噪音等在信息流之間的存續，而這種特徵至今仍表現在更廣的串行數據協議範疇之中。

接續的分析視角，則是遠離以人類為中心的分析姿態，將「看似」無生命體的技術，重新拉回至媒介研究視閥，傾向觀察以媒介、機器為存儲、記錄與傳輸的物質系統，如何作為一邊際系統與其他領域產生關聯。

以第十篇為例，德國媒介考古學者恩斯特，他的學術訓練背景是文化歷史，擅長以冷凝式（cold gaze）（Parikka, 2011）的眼光對檔案進行考古，通過探索機器的內在時間過程，將焦點從歷史時間轉移至機器內部的機器時間（machine time）。

所謂的德式物質銘刻的媒介考古研究，無疑是在恩斯特這裡開始取得巨大的進展。自基特勒一脈發展下的物質論媒介研究，在德國（及歐洲）產生巨大影響開始，在柏林的媒介考古儲藏室收藏諸多，如：留聲機、西洋鏡、打字機、放映機等媒介，但它們得以跨越時空尺度在此會上一面，不是因為它們是歷史上的「舊」媒介而被集置在一起，而是這些媒介彼此之間具有的「關聯性」（relational）以及「可操作性」（operational）的物質特性而被收藏；在德式的考古取徑裡，媒介考古學面對的是，媒介之前的技術認識論結構，而非歷史敘事的結構，這也使得這些媒介的集置像是一種「物質紀念碑」（material monument）（Parikka, 2011）。

恩斯特從而主張，應將媒介考古學理解為一種分析與呈現媒介的方法或工具，只要媒介沒有被視作大眾媒介的「內容」來研究，我們就需要另外採取一種更為物質取證層面的分析方式。他的這個基本主張，使得他後來採取的研究路徑，不是在複製既有的媒介歷史敘事的宏觀視角之上前進，而是以一種更為激進的——微觀時間且非人的考古視角，通過對檔案、噪音、訊號的近距離閱讀，強調遠早於人類介入以前，機器即可記錄時光流逝，成為自己的媒介考古學家，且是一活躍的知識考古學家。

正因為媒介所記錄、處理、分析的文化數據，不再是備受推崇的敘事模式，而更多可能是數學、計算、函數模式等，使得現代媒介有技術數學性的特徵，而後者更是成為當代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這也正是為何對恩斯特來說，機器產生意義的關鍵，其實並不需要人類觀察

者的翻譯與中介，亦即，媒介成為自身考古的對象，使得媒介考古學更像是一種光學掃描儀的凝視，而非人類學觀察者的凝視。此一基本論點，幾乎不見容於正典媒介歷史之中。

第十一篇帕瑞卡探究在廣義的傳播領域中，尚未被探究的噪音以及垃圾郵件等，這類被視為通訊「它者」的問題。

自從兩位資訊理論學者 Claude Shannon & Warren Weaver (1949) 提出《傳播數學模式》（*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以來，噪音成為在通訊過程中應被嚴格區分、排除的對象，它被視為是對於通訊過程的干擾。然而，帕瑞卡認為自電報問世以來，噪音、干擾及網絡戰（cyber warfare）等，不僅是可與網絡文化中備受重視的文化／語義脈絡，並肩齊步的媒介文化課題，更是瞭解現代通訊過程的重要核心（Parikka, 2012），且仍延續至當代的軟體代碼文化之上。

他剖析噪音的誕生、干擾、混亂、傳播、攔截及其隨之而來的擔憂，如何與其他層面相互關聯，而成為媒介系統渠道的一部分；有來自黑客的「積極竊聽」，甚至是來自外星訊號，此一既神秘又離奇的色彩。儘管，噪音與垃圾郵件，通常被視為數位文化黑暗面的病毒（virus），但帕瑞卡嘗試通過此一「異常」現象來濾除（filter）當代文化。

對帕瑞卡來說，這是當代數位網絡裡極為關鍵的噪音（noise）文化，卻在既有的傳播史中被輕易抹去，正恰恰是這些極為典型的黑暗面（dark side）構成當代數位文化的立體顯影²。

第十二篇則是由藝術家 Alt 討論計算機如何可能成為一種媒介，從物導向程式設計（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OOP）概念的討論出發，受益於德勒茲的啟發，他將 OOP 視為一「抽象機器」（abstract machine），並聚焦探索「計算（機）如何被視為媒介？以及，『作為媒介』的計算機是如何取代『作為計算』的機器，並成為一種主導的隱喻？」（Huhtamo & Parikka, 2011／唐海江譯，2018，頁 270）亦即，他嘗試探索那些不被劃定為媒介範疇之內的「計算過程」，摸索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如何作為電腦科學領域與文化範疇之間的聯繫，意圖重構對於計算機更為積極的認識論，正是在此處，媒介考古學自然成為其觀察的視角。

那麼，計算機、計算過程、計算機語言，是「如何」呈顯出計算的媒介性呢？他首先簡要地回顧物件導向程式設計，曾在幾個關鍵的歷史關頭出現，卻未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如：Stephen Russell 於 1962 年設計出基於圖形的互動計算機遊戲

2 讀者亦可參考帕瑞卡其餘兩本另類媒介考古學之作（Parikka, 2007, 2010）。

《太空大戰》（*SpaceWar!*）、Ivan Sutherland 於 1963 年發布的計算機圖形應用程序「畫版」（sketchpad），至 1967 年時，由 Kristen Nygaard 等人設計的程序設計語言 Simula-67；Alt 認為，他們曾經都很有可能使這些早期的設計雛形成為新的計算典範標準（new computational paradigm），不過，由於都各自缺少了系統性的社會技術奧援，而使計算過程終止於雛形階段，無緣推及至更廣泛的計算場域。

之後，計算機科學家 Alan Kay 於 1972 年為個人筆記本計算機 Dynabook，開發一名為 SmallTalk 的編程環境，此一物件導向程式語言，凸顯出計算的媒介性的幾個關鍵特徵，如：可擴展性（extensible）、多態性（polymorphism）等，亦即，在更廣的程度上，凸顯了計算作為媒介的進程，此一當代計算環境的現實。亦即，計算機在有了 OOP 之後的計算機才稱得上是成為了一種媒介。

將時間刻度往前拉回一些，遠早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誕生之前，Christopher Strachey 就曾訓練過計算機寫情書。第十三篇由 Noah Wardrip-Fruin 執筆的「數位」媒介考古討論，即是以 Strachey 於 1952 年發明的「情書生成器」（love letter generator）為例，拆解它的輸出、數據與計算過程（computational processes），主張唯有瞭解這些計算編程如何運作，才能洞察它如何作為「生成表象」的機器。

Wardrip-Fruin 主要經由數據（data）以及程序（processes）兩面向著手。他發現情書生成器有一個話語模式，即是按照「我的一（形容詞）—（名詞）—（副詞）—（動詞）你的一（形容詞）—（名詞）」，並由數據庫進行詞語的挑選，填進相對應的位置。通過這個設計好的模型，它所輸出的情書文本具有一定的結構性。他進一步比較情書生成器與一個來自實驗性文學的研究組織，發展出來的一個詩歌作品《100,000,000,000,000 首詩》（*A Hundred Thousand Billion Poems*），此一作品由十首十四行詩組成，箇中深意即是，任何一首詩的組成結構使得潛在的詩歌數量，遠遠大於十首。這是一個可以由讀者選擇與創作的文學作品，通過任何一首詩的第一行，再選擇任何一首詩的第二行，緊接著再任選一首詩的第三行，依此創造出一首可以取代原先作品的十四行詩。

Wardrip-Fruin 探究的是，情書生成器與這些詩歌之間的操作與排列結構，來探索情書生成器因為通過操作與選擇較小的獨立單詞的過程中，相較於十四行詩作品，而獲得更多組合的可能性。

其次，則是通過比較「跳棋博弈遊戲／程序」（checkers-playing program）與情書生成器之間的基本區別，來凸顯它們是如何選擇的，以及這些涉及選擇的

過程又是如何完成的。此一跳棋程序，是 Strachey 早在情書生成器之前，開發的程序設計方案。它建立的規則是，機器在每選擇可以走動的一步過程中，發現了可以回擊對手的所有合法步驟，並且一一嘗試，再根據自身的走動路徑以及對手回應的組合之間，推論自己可以進行的第二步。

Wardrip-Fruin 闡述，倘若跳棋程序是通過觀察當前的棋局狀態來做出決策，則表示它必須掌握當前的信息狀態，從而知曉在何處開始下棋。這意調的是，選擇的過程代表對於下一步的向前投射。然而，情書生成器則是必須知曉編程程序正處於情書文本的哪一階段，是在「開始」、「本文主體」，亦或「結束」的位置，而也囿於可以選擇的單詞與句型都是隨機狀態，使得情書生成器無法積極向前投射未來的可能性。

簡言之，Wardrip-Fruin 試圖瞭解情書生成器的操作以及它實際上是如何運行，通過對於這個支撐系統的拆解與比較過程，來瞭解當前數位軟體文化的運作邏輯。

循此，他的分析軸心脫離意義學式的範疇，轉而強調「軟體」編程潛藏的文化邏輯，其實正逐步滲透至當代文化的各面向，成為「敘事」的一部分。此一呼籲，迥異於德國媒介物質主義學派強調的「硬體」分析導向。

本書〈後記〉，Vivian Sobchack 經由回望全書各篇所論的媒介考古學式研究，她認為不應將媒介歷史視為總是以「連續性」及「目的論」的姿態，來到我們面前，而應更凸顯過去在此時此地的在場，以及將當下與未來呈顯為永恆的過去，同時，將備受忽視的媒介及其認知過程重新尋回至媒介系統性的隊伍之內。此種意圖聯繫不同時空的企圖，將使得媒介之間並不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別，主要端視我們如何尋找存於它們之間的可能神秘聯繫。

綜觀各篇內容，在前述論及的理論座標中，媒介考古學該如何定位自身？承如兩位編者所言，「媒介考古學在各個學科之間移動自如，沒有一個置身其間的永久家園」（Huhtamo & Parikka, 2011 / 唐海江譯，2018，頁 3），它的高度分歧性以及難以歸類的特性，成了媒介研究建制化過程的化外之地。我們不妨將媒介考古學視為在這個座標「之間」浮現而出的論述圖像，它是一種在各學科領域之間的「論述旅行」（discursive travelling）。亦即，尋找媒介群像的知識、技術、文化在這些學科之間的聯繫、重疊、分歧，不是僅停留在片段的軼事範疇，而是試圖追問那些在正典敘事之外，未曾被意識到的「潛在脈絡」，如何可能成為媒介認知過程的一環。

此一定位顯然有別於兩位編者的定義與想像，實際而言，這也是媒介考古學自 1980 年顯其蹤跡以來，如影隨形的學科定位與方法學包袱。然而，與其追問它的定位，不如轉而思索它與「新」媒體研究的關聯性，或許可以回過頭來幫助我們思考它的理論位置，為何是一種論述旅行。

以網際網路為例，支撐與維繫其浮現的重要物質基礎：海底纜線，深埋在海底成為沉默的服務者，一如現代通訊的僕人。它實際牽動現代文明溝通的發展，卻未曾成為媒介研究的關鍵篇章，忽略這種典型技術的連結意涵，將可能錯失媒介研究的「全景」。

當我們想探問，海底纜線作為關鍵的媒介技術，如何干涉於現代的網絡社群。在這樣的研究裡，我們必須下至海底，探索其工程技術的運作原理，也需上至雲端探索虛擬的傳播系統，更需著陸，將旁及媒介技術的運作過程、操作程序、理念、知識等一系列物質條件，通過對技術細節的描述與歷史先例聯繫起來，正是在此一關鍵位置，媒介考古學式的人文分析意涵開始冒出頭來。例如：Starosielski (2015) 進行的《海底網絡》研究，便可視為是在多學科領域之間遊蕩的論述旅行。

亦即，所謂的「論述旅行」，是這樣從技術細節之處窺探媒介群像，尋找媒介之間的關聯性如何慢慢靠攏的過程。如今，只是透過一種或一系列密切相關的方法，通常被命名為媒介考古學的途徑，將此一深層結構的鏈結過程，重新發掘出來。

在此，也須提醒讀者，儘管各篇內容之間未有連貫性，但無論是兩位編者在〈導言〉中描繪的學科版圖，亦或，本篇書評的結構布局方式，皆可能形成另一種對於媒介考古的「再現圖像」；評介者也有意識地反覆使用，如：復現、考掘、視閱、群像等後設字眼，這種積極重構認識論的本身，也可能暗藏特定觀點或框架的傾斜。正如全書隻字未提「再現」，卻也無法遮掩，他們抗拒主流歷史有一特定再現媒介的角度，只是，媒介考古學「顯影」媒介的方式，不是僅將分析停留於不同片段的軼事範疇，而是通過此歷史斷片積極重構更為廣袤的媒介群像，以更為謙遜的新歷史主義的態度，來思索媒介的意涵。

概括而論，無論是從本書中的任何一個案或觀點來看，基本上，所有的媒介都是歷史的集置 (historic constellation)，亦即，媒介本身是巨大冰山網絡的一角，潛藏不同的行動、情境、感知條件等，媒介考古試圖揭示媒介所處的存在視域，以及如何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為其顯影。

肆、媒介的深層時間：文化技術與媒介概念的聯繫

讀者閱覽全書後，或許心中潛藏一疑惑，媒介考古學如何挖掘更古老的媒介？如何定義這些古老的技術？以及，如何想像與連結它們與當代的關係？

當代，各式媒體及其新興的媒介形式出現後，我們對於何謂媒體開始有不同的論述想像。例如：基特勒 (Kittler, 1995) 的「沒有軟體」(There is no software)；曼諾維奇 (Manovich, 2013a, 2013b) 的「只有軟體」(There is only software)、「軟體之後的媒體」(media after software)、「媒介軟體」(media software)；席格特 (Bernhard Siegert, 2003) 的「沒有大眾媒體」(There are no mass media)；霍恩 (Eva Horn, 2007) 的「沒有媒體」(There are no media)；皮亞斯 (Pias, 2011) 的「媒介曾經是什麼」(What were media)；溫斯洛普楊 (Geoffrey Winthrop-Young, 2010) 的「硬體／軟體／濕體」(hardware/software/wetware) 等。這份關於究竟何謂媒介的本體論的清單，還可以繼續增列下去。究其實，他們試圖回應的是一個關於媒介的前世、今生與未來的譜系問題。而不論我們談論的是何字眼，從媒介考古視之，重點在於媒介及其周遭可能相互關聯的軼事。

如果說，上述諸種概念可以表現當代媒介譜系某些面向的特性，那麼，媒介考古學如何探索現代「之前」的媒介，可以直接用現代的媒介概念去理解嗎？這確實成了研究難題。從媒介考古的視角來看，自然可以以發展的新概念去逆向挖掘歷史上曾出現的媒介，但不免落入概念適用性與否的爭論。

針對此問題，有兩派爭論，其中一派觀點，如：恩斯特 (Ernst, 2013，轉引自 Born, 2016) 率先提出「中世紀無媒介」(There are no medieval media) 概念，「強調能夠稱為媒介的，必是具有現代電子技術意涵，以此嚴格性的界定，區分現代媒介與中世紀之別」(同上引, p. 110)。恩斯特反對的是，以現代術語回望中世紀，但不代表他反對採用文化技術概念來研究前現代媒介 (pre-modern)。

另一派觀點說得更直接，伯恩 (Erik Born, 2016) 認為「文化技術」可以作為媒介概念的早先聯繫，以此協助媒介考古進行深層聯繫的考掘工作。從字源追溯來看，「文化 (culture) 源於拉丁文 “colere” 與 “cultura”」(Siegert, 2015, p. 9)。文化技術，它的德文是 “Kulturtechniken”，這個字眼首次使用是在農耕領域 (agricultural domain) 出現，自 19 世紀晚期至今以及在德國理論中的發展，與德國在農耕技術上的歷史進程互有關聯 (Siegert, 2013, 2015；Winthrop-Young, 2013, 2014; Young, 2015)，如：大規模的改良程序，灌溉、排水耕地、截彎取直拉直河床或建造水庫等，這些試圖改造自然地貌的方式，使得文化技術在德國的

農林耕脈絡裡成為代表環境工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的專有指涉。至 20 世紀 70 年代，文化技術蹤跡的現身與類比及多元的新媒體環境相關。在此脈絡下，文化技術指的是一些基本技能，諸如：閱讀、寫作和算術等等（Siegert, 2015, p. 10）。亦即，該概念最初描述旨在耕種土地並使之適合居住的工程過程，爾後與其近來的媒介多元脈絡發展相互融合。

此一轉變脈絡，共同凸顯的重點是，文化技術概念被用以指稱「行動者、技術、器物」之間的運作鍊（chains of operations）（Siegert, 2013, 2015; Winthrop-Young, 2013, p. 4-6, 2014）。亦即，「文化技術」作為人與非人之間構連的過程（the process of articulate），以及啟迪德國技術哲學一脈的發展，此思潮亦激勵了後繼德國學界對於知識或文化物件，更為廣泛且跨越學科邊際的探索（Cruz, 2017; Ernst, 2013; Geoghegan, 2013; Parikka, 2013; Siegert, 2011, 2012, 2013, 2015; Vismann, 2008; Vogl, 2007; Winthrop-Young, 2006, 2011, 2013, 2014），其將研究焦點著眼於文明歷史上不同的文化技術，包含：門、地圖、信使、郵政系統、索引卡以及閱讀術等，與歷史文明進程的關係及其無意識過程（Geoghegan, 2013）。這派思潮著眼於媒介技術所設置的物質條件及其脈絡如何構成意義，而非強調媒介內容再現的意義。

熟悉這個概念的讀者，或許並不陌生一個著名的例子，德國媒介文化技術學者威悉曼（Cornelia Vismann, 2013）以犁為例，犁在地上犁溝，標誌與圈限出法律、秩序、習俗，以及野蠻、混亂等內外之別。進一步而言，犁是劃定領土所有權（特別是羅馬帝國）得以出現的技術物質基礎，亦即，它是主權概念能浮現的一種文化（操作）技術。

另一例子，席格特（Siegert, 2015, p. 45）指出，烹飪是文化技術，從本質而言，它區分食用與不可食用食物，創造出生食與熟食之別，也正是這個透過技術所完成的區辨過程，文明文化與野蠻之隔一去不回。這也讓我們想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分析無數的神話後，認為烹飪是處理自然與文化差異的典型技術（Lévi-Strauss, 1969 / 周昌忠譯，1992），即便，他並沒有使用文化技術一詞。換言之，即便席格特與李維史陀分擅兩個不同的學術場域，使用不同的學術語言，但他們都試圖瞭解烹飪在人類馴化過程中所起的交互演化作用，何以使得人類區別於其他獸化動物。這一系列的區別過程，更涉及「進階」的文化技術鉸鏈的操作，諸如：區分用餐時段、餐前禱告、使用餐具吃飯、遵守相關的用餐禮節等，皆具有區辨文明化文化的作用。進一步而言，若從這個演化結果的角度來看，「門」自然也是區分人類家居演化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技術，相關的文明

與隱私概念油然而生 (Siegert, 2015)。

我們僅能在此以稍短的篇幅說明，根據伯恩 (Born, 2016) 的觀點，中世紀的文化技術與現代的媒介概念之間，不僅具有概念上的早先聯繫關係，在分析意義上，更是幫助我們在挖掘現代文化的偶然性如何浮現時，其與文化技術作為媒介的前結構 (pre-condition)，有一追尋的線索。

也就是說，無論是從犁、門、烹飪等例子，揭示文明化的文化正是建立在這些技術的操作與實踐區別之上。從此角度看，將文化技術放在當代脈絡來看，不僅有了必須被討論的意義，亦有作為（現代）媒介研究的現實意涵。

當然，更重要的意義是，它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了探索媒介隱匿消失與浮現的可能意涵。

究其實，作為文化技術的媒介，此一深層時間的聯繫，給予媒介考古學的啟示，分三面向。

一、拓展媒介研究的範圍

一如「文化技術學者所談的媒介，如：門、僕人、動物、法律等，並非是英美媒介研究脈絡裡所指涉的『媒介』意涵」(Parikka, 2013, p. 148)。以席格特 (Siegert, 2008，轉引自 Parikka, 2013, p. 148) 的語彙來說，「早期的德國媒介理論無忌憚地進入各領域，挖掘受人文學科領域束縛的源頭，而又無需顧慮其根深蒂固的『媒介概念』(concept of media)」。換言之，從學科領域中鬆綁，同時亦擴大媒介研究涉足的領域。媒介考古學探索的範圍從留聲機、電影等這般具有現代意涵的媒介，亦擴及至索引卡、日曆、目錄等更古老的文化技術如何形成古老網絡。

二、媒介技術的出現是一操作鍊的運作過程

當我們在強調與彰顯德國媒介理論對於文化技術「動態過程」的強調，一方面，一如席格特 (Siegert, 2012, 2015) 指出，它們是一種運作鉸鏈的（動態）過程 (chains of operations)，我們必須按照它為我們制定的規則行事 (act)，如：門的推或拉，打開或關閉等。媒介考古學從此處看見，媒介技術的出現「過程」是探問的焦點，而這個過程包含了技術於動態脈絡變化中的「諸種實踐方式」，「遠早於」特定的媒介技術的專殊化之前。

三、媒介歷史（media histories）是相互關聯的文化技術史

從「文化技術」作為媒介一詞統攝的出現及其相關的「轉變脈絡」，凸顯媒介始終作為一種需加以探究的技術運作的本體，或操作本體（ontic operation），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技術的網絡」（media as networks of cultural technologies），媒介的歷史是一相互關聯的文化技術史（Siegert, 1999, 2011, 2012, 2013, 2015），這個由席格特（Siegert, 2015）改寫媒介概念的基本主張，曾幾何時近乎成為當代媒介發展的現實地圖，精確一點地說，媒介不再是傳統視域下，所謂單獨使用或探究文化語意等的經驗主義式圖像，而是強調從更為基礎的物質—技藝面向思索媒介的意涵。彼得斯（Peters, 2015）曾以 Google 為例，「Google 的崛起，使得我們對於探索『古老』媒介的相關性迫在眉睫，此一基於演算運作的文化技術服務，殖民了我們的桌面，諸如：搜尋、文件儲存、日曆、地圖、信件、導航，以及翻譯等」。這些橫跨不同媒介系統的文化技術的操作與實踐，不僅提供一種相互索引的參照性，同時也將媒介研究帶向一深層的「技術化與計算化（computerization）年代」。

換言之，人們通常認為數位化與計算機技術是密不可分的，但，或許數位化是更古老的文化歷史的一部分。以演算技術而言，我們應該可以質疑它能有多新？從古老蘇美爾泥板到現代計算機代碼，何嘗不是歷史文明進展中相互連結的文明技術網絡。當我們從媒介考古角度開始考慮這類問題時，現代數位世界的數據流其實與悠遠的文明加密技術與脈絡，如：代碼、早期魔術實踐、現代戰爭等，脫離不了千係。

伍、媒介考古遙指未來的現在：往返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書評尾聲，為呼應本書第三面向探索的「類比／模擬與數位」篇章，意在遙指媒介考古學式研究的未來，評介者亦根據此提供淺見。

仔細回想，在文化研究席捲歐陸的年代裡，備受熱論的關鍵詞彙是人、主體、能動性、意義、霸權等，而在進入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Weiser, 1991）的年代裡，媒介研究每隔幾年便重新定義、翻修「當代」關鍵詞彙（critical terms），諸如：大數據、程式碼、演算法、物聯網等。這些曾經占據電腦科學領域的資訊語彙，也成為傳播研究的時髦詞彙，更不用談，近年媒介理論也亦步亦趨地與其他研究接軌，如：後控制論、平臺研究、批判程式碼研究、軟體研究、社會網絡分析等。

這種「非人」(non-human)轉向，恐怕是未來媒介研究需加以深究之處。亦即，媒介所處的存在視域，如何從古老的網絡演化至現代的文明樣態，以及如何將那些沒有被明確地上下文化(contextualised)的軼事，成為歷史網絡的一部分。

評介者提供兩點基本觀察，從時間與空間維度出發，進行媒介考古學式的探索。

一、時間維度考古：成為歷史網絡

以雲端的史前歷史(prehistory)為例，Tung-Hui Hu (2015, p. 146)指出，數位雲會主動消除其自身的「歷史性」(erases its own historicity)，他透過想像的另類歷史方案，重新考察雲端的史前史的過程中，揭示關於雲(cloud)的文化幻想(cultural fantasy)，進一步指出，雲端如何從鐵路網絡、下水道系統以及電視線路等較舊的歷史性網絡中演化而來，它們為數位雲端的浮現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基礎架構(historical infrastructures)。

此處值得思考的是，媒介考古學暗藏這樣的視角，即網絡，早在現代網絡社會出現之前即已存在。亦即，媒介考古考慮的是，如何將「媒介視為網絡」(media as networks)，以及，如何將「網絡視為如同媒介」(networks as media)般地觀察與分析。此處，網絡是「複數」的，在時間的推移中，它們如何成為歷史網絡的一部分，由此區辨出多少紛沓的文明樣態。

二、空間維度考古：媒介、地球歷史與技術的聯繫

在既有的媒介研究中，「環境」幾乎是一抽象運作的概念，少有研究闡述環境之於媒介的意義。帕瑞卡(Parikka, 2015)敏銳地關注到此議題，他從齊林斯基對媒介採取的深層時間(deep time)觀的視野中，發展出以地質學的角度拓展媒介研究的視野，將媒介的歷史推及至數千年之前。

他認為媒介研究不應僅止於研究「當世」的媒介，而是應凸顯組成媒介的原始物質(raw materials)與歷史地質層之間有何關聯性，以歷時性的時間尺度將媒介的物質與生態，置於更廣袤的地球歷史之中。此一真正的回歸物質沉積層的研究，亦有論者謂之媒介激進論。以當代各式電子廢棄物為例，我們甚少關心這些退場的媒介，後來去了哪裡？近十年以來，「數位垃圾」(digital rubbish)、「媒介廢棄」(media waste)、「電子廢棄物」(electronic waste)、「傳播的生產／

物質環境與綠色思維」(greening the media)、「媒介自然」(medianatures)、「計畫性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 (Cubitt, 2016; Gabrys, 2011; Hertz & Parikka, 2012; Maxwell & Miller, 2012; Parikka, 2011, 2013, 2015; Rust, Monani, & Cubitt, 2015) 及其相關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等議題，開始進入媒介研究的視野。論者們開始意識到媒介與自然環境之間的深層聯繫，開啟一波以媒介的自然史與生態史為書寫重點的媒介研究。例如：加布雷斯 (Jennifer Gabrys, 2011) 研究媒介設備／裝置的物質壽命。也就是說，這些新一代的媒介理論學者也重新界定何謂媒介生態 (media ecology)，凸顯自然與技術之間的聯繫。

前述時、空維度的探索，無疑地提醒我們朝向一種網絡式的媒介考古研究。尤其是，網絡一直是作為支撐與維繫人類文明的亙古存在。我們可以做的是，當某些維繫特定網絡方式的技術出現時，謹慎說明此一技術細節為何，如何與其他技術相互關聯，考慮它在不同網絡中的意涵，進一步，如何可以幫助我們描述與重構更廣袤的社會歷史文明秩序。

綜觀而論，無論是從何角度進行媒介考古式的媒介研究，應能同意一個基本論調，即，不流於任何有關歷史哲學觀念的大解釋模型，這類的既成之見。同時，亦拓墾為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基本運動與倡議，從地質學、文化學、遊戲學、海洋學、電影學等，都試圖揭示當媒介成為一基礎字彙，打散至各領域時，媒介不僅成為當代基礎的論理架構，亦開展出不同深層維度探索，讓我們看到另類的「媒介歷史」嘗試。

同時，綜觀本書各篇所嘗試的考古取徑，他們亦婉拒古老與數位是兩碼子事，一如基特勒徵引不同的歷史插曲、軼事，引入一種非線性的媒介歷史觀，不是將寫作、計算、音樂、數學的歷史，描述為線性進步的歷史 (Armitage, 2006)，而是視為同步的文明過程，因為「即便像是文學，以字母（表）這般古老的媒介，來處理、存儲與傳輸文本，這類操作（資料）的過程，其實都具有與計算機技術相同的『技術積極性』 (the same technical positivity)」(Kittler, 1990, p. 370)。換言之，所謂技術的積極性，並非專屬演算時代的事，數位也是更古老的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可能透過媒介考古學式的視角登上一艘新世紀之船，重新思索與改寫關於媒介新穎性的諸種措辭，將媒介視為多面的立體棱鏡觀之。

參考書目

- 周昌忠譯（1992）。《神話學：生食與熟食》。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Lévi-Strauss, C. [1969]. *The raw and the cooked*.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唐海江譯（2018）。《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Huhtamo, E., & Parikka, J. [Eds.]. [2011].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rmitage, J. (2006). From discourse networks to cultural mathematics: An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 17-38.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06069880>
- Born, E. (2016). Media archaeology,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the middle age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before the media. *Seminar: 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 52, 107-133. <https://doi.org/10.3138/seminar.52.2.2>
- Crary, J. (1990). *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ruz, M. T. (2017). *Media theory and cultural technologies: In memoriam of Friedrich Kittler*.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 Cubitt, S. (2016). *Finite media: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Ernst, W. (2013). *From media history to Zeitkriti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132-146.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96286>
- Gabrys, J. (2011). *Digital rubbish: A natural history of electronic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eoghegan, B. D. (2013). After Kittler: On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recent German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66-82.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88962>
- Gitelman, L. (1999). *Scripts, grooves, and writing machines: Representing technology in the edison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 *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oddard, M. (2013). Book review: Erkki Huhtamo and Jussi Parikka (eds)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 12, 190-194. <https://doi.org/10.1177/1470412912468714>
- (2020). Genealogies of immersive media and virtual reality (VR) as practical aesthetic machines. In B. Herzogenrath (Ed.), *Practical aesthetics* (pp. 171-181).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 Hertz, G., & Parikka, J. (2012). Zombie media: Circuit bending media archaeology into an art method. *Leonardo*, 45, 424-430. https://doi.org/10.1162/LEON_a_00438
- Horn, E. (2007).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 media. *Grey Room*, 29, 7-1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0442772>
- Hu, T.-H. (2015). *A prehistory of the clou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uhtamo, E. (2013a). *Illusions in motion: Media archaeology of the moving panorama and related spectacl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13b, May 3). Q&A with Erkki Huhtamo. *MIT Press*. Retrieved January 11, 2020, from <https://mitpress.mit.edu/blog/qa-erkki-huhtamo>
- Huhtamo, E., & Parikka, J. (2011).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rschenbaum, M. G. (2008). *Mechanisms: 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ittler, F. A.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There is no software. *C-Theory: Theory, Technology, Culture*, 32, 147-155.
- Kluitenberg, E. (Ed.). (2007). *Book of imaginary media: Excavating the dream of the ultimate communication medium*.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NAI.
- (2011). On the archaeology of imaginary media. In E. Huhtamo & J. Parikka (Eds.),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p. 48-6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doi.org/10.1525/9780520948518-005>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ger, A. (2013).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6, 1009-1012.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2.722224>
- Manovich, L. (2013a). Media after softwa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12, 30-37. <https://doi.org/10.1177/1470412912470237>

- (2013b). *Software takes command: Extending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New York, NY: Bloomsbury.
- Maxwell, R., & Miller, T. (2012). *Greening the med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ikka, J. (2007). *Digital contagions: A media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viruse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2010). *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11). Operative media archaeology: Wolfgang Ernst's materialist media diagrammat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8(5), 52-74.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1411496>
- (2012).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Malden, MA: Polity.
- (2013). Afterword: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media stud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3), 147-159.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501206>
- (2015). *A geology of med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eters, J. D. (2008). Strange sympathies: Horizons of media theory in America and Germany. In F. Kelleter & D. Stein (Eds.), *American studies as media studies* (pp. 3-23). Heidelberg, Germany: Winter.
-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London, U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as, C. (2011). Was waren Medien-Wissenschaften? Stichworte zu einer Standortbestimmung. In C. Pias (Ed.), *Was waren Medien?* (pp. 7-30). Zurich, Switzerland: Diaphanes.
- Potts, J. (2013). 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Screen*, 54, 113-117. <https://doi.org/10.1093/screen/hjs074>
- Rust, S., Monani, S., & Cubitt, S. (2015). *Ecomedia: Key issu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once, J. (2000). *Haunted media: Electronic presence from telegraphy to televis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hannon, C. E., & Weaver, W. (1949).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iebert, B. (1999). *Relays: Literature as an epoch of the postal system* (K. Repp,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3). There are no mass media. In H. U. Gumbrecht & M. Marrinan (Eds.), *Mapping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digital age* (pp. 30-3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Cacography or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echniques in German media studies (G. Winthrop-Young Trans.). *Grey Room*, 29, 26-47. <https://doi.org/10.1162/grey.2007.1.29.26>
- (2011). The map is the territory. *Radical Philosophy*, 169, 13-16.
- (2012). Doors: on the materiality of the symbolic (J. D. Peters, Trans.). *Grey Room*, 47, 6-23. https://doi.org/10.1162/GREY_a_00067
-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Or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 postwar era in German media theory (G. Winthrop-Young Tran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48-65.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88963>
- (2015).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Starosielski, N. (2015). *The undersea networ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rne, J. (2006). The mp3 as cultural artifact. *New Media & Society*, 8, 825-84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06067737>
- (2012). *MP3: The meaning of a forma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Vismann, C. (2008). *Files: Law and media-technology* (G. Winthrop-Young,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sovereign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83-93.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96851>
- Vogl, J. (2007). Becoming media: Galileo's telescope. *Grey Room*, 29, 14-25. <https://doi.org/10.1162/grey.2007.1.29.14>
- Weiser, M. (1991).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Scientific American*, 265(3), 94-105.
- Winthrop-Young, G. (2006). Cultural studies and german media theory. In G. Hall & C. Birchall (Eds.), *New cultural studies: Adventures in theory* (pp. 88-104). Edinburgh, UK: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 (2010). Hardware/software/wetware. In W. J. T. Mitchell & M. B. N. Hansen (Eds.),

- 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 (pp. 186-198).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1). *Kittl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Preliminary remark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3-19.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500828>
- (2014). The Kultur of cultural techniques: Conceptual inertia and the parasitic materialities of ontologization. *Cultural Politics*, 10, 376-388.
- Young, L. C. (2015).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logistical media: Tuning German and Anglo-American media studies. *M/C Journal*, 18(2). <https://doi.org/10.5204/mcj.961>
- Zielinski, S. (2008).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Zielinski, S., & Wagnermaier, S. (2007). *Variantology 1: On deep time relations of arts,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Köln, Germany: Walther König.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Illuminating the Hidden Histories of the Media Through Media-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Chang, Hui-Lan*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Erkki Huhtamo and Jussi Parikka Eds.), part of volume from Wolfgang Ernst, Jussi Parikka, Claus Pias, et al. Their scholarly works adopt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hat rejected linear narratives to understand the study of media; they instead emphasized more on the material underpinning of media as well as related the media study to the conditions of media cultur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the paper introduces to how to think of media archaeology as discursive travelling that emerges from the field of media as well as sets out to illuminate its core idea resonating with the various theoretical positions as well, e.g., media forensics, infrastructure studies, and platform studies. Second, the article examines each chapter in this edited volume and further illuminates its argumentation concretely. Third, in the light of this materialistic epistemology, the paper thus extends into discussions regarding how the media archaeology excavated the “historical media” with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technique. Fin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media archaeology should take the notions of “media as networks” as well as “networks as media” into conside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more archaeological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ulture.

Keywords: media archaeology, becoming-media, material structure, cultural technique, media as networks

* Email: huilanchang1990@gmail.com

Received: 2020.5.15

Accepted: 2020.11.30

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 年 1 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與舍我紀念館共同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近日規劃中專題如下，歡迎各位共同參與。

■ 運動傳播——後疫情的重整與新視野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瞻性之研究論述；
-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論文長度原則上為 12,000–25,000 字為主）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文自 3 卷 2 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 四、研究紀要：研究議題重要且具前瞻性，能系統闡述特定領域相關文獻或最新變動情況，已通過審查但與一般論文的偏重不同，以研究紀要刊出。
- 五、典籍再現：不定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典籍再現自 10 卷 2 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 六、口述歷史：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或本刊編輯規劃之口述歷史專題。
-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參、審查制度

-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3 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改權。
-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 （一）刊登；
 - （二）修改後刊登；
 - （三）修改後再審；
 - （四）退稿。
 - （五）其他。
-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修改）約花費 3-6 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 （一）刊登 vs. 退稿；
 - （二）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七版撰寫體例。
-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本刊即予撤稿。
- 四、「特邀論文」、「口述歷史」、「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 五、論文一經刊出，致贈當期期刊 1 本，與該文 PDF 檔案。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www.ipress.tw/J0014?pWebID=490>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11卷 第1期 2021年1月 Volume 11 Number 1 January 2021

科技部TSSCI 期刊

出版者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Ainosco Press
Publisher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nosco Press
期刊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dd	No. 1, Ln. 17, Sec. 1, Muzha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 Taiwan
電話 Tel	+886-2-22368225 ext. 83103
傳真 Fax	+886-2-22367150
電子信箱 E-mail	crpjour@gmail.com
華藝地址	234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Add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電話 Tel	+886-2-29266006
傳真 Fax	+886-2-29235151
電子信箱 E-mail	press@airiti.com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221-1411
iPress	http://www.ipress.tw/J0014
Airiti Library	電子期刊全文請上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為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傳播研究與實踐

發行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950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郵寄地址：234634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服務信箱：aporder@airiti.com
Ainosco Press 網站：http://www.ainoscopress.com/

個人訂閱價					圖書館／機關團體訂閱價				
	一期		一年			一期		一年	
新臺幣	\$ 350		\$ 600		新臺幣	\$ 700		\$ 1400	
歐洲	€ 31		€ 58		歐洲	€ 48		€ 96	
美洲	US\$ 36		US\$ 66		美洲	US\$ 56		US\$ 112	
亞太	US\$ 33		US\$ 60		亞太	US\$ 53		US\$ 106	

訂閱	卷	期	至	卷	期		數量		金額	
臺灣郵寄處理費	印刷品一本平信 40 元，印刷品一本掛號 60 元。						數量		金額	
* 以上價格含稅							總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期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nosco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銀行匯款

帳戶資訊	戶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埔墘分行
	代碼	總行代碼：808；分行代碼：0174
	帳號	017 444 001 9696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634, Taiwan (R.O.C.)

Tel: +886-2-29266006 ext. 8950

E-mail: aporder@airiti.com

Fax: +886-2-29235151

Website: <http://www.ainoscopress.com>

PERSONAL				LIBRARIES / INSTITUTIONS			
		1 Issue	1 Year			1 Issue	1 Year
Europe		€ 31	€ 58	Europe		€ 48	€ 96
US/CA		US\$ 36	US\$ 66	US/CA		US\$ 56	US\$ 112
Asia/Pacific		US\$ 33	US\$ 60	Asia/Pacific		US\$ 53	US\$ 106

Vol.	No.	—	Vo.	No.	Copies	Price US\$
* Postage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rice.						TOTAL US\$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Please note that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are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nosco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VIA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634, Taiwan (R.O.C.)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 Puchien Branch
Account No.	017 444 100 6149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 188, Sec. 2, Sanmin Rd., Banqiao Dist., New Taipei City 220736, Taiwan (R.O.C.)